

THE JOY OF FREEDOM

欢乐的经济学

一门关于市场经济的必修课

[美] 戴维·亨德森 (David R. Henderson) 著

王志毅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www.PearsonEd.com

半自传性质的《欢乐的经济学》是为自由社会吹响的号角，行文优雅，充满激情，却又思虑周全，信息丰富且曲尽其妙，对自由社会的道德规范做出完美的解说，同时也详尽地探讨了它在社会实践中的优点，指出了普遍存在的政府干预带来的害处。

——米尔顿·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拿起来就放不下的好书……经济学原理在这里不是干巴巴的理论，而是亨德森教授鲜活的生活经历。跟随他的故事，我们能够看到日常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学逻辑。

——谢尔比·史蒂尔，胡佛经济研究所

一部耀眼的知识分子回忆录，一门有关市场经济的高水平课程，一次令你震撼的阅读体验。

——丹·塞利格曼，《福布斯》杂志

THE JOY OF FREEDOM

奇文雲海 
www.qwyh.com

ISBN 7-208-06426-1



9 787208 064263 >

定 价：28.00 元

易 文 网：www.ewen.cc



THE JOY OF FREEDOM

欢乐的经济学

一门关于市场经济的必修课

[美] 戴维·亨德森 (David R. Henderson) 著

王志毅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欢乐的经济学：一门关于市场经济的必修课 / (美)

亨德森 (Henderson, D.) 著；王志毅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书名原文：The Joy of Freedom

ISBN 7-208-06426-1

I. 欢... II. ①亨...②王... III. 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9425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策划编辑 王志毅

责任编辑 储卉娟



世纪文景

欢乐的经济学：一门关于市场经济的必修课

[美] 亨德森 著

王志毅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3.25

插页 1

字数 241,000

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426-1/F·1462

定价 28.00 元



《欢乐的经济学》探讨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我们看到无处不在的自由契机。继弗里德曼夫妇的《自由选择》一书之后，成为倡导自由市场的最有力论证。沿着同样的思路，作者粉碎了支持政府插手环境规制、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传统观念，并且我们证明了为什么政府过分干预只会让贫穷永延，而非消除贫困。

THE JOY OF FREEDOM

作者简介

戴维·亨德森 (David R. Henderson) 生于加拿大，数学学士 (University of Winnipeg, 1970)，经济学博士 (UCLA, 1976)。现任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加州蒙特利海军研究学院经济学副教授，曾主编 *The Fortun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Warner Books, 1993)，除学术论文之外，他还为《纽约时报》等颇具影响力的媒体撰写各类专栏文章，曾担任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并在涉及税收、卫生、能源等各个领域的政策听证会担任专家证人。



献给正在世界上发展的未知文明^{*}

• 该献辞的灵感显然来自于哈耶克在《自由宪章》（或译《自由秩序原理》）中所写的献辞：献给正在美国发展的未知文明。——译者注

■ ■ 致 谢

首先，我要感谢爱妻 Rena，不仅仅因为在写作本书的六年中她所给予的支持，还由于她卓越的编辑工作。其次我要感谢已故的 Roy Childs，当我在 1990 年代初构思这本书时，他便鼓励我完成它；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导师 Clancy Smith，我在第一章介绍了他对我的帮助。

经济学家 Russell Roberts 为本书作了技术编辑，他的付出远远超出了所得；我接受了他的绝大多数建议，并且非常享受和他在电话中交流工作的过程。责任编辑 Russ Hall 做了一些关键的修正，更重要的是，他的热情反应让我确信那些政治信仰和我完全不同的人也会欣赏这本书。Prentice Hall 出版社的版权编辑 Carol J. Lallier 的工作快速而高效，而且我很感激她所说的，“如果戴维·亨德森竞选总统，我肯定会投他一票。” Marshall Fritz 对第十六章做了非常有益的评论。

诸多人士以课堂传授、对话或写作的方式让我获得书中的许多观点。他们包括 Harold Demsetz, Armen Alchian, Milton Friedman, 已故的

George Stigler, 已故的 Ayn Rand, James Buchanan, Gordon Tullock, E. G. West, Alan Reynolds, Michael Prime, Perry Taylor, David Friedman, 已故的 Friedrich Hayek, 已故的 Ludwig Von Mises, 已故的 Henry Hazlitt, 已故的 Murray Rothbard, 已故的 Yale Brozen, 已故的 Merton Miller, Joan Kennedy Taylor 和 Paul Samuelson。我要向那些没有列出姓名的老师们道歉。

报章和杂志的编辑也给了我阐释自己观点的空间, 他们包括《红鲱鱼》(*Red Herring*) 杂志的 Jason Pontin;《财富》杂志的 Dan Seligman 和 Rob Norton;《华尔街日报》的 David Frum, James Taranto, Max Boot, Mary O'Grady 和 Erich Eichman; 还有《理性》杂志的 Marty Zupan, Virginia Postrel 和 Nick Gillespie。

我要感谢 John M. Olin 基金、美国企业协会和胡佛研究院的资金支持。

感谢我所在部门的前任主席 Reuben Harris 和海军研究院的教务长 Dick Elster 允许我停薪留职, 这样我才有时间完成这本书。

我的朋友对这本书中的许多看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针见血的意见。我要特别感谢 Tom Nagle 和 Greg De Young。同时, 我在海军研究院的学生也是本书中一些篇章的宽容的热心读者。

我要感谢 Prentice Hall 出版社副总裁 Tim Moore 这位热情而又专业的出版人, 以及制作编辑 Kerry Reardon 和 Anne Garcia。最后, 我的代理 Henning Gutmann 做出了——我深信他还会继续——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最后, 我要感谢我的女儿 Karen 那充满欢乐的笑声。

序

12 岁时，父亲带我和哥哥去参观马尼托巴省温尼伯的省议会大楼。从外表看，这座建筑给人印象深刻，但里面却是一排无趣的办公室。当然，或许这只是我的想法。父亲把我们带到一个被特别隔开的地方，在那间圆型的房子里面，大理石地面的中央有一颗大星星。

父亲解释说，这是几个世纪以前存在于英国的“星室法庭”（Court of Star Chamber）的复制品。那时候，国王可以随意逮捕他的政治敌人，让他们单独站在房子的中间，然后国王的支持者们将他们团团围住，进行指控。被指控者没有权利请律师或者任何人来为自己辩护，审判的结果通常就是把他们关进监狱或者执行死刑。爸爸告诉我们，在省议会大楼里复制这样一个房间，就是为了提醒大家，人民拥有政府不可践踏的权利。我在心中暗忖，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多好的想法啊。这是自由的重要性与正确性在我的头脑和心中留下的最早记忆。

那时我当然不会知道，几年以后我会发现隐藏在限制政府权力这种观

念背后的，就是自由哲学。而今天我写下本书，不仅仅要去发现自由本身，更是关于自由的欢乐，关于自由的力量可以使这个星球上的数十亿人幸福生活的故事，这同样也是我及其他同道努力扩展自由的故事——我们的尝试时有成功。

书中许多小故事介绍了我如何通过经验、对话和阅读来理解这个世界。在第五章，你们会读到一个大企业的经理和我父亲的争吵，读到我如何从中发现私人产权制度能够保护我们免受其他人无名怒火的打击。在第八章，我描绘了自由市场所能创造的令人难以相信的激励，以及这种激励如何影响我和身边人的生活。第一章讲述了我十几岁的时候与前任美国副总统的辩论。早年接受经济学教育的时候，我曾经在尼克松经济顾问委员会里实习，第十二章讲述了我在这方面的个人经历，这些经历让我相信多数政府在多数时间里所做的惟一事情就是破坏人们的生活，还从来不为此承担责任。

这里还介绍了一些我成为政策经济学家后发生的事情，比如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前任财政部长萨默斯，以及拉尔夫·内德等人的交流。比如在第六章，我介绍了自己参加的一次听证会，在劳工部禁止数以百计的妇女在家里织滑雪帽赚钱的情况下，我作为专家证人帮助里根政府推出了相反的提案。第二章记录了我对拉尔夫·内德的一次访谈，内德以批评不安全的汽车而闻名，同时却支持每年导致数千人死于非命的联邦法律。在第十六章，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那些让我相信公共教育已经彻底失败的人的故事。在第十章，你会看见一位经济学家梅力斯的故事，他曾作为志愿者见证了1970年代早期尼加拉瓜令人震惊的贫困，并在后来的研究中逐步揭示出贫困的原因及解决的

方法。在第四章，我介绍了1960年代的一位年轻盲人经济学家瓦尔特·奥：他的研究报告没有掺杂丝毫的个人利益，证明了军队征兵制是无效率的，应该被废除。

我还会提到一些重要的历史典故，并用全新的视角来阐述这些众所周知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1964年的底特律种族暴动，但很少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在第七章，我要讲述这件事，它会把你吓了一跳。第七章还会介绍有关当年罗莎·帕克斯拒绝乘坐的那辆著名公车的重要事实。

在列举了书中会讲到的一些故事之后，我想以本书没有涉及的一则故事来结束这篇序言。有史以来最为著名和动人的音乐作品之一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它的歌词是德国诗人席勒的诗歌《欢乐颂》。席勒原来想把这首诗写成“自由颂”，但在最后的定稿中，我们看到的依然是“freude”（欢乐）一词，而非“freiheit”（自由）。这是因为，为了通过普鲁士的审查制度，席勒用“欢乐”替代了“自由”，但是充分了解席勒想法的人肯定会知道他的真正用意。到了1989年的圣诞前夜，那时柏林墙倒塌仅仅几周，伯恩斯坦为了庆祝柏林人获得自由，在柏林指挥了贝多芬的交响曲，在这场演出中，他用原来的“freiheit”代替了合唱词里的“freude”。用得非常恰当，你觉得呢？

戴维·R. 亨德森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致谢

序

第 一 章	自由的欢乐.....	1
第 二 章	迷上经济学.....	14
第 三 章	任重道远.....	35
第 四 章	你属于你自己.....	46
第 五 章	你的财产权.....	62
第 六 章	联合的自由.....	75
第 七 章	关于歧视的经济学.....	100
第 八 章	市场经济的欢乐.....	132
第 九 章	谁的收入？谁在分配？.....	151
第 十 章	梅力斯的故事.....	165
第十一章	市场德行与社区.....	173
第十二章	华盛顿之旅.....	190
第十三章	终结课税.....	212
第十四章	社会保障危机：原因及解决之道.....	235
第十五章	以半价获得自由和健康.....	257
第十六章	“公立”教育之忧.....	295
第十七章	环境：拥有它，拯救它.....	324
第十八章	我们时代的自由.....	349

第一章

自由的欢乐

在最近两个世纪，经济学被说成是“沉闷的科学”（the dismal science），发明这个词的人是英国反资本主义作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你可能永远也猜不到为什么他会这么说。我过去一直以为那是因为卡莱尔的假想敌是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后者认为农业产出只会以算术形式递增，同时人口只会以指数形式递增，因此最终将导致大规模的贫困和饥饿。我错了！卡莱尔说“经济学是一门沉闷的科学”，只是因为19世纪占据经济学主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强烈反对奴隶制。^[1]所以，这其实是一项非常无稽的指控，不是吗？

对我来说，经济学永远是一门快乐的科学。它告诉我们自由（free-

[1] 有关这方面的更多资料，请参见 David M. Levy and Sandra J. Pear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Dismal Science: Economics, Religion, and Race in the 19th Century,” *Contributors’ Forum*, January 22, 2001, www.econlib.org.

dom) 是繁荣 (prosperity) 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你不仅能够获得自由，同时还能得到附赠的奖品：繁荣。这，就是我对自由的根本信念。

1968 年 6 月，加拿大，马尼托巴省温尼伯

我在马尼托巴大学等着和一位加拿大政府的中层官员会面。那时我 17 岁，两星期前刚辞去在一个美丽的加拿大国家公园里的差事。要知道，这份工作轻松有趣，而且薪水很不错。要是我保留这份工作，整个夏天赚到的钱加上我的储蓄，就足够支付大学第二年的学费了。身边的人，包括我的母亲，都怀疑我的判断力是否出了问题。我的老板的老板叫我过去解释自己的行为。虽然他是否理解我辞职的原因并不影响我的决定，但我还是同意跟他见面。

我进了办公室，那位官员问我为什么要离开。我解释了原因。

我在那儿的工作是来来回回地给树贴上标签，并对这些树在不同条件下的生长情况进行记录。因为想了解这项工作有什么意义，我就问顶头上司我们的研究结果会得到怎样的利用。他解释说，由于气候的不同，这些研究结论不适用于加拿大的树。“那么它们适用于哪儿呢？”我问道。他回答说事实上最适用于苏联。我停下来，仔细思考了一阵，然后才问：“花加拿大纳税人的钱来资助苏联人，我们如何证明这种做法的正当性？”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那天晚上，我回到在赖丁山国家公园 (Riding Mountain National Park) 的小屋，辗转反侧，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就是感觉不对劲，觉得不对劲的不仅是我的感觉，还有我的理性。我实在看不出向

加拿大人课税来帮助苏联人有什么正当性。

第二天，我又想到了一个新问题：如果我们的研究结论可以用来帮助加拿大人又能怎样？在这种情况下，用税款来支付研究费用就是正当的吗？我想，它的正当性会强一些，但是否就“足够”正当了呢？它实际上是以剥夺纳税人的选择权为代价帮助了某一部分加拿大人。这好像也是错的。我开始回想起最近几个月在读的哲学家兼小说家、自由斗士安·兰德（Ayn Rand）的书。我突然意识到，她已经以一种很清楚的方式指出了问题：用向一些人课税的方式来帮助另一些人，实际上是侵犯了被课税者的权利。最后我得出结论，为了这个项目而向无辜的加拿大人课税，不管得益者是谁，都是错的。于是，理所当然，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我必须离开。我一整天都在考虑我的想法，想找到其中的破绽。毕竟，这是份好工作，而且为了获得这份工作我花了不少力气。我们住得好，吃得好，工作轻松，还蛮有意思，而且待遇也好。我真不希望放弃这份工作。但是一想到付给我薪水的是那些不知名的纳税人，而且他们被剥夺了发言权，我就觉得良心有愧。“道德上的确定性”（moral certainty）* 和一股隐秘的力量在迫使我辞职。那个晚上，我告知老板我要在本周末离开。

我把这些都告诉了我在温尼伯的老板的老板。他是个很好的人，没有嘲讽我。相反，他试图用科学研究自身具有的价值来说服我。我提醒他，我所质疑的并不是他这个项目的价值，而是实现它的手段——用纳税人的钱来买单。他竭其所能地劝说我。但我渐渐发现，不是我在竭力证明自己

* Moral certainty 指的是那种足以对付实际生活的确定性，尽管并没有到绝对的确程度。在这里，作者指的是他感到自己也确实参与了这件不正确的事情。这个概念的翻译参照了苏力所译波斯纳的《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页。——译者注

的选择，反而是他要努力证明他所做的事情的正当性。几个月前，阅读兰德的书，并用她的观点来和那些比我年长的人辩论是很痛苦的事情，因为在我驳斥了所有的标准反对理由后，他们提出的主要异议就是：生活不会像我说的那样运转，你无法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坚持所谓的理想。但现在，我正在让理想与现实对质，而我突然感觉有了力量（power）。这是一种非常纯净的力量，不是去超越别人，而是超越自己。

在回家的路上，我进一步思考刚才发生的事情。母亲教育我要用逻辑来思考问题，并且坚持自己的原则。父亲用言传身教的办法教育我不偷窃、不说谎、不欺骗。安·兰德的推理看上去就像是逻辑的下一步那么必然。我没有做任何与我所受家教相违的事，仅仅是沿着她的思想走下去，就得出了一些以前连做梦都没想到过的结论。最主要的结论就是政府没有权利（right）操纵人们做某件事。我身边的许多成年人都很担心我——这一次，让人不快的是，那些人也包括我的母亲——他们试图说服我去调和（moderate）自己的观点，却没能给我这么做的好理由。对他们来说，不需要考虑事件的背景，调和本身就是一种美德。我受到了诱惑。考虑到从小接受的教育，我或许也不会屈从于这种诱惑。但如果那时我能够计算出我所信奉的哲学的力量有多大，那么这位40岁的成年人试图说服17岁的孩子的方式几乎是徒劳的。

1968年8月，温尼伯

我坐在我的朋友唐·雷德克的位子上，阅读新一期的《新闻周刊》。一篇叫“该死的公共设施”的文章吸引了我。这篇文章分析的

是美国邮局，作者认为“该死的公共设施”正可概括邮局的服务态度，因为它拥有投递第一类邮件（first-class mail）* 的法定强制垄断权。整个推理非常有说服力，并且充满热情，完全没有兰德式的愤怒。作者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名叫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在读完“该死的公共设施”之后，我翻出唐的一堆旧《新闻周刊》，在里面寻找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其他文章。当那一堆看完之后，我又在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了更多弗里德曼的专栏文章。我喜欢他写的所有东西，不论是否同意他的具体观点，当然一般来说我都是赞同他的。我特别喜欢其中一篇反对征兵制（military draft）的文章，并不是因为他反对越南战争，而是因为他认为征兵制是一项束缚年轻人自由的非正义之举。弗里德曼的文风在任何时候都是逻辑严谨和热情洋溢的，偶尔也夹杂着义愤，但绝不是那种我已经有点厌倦的兰德式咆哮和不时爆发的狂怒。我找到了一个智识和精神上的心灵伙伴（soul mate）。

1968 年 9 月，温尼伯

这是温尼伯大学 1968～1969 学年注册的第一天。填完表格后，我走到搞迎新活动的地方。一张桌子旁立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自

* 按美国邮件的分类方式，第一类邮件是投递速度最快的，主要包括信件、邮筒、明信片等。

——译者注

由至上主义者 (libertarian)* 俱乐部”。 “自由至上主义者”，这个奇怪的词吸引了我，因为在上个月的一场讨论中，一位社会学教授就称我为“自由至上主义者”。

“一个什么？”我问道，心里想她是不是在说图书管理员 (librarian) 或者浪荡子 (libertine)。

“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她说，“你一定知道，就像去年搞学生报纸的那群人——丹尼斯·欧文斯、克兰西·斯密。”

“不，”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会去拜访他们。”

“天哪！”她鄙视地说。

桌子旁边站着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我在哲学课上见过他。桌上摊了大约有40本书，我知道里面一些作者的名字，包括弗里德曼和另一位经济学家冯·米塞斯，另一些作者的名字则从没听说过，比如哈耶克、熊彼特。然后我看到了一本非常熟悉的书：《源泉》(*The Fountainhead*)，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兰德的小说。“你读过它吗？”我问那个人。“百读不厌。”他回答说。我们相互作了介绍，他叫克兰西·斯密，也就是那位社会学教授曾经提到过的那个人。

那周的晚些时候，克兰西邀请我在周六晚上8点半去和他们那帮人会面。对我来说会面的时间有点晚，因为我通常在晚上11点就已经上床睡觉。周六晚上8点钟，我的朋友，对自由至上主义也非常感兴趣的唐，和

* Libertarian 一词在国内译法较为混乱，较常见的有自由放任者、自由意志论者、自由主义者等。该词的含义是限制政府的权利，保障个人的自由。根据他们想达到的目标，本书将该词统译为自由至上主义者。——译者注

我一起去见他们。我有一点紧张，同时也很兴奋。他们大概有五六十人，都比我们大2到4岁。那是我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晚上。

首先，他们谈论政治，但是我从没见别人以这样的方式谈论政治。他们对时政和历史都有相当深的认识，他们谈起上个月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大会，小威廉·巴克利和戈尔·维达作为特约评论员在同一个电视台*上相互争论（这两个人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巴克利提到了天主教教义和罗马教皇，并把他们与19世纪一个叫做阿克顿勋爵的英国人相提并论。他们谈论各种新闻，但主题很集中，有时讨论得非常热烈。克兰西和迈克尔·普赖姆谈到了他们去弗里德曼的避暑别墅拜访他，谈到弗里德曼和他的妻子如何热情地招呼他们。他们还讲起在纽约拜访了安·兰德的同事佩考夫（Leonard Peikoff）。佩考夫问他们对兰德的客观主义（Objectivism）是否有不同意之处。他们回答说只有些许异议，事实上，他们正是来就此进行讨论的。然而佩考夫断言他们其实是曲解了文章的字面意思，会面就此结束。从此以后，克兰西就戏称他为“佩考夫老夫子”。

除了见闻广博之外，他们的思路清晰，头脑开放。他们是党徒（partisan），但却是诚实的党徒。比如，在讨论巴克利和维达之间冲突的时候，他们站在了巴克利一边，但并非对他就没有批评。他们似乎认为自己有权利和能力来评价那些比他们大三四十岁的人的所思所行。我一直觉得我也有这个权利，但通常我不像他们那样有丰富的信息来评估别人的想法。以往，我在会谈中总是十分活跃；但这次，尽管对他们讨论的每件事都感兴趣，我整晚却几乎什么都没说，只是不停地问问题，想知道更多的

* 美国广播电视公司（ABC）。——译者注

事情。他们也总是能回答我。对我来说，这可是全新的领域。

在听了两个小时一次也没有提到曲棍球、足球和其他运动的谈话之后，我断定这些人是同性恋（17岁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有许多陈见）。我从未碰到过任何像他们那样沉迷于思想的男人。幸好，我们开始谈论女人。看来他们也喜欢女人。他们谈论那些有魅力的女人，但是和我以前所听到的粗鲁语言不同，他们更多的是抱以一种欣赏优美绘画般的态度。他们谈论那些女人的言论和想法，而不仅仅是她们的相貌。我喜欢这一点。

时至午夜，已经过了我的上床时间，一个人说他饿了。我想完了，这下我没法跟着了。他们肯定对食物有非常高的品位，他们要去的地方对我来说肯定太高级了。错！我们一起挤进克兰西爸爸的那辆旧车，开到了温尼伯北部的一个小镇洛克港，因为他们知道那里有一个非常棒的、营业到凌晨的热狗店。

凌晨2点半左右，我回到了家。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回想着刚刚经历的一切：我找到了朋友。第二天，我骑着自行车去找唐，他昨天晚上一直和我在一起。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觉得这是真的吗？”他没有笑，这说明他在思考同一件事情。我感觉我好像加入了一支伟大的道德十字军，那一定很有意思。

接下来，在我三年大学生活（这是加拿大大学教育的标准长度）的最后两年，我同时接受了两项教育。大概有半天的时间，我学习自己的主修数学和辅修物理的相关课程，并完成作业。剩下的时间就拿去做两件用来犒劳自己的乐事。一件是读一本（或一篇）克兰西和其他自由至上主义者推荐的经济学、政治学、历史或哲学专著（或论文）。我以前并不是一个定期阅读的人，现在则每周要读一本书。第二件事更有趣：和克兰西及其

他自由至上主义者们泡在一起。如果我没有在图书馆找到克兰西，那通常会发现他正在自助餐厅舌战自由主义者（liberal）或社会主义者，偶尔也包括保守主义者。我待在他身边，学到了不少东西。

首先，我了解到自由至上主义哲学并非肇始自安·兰德。它有着数百年的悠久传统。举例来说，1215年签署的英国大宪章就已经是对国王权力的极大限制。尽管它限制的主要是国王对贵族的干涉，并没有涉及农奴；但尊重人权的观念在17世纪渐渐向底层渗透，英国政府对平民的干涉也进一步受到限制。当然，美国1776年革命的核心就是“免于统治的自由”（freedom from government）。我还了解到这个传统中的一些关键人物：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以及美国的托马斯·杰弗逊和詹姆斯·麦迪逊，这些人真切地思考了自由的意义和价值。我开始认识到他们绝不仅是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无聊家伙而已。

其次，我从观摩克兰西的讨论和争辩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克兰西从来不是仅仅为了赢得胜利而辩论，他总是力图在让别人了解自己的看法之前先去理解别人的立场。我的坏习惯是在还没有明白别人究竟说了些什么的情况下就要去驳倒他们。克兰西的风格可不是这样。他能辨别出人们叙述方式的细微差异，并用一系列问题来深入这些差异。克兰西认为，每个人都是有着与众不同（哪怕是细微的不同）观点的独特个体，因此对他来说，在和别人辩论之前先去弄明白这个人到底在说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一个社会主义者也许会说资本主义的顽症在于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克兰西会问：“你究竟是想说贫者愈贫，还是想指出人们虽然变得更富了，但贫富间的差距在拉大？”从那个人对克兰西问题的反应来看，你

一般能判断出他其实从没对这两者进行过区分。但克兰西会假设他已经作过区分，而且会给他时间来想清楚自己刚才到底想说什么。克兰西并不是在设置陷阱，他只是想要弄清楚人们真实清晰的想法。

从克兰西身上我还学到了这样一点：毫不妥协地面对周围那些强势成年人的敌意。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69年，也就是与尼克松竞选总统失败后的一年，前任副总统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来我们大学做了一次大型演讲。在提问阶段，克兰西站到麦克风前，引述了《丹佛邮报》一年前的一则报道：汉弗莱这个征兵制的强烈拥护者，在总统选举期间被问及，如果一个年轻人反对某场具体的战争而并非所有战争，那么根据良心拒绝（conscientious objection）的原则，他是否可以被免除兵役？《丹佛邮报》引用汉弗莱的回答说，允许个人决定哪场战争是道德的就相当于“给予了一个人神一般的权力”。^[1]克兰西问汉弗莱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汉弗莱说他不记得自己是否这样说过，但因为这的确反映了他的观点，他会对此负责。

然后克兰西说：“如果给予个体决定自己行为的权利是神一般的权力，那么我们给予政府的为数百万年轻人作决定的权力又是种什么样的权力呢？”

我不记得汉弗莱的具体回答，只记得他有一两次称克兰西为“年轻人”，然后提到权利之中隐含着责任。事实上他没有回答克兰西的问题。

演讲结束之后，克兰西和我走到汉弗莱跟校长站着的讲台前。我仰望着汉弗莱，他大概有6英尺（约1.83米）高，站在讲台上，鞋子和我的

[1] *The Denver Post*, September 10, 1967.

头处于平行位置，所以我不得不仰着头看他。

亨德森：你信奉美国宪法吗？

汉弗莱：是的。

亨德森：你信奉禁止强制劳役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吗？

汉弗莱：是的。

亨德森：那么你如何调和同时赞成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与征兵制两者之间的矛盾呢？

汉弗莱：它们是一致的。

亨德森：怎么一致？

汉弗莱：我们有第十三条修正案，我们也有征兵制。

我在那一瞬间愣住了。看样子在这个家伙的头脑里，原则与概念有着不可思议的弹性空间，或者，语词的字面意思对他来说是无意义的。我继续问他。

亨德森：你同意征兵制是一种强制劳役吗？

汉弗莱：课税也是强制的。

我抓住了他的破绽：“那么你同意征兵制是一种强制劳役了？”

但是我被打断了。在汉弗莱回答我之前，校长插进来说：“副总统是我们的客人，我希望这个校园里的学生能够待之以礼。”

我立即有一种羞愧的感觉，甚至没有去想自己是否真的对汉弗莱失礼

了。一个有权势的成年人在我头顶上方说我表现得太粗鲁，所以我的脑子就停止了运转，表现得像一个4岁的小孩子。我就像小时候被人指责太粗鲁时那样，看着汉弗莱说：“我很抱歉。”

克兰西目睹了整个事情，他激烈地说：“戴维，不要道歉，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我立即意识到克兰西是正确的。我的确有点激进，但绝没有粗鲁或不尊敬的地方。“你是对的。”我对克兰西说，同时对有人能够在我遭到权势者攻击的时候在旁边支持我感到又惊又喜。我回过头看了一眼校长，然后对汉弗莱说：“我要收回刚才说的话，我不道歉。”

两年前，我把这个故事重新讲给克兰西听，他那时已经患了重度多发性硬化症。我希望他能够知道那时的一臂之力对我有多么重要。

和克兰西及其他自由至上主义者初次会面之后，我就已经认识到自己参与了一项事业（cause）。的确如此。这项事业就是自由。它引导我离开加拿大，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它引导我1979年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作专家证人反对兵役制。它引导我在美国经济协会年会的一次小组会议上成为自由党总统候选人爱德·克拉克（Ed Clark）的代表，我的对手则是卡特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舒尔茨（Charles Schulze）及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的顾问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

争取自由的事业促使我作证反对禁止佛蒙特州的女性在家制作编织品用以出售的联邦法律。它引导我加入里根政府，成为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的一名高级经济学家。引导我成为《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的经济学编辑，并在《财富》和《华尔街

日报》上写下数十篇为自由呐喊的文章。它引导我在 CNN 上讨论自己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出我们不需要为石油而战。它引导我编撰了第一本——直到现在也是惟一的一本——经济学百科全书：《财富经济学百科全书》（*The Fortun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并向联邦法院法官讲授经济学。它引导我做了许多维护自由的事情。它还引导我花费无数的时间来阅读、思考和写作，思考自由如何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

这些阅读、思考和写作的成果之一就是本书——《欢乐的经济学》。这本书讨论的是自由，是自由的运作如何有效，以及政府对自由的压迫会如何搅乱我们的生活。这些均源于我和其他人的亲身经历，这些人包括名人，当然也包括更多的普通大众。

第二章

迷上经济学

一旦我明白人们应当自由生活，许多问题的答案便豁然开朗。政府应该向人们征重税来养活年老退休人员吗？不应该。但所谓的社会保障正在这样做。政府应该干涉雇主和雇员间的合约吗？不应该。但强制性工会主义正在这样做。政府应该阻止人们自由经营出租车业务吗？不应该。但政府的许可证制度正在这样做。政府应该禁止人们吸烟——不管里面是大麻还是尼古丁——或要求人们开摩托车的时候戴头盔吗？不应该。政府应该有权利以关进监狱为威胁，强迫人们参军吗？还是不应该。所有这些结论都能从自由原则中推导出来。

但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实践**这些想法。那时我 17 岁，没有经验或足够的学问来判断一个自由社会该如何有效运作。在跟教授、同学及其他各种人的讨论与争辩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以宣扬自由观念开场，两轮激辩过后，他们对自由的疑问就会变成它是否真的能运作。例如，反对者会说，在自由社会里，每个产业中的少数几个企业会垄断市场，强迫购买

者“选择”它们的产品。或者，他们会说，如果劳动者不用交重税，那么他们就会把钱花光，老了之后会变得一贫如洗。又或者，如果政府不限制出租车的数量，居心不良的司机就会向那些不知内情的无辜乘客敲竹杠。这是绝大多数反对自由的人的观点，而反驳这些观念的关键都在经济学。

所以我开始学习经济学。我读了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曼和罗斯巴（Murray Rothbard）等人的著作及论文，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们合理地推导出了自由经济如何运作的原理，论证了为什么政府管制*（regulation）一般都无法实现既定的目标：有时候弄巧成拙，结果与原来的预期恰恰相反；有时候则被特殊利益群体左右，为的是实现其不当目标。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有四件特别值得指出的事情。

第一件源于一篇题目为“我，铅笔”的短文，作者是1958年一个名叫里德（Leonard Read）的人。文章里有一支会讲话的铅笔，它说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人知道如何制造“它”。如果一个人想所有事都亲力亲为，他一定会失败。事实上，铅笔是由数千人各司其职，在难以想像的复杂国际劳动分工之下制作出来的。笔芯里的石墨来自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橡皮来自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在的印度尼西亚），木头来自俄勒冈州，等等。这些听上去都不足为奇，它真正打动我的地方是，那支铅笔说，参与制造的数千人中没有一个像购买和使用铅笔的孩子那样关心铅笔，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赚钱来养活自己和家人。但是“非直接的关心”

* Regulation 一词在中文中有不少译法，如管制、规制、监管等。本书一律把 regulation 译为管制。另，price control 在本书中也被译为价格管制。——译者注

(derivative caring) 却能使他们集中精力制造出一支高品质、低成本的铅笔。即使在学习初级经济学 30 年之后、在讲授初级经济学并用“我，铅笔”一文作为课程读物 20 年之后的今天，我仍然要不断提醒自己市场所能创造的奇迹。开车的时候，我从不担心刹车是否会失灵，我相信它们非常有效，因为东京、底特律或其他地方的某位工程师已经为我的刹车系统付出了极大的心力。这并不是因为他关心我本人，而是由于他关心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在我害怕自己失明、得癌症或者在六七十岁的时候患上老年痴呆症的时候，我记起了“我，铅笔”，并认识到某个地方（事实上不止一个地方）的研究者正在想方设法让我免受这些疾病的侵害；另一些研究者在思考治愈的办法；还有一些人则在探索如果无法治愈的话，应如何减轻我的症状。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不关心我是谁，也不需要有人去命令他们把工作做好。他们自身的生产欲望支配着他们运用所拥有的知识创造出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让我生活得更好。

早期阅读中学到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正如黑兹利特和冯·米塞斯曾指出的，当人们游说政府资助某项事务，比如说艺术、农业或教育的时候，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让政府从其他人身上收钱，来资助这些人不准备购买的项目或服务。一旦我这样看问题，不要政府资助普通日常事务的观点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那会剥夺人们的自由选择权。

我学到的第三件事是，关税不仅损害了产品被征收高关税的国家，也使进口国的公民不得不花更多的钱来购买产品。19 世纪的法国多产新闻记者巴斯夏 (Fredric Bastiat)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曾妙称关税为“负向的铁路”。两国间的铁路会降低商品的运输费用，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而征收关税却会提高运输商品的费用，这样一来，铁路好像就被抵消

掉了。即使对阅历很广的记者来说，关税会损害进口国利益的事实也是令人震惊的。多数赞成自由贸易协定的报道都只看到出口商因此可以获得的巨大收益，而忽视了便宜的进口货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

我学到的第四件事——冯·米塞斯和罗斯巴都指出过——是当政府插手解决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时，通常会带来更多的麻烦，这又导致政府进一步的干预。如此循环，问题和干预都越来越多。我最熟悉的一个例子是1970年代后期对原油和汽油的价格管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让我后来成为一个能源经济学家。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使用价格管制时，一开始并没有惹出太大的麻烦。但当欧佩克组织（OPEC）在短短几个月内把世界原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升到每桶11美元时，尼克松的物价调控员们却禁止炼油者相应地提高汽油价格，结果引发了严重的汽油短缺。尼克松的政策不是取消价格管制，而是让政府官员以独断的标准分配汽油；继任的福特总统，以及福特总统的继任卡特总统都延续了这一政策。

然而，卡特总统非常惊讶地注意到某些人像“能源猪”一样使用汽油和其他能源产品——这是某些政府官员使用的术语，这些人开汽艇，买大轿车，他们冬天取暖，夏日制冷。换句话说，他们在这个人为控制的低价位上继续不节制地使用汽油和原油。针对这个问题，卡特总统又不是去终止直接引起麻烦的管制，而是限制人们冬天取暖，夏日制冷。他和国会一起，提高了针对轿车和卡车的所谓公司平均燃料经济性（CAFE）标准。这个标准要求汽车制造商全年所销售的轿车和货车要分别达到一个给定的平均燃料经济性水平。1983~1984年在我担任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能源方面高级经济学家时，曾努力取消这条CAFE法律，但没有成功。

在1985年的一篇论文中^[1]，我指出 CAFE 是旅行轿车（station wagons）从市场上消失的原因：它们被越野车（SUV）替代了，因为按照 CAFE，SUV 属于标准更低的卡车。

CAFE 还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汽车制造商回应 CAFE 的主要对策就是把汽车造得更小、更轻。但那样的话，安全性也就降低了。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罗伯特·克兰道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约翰·格雷厄姆发现，汽车的小型化趋势无可避免，CAFE 标准将会使1989产品年制造的汽车在整个行驶生命中增加总计2200~3900人的死亡。^[2]见到这份证据以后，1988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的首席经济顾问、哈佛大学的萨默斯呼吁“立即”废除这条法律。讽刺的是，以鼓吹汽车安全性而成名的内德和伍德汽车安全基金中心的主管狄特罗（Clarence Ditlow）却强烈支持“公司平均燃料经济性”法律，并敦促制定更多类似的严格法律。

1980年代末，为了在《富豪》（*Barron's*）上写一篇关于内德和“公司平均燃料经济性”法律的文章^[3]，我采访了一位老朋友，竞争企业协会（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律师卡兹曼，他发起了一场抗议联邦政府 CAFE 法律的诉讼。卡兹曼说：

[1] David R. Henderson, "The Economics of Fuel Economy Standards," *Regulation*, January/February 1985.

[2] Robert W. Crandall and John D. Graham, "The Effect of Fuel Economy Standards on Automobile Safet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XXXII (April 1989), pp. 97~118.

[3] David R. Henderson, "Less Good Than Harm: On Balance, That's What Ralph Nader Has Wrought," *Barron's*, July 31, 1989, p. 9. 关于内德和狄特罗的回应以及我的再回应，请见 "Safety and Economy: An Exchange," *Barron's*, August 21, 1989.

这是汽车安全中心第一次在更多安全性和更多政府控制之间进行的明确选择。他们选择了后者。

然后我访问了狄特罗。他立即承认“公司平均燃料经济性”法律使汽车变得更小。我问他，如果发生车祸，他是希望待在大车还是小车里。

狄特罗：我会选择一辆有安全气囊的小车，而不是大车。

亨德森：那么一辆有安全气囊的大车呢？

狄特罗：你就是想让我说“公司平均燃料经济性”对安全的影响。

狄特罗的最后一句话其实是种默认。

我曾和内德有过 90 分钟的访谈。^[1]下面是谈话中比较有意思的部分。

内 德：（当听说我发在《富豪》上的那篇文章是由编辑布莱贝格负责的，内德宣称这位编辑已经给过他十次不公平的对待。）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上，你会再试第 11 次吗？

亨德森：会的。

内 德：为什么？因为你高度的新闻公正性素养（journalistic integrity）吗？

亨德森：那也是一个原因，但假设我处在你的位置上，如果你要

[1] 根据 1989 年 7 月的电话记录。

求采访我戴维·亨德森，我会说好的，因为我没什么可隐瞒的。

.....

亨德森：如果有一个人想要开足汽车马力来冒一下险，他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

内 德：有一次我在一所大学作演讲，一个学生站起来说人们有权买一辆不带安全气囊的汽车。我问他们是否有权买一辆没有门的汽车？为了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他非说有，尽管他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可信。

亨德森：亨利·福特早在政府要求之前很久就把汽车上的门作为标准配件了。

内 德：但是大车污染更严重，而且伤的人更多。

亨德森：所以要通过课税来体现这种伤害，可同时如果他们愿意付这笔税的话，仍然可以开大车。

内 德：如果一个人真的用脚去踢别人，只要他缴税你会允许他这么做吗？

亨德森：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做法啊。我们把课税等同于罚款或入狱判决。

.....

亨德森：你不许工人选择危险性工作的理由是什么？

内 德：依赖市场解决安全问题是不可奏效的，因为许多工作方面的风险——比如苯等物质对安全的影响——是工人的感觉系统无法感知的。

亨德森：工人不知道这些风险吗？

内 德：他们知道？

亨德森：如果工人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你会让他们自己选择吗？

内 德：你所说的“选择”是什么意思？工人迫于自身的状况无奈地“选择”挨饿或从事危险性工作吗？

亨德森：不是这样，没有人强迫他们。我们承认一些工人面临着两个都不怎么安全的选择，但你希望帮他们去掉那个最不安全的，可如果那个选择给他们带来更多收入怎么办？

内 德：我想要给他们更多的选择。

亨德森：很好。但同时，在出现其他选择之前，你却剥夺了他们最好的选择。

内 德：我要保证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工作。

.....

亨德森：你能举出一个你一直反对的管制的例子吗？

内 德：安全管制？

亨德森：是的。

内 德：当然有。（停顿 3 秒）我一时想不起很多，但我的确反对一项管制，那就是要求在后座上装单独的安全腰带。我希望它和肩带是一体的。而且，我还反对要求人们系安全带的管制。

亨德森：为什么？

内 德：我希望推广气囊。

.....

又一次，人们没有取消引发问题的 CAFE 法律，而是建议提高卡车标准，提高 SUV 的价格。他们更希望小车撞小车而不是小车撞重型卡

车，尽管安全研究显示，较好的情况是重型车撞重型车。

在读了大约一年的关于经济自由的著作和论文后，我慢慢发现，自由不但在道德上是高度可欲的，同时也具有不可思议的实用性。我迷上了经济学。

某天，我和自己非常尊敬的数学教授、英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科茨（Robert Coates）辩论经济自由的优点。他说：“好吧，我承认我无法反驳你的经济论点，不过如果你对自己的观点这么自信，你为什么不到经济系上一门课呢？我打赌他们会对你的想法有很好的批评。”

这让我闭上了嘴。“他是对的。”我想，“我以前所阅读的都是那些强烈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的作品。为什么不去上一门主张政府干涉的经济学教授的课，看看他能说出些什么来呢？”所以第二年（加拿大的大学，多数课程都会开一年而不是一个学期），也是我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年，我选修了一门经济学原理课程，用的是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安东尼·斯科特（Anthony Scott）合写的教材。

这门课出奇地令人失望。不管是教材还是就教材展开的沉闷的课堂话题，都没有超出我以前和别人讨论与争辩的范围。举个例子：自由经济会趋向垄断吗？他们不是直接就这个话题展开分析，而是把重点放在怪异的“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上。在“完全竞争”状况下，每家企业都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企业不会花一分钱在广告上，因为已经假定每个买家都拥有完全的信息；所有企业的定价都相同。对我来说这个模型一点也不完美（perfect），它看上去很无聊。后来我知道，这是经济学教育的标准方法，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例外。萨缪尔森的书中有一段讨论期货市场的运

作——他的解释非常好。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但萨缪尔森告诉我们，当人们预期供给不足的阶段要来临时，期货市场就自然形成了。这并不需要政府来规划，要求人们现在贮存东西，留到稀缺时刻使用。21 年以后，也就是 1990 年，我想约人在我的《财富经济学百科全书》中写一篇关于期货市场的文章。我打电话给萨缪尔森，告诉他这个故事，并请他写这篇文章，但他很有风度地拒绝了。除此之外，除了非常精炼地提出了各种经济学话题以外，萨缪尔森的这本教材和课堂练习对我来说，什么意义都没有。

如果你那时问我是否想成为经济学家，我肯定会说，“绝不。”除了极个别例外，他们所写的东西和谈论的话题根本引不起我的兴趣，也跟我和我所认识的人所关心的问题差之千里。我需要为自己的将来作筹划，因为几个月后我就要毕业了。母亲死后，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得到了一笔不多不少的保险金，所以我不必急着作出决定。但我想要有一个计划。我对飞机一向很着迷，准备投身航空事业。但是在第三次飞行课后的几天，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我从未听说过的一位教授，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来访。

我所在的温尼伯大学自由至上主义者俱乐部拿出整年的预算，请德姆塞茨在两天之内作三次演讲。一个叫做院际研究协会（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的美国组织向我们推荐了他，由于我们年度预算微薄，这个组织还捐助了几百美元。

德姆塞茨的演讲令人大开眼界。他解释了为什么房租管制和最低工资法会增加对黑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群体的歧视。比如，如果房租管制使租金低于自由市场下的租金水平，那么一位略带种族歧视的白人房东面对一群

想要租他房子的人，会倾向于选择白人房客。他说：“房租管制会使歧视的成本变成零。”然后，德姆塞茨分析了二战期间《芝加哥论坛报》分类消息版面里限制性词汇（比如，“不要黑人”）和销售家具捆绑租约（他指出，这是一种绕过房租管制的方法）的广告的比例。德姆塞茨说，随着战争的进行以及受到管制的租金越来越低于自由市场下的租金水平，这类广告的比例在不断增加，到1945年，有90%的广告里要么写了上述两种情况里的一种，要么两种都写了。

我也喜欢德姆塞茨的风格。在与那些持有异议的听众的交流中，他表现得积极而又有技巧，但又很公正。在整个过程中，他都镇定自若。比如，有一次德姆塞茨分析了如何用所有权来解决污染问题，听众席上的一位教授引用了社会学家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所说的话——任何交易中都有一个胜者和一个失败者。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警句，从没想过要去分析它们。但是德姆塞茨回击说：“这不对。任何一次交易中交易双方都是胜者，否则他们不会进行交易。”

我从没见过德姆塞茨这样的做事方式：言必有据。举个例子，一位听众说，如果没有管制，航空公司就会向乘客敲竹杠。德姆塞茨引用了一篇文章——发表于《法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一份我以前从没听说过的学刊——证明，同等距离的机票，在没有管制的加利福尼亚州价格却要低30%。

在演讲之后的休息时段，他一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我心头郁积了一大堆问题——经济自由的批评者们抛出来的一些难题，我没有办法给出让他们和我自己满意的回答。我记得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政府是否不应该干涉电力公司和其他被称为“自然垄断”的行业。他的回答是不应该，然

后向我推荐了他自己的一篇论文：“为什么管制公用事业公司？”——发表在现在已经成为传奇的《法与经济学杂志》上。

突然，我对经济学的兴趣又复活了。这个人过着很有意义的生活，和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们共事，言说和践行着非常有趣的事，和我在课堂上所见的完全不一样。他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德姆塞茨再为这份兴趣加了点佐料：当我在机场跟他说再见时，他建议我应该考虑去芝加哥大学读博士。

接着他给了我最后一点忠告。他说，找到往期所有的《法与经济学杂志》，开始读吧。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飞行学校，取消了我的课程。我“重新迷上”了经济学。

5月份毕业以后，我去芝加哥大学拜访德姆塞茨，他带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午餐，拜访了弗里德曼，并买了全套《法与经济学杂志》。我把差不多20卷的杂志塞进破旧的黑色纸板手提箱，通过温伯格机场行李传输带时，手提箱裂了。加拿大的海关人员要我打开袋子，我说最好不要，因为我怀疑是否还能再装回去。这显然是个错误的回答，他坚持要打开——结果我们两人都很后悔。我打开袋子，砰地一下从各种内衣中滚出了一堆杂志。然后他给我一大卷粉红色带子，把已经彻底破裂的手提箱捆起来。我那时的样子一定很好笑——拖着笨重的旧手提箱，箱子还绕着粉红色带子，到处找最近的公共汽车。

那个夏天，我的哥哥自杀了。他长期患有忧郁症，我母亲七个月前因癌症过世后，他的病情也每况愈下。我和哥哥的关系很亲密，我们一直住在一起。在失去两个亲人以后，我决定去和朋友一道生活。我打算在西安大略大学读一年本科高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所以搬到我的朋友朗·罗宾逊

那里，他在加拿大的国营电台 CBC 做节目。接下来整整一年中，我每天早上读四个小时《法与经济学杂志》里的论文，根据文章的注释，又去读其他学刊的论文和书。举个例子，我就是这么发现了布坎南和塔洛克的研究，他们运用经济学的思考方式来理解政治家和官僚行动背后的激励因素。

事实上，虽然我已经不记得是谁写的还是说的，那一年我所学到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是：激励很重要（incentives matter）。换句话说，如果你去注意人们所面临的激励，就可以理解和预测大量的人类行为。比如，要是发现治愈癌症的办法有巨利可图，许多人就会非常努力地去研究它；但如果政府宣布不可以将治癌药的价格定得高于生产成本，探索治癌新药的热情就会迅速降低。举一个更复杂的例子，我的女儿最近刚上完一门强制性的驾驶教育课程。这门课花掉我家 200 美元再加上女儿 30 个小时的时间，但是聪明伶俐的她却没学到什么。学生们没有坐在模拟驾驶机器前，甚至没有看交通车道的平面图。相反，他们花了大量时间看反毒品和反酗酒的录像。这门课毫无意义。但是我本应当预测到这一点，因为问题就在于它是强制的。这意味着，尽管我们付了钱，我的女儿花时间上了课，但我们都不是顾客。真正的顾客是政府，是它强制人们做这件事的。

但政府是不会参加这些课程或为它们买单的，所以政府很难找到办法来确保课程的质量。而且，退一步说，即使某位政府工作人员有能力监督质量，他也没有坚持要求课程改进的必要，因为这跟他没什么利害关系可言——他并不为这门课买单，也不会去上这门课。如此说来，这就是一门

典型的无用之课。事实上，这只是个小例子罢了。中央计划经济*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人们并不真正拥有某样东西的时候，自然也就没有受到激励去关心它。如果你不知道明天自己还开不开这辆车，为什么要给它加满油呢？如果不能从中得益，你为什么要去好好照料集体农场的奶牛呢？如果生产商的产品是去供应配额而不是满足顾客的需要，那么真正的顾客就是安排配额的人，而不是消费者。

在经济学家文章中，“激励很重要”这条原则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事实上，所有经济学家都知道和理解这一点，只是很少有人把它当成原则来看待和运用。比如，你经常会听到经济学家指出现有自由市场的一些问题，然后鼓吹用政府管制或政府支出来解决，但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拥有预算和/或管制权力的政府工作人员会把事情做好。简而言之，他们没有把“激励很重要”这件事考虑进去。“激励很重要”这条原则非常根本，我教经济学课程的时候，经常会把它作为“十条经济学箴言”里的一条列给学生。

.....

十条经济学箴言

- 1.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 2. 激励很重要；
- 3. 经济学思维是一种“边际”思考；

* 在本书中，作者将 socialism 等同于计划经济，将 capitalism 等同于市场经济。在翻译中，涉及经济方面的问题时，仍将前者译为计划经济或中央计划经济，将 capitalism 译为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如涉及政治方面的问题，将前者译为社会主义，后者译为资本主义。——译者注

- 4. 创造财富的惟一方法是（通过交易）让物品转移到具有更高价值的地方。推论：双方都能从交易中获利；
 - 5. 信息是有价值的和有成本的；
 - 6. 每样行为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 7. 对商品或服务价值的评估是主观的；
 - 8. 成本有害无利；
 - 9. 增加一个国家的真实收入的惟一办法是提高真实产出；
 - 10. 竞争是坚忍不拔的野草，而非雅致柔弱的花朵。
-

这一年中，我开始渐渐相信自由市场有能力创造美好事物，而政府一般只会将人们的生活搞砸。我也在了解自由市场的缺陷。我越来越好奇为什么有这么多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没有足够的信心。我期盼下一年去西安大略大学上课，这样我就可以和那些教授辩论，看看他们如何反击。

1971年秋季我去了西安大略大学，因为我想在那儿读一年本科高年级和几门研究生课程，还因为那儿有加拿大最有名的经济学本科教育。那一年，除了从一些非常好的经济学家那里学到许多扎实的经济学推理方法以外，我还从自由经济论与政府干涉派的相互辩论中吸取了两个教训。

第一个教训是，自由经济与政府干涉之间的辩论规则不同于两门经济学子学科之间的辩论。就拿国际贸易来说，我的教授利斯（Clark Leith）是一个彻底的自由贸易论者，他和同道一起组成了这个盛产贸易经济学家的国家中最强大的国际贸易研究团体。在课堂的大部分时间里，利斯都在分析那些支持关税反对自由贸易的各种论点。他会对每个论点进行清楚的分析，然后指出它们的问题所在：征收关税会让另一个国家用相同的手段

进行报复；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征收关税才的确能够带来好处，但前提是政府需要拥有能把关税设在“正确”水平上的信息，而这是不太可能的；政府设置关税的权力会遭到滥用，因为掌权的政府官员会得到不正确的激励。这些并不只是利斯的观点，而是——现在也是如此——全世界国际贸易经济学家们的主流看法。鼓吹关税和配额的国际贸易经济学家就像美洲鹤一样罕见。

但当我上福利经济学的课时，规则发生了变化。那门课的布劳德教授（Charles Plourde）使用关于“市场失灵”的文献反复进行讲解。他教导我们，只有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自由市场才是有效率的，而如果这些条件不成立，后果就难料了。市场失灵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部性”。我后来学到的一个经典而常用的例子是苹果和蜜蜂。苹果树提供花蜜，蜜蜂则用它来制成蜂蜜。如果果园主无法向养蜂人收取“利用苹果树”的费用，那么他就不可能考虑到养蜂人的需求，决定种植苹果树的时候数量一定会偏低。苹果树对制蜂蜜的积极效应被称作“正外部性”。几年以后，《法与经济学杂志》上刊载了两篇论文，详细说明了果园主和养蜂人之间的“实际”契约安排。^[1]实际情况是蜂群的主人收取费用让蜜蜂对作物授粉，而所收的费用与它们的生产率成正比。简而言之，这个苹果—蜜蜂的外部性论点完全是闭门造车，并非来自真实世界。我猜想在数百万听过这个苹果—蜜蜂外部性故事的学生当中，只有不到5%的人知道真相。

[1] Steven N. S. Cheung（张五常），“The Fable of the Bees: An Economic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XVI (1), April 1973, pp. 11~33（中译本见：张五常，《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3~161页）；David B. Johnson，“Meade, Bees, and Externalitie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XVI (1), April 1973, pp. 35~52.

另外一个关于市场失灵的例子是“公共品”。其中我已经接受的一个标准论证是，由于存在“搭便车”问题，政府要提供国防服务就必须向人们课税：如果政府和任何其他提供国防的组织以此向人们收钱，那很难阻止不付钱的人享受防卫服务，要是每个人都有激励去搭便车，国防一开始就无法建立起来。这个问题非常棘手，我到现在都没有想出化解之道。不过有个有趣的例子，不是国防，而是关于灯塔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灯塔所有者不可能向所有过往船只征收费用，灯塔的数量将会减少。几年以后，一位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Coase）写了一篇论文，披露了相当不同的事实。^[1]他指出，几个世纪以前英国灯塔数量的不断增加主要归功于那些私人灯塔，它们的所有者能向开到附近港口的船只收费。所以经济学家所偏爱的搭便车，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好例子。有意思的是，今天很多经济学家仍然使用灯塔作为例子。科斯这篇论文发表14年后的1988年，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教科书《公共部门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Public Sector*）的封面上就有一座灯塔。

布劳德的指定读物中有一篇论文，是肯尼迪政府顾问贝特（Francis Bator）的“剖析市场失灵”，这篇文章为政府对公共品进行进一步干涉提供了基础。贝特写道，无线电信号也是一种公共品，因为一个人收听的时候无法阻止别人也收听。能不能允许电台抢夺信号，然后通过向人们卖解码器来限制不付钱的人收听呢？贝特认为这种方法在经济学上是无效率的，因为向每个额外的人提供服务的成本是零。

[1] R. H. Coase, "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XVII (2), October 1974, pp. 357~376.

贝特的分析不是为政府干涉打开了大门，而是干脆把门都拆掉了。布劳德坚定地认为，政府在任何一个人类经济生活领域内进行干预都是合理的。

但有一天，布劳德开始讨论政府干涉的实际（而非假设）效应。他证明，石油进口配额会提高国内油价；农业价格支撑政策会让农民生产过多的粮食，最后政府只得任其腐烂；飞行管制会使航空公司不必实行价格竞争。他说，这些管制和政府项目是有害的，应当被废除。这是我在这学期中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感受到他身上的激情。当他攻击一个又一个政府项目的时候，跟我志同道合的沃森和我两个人几乎无法抑制住欢呼的冲动。我们怂恿他，问了他许多政府干预的实例，他每次的回答都是政府应当滚蛋。我觉得很快乐：不管这个家伙在理论上怎么主张，他还是反对所有的实际政府干涉。

但这就是问题所在，而且——我后来了解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发生在这位教授身上的个案而已。经济学家经常在理论上主张干涉，却反对现实中的多数政府行为。这不像关于关税的研究，尽管在实践中看到了很多问题，但他们不会就此去质疑理论本身。看起来，我们缺少的是对政府如何运作的现实主义的认识。经济学家总是假定商人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并运用百试不爽的自利假设。但当研究政府时，他们就抛弃了自利假设，转而假定政客和官僚会努力使公共品最大化。而事实上，政府不过是政治强势集团用来对付弱势群体的典型工具。

第二个教训是，经济学家经常出于失望和恐惧而主张政府干涉。尤其在一对一的讨论中，你会很容易让他们承认，某个具体的政府干涉并不是好主意，但是他们不愿对此进行攻击，只是说“我们总得做点什么”，或

者“如果我主张取消政府干涉，我就会被认为太像米尔顿·弗里德曼了”。

第二年我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德姆塞茨离开芝加哥大学去了那里。我的教授多数都是自由市场论者，我很喜欢这一点，但我同时也怀疑，关于管制，是否还有西安大略大学的教授们没有讲过的真正复杂的例子。当然我有很多机会去把它们找出来。

第一个例子是1973年夏天，我在华盛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实习期间找到的。我的顶头上司是一个叫托利森的高级经济学家，在我开始实习的三个星期后，他找到了一份学院工作，辞职了。在那三个星期里，他让我参与了他手头在做的所有工作，并建议委员会主席赫伯·斯坦（Herb Stein）让我代任他的高级经济学家职位，直到夏末他的继任者到来为止。赫伯同意了。所以，我成了委员会与其他政府机构高官会谈的惟一代表。在一次交通部副部长主持的关于解除运输管制的会议中，我们讨论了解除管制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形式。司法部的首席反垄断经济学家乔治·海（George Hay）通常是解除管制者的盟友，但这次却希望不同铁路之间能够互相享有过路权。我反对这一点。我的基本理由是，这是他们的财产，如果强迫他们允许别人使用就是对产权的根本性侵犯。不过我没有这么说，因为虽然在华盛顿只待了六个星期，但我已经知道诉诸权利的道德论点不怎么管用。完全基于经济学，我找到了一条针对乔治·海的立场的非常有用的理由，于是我说：“如果允许其他铁路使用该铁路的轨道，你就减少了他们好好维护轨道的激励。”在受到UCLA的教授德姆塞茨和阿尔奇安（Armen Alchian）的熏陶之后，我已经能够很轻松地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也希望借机看看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流经济学家会对此说些什么。我期待海的回复，结果他什么也没说。

一个职业经济学家攻击其他经济学家的动机而不是论证，这种情况到底有多普遍，我已经就此观察了好多年。最难忘的事发生在1973年秋天，那时我正在UCLA读第二年的课程。我被邀请参加华盛顿瑞盆协会（Ripon Society）的一次会议，讨论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谢菲德（William Shepherd）的一篇论文。谢菲德的知名论点是将企业拆分开来以使产业更具竞争力。我们在UCLA已经对此进行过研究和讨论，UCLA的教授们，尤其是德姆塞茨，对这个观点批评甚烈。我从谢菲德的数据和论证中找到了问题，并在发言中提了出来。我原以为我会再次听到“另一面”的观点，那是在UCLA听不到的。谢菲德的回应有两个方面到现在仍给人深刻记忆。首先，他并没有就我对这篇论文的具体批评作任何回应。其次，他对我实施了非常严重的人身攻击，并且傲慢地批评我缺乏经济学常识。这就是全部。

另一件事发生在1983年夏天，那时我是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名高级经济学家。我的老板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刚刚又留聘了我一年。我那时的两个同事是萨默斯（后来成为了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和麦克尼思（Stephen McNees）。萨默斯、麦克尼思和我受邀参加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一次圆桌午餐会，讨论税收政策问题。在午餐中，经济学家巴特利特（Bruce Bartlett）和其他人主张对所得税实行单一税率或比例税制。萨默斯在会议期间并没说太多，但他的面部表情说明他不太赞同这些意见。萨默斯、麦克尼思和我挤一辆出租车回白宫。萨默斯并没有对巴特利特的观点进行议论，但他也没有沉默。在我们去往白宫南门的时候，萨默斯恼怒地说：“巴特利特主张对富人征收低税，不过是因为他想保护自己所在的那个阶级。”

律师界有句名言：如果事实与你为敌，就援引法律；如果法律与你为敌，就援引事实；当两者都与你为敌的时候，那就敲桌子、高声喊叫吧。当我看到聪明的经济学家们不去分析我的论证，而是对我和那些赞同我的观点的人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我怀疑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拿不出进一步的分析了。

第三章

任重道远

1978 年 9 月，香港

我作为观众参加了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的双年会议，它是一个由信奉个人自由的人组成的组织。27 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学社会议。第一天早上的首要演讲者是一位世界闻名的经济学家，由他致开幕辞。人们从世界各地赶来瞻仰他的风采。他是最强硬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获得了经济学家所能够得到的最有声望的奖项：诺贝尔奖。在 1930 年代后期和 1940 年代早期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他阐明了中央计划经济的致命缺陷所在。他指出，由政府对一个经济体进行理性规划所需要的信息量太巨大了，即使那一小部分最聪明的头脑也无法将其掌握，更加无法有效使用，同时他还指出，只有

自由市场能够产生市场所要求的信息。他最有名的一本书《通往奴役之路》，写于二战正酣之际，到现在仍是经典。二战后，代表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四国政府分区占领德国的权力机构曾在苏联的要求下，禁止刊印《通往奴役之路》一书。^[1]这个人就是哈耶克。

哈耶克于1947年组织了朝圣山学社，那时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钟情自由经济的知识分子之一。支持这一观点的人非常少，因此他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国际团体，每两年有一个星期聚在一起，相互给予精神支持和勉励。第一次会议只有很少人参加，可他们都是个中翘楚。36个与会者包括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他们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在当时的30多人中他们还不算有名；德国经济学家欧肯（Walter Eucken），他和埃哈德（Ludwig Erhard）一起废除了由纳粹制订、盟军执行、严重束缚德国经济的管制条例；奥地利经济学家冯·米塞斯，他第一个分析证明了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失败；法国经济学家阿莱斯（Maurice Allais），他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来自英国的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波普尔（Karl Popper）和罗宾斯（Lionel Robbins），他们后来都受封为爵士或勋爵。

朝圣山学社是以这个团体在瑞士第一次开会的地点命名的，1947年以后，该组织有少许扩大。1960年代，哈耶克退休，移居德国弗赖贝格，对当时的世界形势及他的自由市场理念不被接受感到非常失望。但是诺贝尔奖又使他重新振奋起来。1978年，朝圣山学社在香港开会，哈耶克是

[1] 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8, p. 143.

带着光荣和饱满的乐观主义情绪而来的。

哈耶克告诉我们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气若游丝，我们必须准备开展一场大辩论，主题应当是“取消导致经济失败的强制手段”。他还想在巴黎举行这样一场辩论，并邀请最优秀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参加。

我站起来问了第一个问题。我对哈耶克说：“我喜欢你的想法，但你真的认为社会主义者会赞同这样的措辞吗？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觉得他们是在主张强制。为什么不换一种比较中性的提法，比如‘社会主义失败了吗？’之类？”他接受了这个建议。随后的许多提问者都对哈耶克的这个想法表示怀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主义，而是由于他们觉得社会主义者不会允许辩论这个问题。斯蒂格勒是本年度朝圣山学社的主席，也是邀请我参加会议的那个人，他在休息期间主动与我交谈起来。

在前一天的晚宴演讲中，斯蒂格勒已经说过哈耶克的想法和所谓的辩论都没什么用。斯蒂格勒坚持认为，没有人仅仅因为观念的影响就会改变他的头脑。他误以为我的看法和他一样。斯蒂格勒用他对传教者（prose-lytizer）的惯常轻蔑态度说：“哈耶克一直是个只知道行动从不考虑反对意见的人。”

1987 年 6 月 12 日，柏林勃兰登堡门

勃兰登堡门的西边站着永远的乐观主义者、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他感到当时的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跟前任有些不同。勃兰登堡门是非常著名的，更准确地说，是臭名昭著的。它是柏林墙中的一个关口，如果你从东柏林走到西柏林，就会经过它。但是有一个

“小”问题：要是你是东德人，没有通行证的话你是不能这么做的。

从1961年8月起，东柏林人就被禁止前往西柏林。近30年来，前苏联的领导人们向东德领导清楚地表示，他们希望边界是封闭的。

里根说：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你要寻求和平，如果你要为苏联和东欧寻求繁荣，如果你要寻求自由，就到这扇门这儿来。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拆除这面墙。^[1]

一年以后，西德总理科尔（Helmut Kohl）表示，在他有生之年柏林墙不会倒塌。^[2]

1989年1月23日，纽约

《纽约客》刊登了一篇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海尔布伦纳（Robert Heilbroner）的文章。这并不新鲜。海尔布伦纳是《世俗哲学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一书的作者，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读过这本书。

他经常为《纽约客》写文章，但这篇文章有点不一样。这位长期提倡

[1] 引自 Dinesh D'Souza, *Ronald Reagan: How an Ordinary Man Became an Extraordinary Lead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p. 194.

[2] 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8, p. 126.

计划经济的人是这么开头的：“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开始较量算起，不到 75 年，现在的答案就是：市场经济赢了。”

1960 年代早期，苏联实现了可怜的第一：工业发达国家中第一个在和平时期人口预期寿命下降的国家。可悲的、破坏生命的故事在苏联经济中比比皆是，如果不是危及到人命的话，其中有一些本来是很好笑的。政府制定的价格太低，导致了严重的短缺，这意味着苏联公民不得不每天工作更长的时间来满足基本需求。^[1]1988 年的时候，有一个关于短缺的笑话非常流行：

肉店的顾客：小姐，你能切 100 克的火腿给我吗？

销售员：当然可以，公民，如果你给我火腿的话。

由于个人或公司都不能拥有农场生产的粮食，也就没有人有激励去好好经营农场，这就是为什么每年有这么大比例的粮食烂掉的原因。事实上，评判工厂的标准是它的大致生产指标而非满足顾客的能力——它们的顾客是国家——这就足以预言糟糕的结果。举个例子，如果评估一家钉子厂的标准是产品数量，那么企业就会大量生产大头针那样的小钉子；如果标准改成了产品重量，那么钉子厂就会转而生产数量不多但非常重的钉子。政府设定的价格太高会造成人们并不想要的东西严重过剩，有时，过

[1] Hedrick Smith, *The Russians*, 1977.

剩物最后就被当成垃圾处理掉了。^[1]浪费性地使用金属来生产钻探设备和管道，通常意味着钻探和运输苏联原油的成本超过了它最终能实现的价值^[2]，苏联的许多生产过程不是增加价值，而是削减价值。1984年12月，在成为苏联新领导人之前的几个月，戈尔巴乔夫已经总结道：“再也不能这么过了。”^[3]他是对的。成为苏联领导人之后，戈尔巴乔夫小心翼翼地、经常是前后矛盾地迈着小步，朝着允许苏联公民享有更多经济自由的方向走去。冯·米塞斯在20世纪20年代预言的^[4]、哈耶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详细说明过的灾难终于发生了。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海尔布伦纳称赞冯·米塞斯和哈耶克在40多年前就以他们的慧眼，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评估了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生活的混乱。尽管哈耶克1978年的时候希望在巴黎展开的大辩论并没有举行，但看来也的确不需要了。

1989年11月9日，东柏林

柏林共产党的领导人沙包夫斯基（Gunter Schabowski）准备在电视上举行一次现场新闻发布会。东柏林的领导和党书记克伦茨（Egon

-
- [1] Scott Shane, *Dismantling Utopia: How Information Ended the Soviet Union*, Chicago: Ivan R. Dee, 1994, pp. 77~78.
- [2] Marshall I. Goldman, "Perestroika," in David R. Henderson, ed., *The Fortun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3, p. 163. (页码疑有误。——译者注)
- [3] Goldman, "Perestroika," p. 747.
- [4] Ludwig von Mises,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1920, reprinted in Friedrich Hayek, ed.,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 1935.

Krenz) 给了他一份内政部新制订的管制草案。这份草案描述了申请西德签证的新流程。几分钟以后，在答复一位意大利记者的时候，他错误地说东德人从现在开始可以没有限制地去西柏林。马上，数以千计的东德人奔向了柏林墙，一些人甚至还穿着睡衣。三个小时中，在他们所痛恨的墙前面，人越来越多。他们拒绝离开，并高喊着口号：“打开门！打开门！”卫兵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把门打开了。成千上万的东柏林人投进了西德兄弟姐妹们的怀抱。没动一刀一兵，这座难以逾越的墙就倒塌了。

几天以后，我躺在地板上，和4岁的女儿凯伦一起看最新一期的《新闻周刊》。我给她看了25年前东德的武装卫兵从东德成功逃跑的著名照片。凯伦问我为什么对柏林墙的倒塌如此兴奋，我得用4岁的孩子能理解的话来解释。

我说：“这些人被命令要杀掉任何想从东柏林逃到西柏林的人。其中的一些人突然决定不再向人们开枪，他们要离开那里。也就是说，他们以前被困住了，现在则获得了自由。他们能够去自己一直想去的地方了。”

“比如迪斯尼？”凯伦说。

“对。”我回答说，“他们不但能够去想去的地方，也能够买他们一直想买的东西。”

我的女儿笑着说，“比如糖果？”

“对，”我说，“比如糖果。”后来我知道，那个周末西柏林的糖果店都断货了。

12年之内，哈耶克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尽管他所希望的辩论会没

有召开，但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海尔布伦纳在1990年9月的文章中讨论了冯·米塞斯的论点，他写道：“当然，结果证明米塞斯是对的。”

从那时起，世界上的经济自由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1922年，苏联领袖列宁说，政府应当控制“制高点”，也就是经济中最重要的那些部门。从1920年代到1980年代，事实上苏联的所有生产性资产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所有的工业、发电站、卡车、火车、飞机、商店和房子都归政府拥有。私人惟一拥有的生产资料是小农场，幸运的是，它们有非常高的生产效率，用全苏联3%的耕种面积生产了整个国家超过25%的肉和大约50%的土豆。^[1]但是到了1996年，俄罗斯的多数资产都由私人拥有。现在俄罗斯的GDP有70%是私人创造的。

1978年，中国农民面临严重的干旱。穷则思变，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场是集体所有的，因此农民不愿意在不属于自己的田地上努力工作。农民们恳求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家庭可以保留部分劳动所得。邓小平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自此以后，农民只要向政府上缴定额，超过定额的部分就可以保留下来或卖掉。从本质上说，政府已经执行了事实上的产权制度。此外，超过定额部分的产出是免税的，这就为农民积极生产创造了强大的激励。结果，从1978年到1990年，农民在自由市场出售农产品的比例从8%上升到了80%；而1978年之后的六年中，农业家庭的真实收入提高了60%。邓小平还允许中国沿海的经济特区给予当地企业更大的自由，从此以后，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比中国其他地方快得多。

在波兰、匈牙利和从捷克斯洛伐克分离出来的两个地区，还有印度及

[1] Yergin and Stanislaw, *Commanding Heights*, p. 272.

亚洲的其余地区、拉丁美洲以及英国等国家，也发生了政府权力不断削弱、社会逐渐走向经济自由的转变过程。简而言之，经济自由度在世界上很多地区有了戏剧性的递增，涉及到了世界人口的二分之一。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包括政府的计划制定者在内，人们认识到了政府做事是多么无效率。印度政府的一位高级计划制定人员回忆道，“在1989年秋天到1991年之间，我感到自己好像从一场35年的梦中惊醒了。我以前相信的经济制度和执行的经济政策都是错的。”^[1]

其次，观念真的很重要。事实是，世界上的许多冯·米塞斯们、哈耶克们以及弗里德曼们已经为此呼吁了几十年，终于水滴石穿。盖达尔（Yegor Gaidar）是帮助俄罗斯推行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的一位经济学家。盖达尔小时候生活在卡斯特罗革命时期的古巴，他们家曾经招待过古巴著名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切·格瓦拉。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给了他极大的打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读了许多关于自由市场的书。当被问到谁对他的经济思想影响最大时，盖达尔说：“当然是哈耶克。”^[2]

看来世界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各个国家都推行了更多的自由，自由为大众创造了前所未见的财富。

然而，尽管自由经济的成功得到了证明，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包括美国，还是执著于自由的反面：政府管制。政府不允许我们完全自由地为退休存钱，而是要趁我们还在工作时，用所得税的形式从工资里咬掉一大

[1] Yergin and Stanislaw, *Commanding Heights*, p. 138.

[2] Yergin and Stanislaw, *Commanding Heights*, p. 277.

块，然后等到我们退休时再以很低的收益率返还给我们。如果你是个雇主，需要为你的雇员们购买保险，那各种各样的州和联邦法会强迫你将保险责任范围扩得非常大，也不管你的雇员是否真的需要这些东西，这些要求也许会迫使你干脆就不去买保险了。如果你想推着小车在街上卖东西，或者用自己的汽车做出租生意，赚点小钱，那你首先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通常来说，政府是不会批准的，如果你不顾政府的命令坚持这么做的话，就会被送进监狱。要是你不满意你的孩子在公立学校接受的教育，想让他退学，那你是无法要回所缴的税里面付给公共学校的那部分钱的。此外，即便你让你的孩子进了一所私立学校，学校也是受到政府管制的。当有人使用有确定风险的产品——从香烟和武器到梯子和飞机——受到伤害后，销售者会被起诉。这样，被起诉的可能性迫使生产者提高价格，消费者也就不得不支付更多的钱。

政府条例和管制越来越多。仅仅包含联邦政府新制订的和即将出台的管制条例的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在1988年柏林墙倒塌前夕有5.3376万页，到了1998年则扩到了6.8571万页。美国各级政府花掉了人们30%的收入，并对剩余的70%进行不同程度的管制。

25年前，当你与某人就他所作的某个选择进行辩论时，通常来说，这个人自己有不智嫌疑的选择作出的终极辩护词是：“这是个自由的国家。”现在，你很少能再听到这样的表达了。相反，政府越来越像你的父母或“老大哥”，后面那个词因奥威尔的《1984》这部描述极权主义的讽刺小说而家喻户晓。美国副总统戈尔意识到了许多美国人因管制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他说联邦政府“绝不应该成为临时保姆或父母”。这听上去很好，但戈尔并没有放弃让政府权力介入人们生活的念头，倒是对政府在

“大家庭”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作了很好的界定。他说，政府应当“更像是祖父母，负有养育的责任，并知道该如何教育，但不会以那种权威的方式来推行”。^[1]但政府并不是我们的父母、老大哥、临时保姆或祖父母。政府就像华盛顿说的那样，是武力（force）。所以如果你支持副总统的构想，请想一想，把政府当作一个手里握着枪、从来没见过你而且也不怎么关心你的祖父母会是什么情形。

柏林墙的倒塌固然令人欣慰，但这并不是全部，人们应该拥有比任何政府所允许的更大的自由。

[1] Associated Press, June 12, 1997.

第四章

你属于你自己

主张征兵的人们是怎么想的？不管他们的想法多么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相信你是一种国家资源。我在这里告诉你，你属于你自己。你不是一团任人揉捏的泥巴，没有人有权利要你违背自己的意志，不管他们是谁，不管他们有多少选票，也不管他们试图让你做什么。

——戴维·亨德森

1979年5月在卡耐基—梅隆大学所做的反征兵制演讲

在文明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奴隶制是错的，我也这么认为。但为什么奴隶制是错的？内战前的奴隶制是错的，因为它强迫奴隶去摘棉花吗？很难这么说。并不是所有奴隶都被强迫去摘棉花或收割别的什么农作物，有些人是被强迫去做种植园里的其他劳动；也并不是所有的奴隶都在

种植园里工作。事实上，有个叫格雷的著名奴隶曾当过一艘纳齐兹平底船的船长，手下管着一群人，包括白人。格雷还管理着公司的其他生意，他能够自由旅行，手里掌握着大量的钱，而且还佩戴着一支枪。但格雷仍然是一个奴隶。^[1]所以，奴隶被强迫去做什么本身并不是奴隶制在道德上可憎的原因。

那么，原因或许在于奴隶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这肯定是奴隶制的一个非常可恶的方面，但奴隶们遭受的待遇仍然不是奴隶制的根本问题所在。下面有个笑话，是一个从肯塔基州逃出来的奴隶和一个印第安纳州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之间的对话。

绅士：你在那里不快乐吗？

奴隶：哦，不。我在那里生活很好。

绅士：你遭到了虐待吗？

奴隶：不。主人和我是很好的朋友，还一起钓鱼和打猎。

绅士：你的伙食和居住条件好吗？

奴隶：当然好了。火腿和土豆，还有蜜糖。我的小屋就在房子上面。

绅士：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要逃走呢？

[1] 格雷的故事来自 Jeffrey Rogers Hummell, *Emancipating Slaves, Enslaving Free me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Peru, Illinois: Open Court, 1996, p. 42.

奴隶：尊敬的先生，如果你想申请去的话，那里还有空缺呢。^[1]

奴隶制的本质以及令它在道德上可憎的原因在于，奴隶的身体成了其他人的所有物。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从奴隶制地区逃出来后不久，在新英格兰的废奴主义者大会上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道格拉斯告诉听众，他已经把自己的身体偷出来了。他的话充满了苦涩的反讽意味，因为既然他自己的身体属于那个奴隶主所有，那么一旦逃跑，道格拉斯实际上就犯了偷窃罪。但这根本就不是偷窃。道格拉斯只是要回了他自己的权利而已。这个故事说明，奴隶制的本质以及它的根本罪恶在于，它认为一个人可以成为其他人的主人。

如果不是某个特定的个人拥有奴隶，而是政府要求拥有奴隶呢？这就是希特勒所说的：“我们把人社会化。”政府拥有奴隶会使奴隶制变得可接受吗？不。其他人不能拥有你，政府也是其他人，它同样不能拥有你。那么谁可以呢？给你提供个线索：看看镜子。惟一能够拥有你的人是你，你拥有你自己。

你对你自己的权利有时也被称做自我所有（self-ownership），这是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在300年前就明示过的。美国的国父受洛克思想的影响很深，虽然他们还是非常错误地允许了奴隶制的存在。到了今天，你对你自己享有权利这一点，在美国总该是没有争议了吧。但事实却

[1] 来自 Jonathan Hughes,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3rd 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0, p. 34. Jeffrey Rogers Hummell 在 *Emancipating Slaves, Enslaving Free Me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p. 41 里作了重述。

并非如此。

针对所有人种的大规模奴隶制在美国从没有被广泛地执行过，但美国确实曾经差一点就变成了那样的社会。那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几个月就结束了。罗斯福总统提出了一个新法案，授权政府可以禁止工人辞职，而且在没有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工人不能获得新工作。因为违反这条法律的人会被关进监狱，最高刑期为一年，所以这个法案也被称为“不工作，进监狱”（work-or-jail）法案。^[1]在这条罗斯福提案之中，政府战争动员部门的主管将有权奴役人民。罗斯福的手下宣称这条法律可以用来维持战争期间的工业产量。很明显，这说服了美国众议院在3月27日以167票对160票通过了该条提案。^[2]就在4月3日参议院正式表决前的几天，至少发生了三件大事。首先，罗斯福政府战时人力资源小组委员麦克拉特（Paul McNutt）承认，当前的人力资源并不是非常紧张，而是处于“理想状态”。^[3]在此之前，希望通过该提案的陆军和海军曾经成功地威胁住战时人力资源小组，让他们扣住一月份的报告不发，因为这份报告描述了“自开战以来最好的人力情况”。^[4]其次，战时生产部的月度报告显示，2月份的生产总量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这揭穿了法案支持者关于战时生产危机的谎言。^[5]最后，就是参议院表决前三天，战时动员和重建部门的主任无意中说出，“需要扩展人力资源法律的适用范围……不仅是战争

[1] Allen Drury, *A Senate Journal, 1943~1945*, New York: McGraw-Hill, 1963, p. 360.

[2] Drury, *Senate Journal*, p. 396.

[3] Drury, *Senate Journal*, p. 400.

[4] Drury, *Senate Journal*, p. 384.

[5] Drury, *Senate Journal*, p. 400.

用品，还要包括那些基本的民用品，以后还要加上那些能帮助战后重建的产品。”^[1]翻译一下，也就是说：罗斯福政府不仅把这个法案当作战时措施，还要让它成为长时期奴役人民的奴隶制度。1945 年 4 月 3 日，美国参议院以 46 票对 29 票推翻了这个提案。^[2]这区区 17 票挽救了美国的自由，美国人从此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可以自由地选择用他们自己的身体来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要有九个议员改变他们的投票，某种限度的奴隶制就会套到美国人头上。这不可能发生吗？不，它几乎已经发生了。

.....

几乎奴役了美国工人的法律

下面就是这个所谓“不工作，进监狱”提案的关键条款，它在众议院通过，但是在参议院以 46 票对 29 票遭到否决。

第 5 款 (a) 在 (战争动员部门) 负责人认为有必要并适合执行本法第二款所宣布的目标和手段的情况下，若其目标是使雇员的活动及场所用于战事服务所必需的生产作业时，负责人有权进行如下管制：

- 1. 规定工作指定范围、活动或场所的雇用最高限额，通过年龄、性别或职业资格标准固定可能被雇用的工人的最高限额，禁止招雇超过最高限额的工人；
- 2. 禁止或者限制雇主雇用、重新雇用、招揽或招雇新工人，以及工人接受工作；

[1] Drury, *Senate Journal*, p. 402.
[2] Drury, *Senate Journal*, p. 404.

3. 在指定范围、活动、车间、机构和农场等负责人认为对战事至关重要的场合中禁止已被雇用的工人自由停止工作，除非负责人认为这个工人继续这样的工作对战事来说已不再必要，或这个雇员有正当的理由离开岗位。

(b) 任何任意违反 (a) 下各子款规定管制的行为都是犯罪或违法，根据有关判例，要被处以 12 个月以下的监禁，或处以 10000 美元以下的罚款，或两者并用。

.....

征兵制

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 1945~1973 年间（只有一年例外），我们的确进行了征兵。在 20 世纪所参与的四场主要战争中，美国政府都使用了征兵制。政府告诉人们，身为年轻男性是一种不幸，必须到“征兵事务处”登记。数百万人被征募并被送去战场，其中数十万人再也没有回来。任何拒绝登记或加入军队的年轻人会被抓进监狱并判处最高达 5 年的徒刑。所以，在 20 世纪的很长时间里，政府在事实上拥有否认年轻美国人支配自己的权力。

当然，政府宣称如果不这样做，志愿军的数量就不够，以此来将征兵正当化。实际上，当人们相信参军具有必要性时，志愿兵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比如，在珍珠港事件后的三个月中，在理所当然要“向日本人报复”的情绪下，有 38.4 万人加入了军队。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威尔逊政府就以志愿兵太多为借口来实施征兵制。他们说要通过征兵制来阻挡过多的积极入伍的人，因为市民生活更需要有参与精神的公民，

而征兵制征募的是那些没什么参与意识的人。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政府都阻止人们志愿参军。

非民选政府在承认他们需要征兵制的真实动机问题上往往更为坦率。当现代征兵制度的创始者拿破仑被告知某次军事行动会牺牲太多的男人时，他回应说：“那没什么。妇女们制造出来的要比我所能用的多得多。”幸运的是，在今天的美国，年轻男性不用被强制入伍。从1973年7月1日起，没有一个人因为被强迫才加入美国军队。在重建私有产权这个重要方面，美国政府跳到了其他许多政府的前头，包括法国、俄罗斯和西班牙在内。

我前面说过为自由而努力的渴望引导我成为了一个经济学家。在我早期的阅读中，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有这么多经济学家同时在经济学与哲学层面上反对征兵制。不仅如此，他们也是1960年代反对征兵制的知识分子领袖。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征兵制，他说“征兵制从理论上讲就像是一种强迫年轻人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提供服务的机制”。^[1]1966年，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征兵制做出理论性批判，当时征兵制在美国社会的地位安如磐石，即使在当时蓬勃发展的反越战运动中，也很少有人从理论上反对征兵制。弗里德曼说，征兵制是他惟一曾亲自向国会议员游说过的主题。在把征兵制从美国人的生活中消除掉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们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如果不是那些早过了征兵年

[1] 引自 Richard Gillam, “The Peacetime Draft: Voluntarism to Coercion,” *Yale review*, Vol. 57, #4, June 1968。

龄的经济学家们英雄般的努力，我们今天可能依旧还保留着征兵制。

有一位经济学家特别值得提出，他就是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他是我在胡佛研究院的同事，参加了尼克松在 1967 年的总统助选活动，1968 年选举期间尼克松在 CBS 电台上所作的反征兵制演讲就是安德森写的。作为尼克松的顾问，安德森帮助挑选了尼克松的全志愿役委员会，即一般所说的“盖茨委员会”成员。其他四位帮助终结征兵制的经济学家分别是：弗里德曼，沃利斯（Allen Wallis，他后来成了尼克松总统的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格林斯潘（委员会委员），还有委员会的执行主席麦克林（William Meckling）。他们都认为征兵制是不公平的隐性税，会强迫年轻人离开他们所喜爱的事业。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年轻人本来每年能赚 2 万美元，而加入军队后的所得是 8000 美元，那么“征兵税”就相当于 12000 美元，对年轻人的征兵税率就超过了 50%。他们相信既然整个社会从国防中受益，社会就应当以直接税（explicit tax）的形式来支付服务薪金而不是向不幸的少数人征收隐性税。弗里德曼在最近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Two Lucky People*）中写道，一开始，15 个委员中有 5 人反对征兵制，包括他自己、格林斯潘和沃利斯，5 个委员没有决定，还有 5 个支持征兵制。但是不到一年之后，在委员会的报告出台并成书的时候，所有委员都赞同结束征兵制。

这是怎么发生的？主要是因为委员会里的经济学家们太善于说服人了。有一个精彩的例子，那是比尔·麦克林的遗孀贝基·麦克林在丈夫去世几个月后跟我交谈时提到的。（我在 1970 年代晚期和麦克林夫妇相熟，那时比尔是罗彻斯特大学商学院的主任，而我在那里担任助理教授。）贝基告诉我，有一天比尔从委员会回来，显得特别开心。她说，让比尔那么

开心的事是弗里德曼与威斯特摩兰将军的激辩，威斯特摩兰将军是越战军队的指挥官，那时还是美国陆军的参谋长。我曾经听比尔讲过好几次这个故事，而且那天的事给弗里德曼也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两个幸运的人》中，弗里德曼记录了两人的辩论。据弗里德曼回忆，威斯特摩兰说他不愿意指挥一支由惟利是图的雇用兵组成的军队。弗里德曼问道：“将军，你更愿意指挥一支由奴隶组成的军队吗？”

威斯特摩兰：我不喜欢你把我们爱国的征召入伍者们称做奴隶。

弗里德曼：我不喜欢你把我们爱国的志愿兵们称做惟利是图的雇用兵。如果他们是惟利是图的，那么先生，我就是个惟利是图的教授，而你，则是一个惟利是图的将军；为我们治病的是惟利是图的医生，我们雇用的是惟利是图的律师，而我们所吃的肉是从一位惟利是图的肉贩那儿买来的。

弗里德曼评论道：“这是我最后一次从将军嘴中听到雇用兵这个词。”^[1]

另一位做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是罗彻斯特大学的瓦尔特·奥（Walter Oi）。瓦尔特一直是一个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人，他早年因退化性眼病而全盲，但仍然开创出了自己的事业。瓦尔特后来成了我在罗彻斯特的同事，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讲原则的一个。关于他有两个特别的故事。第一

[1]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380.

件事是我从另一位罗彻斯特的同事詹森那儿听到的。瓦尔特的第一份学院工作是在艾奥瓦州立大学的一个短期职位，它有可能转成长期职位。那时候，他的视力已经退化得很厉害，几乎完全看不见了。在1960年代早期，歧视残疾人还是合法的，尽管瓦尔特从不把自己看成残疾人。他的一些同事建议年轻学生主修农业经济学，说农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在一次教师会议上，瓦尔特指出农业是一个正在衰落的产业，并谴责他的同事们不够诚实。这是很有勇气的事，他在第二年失去了那份工作。

另一件事是在1980年代早期，那时我是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瓦尔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当时一个评估二战期间所有被关入监狱的西海岸美籍日本人生活状况的委员会刚刚推出一份报告，建议政府向每人赔偿2万美元。瓦尔特希望我能给他一份报告的副本。当初在罗彻斯特第一次和他会面的时候，我已经对他充满了好奇。我曾问瓦尔特，年幼的他在战争期间是否曾被关进监狱。他说是的，他在10岁的时候被美国政府当作囚犯关押，而且在被送回内陆之前，他们一家都被关在洛杉矶圣塔安妮塔跑马场的马厩里。他对这段经历记忆深刻。这一次，我答应瓦尔特寄给他那份报告，并问：“你对委员会的建议有什么看法？”

他大声说：“我反对。”他告诉我，美籍日本人的确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最好的办法是让这件事过去，而不是开启一个新的政府项目。

盖茨委员会报告出台三年后，征兵制宣告结束。从此，所有美国青年都可以像我在加拿大时那样长大，在18岁以后有筹划自己生活的自由，而不必受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征兵制的威胁。他们可以像比尔·盖茨那样自由退学，不用担心因此失去暂缓服役（draft deferment）的待遇。这项自由可能有助于造就一个由20岁左右的年轻人构成的企业家阶层。

上面提到的为终结征兵制而战的经济学家只是其中最知名的而已。很多青年经济学家也作了各种相关研究，才使盖茨委员会能有充足的理由要求取消征兵制。当政府官员鼓吹恢复征兵制的时候，有许多你可能从没听说过的经济学家扮演了坚决反对者的角色。他们中的许多人常年在军队智囊团（think tank）里担任职务，包括兰德公司、海军分析中心及防御分析研究院等；还有许多人则在国防部和国会预算办公室等机构就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人都是从道义出发反对征兵制，没有人是因为自己或其子女可能受征兵之苦才这么做——胡佛研究院的马丁·安德森没有子女，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克里斯·杰恩只有一个女儿。征兵制的废除过程使我难忘，还因为理性和自由的信念终于成功击败了错误的义务论，而经济学家在其中居功至伟。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军队在招募新兵方面碰到了麻烦，主张征兵制的声音就会从隐藏的角落里冒出来，并试图重行旧制。多数雇主在找不到足够的雇员时，会问他们自己是不是付的薪水不够高，或者反思他们分配给雇员的任务是否合理。军队可不是这么想问题的。比如，士兵们被送到巴尔干半岛这个郁积了数个世纪仇恨的地方去平息冲突，可以理解，这些对冲突双方都不感兴趣的美国青年并不愿意参军，但很少有政府官员选择用自己的智慧来解决外交争端。每当他们开始试图重启征兵制，在最前线举起反对大旗的仍然是经济学家。^[1]

[1] 1970年代晚期至1980年代早期，与重新引入征兵制的尝试作奋力搏斗的经济学家包括：保罗·霍根（Paul Hogan）和李·梅尔斯（Lee Mairs），他们都是华盛顿战时人力资源顾问；霍洛维茨（Stanley Horowitz），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防御分析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还有克莱姆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约翰·华纳（John Warner）。

一些希望重拾征兵制的政客非常可恶地质疑那些相信人们应该自主选择是否加入军队的经济学家的爱国精神，但他们自己真正显示出的却是自己对爱国主义狭隘的理解。1979年我在美国参议院三军委员会人力与人事小组委员会作证反对重新启用征兵制的时候，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下面是我与小组委员会主席，佐治亚州民主党参议员龙恩（Sam Nunn）的对话：

亨德森：我所说的是建立一支优秀军队所需的成本。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你所谈的是挑选谁来承担这个成本。这个成本一点也不低于30%的预算（工资），你只是把成本摊到了那些年轻人头上而已。你并不是在主张一支费用更少的军队，你并不是在主张更低的劳动力成本，你只是在主张让年轻的应征入伍者而不是所有纳税人来承担这个成本而已。

龙恩参议员：所以你不认为任何人对这个国家有任何义务，除非他们获得了相称的报酬？换句话说，你拒绝承认存在任何类型的为（美）国服务？

亨德森：是的。我想你也有一项义务，那就是尊重其他人的权利。

龙恩参议员：你反对任何人在没有得到足够回报的情况下为美国服务，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是如此？

亨德森：是的。

龙恩参议员：要是发生入侵的话，你会在征兵人员旁边，问我们能付给你多少钱，问我们是否应提高价格？

亨德森：我想我们可以搞得更有组织一些。

龙恩参议员：我不知道。你用你的理论做逻辑推理，把“爱国精神”这个词抹得一干二净。

亨德森：不，我没有。我是说付给人们应该付给他们的钱，我不是说人们就没有爱国的动机。事实上，如果你相信人们有爱国的动机，为什么你不愿意组建一支全由爱国的志愿者组成的军队呢？如果人们是如此的爱国，那么他们就会愿意志愿参军。那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不是说他们不爱国，我是说爱国的人愿意志愿参军，不爱国的则不愿参军；而且人们越是爱国，你所要付给他们的钱就越少。^[1]

对龙恩来说，爱国精神意味着人们应当被迫服役；我的爱国精神则意味着，人们选择去服役。

你的身体到底是谁的？

在很多重要方面，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政府都宣称它们拥有我们的身体。在美国的某些州和加拿大的某些省，要是你骑摩托车（甚至是自行车），你是不能为自己的身体作决定的——必须戴上头盔。通过为你做这样的决定，从根本上说，政府拥有你的身体。

那些希望政府强迫人们戴头盔的人认为安全法规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摩托车手没有保险或资产作保障的话，纳税者就得为他愚蠢行为的后果买单。但我认为这个论证是虚假的。现在相当多的摩托车手有充足的保险

[1] 出自“Reinstitution of Procedures for Registration under the Military Selective Service Ac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Manpower and Personnel of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 U. S. Senate, 96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May 21, 1979, p. 169。

和资产，如果受伤的话，他们事先有准备，不会成为别人的负担，但我没有看到安全帽法规的鼓吹者们说这部分人可以不必一定要戴头盔。我坚信，只要你抓住一个安全帽法规的鼓吹者，你就找到了一个认为你不属于你自己的人。

针对毒品、药物或其他东西的法律也有相似之处。如果你拥有自己的身体，又如果你患了艾滋病等威胁生命的疾病，你难道不可以试试某种实验药物碰碰运气吗？可是药品公司必须通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关于药品安全和疗效的要求，等到公司满足了FDA的要求，你可能已经死了。但是，在此之前药品公司就是不能卖这种药物，你也不能买。许多FDA不允许在美国销售的药品在其他国家是救命用的。这不仅是指墨西哥等贫穷国家，还包括工业化国家，如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前《华尔街日报》记者奎特尼讲述了1990年代早期一位医院护士柯蒂通过走私为他的病人获得各种药物的故事。在华盛顿特区，柯蒂告诉一个FDA顾问委员会，甚至委员会里的一些成员医师都曾经通过他获得非法药物。柯蒂说：“我来这里是想说服你们确认这种化合物的价值，你们中已经有两位从我这儿为你们的病人买过这种药。”奎特尼评论说，这些医生“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为了决定你可以使用哪种药物，政府用他们的专家意见替代了你知之甚详的那部分关键信息：你自己对于风险的想法和感觉。实际上，政府认为他们比你懂得更多，因此有权决定如何处置你的身体。1992年，FDA委员凯斯勒（David Kessler）在知名刊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这样写道：

如果我们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是否要使用 FDA 的管制产品，那么机构存在的整个理论基础都将消失。^[1]

对于这样赤裸裸的辩白，我实在无话可说。

基于相似的原因，政府不允许你拥有大麻、可卡因、迷幻剂和海洛因等毒品。政府说这是因为如果你服用这些毒品，就会伤害你自己。毫无疑问，有很多人相信这样的话。然而，政府官员不会试着用劝说的方式让你远离那些东西，那样的话，决定权就在你手上。他们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用判以重刑来威胁你，夺走决定权。他们把你当成一只宠物，区别只是在于：如果你的宠物行为不当，你不会把它关起来并定以凶手之罪，还假装这样做是为了它好。

不管你对这些毒品知道多少，也不管这些毒品在你的生活中有多少价值，你的个人信息毫无意义。比如，某些针对癌症和其他疾病的治疗方法使病人极度痛苦。在绝望中他们希望使用大麻，因为它通常有助于减轻术后反应。尽管加州等地区多数选民也支持这一做法，联邦政府却非常严格地禁止大麻药用。对那些把大麻列入药方的医生，政府威胁说要吊销他们的行医执照。使用这些措施，联邦政府官员就等于是宣告了对你的身体的占有权。

当然，许多政府官员在表示每个使用非法药品的人都应当被关进监狱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当真这么想的。他们的潜台词是，如果他们不认识你的话，你应当被关进监狱。对他们自家犯罪的孩子而言，监狱没有任何好

[1] David Kessler,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June 1992.

处。我太夸张了吗？那么，请先读读下面这个发生于1998年8月的新闻故事，然后再作判断吧。

州警察局本周二宣称，帕塔基州长（George Pataki）竞选伙伴的19岁女儿凯尼（Sara Kenney）被控藏有少量大麻……

她的母亲，仁斯利尔（Rensselaer）前地方检察官多诺霍（Mary Donohue）和帕塔基都承认在大学期间也曾抽过大麻。

“我女儿所做的是错的，她对此非常悔恨，”多诺霍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会以家庭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1]

药物法当然不会让我们也“以家庭的方式”来处理这种事。界定非法药品背后的整个理念就是要让政府代替家庭来处理这些事。家庭不能因为某个人使用了大麻就把他投入监狱，政府却能，而且它也经常这么干。

[1] Associated Press, August 25, 1998.

第五章

你的财产权

最穷的人也可以待在他的小屋里蔑视国王的全部力量，屋子或许破旧不堪，屋顶或许摇摇欲坠，风或许可以穿堂而过；风暴可以进来，雨水可以进来，但是英格兰的国王不可以进来，他的所有军队都不敢跨过这个荒废小屋的门槛。

——威廉·潘恩，约 1763 年^[1]

厌恶私有产权的民族缺少自由的第一要素。

——阿克顿勋爵^[2]

我的朋友，也是我以前的学生胡伯描绘了这样一个场面：你看见一个人正在一幢房子上画画，另一个人则用枪对着他，命令他停止绘画。谁是有理的一方？我猜你会回答说：“那个画画的人。”我就是这么回答的。但

[1] Michael Barone, "The law and a little boy,"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y 8, 2000, p. 29.

[2] Jim Powell, *The Triumph of Liberty*, Free Press, 2000, p. 345.

我的朋友胡伯指出，你（可能）和我都没有认识到这幢房子是属于谁的。事实上，手里拿着枪的那个人拥有产权，而且他只是要求画画的人远离他的财产，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房子被涂画。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手里拿着枪的人才是有理的，因为我们相信产权制度。我们相信某样东西的所有者有权决定如何使用这样东西，如果他不希望别人画他的房子，那这是他的权利。

大多数人是在实践而不是理论层面上理解财产权的。经济学家塔洛克（Gordon Tullock）举过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那是他于1960年代晚期在弗吉尼亚大学教书时所发生的故事。一个大学生在他的课堂上说并不存在所谓财产权这种东西——当时，这种立场在学生中很流行。于是塔洛克就抢了学生的钱夹。学生要求他归还，塔洛克拒绝了，他说如果并不存在所谓的财产权，那么这个学生怎么能够说钱夹是他的呢。当然，塔洛克是财产权的坚定拥护者，相信钱夹的确属于那个学生，他只是想设法让学生知道这一点。所以塔洛克坚持问那个学生，为什么他相信这个钱夹是自己的。学生最后说他是用和平的手段获得的，并不是偷来的。于是，塔洛克立即就把钱夹还给了他。

请注意我说的“把钱夹还给了他”。“还”和“他”这两个字，即已表明这个钱夹是学生所有的。如果我说塔洛克给了学生塔洛克的钱夹，或政府的钱夹、无主的钱夹，会不会显得很奇怪？事实是这个学生拥有这个钱夹，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接受这点。当有人不接受所有权这个事实，并且用行动来表现这种不接受时，我们有一个词来称呼他们：小偷。

大概在我9岁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它使我第一次真正了解到财产权对普通人的保护。这件事发生在加拿大的避暑胜地米纳基。我爸爸和他的

兄弟从祖父手上共同继承了一幢别墅。因为爸爸是教师，母亲则待在家里抚养我们兄弟三人，所以我们可能是在米纳基拥有别墅的人中最穷的一家人。有一次，爸爸和我把我们的独木舟划到了“米纳基之屋”的前面，那是一个真正的富人旅馆区（爸爸所定义的“富人”，回头想一想，一般是指收入至少比我们高出30%的人）。我们在“米纳基之屋”附近划船的时候，正好旅馆经理牵着条大狗在散步。我们的狗拉迪也在独木舟里，那条大狗开始向拉迪咆哮，变得特别兴奋。它突然跳下水向我们游来，好像准备上独木舟。拉迪也大声地叫着，越来越激动，我们担心它跳进水里和那条狗斗起来，那会让它受伤甚至淹死。

爸爸愤怒地向那个经理大吼：“叫住你的狗！”那个经理也愤怒地吼起来。就这样你来我往僵持了一阵，直到经理叫住了他的狗，也可能是那条狗累了，回到了岸上。我不太记得了。

我所记得的是我对父亲是否会被警察带走的极度恐惧。毕竟，他在愤怒地向一个拥有大型度假山庄（事实上是管理，并不是拥有，但在那个年纪我并不清楚两者的区别）的人大吼大叫。我的父亲总是抱怨有钱人，说他们占有了一切，没留下任何空间给小人物。我相信他所说的。所以那天晚上，我非常害怕那个经理会带着警察把父亲抓起来。当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发生。父亲像往常一样做事，好像昨天发生的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意识到父亲根本没有担心过，于是才开始放松下来，并有了安全感。那时候并不知道“财产权”这个概念，我想到的只是有一块未经允许别人就不能进来的地方真是好极了。我发现了财产权的力量。后来，每当听到人们说财产权只是对富人才重要这类话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自己在米纳基的经历。

在 UCLA 读研究生期间，我从经济学教授阿尔奇安那里学到了财产权带来的重要经济效应，他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声誉甚隆。阿尔奇安指出，如果你能够把什么是财产权这一点搞通，就可以对大量的人类行为有深刻理解。在第一堂课上，他给了我们两个有关无效运作的例子。一个是校园里的学生书店，在那里人们不得不排几小时的队去买书；另一个是学生停车场，收费很低但车辆过多。他说，当你排队买书或者找不到停车位时会非常愤怒，但你应当注意到的是这两个例子证明了经济学的解释力。（事实上，阿尔奇安以他的顽童态度说，这个时候，你应当感到快乐而不是愤怒。）阿尔奇安指出，学生书店运作得不好是因为产权不明晰，没有一个个人或者团体有避免亏损的利润动机或强大激励。在书店里，那些想出更好经营办法的人并没有得到更多回报；如果书店是私人所有的，所有者就有很强的积极性去把经营搞好，因为在所创造的价值中，有很大一部分会归他（她）所有。阿尔奇安说，与此类似，制定停车费用的学校职工有积极性把价格定得低一些。虽然高费用会给大学带来更多的收入，但是这笔收入不会进定价者的口袋。阿尔奇安指出，由于制定停车费标准的人是一定能保证自己有停车位置的，所以会倾向于把费用定得低一些，因为他们也是要付钱的。但是，低费用就意味着无法保证学生们有停车位。

多年以后，一位曾受教于阿尔奇安的经济学家汤姆·黑兹雷特（Tom Hazlett）运用阿尔奇安对停车费的洞识来解释为什么密歇根州国会议员丁格尔（John Dingell）——也是那时的国会商业委员会主席——会强烈反对将有价值的电磁波谱拍卖给广播公司和其他用户。丁格尔希望代之以向特定用户发放规定期限的许可证的形式。黑兹雷特指出，如果政府将波谱拍卖给出价更高的投标者的话，丁格尔就无法从数十亿美元的所得中染指半



因而地主对土地和佃农更感兴趣了，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日趋活跃的刺激下，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均田农民和大量自耕农破产，成为逃户的主要来源。唐代的均田令本来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就比较宽，《唐律》中虽有对于“土地过限”的处罚，但

到1943年1月，尽管作了无数次尝试，但KTBG的所有者依旧无法获得FCC的允许来出售电台。但是在1943年1月3日，约翰逊夫人提出了购买电台的申请，24天以后，那些已经等了三年多的所有者们突然就被允许出售电台了。1943年6月，约翰逊夫人又申请将运营时间从日间扩展到一天24小时，并要求一个更好的调频波段，这些要求一个月以后也得到了批准。这一切发生的时候，FCC正受到强势的佐治亚州议员考克斯（Eugene Cox）的攻击。约翰逊私下里与FCC官员詹姆斯制定战略，并运用他对国会发言人雷伯恩（Sam Rayburn）的影响力来为FCC化解危机。事实上，詹姆斯后来承认他曾经推荐约翰逊夫人申请许可证。林登·约翰逊还通过政治施舍（political favor）来换取广告收入，进一步增加电台的价值。物价管理局通过引入战时价格管制制造了短缺，而稀缺物品通常是通过政治影响力分配的。约翰逊运用他的影响力，让那些在他的电台上登广告的人获得更多配给。比如，1943年百货零售商巴特在KTBC上登广告几个月后，约翰逊就插手物价管理局，多分配给巴特15万箱葡萄柚。

林登·约翰逊的故事是在财产权缺位或定义不清的时候，政府官员运用自己的权力慷他人之慨来为自己聚敛财富的一个典型例子。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当政府控制某样物品或有意压低其价格的时候，那些有良好政治关系的人就会利用这一点占有大量本属于财产所有者的财富。

当然，作为人民的有力保护者，财产权必须得到尊重。尽管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方面都尊重彼此的财产权——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偷你的车或闯进你的家门——但是美国各级政府对我们的财产权却越来越不尊重。比如，在各种联邦、州和地方法律之下，只要政府怀疑你与一项毒品案有

关，他们就可以查封你的车、房子，冻结你的存款。政府机构要扣留你的资产，甚至不需要给出控告你的罪名。为了要回你的资产，你得证明自己是无辜的，这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彻底颠覆。即使你打赢了官司，你还是要支付法庭和律师费用。毫无疑问，当政府没收了一辆只值几千块的汽车时，无辜的人们一般不会自找麻烦去把车要回来。麦克纳马拉（Joe McNamara）是我在胡佛的同事，他向我讲述了他在加州圣何塞当警察局长时的一段经历。当时，他注意到在预算建议中没有买车的钱。他问为什么，一个预算人员回答说他们不需要这项预算，因为根据资产没收法，他们应该会没收到足够多的新车。

政府越来越不尊重我们的财产权的另一个表现是土地使用。想一想波兰镇（Poletown）这个悲惨的例子。^[1]波兰镇是底特律的一个区，1980年的时候，通用汽车公司想在那儿建一个凯迪拉克工厂。他们面临一个问题：波兰镇有4200名居民，其中大多是镇上房子的业主，而且他们多半不愿意搬走。如果我要求你卖给我你的公文包，而你说不，那么讨论就应该结束了。事实上，如果通用公司和底特律的高官们是照章办事的，可能根本就没有这场讨论。当地政府的负责人科尔曼·扬，决定使用密歇根州1980年“统一征用法”（Uniform Condemnation Act）——其实就是“快速获得法”——赋予的权力来抢夺这块土地，强迫所有者在不同意的情况下卖掉产权，并且摧毁他们的房子。更糟的是，通常支付给所有者的钱要低于市场价格。当居民们大声抱怨的时候，国会参议员里格尔拒绝和他们会面，并批评他们的反抗“几乎没有责任感可言”。密歇根的另一位

[1] Jeanie Wylie, *Poletown: Community Betraye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9.

参议员列文，抱怨拉尔夫·内德要求就这个议题举行听证会的主意是“鲁莽”的。惟一一位对这些居民表示了少许同情的密歇根政客是众议员康耶斯。最后，波兰镇的居民失去了他们的房子，这个地区也被摧毁了。

这种情况并非罕见。1950年代末，布鲁克林道奇棒球队（Brooklyn Dodgers）把主场搬到了洛杉矶，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可以在切瓦士山谷建道奇体育场。切瓦士山谷那时是一个由独立住宅组成的大型墨西哥人社区，它后来被毁掉，而业主们所得的赔偿只相当于房子价值的一小部分。联邦政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市区重建为理由，拆毁穷人区的房屋，为富人修建新房，采取的手段多半是借用政府力量征地而不是去向愿意的卖主购买。对湿地的联邦管制也使得私人所有者无法自由使用自己的土地。由于对湿地没有固定的法律界定，这种模糊性给予了政府任意决定人们生活的权力。皮尔斯是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官员，他曾经参与1989年湿地定义的确定过程，对此也承认不讳。他写道：“为了实现控制，我们说什么，湿地就是什么。”^[1]比尔·艾伦是这一定义的牺牲品，他因为在自己的土地上建养鸭塘而被关进了监狱。虽然他已经获得了所有必要的许可，但湿地的定义发生变化之后，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要求他停止修建。艾伦在48小时内照办，但最后还是被起诉了。兵团后来炸掉了养鸭塘，摧毁了湿地。^[2]但是根据他们对湿地的定义，我猜想他们绝不会摧毁自己的湿地。

[1] Robert J. Pierce, "Redefining Our Regulatory Goals," *National Wetlands Newsletter*, November/December 1991, p. 12, as quoted in James Bovard, *Lost Righ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 34.

[2] James Bovard, *Lost Rights*, p. 36.

关于财产权的收益效应及其缺失所带来的损失，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一个洞识可以概括为“公地的悲剧”。但这个概念不是经济学家发明的，而是一位叫做哈丁（Garrett Hardin）的著名生态学家 1968 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1]他这个洞识又来自于生活在 100 年前的经济学家劳埃德（William Forster Lloyd），他指出英国的公地被过度放牧，而私人牧场则没有这个现象。劳埃德及后来的哈丁解释道，如果没有人拥有这块土地，那么每个使用者就有积极性去过度使用它。为了不毁坏牧场，必须控制在公地上放养的牛的数量。但是单个人的这种做法是起不了作用的，并不能在以后获得更多的草料，因为其他人会放养更多的牛来使用这个人节约下来的草料。即使我们多数人都在克制使用，仍有一些哈丁所说的“非天使”（non-angel）会滥用土地。只要我们回过神来，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我们也会开始滥用土地的。

在我们身边可以找到很多类似公地悲剧的例子。和我的同事一样，我对自己的办公室拥有一定限度的所有权（quasi-ownership）。但是走廊就属于公地了，我们就会把走廊当作扔掉旧家具的便利场所，并希望别人会来处理掉它们。从本质上看，我们把走廊当成了公共财产。城市的街道也是公共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要比商店和房子脏得多的原因。

公地的悲剧可以解释很多其他大大小小的现象。它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物种消失或处于消失的危险之中。政府通过禁止私人拥有这些物种而使它们成为“公共”物品。但是，不能拥有活的鱼或动物意味着，要想拥有它们就只能用合法或非法的办法来杀死它们。因此我们就会滥钓滥捕，最后

[1]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1968), pp. 1243~1248.

们不能拥有任何东西，那么国家资源就变成了巨大的公共品，人们没有积极性去照顾它们。如果你不能从生产中获得酬劳，为什么要去做这种事呢？同样，如果不能从行动中得益，你为什么要去保护环境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徒劳地使用除草剂和杀虫剂，想把卡拉库姆沙漠转变成一块肥沃的农田，结果反而毒害了咸海。^[1]

财产权不但给予人们巨大的积极性去管理自己的财产，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变得更富裕，而且还能解决很多问题，使许多潜在冲突消解于无形之中。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这点，因为这些被化解的冲突从来没有出现过。要看看如果不允许人们拥有财产会发生什么后果，可以去访问一下美国或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保护区。一次去那里度假的时候，我和一个在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保护区开商店的人交谈。我指出那个保护区的人们不能拥有他们自己的房屋，这严格限制了人们投资改善“他们的”房屋的热情。他回应说，根本问题是保护区的各种小集团彼此杯葛。但这并不是根本问题，而是一个间接产生的问题。想像一下，如果每次你想粉刷自己的房屋都不得不联合行动，将会发生什么。你就会开始加入各种“小集团”了。

财产权还能解决其他问题。比如说，应当允许人们在超级市场的停车场进行请愿活动吗？1970年代早期，最高法院判定应当允许，因为请愿是一种言论自由权。但是尊敬的法官对言论自由有根本的误解。我的言论自由权并没有给我在不经允许的情况下跑到你家发言的权利。我的言论自由权只是赋予我使用自己的资源来讲话的权利。法官显然忽视了超市停车

[1] 这方面的讨论见 Jim Rogers, *Investment Bik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 45。

场所所有者的财产权。言论自由权意味着，在我有权利待着的地方，我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

最高法院法官的这种误解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陈述：“对言论自由最严格的保障也不会保障在戏院里造谣大叫着火的人。”^[1]其实他本不需要对言论自由做出界定，就像已故的经济学家罗斯巴曾经指出的，私有产权就可以解决问题。除非真的着火了，否则戏院的所有者是不会允许人们在满是人的戏院里大喊“着火了”的，那个在戏院里造谣大叫着火的人要为造成的损失负责。引用这句话的人很少有知道它的背景的。霍姆斯用这个“着火了”的比喻来证明法院对申克诉合众国案（*Schenck v. United States*）判决的正当性，这个判决否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位社会主义者批评征兵制的言论自由权。在他们散发的传单中，这两位反战者写道，第十三条修正案禁止强制劳役，因此一战时期的征兵是违宪的。霍姆斯显然把引用宪法看成和用“着火了”来误导观众一样的事情。

举另一个例子：应当允许人们在饭店或酒吧吸烟吗？加利福尼亚的政府官员认为“不应当”，并以罚款为威胁来强制推行他们的观点，但这完全忽视了饭店和酒吧所有者的意愿。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二手烟是否会对不吸烟的顾客和服务员造成长期的健康影响，即使二手烟不会造成有害的健康后果，多数不抽烟的人还是会觉得烟味令人极度不快。但如果饭店和酒吧是私人拥有的，所有者就有激励以一种无偏的方式对吸烟者和非吸烟

[1] Louis H. Pollak, ed.,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Supreme Court: A Documentary History*, Vol. 2,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 1966, pp. 8~9.

者的愿望进行权衡。如果允许抽烟行为，他就必须放弃那些非吸烟者的生意，并付给不吸烟的服务员高一点的工资；如果由于费用增加而带来的所得提高可以弥补上述损失，所有者就会这么做。非吸烟者的权利没有被侵害：他们本来就没有权利要求别人迎合自己的愿望。当然，多数饭店所有者会发现最优的策略是分设吸烟区和非吸烟区。但是在加利福尼亚这种政府用自己的法令侵犯所有者财产权的地方，这种策略是非法的。

第六章

联合的自由*

1980年3月的一个早上，我睁开眼睛，太阳已经照到了我位于加利福尼亚奥克兰的公寓的床上。我想：“穿上明亮的黄色T恤去工作不是很好吗？”我想穿能反映自己性格的衣服，但另一个想法马上让我的情绪黯淡下来。我意识到我不能穿T恤，因为工作的地方不允许这样做。老板明确要求系领带，穿衬衫和外套。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奴隶（最近，工作的其他方面已经让我非常反感），然后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我还是可以穿任何我想穿的衣服，只是我不能够同时保住工作。

这个新想法让我又惊慌又激动。突然，我感到自己非常有力量。我刚刚以一种非常个人化和生活化的方式发现了“联合的自由”。我可以自由

* 英文为 Freedom of association，常见的译法是“结社自由”，但从全文来看，其所论述的范围似乎更广于“结社”一词所指，所以这里译为“联合的自由”，而在正文中的有些地方则采取意译。——译者注

地选择是否与老板站在一个团队中。

有了这股新发现的力量后，我感觉到了难以置信的清晰。我的头脑不再只是昏昏沉沉地思考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开始从正反两面思考自己的工作，然后决定辞职不干了。这个举动是否正确——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我发现自己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时，我可以考虑得更清楚。你自己作出选择决定你要待在哪里。除非你是在监狱里读这本书，不然的话，你有选择去自己所希望的地方的自由。

你可以在任何时候离开你的工作，但这并不是说不必承担相应的后果。自由并不是说你有权作出决定而不必承担糟糕的后果。如果没有后果，那么自由就像三岁小孩用的小车，转动方向盘并不会影响车前进的方向。如果要打比喻的话，自由是一辆真车：自由地转动方向盘，朝着大树开去，但是要预期到这种行为对你的车造成的伤害。简单地说，自由就是作出选择的权利，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尽管你可能不喜欢你工作的某些方面，但是你所需要的钱、同事的友谊，或者工作中的学习足够让你忍受不如意的那些事。你作出了权衡。

1980年离职以后，我开始用这种新的观念来看待其他工作。一次，我放弃了某份工作，但没有马上离开，因为在离开之前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又有一次，我保留了一份工作——直到现在——因为我找到了办法来引起雇主的兴趣，让他把我所需要的东西给我。当你想从雇主那里得到某样东西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雇主也能从中受益。就像求职顾问们说的那样，最好的工作是雇员自己创造的；雇主不可能为你端上一份理想工作。在清楚你和你的雇主是自由联合的双方之后，如果你想创造一份可以与之热恋的工作，那你会竭尽全力将它设计出来。

我前面说到，当我在 1980 年考虑离开那份工作的时候，我以一种个人化的方式发现了联合的自由。这并不精确，我其实是重新发现了联合的自由。在第一章已经提到，1968 年夏天，我离开了一份在联邦政府的优厚工作，因为我认为我的雇主没有权力做他聘我去做的事情。那时，我已经自觉地运用了不去和那个雇主联合的自由。

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当我告诉人们他们有自由，或者应该有自由去和其他人联合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回应道：“对你来说那很容易，你有一份舒适的工作，而且又有钱。但是低收入的人是被迫去为他们不喜欢的雇主工作的。”但即使在我 17 岁而且净资产不超过 1000 美元的时候，我也并不这么认为。拥有或实践联合的自由并不依赖于财富多少。当然，如果你有钱的话，选择会变得比较容易。但就算你穷困潦倒，你也可以选择是否为某个雇主工作。事实上，意识到这一点并行动起来就是摆脱贫困的第一步。

在个人生活中，所有人都能理解和重视联合的自由。想一想友谊吧。尽管某些人也许会对你所选择的朋友不以为然，但那只是他们的观点而已。这些人没有任何法律赋予的权力阻止你交任何你选择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友谊是真正的一块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并受到极大尊重的领域。

联合的自由总是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自由地和每个人联合；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部分是自由地不和某人联合。我可以选择成为或不成为你的朋友，而且，只有在我们两个人共同选择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联合起来。

选择室友的自由

想像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同性恋，而且喜欢和一个同性恋成为室友；或者，想像一下你是一个异性恋，而且喜欢和一个异性恋成为室友。猜猜怎么样？美国的某些州政府宣称你没有这样的权利。最近，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政府对一个拒绝接纳某位女同性恋为室友的女士判以罚款。这位妇女把案子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1997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受理该案。^[1]就这样，最高法院支持了这种极度侵犯“联合的自由”的行为。在最高法院的批准下，你选择朋友的自由是否也在美国政府的火力范围之内？

性自由和浪漫自由

联合的自由也适用于约会和性行为，人们有自由对要求约会和性行为的人说不。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用来描绘违背另一方说“不”的自由进行性行为的词，我们称之为强奸。在我的印象中，美国政府对性行为中说“不”的自由给予了彻底的尊重。但并非一直如此，在19世纪及更早的时候，如果一个男人强奸他的奴隶，法院不会插手。回到那个时代，法官以及绝大多数人相信，强奸并没有侵犯奴隶“联合的自由”，因为他们并没有赋予奴隶以人的权利。

但是，政府到现在也没有对性行为“联合的自由”的另一个方面给予

[1] Leonard Novarro, "Roomies: Trouble May Move in When All You Wanted Was a Roommate," *San Diego Union-Tribune*, Sunday, August 17, 1997, pp. H1, H4.

始终如一的支持，即说“是”和行动的自由。在某些州，某些确定形式的性行为是非法的。比如，佐治亚州政府规定：“在性行为涉及一方的性器官和另一方的嘴或肛门时，施行方或服从方犯了鸡奸罪。”^[1]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语言太不雅了，我也同意这一点，但请不要谴责我。请谴责那些试图定义鸡奸罪的佐治亚州立法者们吧，在他们的定义下，最高刑期可达20年。请记住，我们是在谈论双方都同意的而非强迫的性行为。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鲍威尔斯诉哈德维克案（*Bowers v. Hardwick*）中以5票对4票维持了佐治亚州鸡奸法。所以即使在亲密隐私如性行为这样的领域中，我们要获得完全的“联合的自由”，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我想说，就像我们自由选择朋友一样，请接受和理解我们选择婚姻伴侣的自由。我想这样说，但我不能。直到1967年（近得都不能算历史），最高法院才在洛文诉弗吉尼亚州案（*Loving v. Virginia*）中废除了禁止异族通婚的州法律。在我写下这些话的1998年秋天，那些手握政治权力的正人君子们还在主张不允许一个男人和他所选择的另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她所选择的另一个女人结婚。^[2]所以，虽然在我们结交朋友、发生性关系和选择婚姻伴侣时，联合的自由得到了尊重，但这种尊重是不完全的。我希望它能被改变，但目前仍遥遥无期。

工人和雇主的“联合的自由”

比起政府官员践踏工人和雇主之间“联合的自由”来，政府对性行为

[1] 佐治亚州对鸡奸的定义出自案例 *Bowers v. Hardwick*, 478 U. S. 186 (1986), dissent of Justice Blackmun, joined by Justices Brennan, Marshall, and Stevens.

[2] 在1996年，有三分之二的选民认为婚姻应当限制在异性之间。见“Washington Wir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0, 1996, p. A1.

和婚姻的不尊重就只是小儿科了。美国、欧洲、拉丁美洲，亚洲，事实上是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以合法的方式禁止雇主和雇员以许多种方式彼此联合，不管雇主和雇员能从彼此的联合中获得多少利益都无济于事。

佛蒙特州的居家工作

1980年，卡特政府的劳工部发现佛蒙特州有许多妇女在家做针线活，并以计件方式赚钱。政府控告这些妇女非法在家工作（homework，请不要误以为是学生的回家作业*，要是那样的话，会有数百万孩子在街上跳起舞来）。在这些非法在家工作的人中，有些是在家带孩子的年轻妇女，有些是在外工作很困难的残障妇女，还有些老年妇女。劳工部所执行的是1940年代早期的管制条例，为什么那时的政府要禁止这样的工作呢？因为国际妇女服装工会为了防止竞争，进行了游说活动。由于担心会员的高工资会被在家工作的妇女拉低，而且政府无法向在家工作的人执行最低工资法，工会便说服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劳工部长彻底禁止了这种工作方式。

但是佛蒙特的妇女选择了捍卫她们的自由。为了回应她们的投诉，新当选的里根总统在1981年召开了听证会。我对这个案子如此熟悉是因为我是该听证会的专家证人。（我的主页 www.davidrhenderson.com 上有我当年的证词。）知道要在华盛顿召开这个听证会之后，我就决定要承担这份工作。那么多的妇女和平地做编织生意，而政府居然想中断这一切，我得去帮助她们。所以我打电话给竞争经济委员会（竞争企业协会的前

* 回家作业的英文也是 homework。——译者注

身，是一个以华盛顿为基地的游说经济自由的公共利益团体），说服他们让我担任该组织的代表。在劳工部把我列进他们的证人名单之后，我在指定日子飞到了华盛顿。

在1981年2月召开的听证会上，工会和工会化企业（unionized company）不得不隐藏他们要求禁止居家工作的真实原因：阻止那些讨厌的妇女与之竞争。这样赤裸裸的自私主张在公共场合中表达出来当然风险很大。（不在公共场合的时候，这样的主张经常出现。一年以后，当我在劳工部工作的时候发现，工会代表和工会化企业代表相当愿意说出他们赤裸裸的自私主张。有趣的是，我在任何时候和劳工部的公务员们谈到听取“公众”的意见时，他们所指的公众和这个词真正所指的人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他们指的是工会和工会化企业们的代表。）在公开的听证会上，我想他们会争辩说，公司以计件方式付钱是在剥削妇女。我猜得一点也不错。

但显然他们的立论是荒谬的。想一想吧：工会和工会化企业的代表板着面孔作证说那些在家工作的妇女被剥削了。但是，就在离他们不足50英尺的地方就坐着那些妇女，她们在工作日专程自费赶往华盛顿，争取她们能够继续用计件的方式生产滑雪帽的权利。很明显，这些妇女并不认为自己被剥削了。作证的妇女们指出，在家工作给了她们一个机会。不管是因为年龄、健康原因，还是要在家里陪孩子，许多人只能在家工作，怎么可能因为她们选择了这个机会而使情况变得更差呢？如果这个选择使她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从实际行动上看，她们认为是这样的——这怎么能叫做剥削呢？

一位叫罗森菲尔德的克里夫兰律师代表工会化的服装企业，支持禁止

在家工作。他的一个关键论证是，在家工作给了人们赚低工资的机会，就像穷人和富人都有晚上睡在公园里的机会一样。他的意思是，这并不是真正的机会，因为只有穷人才对它感兴趣。他所没有认识到（或者没有承认）的是，睡在公园里要比没地方睡好太多了。如果政府成功地禁止这些人在家工作，那么她们剩下的机会只会变得更少。

根据听证会的规则，任何一个作证并同意被质询的人都得回答听证室里任何人的问题。我找到了机会，站起来提问：“你把在家从事低收入的工作类比成晚上睡在公园里是相当合适的。”然后我问道：“那你是想说，你准备禁止人们睡在公园里吗？”我已经忘了他的回答，但我绝对忘不了他当时那一脸的惊讶。光是为了那一点，那次旅行就是值得的。罗森菲尔德可能已经非常习惯于用他的公园比喻（跟19世纪法国作家法朗士所说的穷人和富人都有权利睡在桥下很相似）结束辩论，从没想过会有人用这个比喻反过来驳斥他。

稍后，工会官员罗斯作证说，如果维持禁止在家工作的法令，这些妇女并不会就此没有工作，因为她们能在工厂里找到工作，而且至少能得到最低工资。不仅是我们听众，就连罗斯本人对他自己说的话都不太相信。他的语气告诉我们，他根本不关心那些讨厌的妇女是否能找到工作。我注意到，他的眼神掠过那些佛蒙特妇女的时候，总是带着恼怒和不快。所以我就跟着感觉走，向他提了个问题。

“你知道一个叫多佛尼的妇女吗？”我问他。

“不。”他回答得很简略。

“多佛尼夫人的髋部患有急性关节炎，没有办法在工厂工作，”我解释道。“如果这条禁令被保留了下来，多佛尼夫人就不得不在工厂工作。你

会让她做什么？”

“如果她能在家工作，那她也能在工厂工作！”他恼怒地呵斥道。

“谢谢你。”我坐了下来。

罗斯先生刚刚已经向所有在场的人表明了他根本不关心那些妇女。

不幸的是，那些妇女并没有能获得想要的结果。尽管里根政府在六七
个服装产业中取消了在家工作的限制，但联邦上诉法庭后来否决了这一决
定。法庭认为施行最低工资法要优先于人们在家工作的权利。^[1]所以在今
天的美国，你仍然不能在家编滑雪帽——如果你打算以计件的形式把产品
卖掉的话。

最低工资

美国政府侵犯工人“联合的自由”的另一个办法是实施最低工资法，
该法律要求，除非有合法的豁免，雇主付给雇员的工资一定要高于一个最
低值。今天这个值是每小时 5.15 美元。

做个实验吧。去图书馆随便拿出一本初级经济学教科书，找到“最低
工资”那一节，看看教科书说了些什么。我的预测是：有超过 90% 或许是
100% 的教科书，你会发现里面都写着，由于最低工资使定价偏离了缺乏
技能的工人的工作水平，反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经济学家已经作了数以
百计的关于最低工资的研究，其中绝大部分都表明该法案损害了那些缺乏
技能的人的利益。

[1] “Federal Appeals Court Reinstates Ban on Homework in the Knit Outerwear Industry,” *Daily La-
bor Report*, November 30, 1983, A9~A10.

美国第一个联邦最低工资法是在 1938 年通过的。几年后，经济学家们就撰文分析了它的负面效应。关于最低工资的第一个著名分析出现在一本 1944 年出版的书中，它的名字是《美国的难题》（*The American Dilemma*）。这本经典社会学著作的作者是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一位瑞典社会主义者，和哈耶克分享了 1974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的难题》是卡耐基基金会所委托的一项“黑人问题”研究的最终产物。尽管本书中更有名的是缪尔达尔对 1954 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中运用的“分离且平等”原则的批判，但书中也包含了坚实的经济学区论证。缪尔达尔写道：“当政府插手管制劳动条件并且执行最低标准时，它就把黑人原先一直占垄断地位的那些工作机会给取消了。”^[1]也就是说，最低工资摧毁了黑人的工作机会。

到目前为止，情况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最低工资现在仍然在破坏那些本为没有技能的工人准备的工作，其中绝大部分是黑人。1994 年，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戴维·卡德（David Card）和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作了一项关于新泽西最低工资提高的研究。^[2]他们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提高后，新泽西州快餐店中留给缺乏技能的青少年的工作岗位，相比于最低工资没有提高的宾夕法尼亚州快餐店，数量并没有减少。克林顿政府，尤其是克林顿的劳工部长赖希借助这项研究来证明 1996

[1]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Vol. 1,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first published in 1946), p. 397.

[2] David Card and Alan Krueger, *Myth and Measurem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he Minimum W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年提高最低工资政策的正当性。但正如我在书评“草率判断”中所指出的，他们的研究存在一个问题：它依赖于不良数据（poor data）。^[1]作者调查了快餐店的经理，询问他们全职和兼职雇员的数量，但没有详细说明他们所指的“兼职”和“全职”是什么意思。另两位经济学家，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纽马克（David Neumark）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瓦希（William Wascher）重做了卡德—克鲁格研究。他们使用了更可靠的薪水册数据，发现事实上，新泽西的快餐店雇员数量相比宾夕法尼亚州，在同一时期的确是减少了。

当然，最低工资的确也增加了许多工人的工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工人变得富裕了。高的最低工资并不会突然提高没有技能的工人的生产力。雇主通常会削减工资袋（compensation package）里的其他部分，比如健康福利、免费或补助的午餐，或者培训。

根据原则进行推理

你可以对最低工资进行复杂的经济分析来推导出它的是非功过，但是你也可以通过简单运用“联合的自由”中的基本原则来得出相同的结论：不应当容许任何人去干涉其他人的交易行为，但这就是最低工资制在做的事。这一原则的背后是一个强有力的事实，也是经济学所发现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交易双方都能从交易中获益。如果人们不认为他们可以从获益，那交易就不会发生。从这个原理所导出的一个推论是，当某个人干涉

[1] David R. Henderson, "Rush to Judgment,"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Vol. 17, May-June 1996, pp. 339~340. 另一篇短评请见 David R. Henderson, "The Squabble over the Minimum Wage," *Fortune*, July 8, 1996。

你和他人的交易时，你的状况就会恶化；如果人们的干涉力度很大，阻止交易发生（就像最低工资制经常做的），那你的状况肯定会更糟。我把它看作是通常情况下当然的真理，那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最佳利益的最好裁判者。

我经常发现，没有任何经济学背景的人能够理解并毫不妥协地运用一些简单的原则，他们的思路非常清晰。联合的自由就是这样一条原则，它澄清了围绕着人们在工作场所的法律权利和义务所展开的讨论中的种种模糊之处。

举个例子，一位孟加拉国的妇女希望从事每小时几十美分的制衣工作。“联合的自由”认为她应当有自由去这么做。经济学认为她的选择表明，她认为比起其他所能获得的工作来，这份工作能更好地提高她的经济状况。因此，禁止她获得这份工作，或者禁止跨国公司雇用她，只会使她的状况变差。不管我们是依据“联合的自由”原则还是“从交易中获利”原则，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如果这是那位妇女自己的选择，那么应当允许她去从事工资非常低的工作。事实上，英国慈善团体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报告说，几年以前，当孟加拉企业主被禁止雇用童工的时候，这些孩子要么饿死要么就成了雏妓。^[1]

1996年，我在《财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2]，用上述的观点来解释穷国中的那些所谓“血汗工厂”。我还引用了《纽约时报》对“血汗工厂”工人所作的采访，像可以预料到的那样，这些工人喜欢他们的工作，

[1] "Our view: Banning imports made by child labor won't help kids," *USA Today*, June 12, 1996.

[2] David R. Henderson, "The Case for Sweatshops," *Fortune*, October 28, 1996, pp. 48~52.

认为比他们以前所干的那份更苦、薪水也更低的工作强多了。一位洪都拉斯的工人告诉《纽约时报》说：“这是巨大的进步，我非常感谢雇用我的工厂。”然后，我批评了美国劳工部长赖希和一个名为国家劳工委员会的工会资助机构借关心之名使工人失去工作的企图。作为回应，赖希给《财富》写了一篇讽刺信^[1]，开头是这样写的：“很难把对童工的剥削浪漫化，但是亨德森先生在‘血汗工厂的例子’一文中就打算这么做。”有趣的是，赖希既没有质疑我的事实，也没有挑战我的推理。他好像认为讽刺就足以将读者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问题上转移走。对某些读者而言，这种做法也许能起作用。我在对赖希和其他来信的读者的回应中指出，他们“没有回应我的观点，通过剥夺摆在人们面前的各种坏选择中最好的那个，你是在伤害而不是帮助他们。”

那么，请想像一下，当我后来发现赖希在很久以前曾经为雇用童工工作辩护时有多么惊讶。在《困于内阁》^[2] (*Locked in the Cabinet*) 一书中，赖希讲述了一个名叫麦考伊的 14 岁球童的故事。1993 年，麦考伊在亚特兰大勇士队的一家顶级棒球分会萨凡纳红雀队工作。劳工部下属的童工法执法人员发现红雀队在晚上 7 点以后还让他工作，这违反了美国童工法。赖希的劳工部威胁要给棒球队处以重罚，棒球队因此炒掉了麦考伊。有趣的是，执法人员们使麦考伊不能重回工作岗位的行为引起了社会上的巨大争议，以至于用赖希的话说，“如果我们不支持我们的调查人员，那他们就会士气消沉。”赖希的解释听上去是非同一般的公正，但是，根据我 10

[1] Robert Reich, "No Case for Sweatshops," *Fortune*, December 9, 1996, p. 24.

[2] *Locked in the Cabinet* by Robert B. Reich © 1997 by Robert B. Reich. 已经获得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的授权。

年前在美国劳工部工作的经验，事实并非如此。当照相机和录音机都不在场的时候，政府管制者通常会承认他们做了很多只满足自己私欲的决定。

值得赞赏的是，赖希叫他的执法人员放弃原来的立场，并坚持要求改变管制使得麦考伊能够继续工作。但较之他三年后在《财富》杂志上攻击童工的言谈，当时他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推理非常有趣。赖希说道：

他们（劳工部管制人员）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法律就是法律。

“胡说，”我说，“我们能够改变规则，为在体育项目中工作的孩子创造例外。”

他们担心那样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弊端：卖主会在校园之夜让年轻孩子卖花生和爆玉米花来剥削他们；体育场会要求年轻孩子清洁更衣室；停车场会要孩子来收钱。

“好吧，”我哄他们说，“那我们可以把例外收得紧一些——就限制在球童上。”

在作了适当的修正之后，赖希骄傲地向 ABC “今晚世界新闻”的制作人宣布说，“我已经决定让麦考伊保有他的球童工作。”

请注意赖希所做的一切。他对规则作了微小的调整，恰好使这个给劳工部带来了许多负面新闻的小孩子能够保住自己的工作。对那些希望做类似工作的其他孩子来说，为什么这种推理不能运用到他们身上呢？请注意赖希这种路易十四“朕即国家”式的态度，他洋洋得意于凌驾人们生活之上的权力：“我已经决定让麦考伊保有他的球童工作。”

编辫子的例子

联合的自由还意味着任何人都应当可以自由地将他的服务提供给其他人。以 1998 年瑞茜的故事为例，这是一位 28 岁的企业家，拥有两家非洲编辫发廊，提供与传统发廊不一样的美发方式。1998 年 7 月，加利福尼亚州立政府对她采取了突击行动。罪名？她在没有获得美容证书的情况下经营业务。瑞茜女士曾经去过一阵美容学校，但她发现不但课程中没有辫发，而且证书考试中也没有这一项。所以对她来说，在美容学院上课毫无意义，何况课程还代价不菲。她将不得不花 1600 个小时上课，并付 9000 美元的学费。所以她在没有证书的情况下做起了自己的生意，生意兴隆，于是她又开了家分店。在我写这些的时候，她已经雇了 9 名员工。由于在没有证书的情况下经营美容业务，尽管瑞茜本人并不直接从事美容工作，她还是要面临罚款及可能最高一年的人狱判决。幸运的是，华盛顿正义协会提起了一场控告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联邦诉讼，并获得了胜利。

如果你认为政府的许可证管制能够确保各种从业人员胜任他们的岗位，那么请注意一件有趣的事：在最近 20 年，政府已经通过法院判决和立法使雇主很难解雇或者干脆拒绝聘用不合格的工人。比如，由国会众议员金里奇，参议员哈奇、瑟蒙德和格让姆以及所有国会里的“自由主义”民主党员投票赞成，总统布什在 1990 年签署联邦残障法，在事实上使能力不足的人，甚至危险的人也能保住他们的工作。该法的提倡者们坚定并且成功地拒绝对残障进行定义，只是将纵火狂、盗窃狂、强迫性赌博和其他与性行为、性别认同相关的疾病排除出受保护的残障列

表之外。^[1]很清楚，没有排除的残障还包括酗酒和精神分裂症。这样，对雇主来说，联邦残障法的一个后果就是使解雇酒鬼跟其他可能对顾客和同事具有危险性的员工变得非常困难。西北航空就是一个例子，飞行员普劳斯因酒后开飞机被判入狱（他的血液—酒精浓度测试是0.13%，超过了任何一个州的法律限制），但是从监狱获释后，普劳斯重新被雇用，并在1995年7月再次驾驶飞机。^[2]还有，根据密歇根反歧视法，一家底特律郊区医院因为歧视一位患有发作性瞌睡病的外科医生，被判罚61万美元。^[3]

但顾客就没有努力争取在各个行业实施许可法，以确保自己能获得高品质的服务吗？事实上，我确实从没有发现客户群体就许可证制度进行过游说。鼓动在某个行业采取许可法的主要人群总是本行业中的那些人。比如，各种医学会就努力阻止护理医生*（Nurse Practitioner）参与某些医学程序。

当然，主张特权的人绝不会承认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竞争。不过他们所陈述的道理通常没什么说服力。例如，为了反对授予医院对接生护士、心理学家、足病医生和其他非治疗性保健工作人员进行考核的权力，华盛顿特区医学会在它的时事通讯中推测道：“要不了多久，一个拿着钝刀的童子军就会获准给我们做脑科手术了。”^[4]再举一个华盛顿经济学家海恩引用的例子。海恩跟州兽医评审委员会执行董事交谈，该董事认为没有

[1] Walter K. Olson, *The Excuse Fac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p. 126.

[2] Olson, *Excuse Factory*, pp. 119~122, and references on p. 334.

[3] Olson, *Excuse Factory*, p. 136, and Daniel Seligman, "Keeping Up," *Fortune*, April 11, 1988.
* 一种特殊的护士，接受过相关领域的训练，可从事一部分医生所做的工作。——译者注

[4] Paul Heyne, *The Economics Way of Thinking*, 9th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2000, p. 228.

获得执业兽医资格的宠物美容师不应该侵犯狗的齿龈，因为那可能会造成狗不必要的疼痛。海恩问道：“你认为人们把手放到一条狗的嘴里后，会产生不必要疼痛的一定是狗吗？”^[1]

有时候，当执法人员逮捕无照从事相关活动的人时，他们会暴露出自己真正的目的绝非保护消费者。比如，当曼哈顿的首席检察官瓦科宣布逮捕 10 位在唐人街无照行医人士的时候，他说道：“这与他们的训练水平和专业技术无关。”^[2]

雇主的“联合的自由”

“联合的自由”并不仅仅是雇员可以享有，当然还适用于雇主。就像你和我应当有选择是否为某个人工作的自由，雇主也应当有选择是否雇用某个人的自由。任何人都不该有法律的特权，“联合的自由”也应当放之四海而皆准。

雇主和雇员的地位在今天并不平等。雇员可以自由选择不为某个人工作，甚至可以用最任性的理由来作这样的选择，而雇主就没有这样的自由了。比如，一个同性恋最好不要告诉一个异性恋说，就是因为他是异性恋才不雇用他。如果这位同性恋雇主这么说了，他会被起诉。类似的，尽管在今天还没有成为现实，但许多同性恋团体一直希望有一部法律来禁止异性恋雇主歧视同性恋。有趣的是，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一个这样的团体呼吁立法禁止异性恋拒绝为同性恋雇主工作。不要搞错了，我可不是说应该有

[1] Heyne, *The Economic Way of Thinking*, p. 229.

[2] Garry Pierre-Pierre, “Arrested in Chinatown for Practicing Medicine Without Licenses,” *New York Times*, August 9, 1996, p. B1.

这样一部法律，我的立场只是从原则中推导出来的；我也不主张要立法禁止雇主歧视。我所不理解的是，那些希望用法律来禁止雇主歧视的人怎么就想不到也需要用法律来禁止雇员的歧视呢？

工会

“联合的自由”如何适用于工会？主要是两点：首先，任何人都应当可以自由加入他们希望加入的工会；第二，如果任何人只想雇用非工会成员，或雇用工会成员，但并不跟工会本身打交道，那他应该有这样的自由。联合的自由意味着工会和雇主双方都有选择是否跟对方打交道的自由。这个简单的原则可以解决人们能想到的跟工会有关的几乎所有问题。举两个当前的例子。

首先是工会企业的质量圈（quality circle）问题。质量圈是一种工人和管理人员一起开会提出改进工作办法的措施，许多非工会企业都会采用，但是联邦政府的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扬言要采取法律行动来对付这些非工会企业。他们的理由是：在质量圈中，工人在没有工会代表的情况下和管理人员打交道。工人不得不为他们自己打算？“哦，天哪！”工会和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这样惊叹道，“我们不能接受这样做！”但是“联合的自由”说，我们当然应该能够这样做。如果工人希望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和雇主一起开会，那他们应当被允许这么做。当然，这是假定工人没有在和工会的合约中将所有与雇主的接触都交给工会来代表。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选择加入工会的工人不太可能把这样的权力交给工会。如果由自愿会员所组成的工会想用它的权力来阻碍质量圈的形成，它会失去它的会员。

第二个例子是 1982 年我在美国劳工部工作的时候发生的。彭加山公司是爱达荷州的一家工会化采矿冶炼企业，当时正处于破产的边缘。如果破产的话，大概有 2000 名钢铁工人会失去工作。因为在他们看来，惟一保住工作的方法就是接受对原来的高工会工资作 25% 的削减，所以当地工会进行了表决，以较大的优势选择了同意削减。^[1]但是在表决后的 15 分钟内，当地工会的官员就辞职了，显然是受到了来自上级工会，即美国钢铁联合工会的压力。然后，上级工会就挑选了新的领导来按命令行事。美国钢铁联合工会并不关心这 2000 名工人，它只想为其他想保住工作的人维持高工资。他们也许是害怕如果在低成本下生产，彭加山的产品就会比那些高工资的工厂所生产的更具优势。运用“联合的自由”原则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爱达荷州的当地工人应当自由地和钢铁工厂达成协议。但里根政府甚至不敢大声批评这种不公正行为，任由美国钢铁联合工会侵犯爱达荷工人的权利，工人们因此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作为一个宣称拥护自由，但却不敢在具体事件中维护自由的政府的成员，我感到非常沮丧。

如果联合的自由在美国得到贯彻，工会的力量会不会大大削弱？会的。但是爱达荷的这个例子清楚地显示了工会权力的重要功能：阻止非工会工人展开竞争的能力。尽管工会喜欢把大企业描绘成他们的敌人，但他们真正的竞争者其实是力量很弱的非工会工人。工会用法律来牵制他们的竞争者。

[1] 进一步的细节，请看 Erik Larson, "Steelworkers in Idaho Bitter at Union Stand,"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5, 1982, p. 29。

他们阻止竞争的权力有两个来源。首先是美国劳工法承认和加强了工会的垄断性。如果一家工厂里有 51% 的投票工人选择加入工会，那么其他工人，不管愿不愿意，必须接受工会作为他们的代表。

工会权力的第二个来源是，当地政府经常不愿意在工会罢工的时候保护为低工资继续工作的工人的人身安全。当地警察常常把他们拒绝保护非工会工人的行为说成是支持正在罢工的那一方，但是他们所惟一应当承担的责任只是保护人们远离暴力。在工会认为人们不应当工作而非工会工人作了相反的选择时，这些工人并没有随之放弃获得安全保护的权利。保护非工会工人免于工会工人的暴力在原则上和保护工会工人没什么不同。工会罢工者经常用非常粗鲁的语言称呼那些想要争取自己工作的人：他们称非工会工人为“工贼”。借助这种污辱别人的方式，他们把自己的残忍和不尊重他人权利的行为给合理化了。但是，不受身体攻击的权利是基本人权，并不取决于你是否属于某个工会。

有趣的是，某些工会特权的辩护者们已经清楚地承认工会拥有垄断的权力。已故的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戈德堡是肯尼迪政府时期的劳工部长，也是美国钢铁联合工会的法律顾问，他曾经明白地说道：“从技术上讲，任何一个工会都拥有有限度的垄断权，这样可以消除工人间在特定工厂或行业中为了可接受的工作岗位而作的竞争。”^[1]经济学家阿尔奇安和艾伦 (William R. Allen) 对戈德堡的这段富有启迪意义的话进行了评论，他们问道：

[1] From *Exchange and Production*, 2nd edition, by Alchain & Allen, 1977, 重印经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允许, fax 800 - 730 - 2215。

为什么他要写“从技术上讲”和“有限度的”？难道还有另一种讲法吗？难道还有无限度的垄断吗？

在明白地承认工会拥有政府强制垄断权的同时，戈德堡还力图美化残酷的现实。两位认为工会拥有法定特权（legal privileges）的哈佛经济学家弗里曼（Richard B. Freeman）和梅多夫（James L. Medoff）在《工会做什么？》（*What Do Labor Unions Do?*）一书中写道：一般来说，工会拥有垄断的力量，它能够借此把工资提到竞争水平之上。^[1]现在你明白了。

如果联合的自由得到了尊重，工会就会失去它的垄断权。但如果你为此而悲伤的话，那首先请看清它的权力所造成的后果。工会并没有提高普遍的工资，这一点，在无数的经济学家研究了工资的工会效应之后，已经成为了共识。1985年，已故美国知名劳动经济学家刘易斯（H. Gregg Lewis）对关于工会对工资的影响的200项研究进行了总结。他发现，一般而言，工会会员的工资比同等技能水平的非工会工人要高出15%。雇主对付高工会工资的办法就是减少雇用工会工人，而那些失业的工人就只得在非工会部门找工作，进一步压低了那里的工资。因此，工会工人所多出的七分之一收益主要来自于非工会工人的相应损失。如果所有的工人都被组织到一个大工会里，这样失业的工人就不会压低非工会行业的工资了，但是工会工人收益的相应代价就变成了许多工人被迫失业。这种“一个大工会”的图景其实就是法国、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现状的极端版本：

[1] Richard B. Freeman and James L. Medoff, *What Do Labor Unions Do?*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 6.

工会攫取高工资，而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法国在 1990 年代的失业率是 11.3%，意大利则是 10.2%，而美国的平均失业率是 5.8%。此外，工会在美国的早期发展中，一直运用自己的力量把黑人排挤在最好的工作之外——即使到了今天，工会在事实上也还在起着这样的作用，即便这并非出自它们的本意。我们在下一章还会继续谈到这一点。

逃厂法案 (Fugitive Plant Law)

在美国，超过一定规模的公司倒闭之前一定要提前 90 天通知雇员。这个要求侵犯了雇主的“联合的自由”。从原则上看，这和立法要求雇员在辞职之前必须提前 90 天通知雇主没什么两样。联合的自由意味着，只要雇主和雇员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那他们应当可以签订任何形式的协议。因此，如果雇主同意在准备关闭工厂的时候提前通知雇员，那他必须履行这个承诺；但如果他不同意这么做，那么他就不必提前通知。除非雇主同意在合同中写明这一点，否则他不应当被强迫执行别人给他规定的义务。

强迫一个雇主在关闭工厂 90 天前进行通知，首先会使潜在的雇主更不愿意去开工厂；而且，当雇主根据法律被迫承担这样的义务时，工资和其他形式的补偿会减少，以弥补企业因额外雇用工人 90 天所增加的成本。这两个事实说明提前通知的要求并不是给雇员的免费赠券，但这些还不是我反对联邦政府提前通知法的主要理由。我之所以反对首先是我相信联合的自由。

你可能会说提前通知对雇主来说成本并不高，所以，我不应当对此小题大作。但这确实关系重大。要求雇主在关闭工厂之前通知雇员的做法尽

管并不一定会造成经济上的困难，但却迫使雇主违背自己的意愿留在这个行业中。在本质上，他们成了像奴隶一样的雇主。当年要求遣返逃奴的法案被称为“逃奴法案”，那么要求雇主维持工厂运营的法案就应当被称为“逃厂法案”。

同样，禁止雇主对雇员设置强制退休年龄的法案也是错的。据我所知，没有人会强迫雇员在超过了他们希望退休的年龄之后还继续工作。多数人会说强制退休年龄是一种对雇员的奴隶制。你可能会说雇员不是奴隶，因为他们会得到钱，但这是对奴隶史的无知：一些奴隶，尤其是那些生产力很高的奴隶，也会得到钱。当雇主被迫继续雇用年龄已经超过他们预期临界点的雇员时，怎么就不是一种对雇主的奴隶制呢？

实施长期劳资协议的自由

雇主需要对一份法庭要执行的长期劳资协议负责，而雇员不能。法院不让雇员对他们与雇主自愿签订的合同负责，它们如何证明此决定的正当性？它们宣称这样的合同是强制劳役，但这是错误的，这是自愿劳役，雇员们做得非常积极和主动。如果我承诺在工作中履行自己的职责，这在原则上和我承诺偿付贷款并没什么区别。但是法庭不会拒绝执行贷款合同。

你也许会认为这有点太挑剔了。有谁希望以低于正常工资的水平跟IBM或通用签署一份长达5年的合同吗？我来告诉你谁会这样做：那些准大学生。很多在海军研究生院的学生在18岁的时候加入了后备军官训练队（ROTC），山姆大叔会为他们支付大学学费，回报则是毕业以后为军队工作4年。美国服务队（Americorps）是联邦政府的国家服务计划，它

先让年轻人读大学，并代付部分学费，他们的义务则是毕业后为政府机构或非营利组织服务两年。类似的，联邦政府经常为医学院学生代付学费，要求他们毕业后在像阿拉斯加这种偏僻地区工作几年，非常流行的电视系列剧《北方曝光》的故事背景就是如此。以上例子中，联邦政府都是合同的甲方。为什么年轻人只能和联邦政府签订这样的合同呢？为什么他们不被允许去和 IBM 或微软、宝洁签订类似的合同呢？这样的合同是帮助许多优秀美国年轻人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对来自低收入家庭但前途似锦的年轻人来说，长期劳资协议是帮助他们解决眼前学费问题的灵丹妙药。但联邦政府不允许这样做，当然，政府自己是雇主的时候可以例外。

毒品测试 (Drug Testing)

雇员必须接受强制性毒品测试吗？根据联合的自由原则，我们也可以找到答案。雇主应当有自由与雇员签署含有毒品测试条款的合同，而雇员也应当有自由选择是否签署这样的合同。这样的测试带来三种成本：测试本身的实际费用，测试的时间成本，以及不管有没有服用过毒品，测试这个行为都伤害了雇员的自尊。雇主必须决定这个成本是否值得，我确信航空公司会认为对飞行员进行测试是值得的；另一方面，在雇员是否使用毒品对工作影响不大的行业里，雇主也许会选择不进行毒品测试。

但是强制性毒品测试难道没有侵犯被测雇员的“联合的自由”吗？如果雇员无论如何都不得不接受这种测试，那的确是。但幸好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被雇用，并因此自由地选择是否接受这些测试。就像我的雇主要求我接受本人非常痛恨的着装规范并没有侵犯我的自由一样，雇主要求毒品测试也没有侵犯那些雇员的自由。有位西班牙老作

家的话很适合放在这里，翻译过来就是“按需而取，依价而付”：如果你想使用毒品，那就不要想当航空公司飞行员了；如果你想当航空公司飞行员，那就不要碰毒品。

第七章

关于歧视的经济学

想像你属于一个经常遭到歧视的群体。或者根本不必去想像，你正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偏见。现在你可以在两种政治/经济制度中进行选择：一种政府有巨大的权力作影响日常生活的决定；另一种政府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但人们要对他们自己的决定负责。你喜欢在哪一种制度下生活？若想对这一章的内容有更深入的认识，请在阅读之前花一分钟时间思考这个问题。

种族歧视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存在的，有时非常微妙，有时则很明显。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种差异，但只有到了一定年纪，他们才会在意这些差异。白人孩子注意到黑人孩子长得不一样，黑人孩子也注意到白人孩子长得不一样。这种认识本身并不是问题，操场上的孩子更关心有没有足够的伙伴玩捉迷藏游戏而不是伙伴们的肤色。

记得女儿凯伦在4岁的时候问妻子和我，为什么那些有褐色皮肤的人

被叫做黑人。这是一个好问题，但我们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然后凯伦沿着逻辑步骤作进一步思考，“我们是什么？粉红色人吗？”当我们告诉她我们被称为白人时，她看上去很迷惑，“为什么？”

“从我的角度看，没什么好的理由。”我说道，然后把自己也彻底搞糊涂了。4岁的孩子能够看清楚并问出好问题来，这说明了成人在肤色问题上搞出来的区分——黑和白，或者褐色和粉红色——是多么荒谬。

对差异的认识并不是问题。但是当人们将肤色上的差异和行为上的差异联系起来，扩展到种族中的每一个人，并赋予整个种族的肤色——或任何其他表面特征——很强的道德判断之后，麻烦就开始了。我们有很多荒谬无礼的一般性概括，比如“黑人是愚蠢的”，“白人的弹跳能力不行”，又比如“犹太人是贪婪的”。

在日常生活中与种族主义作战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与种族主义作战？作为个体，我们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可以在生意、婚姻和其他各种事务上与不同种族、宗教信仰和民族的人“接触”；我们能够积极地支持那些因为种族而被歧视的人，支持的形式可以有很多，其中一种就是抵制那些歧视黑人的行业。1955年，当罗莎·帕克斯因为坐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辆公交车的前排而被撵下车以后，许多黑人就是这样做的。黑人社区的领袖运用这种策略向在公交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进行了非常有效的抗议。

另一种办法就是让那些被歧视伤害的人讲出他们的遭遇，没有任何打断、改写和辩驳，就这样完整地倾听他们所讲的故事。一个名为国家联合建设协会（NCBI）的组织已经开设了能够让人们自由讲述彼此故事的场所。

此外，尽管对许多人来说可能很难接受，但还有一个与种族主义作战的有效办法就是倾听种族主义者的声音，让他们把自己的心头之痛都讲出来。这是在支持种族主义者吗？真的吗？是的！种族主义者也有他们自己的故事，而且通常是在早年受到了深深的伤害。重要的是记住，对那些种族主义者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和支持种族主义并不一样。在某些地方，人们是通过学习才成为一个种族主义者的。作为一个教师，我发现改变人们思维的最好办法是倾听并提出问题，而不是去说教。“你不得不学会去恨，”这是电影《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的插曲唱到的，由于太具争议性，这首歌几乎被删掉。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终结种族主义、阶级歧视、反犹太主义和其他偏见吗？当某人讲了一个种族主义的笑话时，你可以放弃尴尬的沉默，站出来说，“我觉得这个笑话很无礼。”或者，当人们问你是否想听最新的波兰人笑话时，你可以坚定地回答说，“不。”很快人们就会明白你的意思，也就不会再用伤害别人的方法来和你说笑。

许多人都幻想成为一个大英雄，挽救无数人的生命。但与此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很多机会去做平凡英雄，加上其他人的努力，我们也能够改变世界。下面这句话是我从汽车保险杠贴纸中抄下的，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心系世界，从我做起”（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与真正的敌人作战

尽管多数人对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抱有恐惧和痛恨之情，但我相信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黑人、亚洲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或任何其他人群，他们都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么，真的有敌人吗？

政府如何（通常是）有意地造成种族歧视

谈到种族歧视的时候，我们的确有一个敌人，就是用赤裸裸的武力来对付某些种族的恶势力。有时候它是私人团体，比如 3K 党，在不受政府限制的情况下，用武力对付其他种族。但是，更普遍、凶残和破坏性地使用武力对付某个种族的，正是政府自己。在许多国家，政府往往运用武力阻止某个种族和族群从事某些行业或生活在某些地方。在极端的情况下，政府会试图系统地消灭整个种族。

政府使用武力对付族群要比私人团体有效多了。我记得 8 岁的我听到希特勒这个名字时，问母亲他是谁。母亲说 15 年前他想用坦克和武器统治整个世界，于是我就把他想像成一个拥有坦克的疯子，把坦克开到我们的公路上，入侵加拿大的小镇。我当时并不理解为什么希特勒那么可怕，因为我从小就被教育要相信警察会保护我们。请想像一下，当我后来发现警察和整个政府都被希特勒控制时，我是多么的震惊和激动，简直是惊恐。在孩提时代我就知道任何一个政府都拥有无比的权力，当政府通过并实施一项法律后，你不能进行合法的抵抗。这就是我后来所渐渐理解的希特勒带来的真正恐怖所在。所以让我们先看看政府推行种族歧视的最佳例子。

纳粹德国

纳粹德国是政府推行种族歧视的最典型例子。希特勒一开始是继承了以前德国政府禁止犹太人在某些行业工作的政策，并变本加厉，把他们赶出大学，禁止犹太医生为非犹太德国人服务。犹太人的财产被没收，就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在 1930 年代后期，他开始实行系统屠杀犹太人的政

策，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他死为止。

南非

南非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是政府实施种族歧视的另一个例子。种族隔离制度从 1948 年开始实施，一直持续到 1990 年代，其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将黑人和白人的生活隔离开来。黑人不能自由地在他们希望的岗位工作，就算雇主想雇用他们也不行；黑人不能自由地生活在他们所希望的地方，就算有人愿意把限制区的房子卖或租给他们也不行。种族隔离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在根本上侵犯了人们和平生活和居住的基本人权。

有趣的是，种族隔离及其前身“有色人种歧视法案”，源自于南非政府希望帮助白人工人避免和黑人工人竞争的想法。在本质上，种族隔离是保护白人的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一种极端形式。

“世界工人联合起来，为一个白人南非而战。”这口号的第一部分听上去像社会主义者，而第二部分则像种族主义者。那么到底如何呢？两者都对。这个口号是 1923 年南非白人工人罢工时提出的，可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他们罢工反对白人矿主用便宜但技能熟练的黑人劳动力来代替昂贵的白人工人。力量强大的白人矿工工会在这次罢工中得到南非工党（SALP）的支持。南非工党成立于 1908 年，把为白人工人谋取特权地位当作组织的目标。

很少有西方知识分子愿意正视种族隔离的根源，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毕竟强烈地质疑我们已经泥足深陷的信仰是非常痛苦的事。但是逃避痛苦并不是回避思考 and 理解的充分理由，何况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我在这一章的开头问道，如果你是一个遭受歧视的团体中的一员，那么你愿意

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之中。选择之一是政府对人们的福利负责，并且用大量控制来实现它的责任。看看这种选择在南非起了怎样的作用，剖析种族隔离的根源。

我们从“有色人种歧视法案”开始。“有色人种歧视法案”是禁止黑人在南非从事某些特定工作的系列法案，首先是1911年的采矿和工作法(Mines and works Act)。这个法案的意图和作用就是取消非欧洲工人在采矿这样的危险行业中工作的权利。是谁在推动这样的法律？不是雇主。事实上，雇主希望雇用黑人工作者，他们的工作水平和白人一样高，而且往往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推动这样的法律，在工作场合实施种族歧视的主力是白人工会成员。理由很简单：他们不希望和黑人工人竞争。这样的法律通过后，黑人工作就变成了非法，于是白人工会工作者就可以限制劳动力的供给，并借机抬高自己的工资。最后，白人工会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之间推动了一系列法律，通过限制黑人的竞争来增强他们的垄断权。

想像一下白人雇主会怎样看待“有色人种歧视法案”。他并非一定得是黑人的崇拜者，才急着想雇用他们。让白人雇主想雇用一群训练有素的黑人的内在原因其实就是所有雇用行为发生的原因：赚钱的欲望。一旦发现被雇用者的产出会超过雇用成本（包括工资、其他补偿和监督费用），绝大多数雇主会毫不犹豫地雇下这个人。所以如果雇主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的话，他的生意就会更好。黑兹雷特说的好：“工厂主盯着附近的低工资黑人，发现他们的魅力无可抗拒。”

但从许多白人工人的角度看，这就是问题所在。雇主的利润动机和黑人工人想要一份好工作的欲望为打破种族歧视提供了持续的动力。此外，黑人和白人一起工作会形成社会融合，而社会融合又导致了更进一步的经

济合作，会进一步打破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许多想要维持自身特权的白人工人发现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把劳动力分隔开来，不但是在工作场合，而且也包括工作场合以外的任何地方。所以在1948年，国民党（National Party）上台，开始执行种族隔离制，这意味着全面推行“分别发展”的社会政策。在种族隔离制之下，政府规定各个种族的成员只可以在哪里生活，而臭名昭著的“通行法”（pass laws）则对国内旅行进行管制。

这下你明白了，种族隔离制的推行并非仅仅因为南非白人不喜欢南非黑人，或者白人认为黑人比较下贱。这些因素当然是必要条件而且直到现在都存在，但实施种族隔离制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白人工人运用政府管制阻止黑人与他们竞争。没有政府这个执行者，种族隔离的信奉者可能会看成是一群怪人，也可能组成一个小小的种族主义派系，但绝不会有能力决定黑人和白人应该在哪里工作和生活长达40年之久。种族隔离的主要反对者不仅是想要得到好工作的黑人，还包括想要雇用他们的白人雇主。

在这里不可能发生吗？

现在，让我们仔细看看自己的家园。就像南非一样，美国政府已经造成或促成了种种为害甚烈的种族歧视。

在美国，奴隶制是对黑人最大的歧视。除了谋杀和酷刑以外，奴隶制是对人权最大的侵犯。在本质上，它就是合法的绑架。美国政府主要用了三种办法来维持奴隶制：首先，政府允许奴隶制存在。这样，政府就没有执行它的基本立法功能：保护人们的基本自由。在奴隶制下，奴隶不能自由地按他们的意志去生活和工作。其次，政府用武力来维持奴隶制。经济史学者哈默尔（Jeffrey Rogers Hummel）在他的著作《美国内战史》中指

出，南方政府在奴隶主的要求下，让许多没有蓄奴的白人承担执行奴隶制的成本。根据法律，多数健壮的男性白人都被要求担任奴隶巡逻员，逮捕逃奴，对旅行中的黑人进行严格监督，驱散任何大型的黑人聚会，镇压奴隶起义。没有这样的强制服务，奴隶制的维持要困难得多。联邦政府也在协助奴隶制的维持，它强制执行美国宪法中的逃奴条款，允许奴隶主追回逃到北方各州的奴隶。事实上，直到 1842 年，北方各州政府还被要求帮助追捕逃跑的奴隶。最后，政府规定奴隶学习识字和写作是非法行为。对于受过教育的奴隶是奴隶制的威胁这一点，奴隶主有很好的认识。

即使在奴隶制结束以后，南方政府仍旧对黑人进行严格的限制。著名的黑人激进主义者迪布瓦（W. E. B. DuBois）在他的著作《黑人的改造》中写道，无耻的黑人法典，即“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为黑人寻找工作制造了法律障碍。比如，一个黑人到居住地以外的地方工作，就会被控以流浪罪，即使他出示证明表明自己正在去新工作的路上也无济于事。

当黑人被私刑暴徒恐吓的时候，南方政府拒绝给予最基本的保护。1870 年代，在 3K 党和其他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的要求下，南方政府通过了这个国家最早的枪支管制法，禁止黑人拥有或使用火器。律师小凯茨曾经写作和编撰了大量关于枪支管制的书，他是这样评论那个时代的：“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和得克萨斯州剥夺了受害者的自卫权，通过确立 3K 党人拥有武器的垄断权来掩饰他们的种族歧视行为。”^[1]

政府对黑人的歧视一直持续到了 20 世纪。南方的法律要求在饭店和

[1] Don B. Kates, Jr., "Handgun Prohib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on B. Kates, Jr., ed., *Restricting Handguns: The Liberal Skeptics Speak Out*, Croton-on-Hudson, NY: North River Press, 1979, p. 19.

其他私人场所进行隔离，不管所有者是否想这样做，这些隔离法是对所有者财产权的直接攻击。而且，尽管当地政府并没有少收黑人的财产税，但他们却用税收收入来资助白人学校。比如，在 1886 年，密西西比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条法令，允许将州基金中分配给黑人学校的钱转移给白人学校。后来又对这条法律进行了修正，把转移多少钱的决定权交给了县学校管理委员会。到了 1910 年，根据经济学家韦尔奇（Finis Welch）的计算，在黑人占多数的乡村里——那里也有更多的黑人教育基金可以调动——花在白人学生身上的钱是黑人的 7~30 倍；而在白人占多数的乡村里，花在白人学生身上的钱“只”是黑人学生的 2~3 倍。^[1]

工会

工会，它决定我是生还是死。

——来自 4 位黑人妇女演唱的一首歌，1980 年 2 月

旧金山的一次反战集会

在 20 世纪初期，要是一个人乘火车去全美各地旅行的话，他会注意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没有黑人担任铁路售票员、报务员、司炉工以及锅炉工人。为什么会这样？毕竟，奴隶制早就被取消了，而且迪布瓦所描绘的臭名昭著的黑人法典在 20 世纪初也已不再存在。答案是：在 20 世纪早期，铁路行业是高度工会化的。就像在南非一样，雇主想要雇用黑人，但

[1] Finis Welch, "Education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Orley Ashenfelter and Albert Rees, eds., *Discrimination in Labor Marke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56.

是白人控制的工会把黑人排挤在外，而且经常用暴力对付那些想要获得这些工作的黑人。有趣的是，我不是从反工会的地方，而是从卡特总统那位支持工会拥有合法特权的劳工部长马歇尔（Ray Marshall）那儿获得这些信息的。马歇尔是一位经济学家，他以记录美国工会的不良种族关系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声誉。在 1967 年的著作《黑人工人》中，马歇尔列举了 1930 年代禁止黑人加入的工会。^[1]它们包括：

- 美国联邦快递工会（AFEW）
- 美国联邦铁路工会（AFRW）
- 美国火车发报协会（ATDA）
- 美国钢丝织机协会（WWPA）
- 锅炉工、造船工人和帮工协会（BIS）
- 餐车工作人员兄弟会（BDCC）
- 司炉工和火车司机兄弟会（BLFE）
- 铁路列车员兄弟会（BRT）
- 铁路乘务员兄弟会（BRC）
- 铁路售票员兄弟会（BRC）
- 车站工作人员兄弟会（BRSEC）
- 铁路和轮船工作人员兄弟会（BRSC）
- 电报员协会（CT）

[1] 工会名单来自 F. Ray Marshall, *The Negro Work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pp. 165~166。选自 Abram L. Harris, *The Negro Worker*, New York: Conference for Progressive Labor Action, 1930。

机械师国际协会 (IAM)

北美国际船长、大副与领航员组织 (MMP)

水手协会 (NA)

铁路递送员团体 (ORE)

铁路发报员团体 (ORT)

卧车售票员团体 (OSCC)

美国火车调车场管理员协会 (RMA)

北美扳道工人协会 (SNA)

工会不仅仅阻止黑人拥有工作，他们有时还袭击甚至谋杀那些跟他们竞争的黑人。马歇尔指出，在 1911 年针对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的罢工中，白人谋杀了两名破坏罢工的黑人，还在密西西比州麦库姆击伤了另外 3 个人。白人罢工者还杀了 10 名黑人司炉工，因为新奥尔良和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同意给他们平等的待遇。所以并不奇怪，虽然 20 世纪早期的两位黑人领袖华盛顿 (Booker T. Washington) 和迪布瓦彼此不承认对方是传奇人物，却对工会有一致的意见。华盛顿是劳动工会的终生反对者，他在 1913 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来自小镇的普通黑人并不理解站在他和雇主之间的劳工组织的必然性和利益所在，也不明白它们的目标显然是要垄断劳动机会。^[1]

[1] Booker T. Washington, "The Negro and the Labor Unions," *Atlantic Monthly*, June 1913, p. 756.

迪布瓦总结得非常简洁：“（工会是）黑人工人的最大敌人。”^[1]

工会的力量从哪来

可见，美国工会一直以来就在与黑人作对。但他们怎么会变得这么势力强大呢？一言以概之：政府。就像我在前一章指出过的，工会本身并没有不对的地方。工会只是工人们联合起来与雇主谈判的组织而已。让工会沾染上负面特征的原因是它拥有的特权：工会工人可以借此压制想和他们竞争的其他工人。

工会是工人惟一合法的谈判代理人，这阻止了工人和雇主自行达成交易的可能，也让许多黑人难以获得工作。在美国，就像在南非一样，黑人愿意在低工资的条件下工作。但工会谈判所达成的高工资却是对每一个人都适用的，这妨碍了黑人工人与工会工人竞争的能力。

二战期间，工会对黑人的直接歧视大大减少，显然，这是因为白人工人去打仗了，给包括黑人在内的所有人创造了足够多的职位空缺。1960年代早期的民权运动和反歧视法把直接歧视，即把歧视直接写进政策里的做法定为非法，但是很多歧视仍然保留下来，直到现在。马歇尔指出，同业工会（比如管工工会）要比产业工会（汽车业工会）有更多的歧视，因为同业工会能够决定谁可以加入谁不可以。同业工会控制着雇用办公室，扮演决定让谁来工作的看门人。这几乎就是前面引用的四个年轻黑人歌手唱出的情形：“工会，它决定我是生还是死。”相反，在产业工会，通常是

[1] DuBois 引自 Morgan Reynolds, *Power and Privilege: Labor Unions in America*,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84, p. 223。

雇主们来作雇用的决定。马歇尔列出了美国工会用来阻止黑人从事高收入工作的大量“非正式”手段，其中包括：

协定不为黑人作入会担保；拒绝接纳黑人进入学徒项目或接受他们的申请，或者干脆简单地不理睬他们的申请；如果黑人被推荐的话，就要一起“心照不宣”地去投反对票（比如，只要有三个本地人投反对票就可以阻止入会申请）；设立要么白人不用考要么可以作弊使黑人无法通过的考试，从而拒绝授予黑人熟练工的等级；给政府管理机构施加政治影响，确保黑人无法通过测试；把会员资格限制在会员的儿子、侄子和其他亲戚范围内。^[1]

结果，即使在有很多黑人生活的地区，地方大工会也继续歧视黑人。比如，在1963年，匹兹堡的蒸汽管装修工有1400名会员，管子工有886名会员，但没有一名是黑人。

工会也同样歧视其他种族。1880年代有一则著名的“寻找工会标签”广告，告诉顾客某个产品是白人劳动者而不是中国人制造的。工会也是1882年《排华法案》的强烈支持者，这个法案的目标，正如它的名字所表明的，就是禁止中国人移民到美国来。他们也支持1924年《移民法》，限制日本人的移民。^[2]

今天的民权法能够用于也的确被用于反对劳动工会歧视黑人和其他少

[1] F. Ray Marshall, *The Negro Work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p. 63.

[2] 这段话中的事实部分来自 Morgan Reynolds, *Power and Privilege*, p. 220.

数民族的行为，这正是因为工会的合法特权已经成了种族歧视的主要来源。

最合理的解决方案是找到问题的根源，并取消工会现在所拥有的合法特权，这是惟一尊重人们“联合的自由”的解决方案。如果工会不再能够对那些希望自行和顾客与雇主建立关系的工人施以强制，那么，想当管子工的黑人就不必再经过任何人的许可。如果工人希望的话，他们仍然能够加入工会，雇主也仍然可以和工会谈判。但是工会不能再强迫任何人加入，还要在事实上保护那些希望为雇主工作的人的权利，不管是谁想阻止他们从事该项工作。

最低工资

工会还通过游说并促使最低工资法通过给黑人工人带来麻烦。实施最低工资，比如一小时 5.15 美元，那么雇主雇用某个一小时生产力只值 4 美元的工人就变得无利可图。因为黑人工人中缺乏技能的比例要比白人高得多，所以黑人工人更可能由于最低工资的限制而被赶出工作岗位。在《美国的难题》一书中，缪尔达尔引用了一项评估结果：1933 年罗斯福的全国复兴工业法设定了最低工资，到 1934 年，在这个法律被裁定违宪之前，大概已经使 50 万黑人失业。^[1]类似的，1938 年公平劳工标准法所引入的最低工资法一直使用到了今天，它破坏了数十万工人的工作机会，其中许多是缺乏技能的年轻黑人。在 1995 年，16~19 岁的黑人男性有 37% 是失业的，而那一年的整体失业率只有 5.6%。比较一下，5 个 20 岁以下的黑人里面就有 2 个失业，而 16~19 岁之间的白人男性的失业率只是

[1] 缪尔达尔的数据出自 398 页，来自 Virginius Dabney, *Below the Potomac*, 1942。

15.6%；当16~19岁的白人女性的失业率是13.4%时，对应的黑人女性失业率则高达惊人的34.3%。当然高失业并非完全由于最低工资，但后者确实是一部分原因。密歇根大学的劳动经济学家布朗（Charles Brown）领导了卡特政府的最低工资研究委员会的经济研究项目，他说，经济学家一致认为最低工资线提高10个百分点，会减少青少年就业率1~3个百分点。当前，最低工资也许剥夺了25万到80万个青少年的工作机会。

1~3个百分点的估计来自卡特总统的最低工资研究委员会由布朗、吉尔罗伊（Curtis Gilroy）、柯恩（Andrew Kohen）三人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他们敢做这样的研究非常值得赞赏，因为它肯定不受欢迎。然而，尽管他们提出了关于最低工资危害的证据，但委员会还是积极主张最低工资线要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并且鼓吹要使最低工资^[1]成为所有缺乏技能、生产力达不到最低工资线水平的工人的安全阀。

最低工资引起的工作机会损失并不是最低工资过高所带来的意外副产品，而是由那些热心地要求不断增加最低工资的人有意造成的。工会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会员在最低工资线上工作才支持增加最低工资的。事实上，所有的工会雇员毫无例外其工资都高于最低工资线。比如，北方的工会和工会化企业一直以来支持高的最低工资，是为了给南方低工资的竞争者制造麻烦。在1960年代后期，奥的斯电梯公司在纽约州推动提高最低工资，因为它已经开始从生产人控电梯转为专门制造自动电梯，希望借最高工资的提高增加市场对高端产品的需求。

40年以前，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政治家不会隐藏他们的动机。在一

[1] *Report of the Minimum Wage Study Commission*, Vol. 1, May 24, 1981, pp. 121~138.

个各州批准种族隔离的时代，对早就知道提高最低工资后谁会成为牺牲品这一点，他们也不觉得有隐瞒的必要。1957 年，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肯尼迪（他在 4 年后成为美国总统）在一次参议院听证会上陈述道：

当然，在市场上有相当多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压低了那些不得不与他们竞争的白人工人的工资。而且，如果雇主能够以低工资雇用有色工人，而正如你指出的，当时有数十万的人正在寻找不错的工作，那么，雇主的这种选择会影响一个地区的工资结构，不是吗？^[1]

他所询问的证人，当时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华盛顿办公室主任米切尔先生回应道：

我相信这就是工资问题如此重要的原因。在南方，总是存在一种威胁：如果白人不接受低工资，一些黑人就会用更低的工资得到这份工作。当然，你在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会感到这种威胁更迫切，那是因为所有企业家都决定把他们的工厂搬出那里，转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地区去。

肯尼迪的同事、纽约州的参议员贾维茨也是一样的坦率。他说：

我要向和我一样来自工业州的参议员指出，提高最低工资还可以

[1] U. S. Senate, Labor and Public Welfare Committee,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Labor, 85th Congress, 1st session, March 20, 1957, p. 856.

给我们州的产业予以某种程度的保护，我们已经因为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主要是南方——用低于标准的工资和其他劳动条件形成的不公平竞争而遭受了太久的折磨。^[1]

今天虽然可能已经没有北方的参议员敢于这样承认，但那些投票支持提高最低工资的人都明白，它的后果之一就是摧毁了那些低技术工人的工作，其中很大比例是黑人。

阻止黑人工人进入建筑业

就像最低工资制让缺乏技能的工人找不到工作一样，联邦政府的《戴维斯—贝肯法》把那些低技术工人赶出了建筑行业。该法案于 1931 年通过，它要求任何从联邦基金获得超过 2000 美元的建设项目，政府都要向工人支付“普遍工资”（prevailing wages）。劳工部在这条法律的解释中就把普遍工资解释成了工会工资。比如，在 1993 年的费城，处于《戴维斯—贝肯法》适用范围之内的电工必须获付 37.97 美元以及其他的福利，同一时期，为费城私人建筑公司工作，从事不在该法适用范围之内项目的电工的平均工资只是 15.76 美元。^[2]一个要付一小时 37.97 美元的雇主肯定会雇一个技能很高的工人。这样的话，低技术劳动力，其中大部分是黑人，就很难从事建筑业的工作。

纽约特洛伊的一个建筑商西蒙斯对此有切身体会。1985 年，联邦基

[1] Congressional Record, Feb. 23, 1966, p. 2692.

[2] 费城的数据来自 John Frantz, "Davis-Bacon: Jim Crow's Last Stand," *The Freeman*, February 1994, p. 68.

金要对 82 幢建筑进行维护，他标到了一个豁免使用《戴维斯—贝肯法》的项目。但在项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劳工部要求执行该法并取消了豁免。结果，西蒙斯告诉《华尔街日报》：“我们不得不解雇超过 100 名劳工，其中接近一半是少数族裔。”为了完成这个项目，他不得不雇用本地的工会工人，其中 95% 是白人。^[1]

《戴维斯—贝肯法》对整个经济都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在华盛顿大学美国商业研究中心（即现在的魏登堡中心，Weidenbaum Center）所作的研究中，经济学家威德（Richard Vedder）和加洛威（Lowell Gallaway）发现，1990 年，黑人在其他蓝领行业人数过多，在建筑业却数量偏少。根据黑人和白人的实际人口比例，黑人在其他蓝领行业的工作人数偏高了 25.5%，在建筑行业却偏低了 29.6%。^[2]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明白了《戴维斯—贝肯法》对黑人工人的伤害，所以除了工会雇用的人以外，没有一位经济学家曾经支持过该条法律。

就算《戴维斯—贝肯法》对黑人所造成的伤害是无心之失，废除该法也是顺理成章的，更何况它的确是有意为之。当该法在 1931 年通过的时候，名叫贝肯和戴维斯的两位国会议员就承认，黑人和移民是目标所在。^[3]贝肯是长岛的共和党员，他于 1927 年第一次递交议案，因为不久前一个阿拉

[1] 西蒙斯的故事来自“Davis-Bacon Meets Jim Crow,”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2, 1992, p. A10.

[2] Richard Vedder and Lowell Gallaway, “Cracked Foundation: Repealing the Davis-Bacon Act,”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Business, Policy Study Number 127, November 1995, p. 15.

[3] 关于《戴维斯—贝肯法》的由来，见 David Bernstein, “The Davis-Bacon Act: Let’s Bring Jim Crow to an End,” *Cato Institute Briefing Papers*, No. 17, January 18, 1993; Scott Alan Hoge, “Davis-Bacon: Racist Then, Racist Now,”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5, 1990; and John Franz, “Davis-Bacon: Jim Crow’s Last Stand,” *The Freeman*, February 1994, pp. 66~70.

巴马州建筑承包商刚在他的选区中标了一个联邦医院的项目，然后，用贝肯的话说：“数千阿拉巴马的非工会工人涌入纽约长岛，涌入我的选区。”用 1928 年的劳工统计局局长斯图尔特的话说，承包商“从南方带来了一整队黑人劳动力”。^[1]斯图尔特的老板正是那时的劳工部长戴维斯，他是一个民主党党员，强烈支持对移民进行种族限制。戴维斯后来当选为美国参议员。

贝肯众议员和戴维斯参议员无法容忍那些不受控制的黑人，而且很明显，他们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同事们多数也是如此。在被白人控制的美国劳工联邦的支持下，参众两院于 1931 年通过了《戴维斯—贝肯法》。一些国会议员甚至用清楚直接的种族主义理由来支持该议案，例如奥古议员抱怨说，“廉价的有色劳动力”正在与“整个国家的白人劳动力竞争”。^[2]

谁在要求隔离，电车公司还是政府

多数美国人都听说过罗莎·帕克斯的故事。事情发生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一天的辛劳工作以后，这个后来的黑人女英雄拒绝从公共汽车的前排移到后排位子上去。但少有人知道的是，为什么南方的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会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呢？这并不是有轨电车公司的主意，而是当地政府要求这么做的。事实上，私营有轨电车的所有者和管理人员都强烈反对种族隔离措施。在法律要求进行种族隔离之前，多数有轨电车公司都自发地对抽烟的乘客，而不是黑人，采取隔离措施。只要不吸烟，任何种族的乘

[1] 斯图尔特的话取自一封信，重印自 U. 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Labor, *Hearings on H. R. 7995 & H. R. 9232*, 71st Congress, 2d Session, March 6, 1930, p. 17, and quoted in Bernstein, "Davis-Bacon Act," p. 11。

[2] 引自 *Congressional Record*, February 28, 1931, p. 6513。

客都可以坐在任何他们想坐的地方，抽烟的人则只能坐在后面或者干脆不得上车。即使在 20 世纪早期种族隔离法通过以后，有轨电车公司也是能拖则拖，并不认真执行。他们这样做的原因非常简单：种族歧视让他们在经济上蒙受了损失。铁路经理们抱怨种族歧视法要求公司“把一大块空位分配给有色人种，而黑人和白人都对此非常不满”。在奥古斯塔、萨凡纳、亚特兰大、墨比尔和杰克逊维尔等地，电车公司在《种族隔离法》通过后的 15 年里都拒绝执行该法。但是当政府增加了法律压力之后，电车公司最终不得不屈服。美国在政府强制推行种族隔离的路上越走越远。^[1]

政府干涉促成了 1967 年底特律种族暴动

1967 年 7 月在持续了 5 天的暴动中，底特律市区有 43 人死亡。约翰逊总统随即任命了国家社会骚乱顾问委员会，也就是所谓的科纳委员会，因委员会的负责人伊利诺伊州长而得名。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查明 1967 年夏天出现类似暴动的原因，并提出在未来防止这种暴动的建议。1968 年，报告轰轰烈烈地出台了。该报告认为贫穷黑人是底特律暴动的重要原因，基于这一结论，他们提出为市区居民提供更多政府工作和住房计划的建议。这些建议为那时的多数公众所接受，而且多数人也只知道建议部分。没有更多人读过整个报告是件非常糟糕的事，因为在报告里委员会对

[1] 稍详细的说明，见 Linda Gorman, "The Market Resists Discrimination," in David R. Henderson, ed., *The Fortun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Warner Books, 1993, pp. 474~475。较详细的说明，见 Jennifer Robac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gregation: The Case of Segregated Street-car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6, No. 4 (December 1986), pp. 893~917。

底特律暴动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下面是这份报告的第一段：

7月22日，周六晚上，底特律警方对5处“盲猪”进行了突击搜捕。“盲猪”发源自禁酒时代*，以私人社交俱乐部的形式一直保存下来。通常，那里就是下班后饮酒和赌博的聚会场所。

这些“盲猪”是市区的黑人和朋友们一起喝酒赌博的地方，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尽情享受的地方。警察有权搜查这些地方，因为酗酒和赌博是非法的。警方原来预期第5个“盲猪”，即第12街上的社会与市民联盟里面大概有二十几个人，但事实上聚集了82个人，他们在欢迎两个回家的越南老兵。警方按计划逮捕了他们。据委员会的报告所说，“一些人对警方的闯入感到非常愤怒。”这种情绪传播开来后，暴动就开始了。

简而言之，底特律暴动的导火索就是政府对平静生活的人妄加制裁，而其蔓延的原因则是政府对和平但非法的黑人生活的打击。有趣的是，在关于增加更多政府工作的长篇大论中，委员会根本没有建议说，政府应当结束禁止黑人和平地喝酒和赌博的政策。

在委员会的报告中，处处可见政府的影子。报告说，城市改造“已经把第12街（暴动开始的地方）从综合社区改造成了一个几乎完全是黑人的地方……”报告又提到了内城区的另一个暴动没有波及的地区。“暴动此起彼伏，”报告说，“但是犹太人社区始终没有受到影响。”这个地区在城市的东北部，有2.1万居民，包括了150幢住宅楼，他们过去已经集聚

* 1920~1933年，美国实行禁酒法。——译者注

在积极邻居行动委员会 (PNAC) 之下, 并建立了邻近街区俱乐部。这些街区俱乐部迅速动员起来阻止暴动蔓延到这个地区。委员会写道: “年轻人同意留在社区里, 参与疏导交通的工作。” 结果是: 没有暴动, 没有死亡, 没有受伤, 只有两起小火灾, 其中一起还是发生在一幢空建筑物里。

让这个地区与众不同的原因很明显: 居民们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社区。但为什么这样的社区没有出现在其他地区呢? 报告的作者们无意中泄露了天机, “他们 (PNAC) 同意和底特律大主教区共同发起一个由双方联合参与的安居工程。” 换言之, 避免了暴动的地区也同样成功地抵制了城市改造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就是联邦政府把穷人居住的市区房子拆掉, 转而建造面向更高层次消费群体的少量高档建筑。经济学家安德森 (Martin Anderson) 在 1963 年的著作《联邦推土机》(The Federal Bulldozer) 中指出, 城市改造计划每建一幢新房子, 平均要拆掉 4 幢旧房子。委员会却认为城市改造是一个积极因素, 并建议要作更大的推广。他们的措辞非常有意思, 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承认了这个计划的历史并不光彩:

城市改造从一开始就是个极富争议的项目。我们意识到, 在许多城市, 它所拆毁的房子比新建的更多, 而这往往给弱势群体造成严重的混乱。

然而, 我们相信, 一个经过改良的更大范围内的城市改造计划对城市的健康发展而言非常必要。^[1]

[1] Report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8, pp. 479~480.

一句话，委员会的解毒方法就是增加剂量。

.....

自由如何通过价格机制减少种族歧视

我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担任访问教授的时候，已经荣休的社会学教授瓦克斯（Murray Wax）跟我讲了个故事。瓦克斯在194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共产党的青年党员，50年代早期研究生毕业以后，他向芝加哥的社区大学系统申请工作，并获得了在赖特学院（Wright Jr. College）教书的机会。但就在开学之前，他接到芝加哥城市教育厅长的电话，要求他去一趟教育厅。在面谈中，教育厅长给他看了FBI收集的厚厚一叠关于他早年政治活动的卷宗，说他不能担任这份教师工作。考虑到芝加哥所有政府主管的学校那时都有类似的限制，瓦克斯只好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做了两年市场研究员，然后又在托尼公司工作了几年。不管是他的客户还是托尼公司，都从没有担心过他的政治背景问题。瓦克斯说，“我接受了全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但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一个悖论：公司并不关心我的共产主义背景，反而是学术界——我过去以为是站在我这边的——因为跟我的教学能力毫无关系的原因拒绝雇用我。”^[1]

政府主管的芝加哥社区大学能够歧视一个高素质的申请者，就因为没有人是大学的所有者，因此，也就没有人承担歧视的成本。但广告公司是营利性机构，如果公司放弃雇用某位非常能干的员工，它就不可能做到最好。公司必须为自己的歧视性选择支付成本，那就是将花更长的时间找到

[1] 与 Murray Wax 的电话访谈，August 29, 2000。

同样优秀的人或者干脆就找一个能力不够的人凑数，这也是为什么公司不计政治背景雇用他的原因：它不想冒关乎利润的风险。

这就是市场运作之道。雇主只关心雇员相对于他们工资成本的生产率。当然雇主可以施行歧视而不关心生产率问题，但那样的话他们就要付出代价：放弃生产率超过工资率的员工。经济学家琳达·高门（Linda Gorman）是我以前的同事，某次在一位男学生对女性大放厥词之后，她对那些女学生说：“别担心，市场会教训他的。”她的意思是说，市场会克服歧视行为。

她的观点在斯皮尔伯格 1994 年拍摄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有极好的体现。在二战时期的波兰，商人辛德勒与统治波兰的纳粹头头们关系良好，他雇用了数百名犹太工人，否则其中的许多人肯定会被送进集中营。

纳粹德国经济部门用出租犹太人的办法来赚钱。对有技术的犹太男人，纳粹索价 7 马克一天，而缺乏技能的犹太女人则是 5 马克一天，他们可以保留自己挣的钱。非犹太裔的波兰人要价更高。辛德勒看到了其中的机会，于是开了一家工厂，专门雇用廉价的犹太劳动力。他的想法很简单：“波兰人（非犹太裔）太贵了，我为什么要雇他们呢？”他对他的会计斯特恩这么说。于是，辛德勒付钱给政府购买犹太劳动力。

通过雇用克拉科夫犹太区的犹太人，辛德勒的确在自己工厂的围墙里为他们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安全，但他的真实动机是很清楚的。当辛德勒告诉妻子他雇用 359 名工人都为了同一个目的时，他的妻子大笑着问，“制造坛坛罐罐吗？”

辛德勒回答道：“为我赚钱。”

辛德勒想要留住优秀的工人，不是因为他真的关心那些员工，而是因

为通过雇用优质廉价的劳动力，他可以赚更多钱。为了这个狭隘的目标，辛德勒甚至把员工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有一幕场景是辛德勒发现他的会计被纳粹抓起来，要送到死亡集中营去。辛德勒愤怒地冲向火车站，威胁一个低层纳粹官员，让他从死亡火车里把斯特恩放出来。

更重要的一点，也是最终使这部电影变得如此令人满意的一点，是辛德勒转变成了一个从内心深处关心犹太人的人，甚至愿意冒险赔上自己的全部财产和生命。然而，仅仅是雇用他们并让他们远离邪恶，这已经是辛德勒做的一件大好事了。辛德勒的故事说明，即使在政府推行非常残忍的歧视政策这种极端状况下，利润动机在减少歧视方面也能发挥作用。

回顾历史，在容忍种族差异方面，政府的表现通常不如私人雇主。这是因为只要歧视行为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政府官员就无需承担相关的成本。经济学家索维尔（Thomas Sowell）指出，在1910年到1930年之间，黑人在私人产业里赚了很多钱，白人对此的仇恨与日俱增。联邦政府对此的反应则是，在雇用时增加对种族因素的考虑。^[1]缪尔达尔写道：“华盛顿的政府部门提出了以前很少使用的种族隔离政策。”^[2]这段时期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允许联邦机构在录用公务员的时候可以从表现最好的三名申请者中进行挑选。于是，行政部门就可以很轻易地把黑人回绝掉。后来，又有了一个政策，要求每个申请者递交一张照片，这样一来拒绝黑人就变得更容易了。

但比起军队雇用黑人的记录来，联邦政府对黑人的歧视还是可以容忍

[1] Thomas Sowell, *Race and Economics*, New York: David McKay Company, 1975, p. 182.

[2]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Volume 1,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p. 327.

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个海军中没有一个人黑人。在一战后期，海军命令所有黑人退役，从此以后一直到 1932 年都没有再招收一名黑人。就算在 1932 年以后，雇用的范围也只涉及厨房工作。在 1940 年，整个美军有多少黑人战时指挥官？两个。不是 2%，是两个。^[1]

在其他国家，官员也不承担歧视的成本，因此一样会歧视非主流团体。在传统上，印度政府就是基于种姓制度来分配雇用名额的，而斯里兰卡政府在分配上则是采取了有利于僧伽罗人（Sinhalese）的办法。在这些国家，政府所推出的种姓和种族配额制度都引发了内战。

自由市场有助于减少经济交易中的歧视

1992 年，我去旧金山烛台体育场看巨人队和辛辛那提红队的比赛。为了融入棒球精神之中，我戴上了洛杉矶道奇队的蓝色帽子。（我同时支持巨人队和道奇队，不过我想既然已经有了道奇队的帽子，又何必再买巨人队的呢。）一个年轻人过来卖热狗的时候，我正坐在看台上。他离我有 40 英尺远的样子，我并没有高声叫喊，而是举起了一根手指，意思是要一个热狗。那个年轻人看了看我，注意到我的帽子，然后指着他自己的头，摇摇头，好像在说：“不，我不卖给你，因为你是道奇队的支持者。”然后他笑了，我也笑了，他过来把热狗递给了我。我们都明白他愿意把热狗卖给我。就算我是道奇队的球迷，他也不可能拒绝从我身上赚钱的机会。

这个关于自由市场如何化解歧视的故事听上去有点琐碎。如果它只跟我的热狗有关，那的确如此，但这个故事其实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

[1] Gunnar Myrdal, *American Dilemma*, p. 420.

题：当交易的是商品而不是劳动时，市场在化解歧视方面特别有效。想一想，你对卖给你面包的那个家伙的政见、种族、性别，甚至国籍知道多少。你不知道是因为你不关心，你所关心的是要买到好面包，哪怕这意味着你要跟可能很讨厌的人打交道。这就是为什么就算书店的店主和雇员都非常讨厌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也仍然会把他的书放到很显眼的位置上。很明显，把这书藏起来会导致很大的销售损失，某些书店的做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电影《七侠荡寇志》（*The Magnificent Seven*）里有我最喜欢的一段台词，尤·伯连纳想说服灵车司机冒着被射杀的危险将一位印第安人的尸体安葬在靴山下，还他尊严。当司机拒绝以后，尤·伯连纳问道：“你（对印第安人）有偏见吗？”司机回答说：“当偏见能救命时，我是彻底的偏执狂。”市场的论点与此相反：当市场能救人的经济生命时，再有偏见的人也会变得包容一切。

自由市场可以消解歧视，这个看法既不是斯皮尔伯格也不是我发明的。两个世纪以前，法国作家伏尔泰在参观了伦敦股票交易所以后就提出了这个看法。他写道：

走进伦敦股票交易所……你会看到各个国家的代表济济一堂，为人类而服务。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彼此做生意，就好像他们信奉同一种宗教一般，惟一的异教徒是破产。^[1]

* 美国著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译者注

[1] David Boaz, *Libertarianism: A Prim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p. 38.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歧视的经济分析》一书中对此作了清晰的界定：自由市场中，歧视者要为歧视行为付出代价，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市场中的人不会进行歧视：最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偏执者往往愿意支付歧视的成本。1993 年瑞典学院授予贝克尔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征引了他的上述洞识。最根本的一点是，在自由市场中，任何一个雇主进行对生产率有害无益的歧视时，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自由市场可以消除种族主义的基础。

贝克尔指出，在能力和经验相同的情况下，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工资差异可以说明黑人所受到的歧视程度。其他情况不变，差异越大，黑人所面对的歧视也就越大。在美国的歧视诉讼中，有两种滥用这个洞识的方式。一种是统计滥用，即假定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工资差异都是歧视造成的，无视研究者没有测度到的其他因素。当然，就像所有研究工资差异的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你无法计算所有相关因素，尤其是那些甚至无法观察的因素。但将一个人的收入能力（earning power）简单地归结为年龄、经验、工会关系、教育等等的变量是可笑的。许多人和比尔·盖茨的年龄一样，在其他方面也很相似，可没有人能跟他一样富有。一份关于男人和女人工资差异的研究发现，跟条件相当的男人相较，女人的工资要么低 61%，要么高 19%，这完全依赖于她们如何控制那些不可观察的因素。

对贝克尔洞识的第二种滥用更基本的层面上违背了正义原则。那些觉得被歧视的工人向法院起诉雇主，并要求补偿他们的低工资。但就算他们的低工资的确是歧视造成的，他们也告错了人。他们告的是那些雇用了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雇主，但是某种程度上，以低工资雇用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消除歧视；由歧视而引起的低工资要归咎于那些不雇用被歧视群

体的雇主。起诉者和好心的法官与陪审团一起追究那些雇用少数族裔的人的责任，他们的做法就像牧师在参加宗教仪式的人很少的时候，却去指责来参加仪式的人。法律制度和牧师都在攻击正在帮助解决问题的人。此外，就像责备虔诚的礼拜参加者会打击他们在未来继续参加的信心，要求向少数族裔工人支付较高工资的行为也会打击那些已经雇用了少数族裔工人的雇主。

自由市场消解种族和其他歧视的方式是许多人不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像戴维斯和贝肯这样的政客非常清楚，在他们希望白人被雇用的地方，自由市场却能使黑人更受欢迎，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推动《戴维斯—贝肯法》；肯尼迪参议员明白自由市场会将纺织工业的工作转移给南方的黑人，而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提高最低工资。某些人可能对一位前共产党员能够在美国的生意场上同样游刃有余感到不高兴，但这就是自由的含义：在自由的情况下，只要有能力，即使是你不喜欢的人也可以做得很成功。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自由会形成对种族和其他差异的宽容。如果你不希望一个社会彼此宽容，那你也许不会喜欢自由。但是请想一想：就算你现在是强势群体中的一员，但并不可能永远强势下去。当有一天你的群体在社会上不再占优势地位的时候，你将会多么需要宽容。

在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某些人会根据种族和其他依据歧视别人。但是，说歧视是错的并不是说人们就应当被强制禁止歧视行为。“联合的自由”意味着人们应当有自由来选择是否雇用某个人，或者是否为某个人工作，这意味着同性恋会经常偏向于雇用同性恋，一些造访旧金山的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这也意味着异性恋可能会倾向于雇用异性恋，白人可能会倾向于雇用白人，黑人会倾向于雇用黑人。这是他们的权利。

尽管我曾经是种族歧视的牺牲者，我仍然要这样说。几年前，一家美国主要报社的商业版希望我成为固定的专栏作家，但那里的一位编辑明白地告诉我存在一个问题：我的肤色不合适。这家报社对我持有的种族歧视非常卑劣，我现在还这么认为，但在跟他们的整个会谈过程中，我从没有否认报社拥有以任何选择标准来进行歧视的权利。

此外，由于两个原因，反歧视法的实施总是事与愿违。首先，政府经常会进行歧视。例如，1964 年的《民权法》宣布雇主进行种族歧视是非法的。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是该法最积极的支持者，他的整个政治生命都在为类似的法律而奋斗。他发誓绝不能让该法被解释为配额制，如果这样的话，他宁愿投票反对民权法案。猜猜后来怎么样？几年之内，联邦政府运用它的权力坚持通过了配额制。在配额制之下，雇主往往得偏向于雇用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1995 年，国会研究服务部发现有 160 个联邦项目使用了种族和性别标准。同一年，两个半白人半亚裔的 5 岁小孩以亚裔人身份申请入读一所公立学校被拒，但他们被告知可以用白人身份重新申请。简单来说，各级政府将许多问题都转变成了种族问题。评论家波阿斯说：“很快我们就需要派观察员去南非求教他们当年是怎么实施《人口登记法》的，学习他们的种族法院如何裁定谁是真正的白人、黑人、‘有色人种’或亚裔。”^[1]正义在这里绝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

反歧视法失控的第二种途径是把合理的歧视非法化。比如，许多雇主都想知道为他们工作的工人是否会偷东西，但在今天，雇主拒绝一个有犯罪记

[1] David Boaz, *Libertarianism: A prim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p. 101.

录的雇员是非法的，除非这项犯罪“与工作有关”。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The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就曾经否定一家公司拒绝重新雇用一位起重机操作员的决定，这位刑满释放的雇员是因一级谋杀罪而入狱的，但委员会认为毕竟他在工作的时候没有杀过人。^[1]雇主也不能有年龄歧视，尽管年龄往往是非常要紧的因素。如果你是一个雇主，你会认为培训 70 岁的人得到的回报和培训 25 岁的人一样高吗？雇主更不能合法地辞退某位妇女，就算他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怀孕妇女需要很长的时间休息，而且婴儿诞生后她很有可能辞职专心照顾孩子。就像一位不得不与法律抗争的雇主灰心地告诉我：“我招聘工人是希望找到能为我多工作几年的人，而不是不工作的人。”如果一位工人因为觉得公司会破产而拒绝某份工作，没有人会控告他歧视。他可以合法地歧视某家企业，他也能的确应当如此。那为什么雇主就不可以因为某位雇员可能辞职或需要大段休息时间而解雇他呢？

本是适度反歧视措施的法律，最终都将不可避免地演化成主张歧视或者禁止合理歧视的法律。为什么不可避免？因为就算反歧视法禁止的是多数人都认为有攻击性的歧视行为，它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可能遭到歧视的人有权利得到这份工作，或有权在某个商店购物。但实际上，人们并没有这样的权利，因为这等于否认了雇主雇用自己喜欢的人和店主选择跟中意的人做生意的权利。不久以前，他们开始想把“冒充权”(Pseudo-right) 当作每个人都享有的基本人权。显然越来越多的法官和政客们认为，雇主不能根据任何犯罪记录对雇员有歧视行为。

[1] Walter K. Olson, *The Excuse Fac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p. 26.

回到我在本章开头所提出的那个问题。我请你想像自己身处一个受歧视的群体之中，然后选择你想生活在怎样的社会，是政府大范围管制人们的社会还是自由的社会。在政府控制的社会中，不受欢迎的群体总是被歧视的，而且歧视通常是以政府政策的形式进行的。另一方面，在自由社会中，自由可以消除歧视背后的支撑因素。

政府对歧视的惩罚可以上报纸头条，但市场对歧视的惩罚要比政府惩罚更有力，也更前后一致。然而，市场的惩罚举动从不会受到广泛关注，甚至少有人知。自由市场经济会对那些不依生产规律行事的雇主施以严厉惩罚；政府官员自以为是地大谈种族和其他歧视的罪恶，可他们自己其实已经成了被歧视群体的主要敌人，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才是被歧视者的救世主。事实上，市场对歧视的惩罚极其有力，就算平等原则不被社会接受或者商人自己主观上有歧视倾向，但客观上来看，商人仍然是这条原则最坚定的拥护者。

第八章

市场经济的欢乐

为什么6千年来，人们不断死于饥饿？为什么6千年来，人们辛苦劳作，另一些人则坐享其成？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在这一个世纪，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人们制造出了蒸汽船、铁路、发动机，现在还可以绕着地球飞行？为什么几千年以来，一家人都住在没有地板的小屋里，没有窗户和烟囱；突然之间，就在这80年中，在美国这块土地上，他们不但有了地板、烟囱和玻璃窗，还有电灯、陶瓷抽水马桶和纱窗作为生活必需品呢？

——罗丝·怀德·蓝恩：《发现自由》^{*}

一天晚上，我开着丰田车在湿湿的道路上开过一个弯道，我问自己：“为什么我相信这辆车不会打滑呢？”我意识到，那是因为我自由市场有

* Rose wilder Lane, *The Discovery of Freedom: Man's Struggle Against Authority*, Fox & Wilkes, 1943.

信心。我知道阿克伦或横滨或东京或底特律的工程师夜以继日地工作，就是为了设计一辆不需王牌驾驶员也能在雨夜平安行驶的汽车。那种信任给我一种模糊的温暖感觉。

最令人惊异的事情是，这些努力工作的工程师和其他参与制造汽车的人甚至不知道我是谁，可他们的行动却表现得好像非常关心我。他们为什么会关心？部分原因当然是他们以自己的工作为荣，想要解决为了制作出好产品所必须解决的技术问题。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他们希望家人生活得好，他们知道除非去抢银行或者中彩票，否则就得在工作中表现突出，这样才能得到相应的报酬，才能满足家人的生活需要。

那些创造了你的生活中各种必需品的人，他们对你的关心是别有所图的，你刚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可能会相当慌乱。你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如果……”而抓狂：如果那个对我微笑的杂货商并不真的喜欢我呢？如果那个汽车修理工忌妒我的车比他好，他会有意把车弄坏吗？诸如此类。但是过一会儿，你就会回过神来：人们卖给你好的产品和提供优秀服务并不是你很可爱，而是因为他们就像你需要他们一样需要你。一个不错的想法，不是吗？

年轻的时候，我不怎么旅行，而且每次旅行我都会有很多担心：我怎么找到我要去的地方？离开机场以后，我怎么找旅馆？谁来照顾我？我，一个在人口不满 2000 的马尼托巴省卡门镇长大的家伙，去温尼伯旅行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恐惧。那个人口超过 50 万的地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巨城。现在我会明白，出租车司机、旅馆服务员和其他人都会来关照我，因为他们的生计依赖于此。去一个陌生的国家旅行，你当然要多加小心，但是我感到惊讶的是以前的我是多么不必要的谨慎。

克里斯蒂安森 (Greg Christiansen) 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海达德分校的一位经济学老教师，他曾举例说明自由市场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效率：“把我放到美国任何一个人口超过 2 万的小镇里，我都能在一个小时内找到合我尺寸的蓝色正装衬衫。”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我几年前参加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经济学年会，第一天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忘了带可以搭配蓝色运动夹克的裤子。那天我只好穿我的蓝色运动夹克和蓝色牛仔裤参加会议。可我第二天得和韦登鲍姆 (Murray Weidenbaum) 共进早餐，他是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在 1982 年雇我为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当时韦登鲍姆想在下一学年雇我为华盛顿大学的访问教授，但蓝色牛仔裤可不能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尽管买一条我喜欢的裤子是很容易的，但我没办法找到一条恰好合我尺码的。我不得不对裤子加以修改，而这要花时间。那天早上在考虑我的麻烦事时，我碰到了一个经济学家朋友，他和我有类似的体形，因此很容易理解我的难处。“这样的修改通常得花个几天时间”，他说。这时，我突然发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回答他：“多长时间得看我愿意付多少钱，”然后我就立即去找男装店。恰好旅馆旁边就有一家，我在 5 分钟之内就挑好了一条裤子，比我留在家里的那条更好，而且只要 100 美元，比我预期的低 50 块。我问店员如果我要两小时内拿到改好的裤子，要付多少钱。我很幸运：他那天不太忙，只收了标准费用 15 美元。我有一个感觉，就算那天他很忙，付 50 美元应该也能让我在两小时内拿到裤子。

快乐的科学

我在第一章曾指出英国作家卡莱尔称经济学为“沉闷的科学”，只是

因为他周遭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都强烈反对奴隶制。对我来说，经济学是门快乐的科学。我一开始信仰经济自由（有时也被称为资本主义）是出于道德使命，把自由看成应当存在的事物，因为它是惟一一种人们以选择而非武力形式彼此交往的制度。但我越是学习经济学，越是发现经济自由还具有巨大的实用性，它在分配产品上比任何其他制度都更好，不仅仅是更好，而且是不可思议的更好。

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并不怎么欣赏这种不可思议的生产力。首先，从16岁开始，我就自己养活自己，一直生活得非常拮据，直到24岁第一次获得助理教授这份全职工作时才有所改善。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我对经济史极度无知。我在学校里学到的历史多数都是在讲各种各样的“谁在什么时候为了哪四个原因进行了什么战斗”。对几个世纪以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所知甚少。

但最近20年，我越来越欣赏经济自由。这部分是因为我的收入，即使算上通货膨胀，仍然有了很大的提高；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身边所发生的技术革命已经提高了每个人的真实收入，尽管有政府错误的通货膨胀政策，但其中一部分人的实际收入也还是可以原地踏步的。

想一想，即使是我们当中那些收入不高的人今天能拥有什么吧。要是我们错过了一部在剧场公映的电影，我们不必像过去一样等第二轮公映（可能性不大），或者等到多年以后电视转播，忍受广告，还得忍受好心的电视台“检查员”把精彩部分删得一干二净。现在，我们可以方便地看到未删剪版，只要花用最低工资衡量还不到三天收入的代价买台录像机就可以了；我们还可以租一部录像带，所需的钱往往还不到电影票价的一半。我们常把这种事看作理所当然：自由市场的欢乐之一就是我们能把惊人的

生产力视作理所当然。不过，偶尔对美好的事情感到好奇也没什么坏处。很多“好奇缺乏症者”认为好奇这件事一点也不酷，但是不要让任何人剥夺你的好奇感。如果你已经丢失了它，现在给你机会去把它找回来。

即使在我还是一个生活窘困的大学生的時候，我本也应当能够欣赏市场经济的生产力，要是我那时能对 20 世纪早期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作品有更深认识的话。在 1942 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熊彼特写道：

伊丽莎白女王（1558～1603 年）拥有丝袜，资本家的成功并不在于他们为女王提供了更多的丝袜，而在于由于生产丝袜所付出的劳动量稳定下降，资本家们可以把丝袜卖给工厂的女工。^[1]

忽略其中的大男子主义，熊彼特的确抓住了问题所在。400 年，甚至 200 年以前，只有国王和女王才能拥有的东西，今天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当回事。国王和女王只要弹弹手指就能命令乐团演奏音乐。今天，任何一个人，只要有 CD 机或卡座也可以想要什么音乐就有什么音乐。

以前，只有势力强大的贵族才有足够的东西吃，但今天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可以享用丰富的食物，不仅种类更多，而且由于罐头技术、防腐剂、冰箱和冷柜的发明，安全性也大大提高了。以前，只有贵族有能力去远方旅行，而今天，多数人都能在 6 个小时内飞越几千英里，要是买打折机票

[1]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42, p. 67.

的话，价格不过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不到两星期的工资。

以买书为例吧。《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布莱姆罗 (Peter Brimelow) 曾经指出，在 1776 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售价 7.99 美元，相当于 2000 年的 650 美元。这么高的书价也是当时美国最好的大学为什么被命名为哈佛的原因：^[1]约翰·哈佛捐献了 400 本书创立了大学图书馆。但是无情的技术进步大大压低了书的价格，今天一本普通精装书的价格只相当于 1776 年的 5 美分，一家图书馆有 400 本书在今天听来可不算多：这个世界上有数以千万计的人藏书超过此数。而且，通过古登堡项目 (www.gutenberg.com)，互联网已经让人们可以免费阅读成千上万本书了。

但还不限于此。尽管熊彼特是那个时代对市场经济最持肯定态度的经济学家，他还是低估了市场经济所达到的成就。他所关注的是市场经济将国王和女王专享了数个世纪的产品传递给普通人的惊人能力，但哪怕是最强大的国王和女王，他们想听音乐的时候，也只能要求交响乐队演奏几个小时。而我，只要轻轻按一下按钮，就能让乐队在任何时候没日没夜地为我演奏。要是我听得不同意，再按一下按钮，就能换上另一支交响乐队或者摇滚乐队或者弦乐四重奏。我可以在家，在办公室，或者在我的车上这么做，音乐家们随时候命。

国王要是想远行数千英里，他也可能做得到，但却受限于旅行方式，而且要花上 6 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对飞行的抱怨只是不得不坐在狭窄的位子上，还可能忍受旁边的人的体臭达 6 个小时。可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人人都有体臭。每次我坐在经济舱里七窍生烟的时候，我都告诉自己，就

[1] Peter Brimelow, "Why they call it Harvard College," *Forbes*, March 9, 1998, pp. 50~51.

在 100 年前，连最强大的国王也还没法享受这些呢。同时我也意识到，就算收入减半，我还能拥有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只是数量没那么多罢了。

也许你认为音乐和旅行不是生活的根本所在。但生命总该是根本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是他父亲所生的七个爱德华之一。为什么他的父亲要给七个儿子取同一个名字？因为他希望爱德华·吉本这个名字能延续下去，而在吉本诞生的 18 世纪初期，父母们预计在正常情况下，多数子女都活不到成年。如果你生于 18 世纪或更早的时期，你在童年就死于饥饿、疾病或传染病的可能性很大。^[1]今天，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 76 岁，是 18 世纪前的两倍还多。我们的健康程度和预期寿命的提高，主要原因并不是医疗保健（medical care）的进步，更多的是由于更好的营养、更安全的食品和饮用水，以及现代下水道系统。近至 1900 年，美国每 2000 人中就有一个死于肺结核；到了 1990 年，14 万个人中才有一个死于肺结核，死亡率下降了 99.6%。^[2]

我们再来谈健康问题。你甚至并不需要回顾几个世纪以前的历史才能认识自由市场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好处。我只是简单地考察了一下我自己的家庭史，就发现了变化所在：1993 年，我拿着 video 采访了我的父亲，以便更多地了解他的人生。我问他，为什么他住在离阿西尼布旺河（Assiniboine river）只有一条街的地方，却从没说起过要到那条河游泳。我永远

[1] Mabel C. Buer, *Health, Wealth, and Popula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1815*,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926, p. 30.

[2] 这些数据来自 Aaron Wildavsky, "Riskless Society," in David R. Henderson, ed., *The Fortun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3, pp. 426~432, 引自 *The 1991 Information Please Almanac*,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1, pp. 817, 820。

忘不了他的回答：这根本不可能，因为这条河里满是从上游倾倒下来的垃圾。我的父亲和我的姐姐都有小儿麻痹症，但你听说过最近 30 年有谁得过小儿麻痹症吗？

1960 年，那时我 10 岁，我们家和另一家人共度圣诞。他们家有一个 5 岁的小女孩叫德鲁，非常早熟，好像对我有点意思，一个劲地在房子里追我，直到我的裤子被撕裂。我只好走回家，换了裤子再回去。德鲁又追我，把我的第二条裤子也撕开了。这下我没得选择了，因为我一共才两条裤子。再快进到今天。一个新婚的朋友告诉我他的妻子把衣橱整理得多么井井有条，我对他说，“我们真是不可思议的富裕啊。”他有 5~10 套西装，大约 20 件不错的衬衫，和同样多数量的高级领带。即使我一位年收入不足 15000 美元的朋友，虽然只是刚过穷困线，但也有 6~10 条裤子、20 件衬衫，堆得整整齐齐，或者挂在衣橱里。当我是孩子的时候，我只有一双好一点的鞋和一双匡威运动鞋。但现在的孩子，就算在低收入家庭，往往也有超过两双质量不错的鞋子。

我今天所拥有的几乎所有东西的质量都比 30 或 40 年以前的好。想来想去，惟一变差的就是治安和教育水平。有趣的是，这些都是政府提供的。

然而，我们不老是听到人们的抱怨，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吗？的确如此。人们通常会引用统计数据来佐证他们的信念：美国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0 年是 4.3%，到了 1998 年则变成了 3.6%。另一方面，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家庭，其收入比例则从 1980 年的 43.7% 升到了 1998 年的 49.2%。但是，基于以下三个理由，这些数据并不能说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首先，政府数据反映的只是收入比例，而非绝对收入。如果比例略有下降，但总量有

很大的增加，那么收入仍然是提高了。根据商务部的计算，从1980年到1998年，按1998年的购买力计算，家庭总收入从3.43万亿美元增加到了5.39万亿美元，但商务部使用了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调整收入，在整个时段中，年通货膨胀率被高估了大概一个百分点的样子。因此，18年中总收入的变化，不是从3.43万亿提高到5.39万亿，而是从2.96万亿提高到了5.39万亿。因此，用1998年的购买力水平计算，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在1980年的总收入是2.96万亿的4.3%，约为1270亿美元，而在1998年，则是5.39万亿的3.6%，约为1940亿美元。由于人口的增长，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的数量从1980年的1650万户，增加到了1998年2080万户。因此，家庭平均收入则是从1980年的7700美元，提高到了1998年的9300美元，大约增加了20%。

由于收入测度和通货膨胀率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更好的办法来判断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看看家里有些什么。有洗衣机、彩色电视机、录像机吗？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考克斯跟他的合作者、新闻记者阿姆在《富裕和贫穷的神话》一书中就用这个办法来评估被官方认定为“贫穷”的家庭究竟是如何生活的，评估阶段从1984年到1994年。他们研究结论的要点在于，一般来说，这类家庭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的。在1984年，70.3%的贫穷家庭拥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在1994年这个比例则是92.5%；1984年3.4%的家庭拥有录像机，10年后，这个比例上升到了59.7%；1984年拥有一辆以上汽车的家庭占59.7%，到1994年则变成了71.8%；在1960年代早期，微波炉还无人听闻，到1994年，已经有60%的贫穷家庭拥有它了。考克斯和阿姆指出，根据是否拥有洗衣机、干衣机、电冰箱、火炉、彩色电视机或空调来衡量，1994年贫穷家庭的富有

程度甚至超过了 1971 年的中等收入家庭。^[1]

第二，要判断一个人是穷人或富人，你必须得知道这个人拥有的财富，而非他（她）的收入。一个退休人员每年只拿 1 万美元的社会福利金，却拥有一幢价值 30 万美元的无按揭房产。根据收入，这个人肯定要被记入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群体之列，但他显然是很富裕的。财富与收入之间尽管有正相关关系，但这种相关性远没有到一对一的地步，尤其对老年人而言。

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一说难以成立的第三个理由是当今美国不可思议的收入流动性。想像一下，你给所有属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群体的人拍一张全体照；9 年以后，你再给那时属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群体的人拍一张全家照。同时出现在两张照片上的人有多少？令人吃惊的少。

这是 1992 年美国财政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的。通过对 14351 名纳税者在 1978 年和 1988 年的税前收入加以分析，财政部经济学家们发现，在 1979 年属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群体的人，只有 14.2%，即不到七分之一的人在 1988 年的时候依然属于这一群体。同时，有 20.7% 的人进入了次低五分之一人群之列，有 25% 的人到了中间的五分之一，有 25.3% 的人到了次高的五分之一，并有 14.7%，也是七分之一的人排到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群中。也就是说，一个在 1979 年属于收入最低等级的纳税者，9 年后进入到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群中的概率与继续留在收入最低的人群的概率是一样的。^[2]

[1] W. Michael Cox and Richard Alm, *Myths of Rich and Poo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 15.

[2] David Wessel, "Low-Income Mobility Was High in 1980s,"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 1992, p. A2.

为什么流动性会如此之高？最重要的因素是年龄。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群中有着相当大数量的年轻人，其中多数人刚刚从中学、大学毕业或中途退学，开始自己养活自己。他们现在的收入是很低，但随着年龄和技术的增长，他们的收入也会提高。类似的还有退休人员，他们比一般的家庭更有钱，年龄大于65岁的人是所有年龄段中第二有钱的群体，但却没有高收入。其他因素也很重要。一个失去工作的工人当年的年收入可能很低，但之后他就找到了另一份工作。或者，一个刚离婚的母亲也许属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群体，但9年以后，她又结婚了，或者有了新的工作技能和更多的工作经验。

的确存在一个社会底层，他们生来贫穷，并且终身潦倒，但其数量要比你想像的少得多。对绝大多数被政府根据收入归类为穷人的人而言，贫穷只是暂时的。比如，1969年到1978年的10年中，只有2.6%的人有8年或更长的时间被归类为穷人。而在同一时期，有24.4%的人至少有一年被归为穷人。不是老年又有贫穷经历的，43%是因为离婚、孩子诞生、或者分家。^[1]

许多福利主义者相信，接受福利的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缺乏谋生的技能，经济学家弗莱克（Thomas Fraker）就是其中一员，他使用调查数据来研究政府政策的效应。很多对福利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由于福利制度中内含抑制因素，穷人反而被“套牢”了。如果你接受了福利救济，若要不丧失福利，你的合法储蓄

[1] 这一段的数据来自 Isabell Sawhill,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R. Henderson, *The Fortun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1993, pp. 56~61。在写了这篇论文以后，Sawhill 这位华盛顿城市研究会经济学家成了克林顿政府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副主任。

不能超过数千美元。而且，如果你在接受福利救济，那每多挣1美元，你的福利至少要减少67美分，甚至多达1美元。^[1]换言之，如果你在接受福利救济，那你将面对67%~100%的隐含边际税。对任何想工作的人而言，这都是很强的阻力。1996年的福利改革由国会投票通过，并由总统克林顿不情愿地签署生效，虽然他在1992年的竞选中曾承诺要“终结当前的福利制度”。这次改革是对以上两种观点的一场考验。改革法对享受福利设置了一个时间期限，过了期限以后，人们就无法再继续享受福利了。一方面，那些相信接受福利救济者缺少基本工作技能的人预言，人们在失去了福利以后会沦为赤贫。另一方面，那些认为社会福利构成工作阻力的人预言，失去福利的人能活得更好。弗莱克主持了一项服务于华盛顿特区“数学政策研究公司”的研究，在这项由联邦政府和一些非党派基金资助的研究中，弗莱克对衣阿华州137个刚失去福利救济的家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结果呢？大概一半人比以前的平均现金福利收入略高一些，另一半则略低一些。^[2]弗莱克对《华尔街日报》说，“我们以为会找到很多流落街头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是激励在起作用。当接受福利救济的人每通过工作多赚一美元，便要失去一美元社会福利的时候，许多人便没有兴趣去赚钱（或者是没有兴趣去报告赚了多少钱）。但如果我们以可信的方式宣布，很快就会取消他们的社会福利，或者干脆就一脚把他们踢开，那他们很快就会找到谋生

[1] Hillary Hoynes, "Work, Welfare, and Family Structure: What Have We Learned?"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5644, July 1996.

[2] 弗莱克的研究引自 Christopher Georges, "On Their Own: Most Iowans Taken Off Welfare Do Get By, Legally or Illegally,"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6, 1997, p. A1.

之道。只要政府让开路，人们就可以更容易地找到工作。最低工资制也应该被废除，因为它把低技术人才赶出了市场。还应该废除政府制定的其他包括对人们拥有出租车、提供美容服务、砍树、在街头卖食物和其他生产性工作进行管制的规定。幸运的是，尽管仍然有上述障碍，那些以前接受福利救济的人还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但美国的财富难道不是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吗？纽约大学的经济学家沃尔夫（Edward Wolff）声称，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所占有的财富比例已经从1983年的31.9%上升到了1992年的35.9%。但另一位经济学家，哈德森研究院的韦切（John Weicher）则认为，这个比例实际是从1983年的31%下降到了1992年的30%。我不知道到底谁是正确的。我没有仔细地检查沃尔夫或者韦切的数据，因为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每个人是否都变得更富裕了，而非财富的集中度，但沃尔夫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在他的《头重脚轻：对美国财富日益不平等的研究》（*Top Heavy: A Study of the Increasing Inequality of Wealth in America*）一书中，我想找到的是诸如美国家庭的一般财富水平、处于各个年龄段不同人中的人们的一般财富水平，以及它们随着时间如何变化等方面的研究。但我并没有找到这些东西。我没能找到关于任何人的财富水平的任何数据，因为沃尔夫根本没把它们列出来。他在这本被广泛引用的书中列出的惟一数据是不同人之间的财富比率。为了计算这些比率，他当然得有不同群体的实际财富数据，但我们可以想像，他认为这些数据并不重要，也不值得放到书里面。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仍然不会知道美国是变得更富裕还是更贫穷；如果你不知道它的书名，那你读完此书，可能也不知道它到底是讲美国还是孟加拉国。沃尔夫似乎认为，重要的是人们的相对差距而非实际生活水平。

但事实上，在美国每个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了。就像考克斯和阿姆所证明的，用人们购买某种商品所需的工作时间来测度，美国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不断下降。他们指出，在1916年，电冰箱的价格是800美元，大概相当于一个制造业工人工作3162小时的收入。在1970年，一个高级得多的电冰箱要375美元，按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来计算，大概相当于112小时的工资。今天，一个更高级的电冰箱要900美元，制造业工人只需要用68小时的工资就能买到。考克斯和阿姆通过对衣服、食物、汽车、飞机票、照相机和电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用工作时间来衡量，连面积相同、周边环境类似的房子的价格也有轻微下跌。尽管新房子用工作时间来衡量的话是更贵了，但那是因为它们包括了更多和更好的“配件”——车库、更多的床、空调、垃圾箱、车库门、防风窗、绝缘材料等。^[1]

自由市场在“交货”方面比政府有效得多，这一点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表示异议了。但许多自由市场的批评者，甚至包括它的许多辩护者还秉持着老掉牙的看法，认为自由市场会损害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真的吗？事实上，有很好的例子能证明自由市场可以推动文化的发展。

当然，要讨论自由市场对文化的影响，首先需要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什么是好的文化，什么是差的文化？我并不是文化相对主义者，我相信存在判断文化的标准。我也的确认为判断一种文化的好坏要远远难于判断慷慨（好）或谋杀（坏）这类事物的好坏。但是，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不管你对文化所持的标准是什么，一般而言，相比政府严厉控制市场

[1] 这些数据请见 W. Michael Cox and Richard Alm, "Time Well Spent: The Declining Real Cost of Living in America," i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1997 Annual Report, pp. 2~24。

的状况来说，在自由市场之下，你能拥有更多你中意的文化。

回到自由市场“交货”这个事实上来，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最糟的情况下，也能生产比以前品质更好、数量更多的产品。普遍的繁荣使人们购买书籍和消费其他形式的艺术成为可能。在所谓的昔日好时光里，书籍的价格不可思议的贵，这部分是由于人们的收入较低，部分是由于纸张和印刷的成本很高。而资本家以一己之力推动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营销，并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改变了整个状况。1998年，乔治·梅森大学的泰勒·考恩在《商业文化礼赞》一书中指出，在1760年，一个普通劳动者要工作整整两天才有足够的钱买一本廉价书，而今天，一本平装书的价格只略高于每天的最低工资。由于财富水平相对于书的价格有了很大提高，人们也就可以买更多的书。比如，1947年美国人均购买图书3本，到了1989年，提高到人均买书8本。^[1]可以推测，同样是由于财富的增加，1997年美国有35%的人参观了艺术博物馆，比1982年的22%有很大的提高。^[2]

如果你不认为汤姆·克兰西的小说*是艺术，那你也许不会认为能够更便宜地买到他的小说是了不得的文化福利。但这没关系，因为正是制造和营销能力提升，以及社会的日趋繁荣，使你能够以越来越低的价格买到你所喜欢的任何书。许多人认为在图书市场上，很少一部分作品的销量占

[1] Tyler Cowen, *In Praise of Commercial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1. (中译本参见泰勒·考恩,《商业文化礼赞》,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05。)

[2] Douglas A. Blackmon, "Metamorphosis: Forget the Stereotype: America is Becoming a Nation of Cultur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7, 1998, p. A1.

* Tom clancy, 全球最负盛名的军事惊悚小说大师。——译者著

据了整个销售的大头，但事实是1980年最畅销的15本书销售总量只相当于图书总销售量的1%弱。^[1]今天的大型连锁书店比如博得（Borders）和邦诺（Barnes and Noble），再加上互联网，为小众作家们提供了很大的市场空间。

就像当年大规模降低图书制作成本的古登堡印刷革命一样，互联网让出版变得更为容易。两年以前，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海默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这样写道，尽管人们能够将《失乐园》放到网上，“但更适合上网的则是《克利夫名著解读》（Cliff Notes）版。”但由于网络空间是不需要成本的，这种权衡的结果并没有出现，事实上两种版本都可以上网。《福布斯》杂志科技版的专栏作家帕斯楚（Virginal Postrel）这样回应海默尔法布：通过雅虎搜索引擎，我们甚至能找到弥尔顿这首伟大长诗的五种全文版本。^[2]

尽管少数民族群体面临着广泛的歧视，但市场机制也能够让他们参与市场。比如，黑人节奏布鲁斯（R&B）音乐家们被主流唱片公司拒绝，但他们通过独立厂牌诸如 Chess 和 Motown 销售自己的唱片；当电台不愿播放 R&B 时，音乐家们利用投币式自动唱机来为他们的作品打广告。查克·贝里（Chuck Berry）的唱片公司付钱给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来播放他的新唱片，以此推广他的第一首流行单曲《梅贝林》（Maybellene）。有趣的是，尽管某国会委员攻击这种酬金是一种丑闻，但此项做法直到国会1959年的著名听证会之后才被宣布为非法。据考恩说，对酬金的指控在

[1] Tyler Cowen, *In Praise of Commercial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7.

[2] Virginal Postrel, "A Net of Plenty," *Forbes ASAP*, April 6, 1998.

本质上就是对黑人音乐的政治迫害。^[1]

自由市场同样也有助于女性作家的发展。几个世纪以前，书的价格非常高，作者很难通过卖书的办法存活下来，只有男性能获得赞助人提供的支持。但是当作家开始竞争读者而非赞助商时，男性的这项优势就化为乌有了。私人经营的营利性图书馆为主要由女性组成的读者群订购小说，和今天的百视达公司（Blockbuster）在音像制品方面的做法一样。它们是女性作者最大的市场，这也是简·奥斯丁、夏洛特·勃朗特和埃米丽·勃朗特姐妹为什么如此成功的原因。到了19世纪，在出版作品的英国小说家中，妇女占了一半。^[2]

通过自由市场财富水平不断增加，艺术家、画家、音乐家可以更轻松地利用他们的技艺谋生，而不用依靠国王或者其他的贵族赞助人。比如，海顿在职业生涯之初与奥地利埃斯特哈齐亲王签订了长期合约，他被要求穿着白色长袜，戴上抹粉假发，未经雇主许可不得外出旅行。他创作了许多使用巴里通琴（一种古大提琴的笨重形式）的音乐作品，只是因为亲王自己会演奏这种乐器。但是海顿针对合同与赞助人重新谈判，获准出售自己的音乐，并因此获得相当于时下百万美元的财政保障。当那位埃斯特哈齐亲王的儿子尼古拉二世批评海顿的演奏时，海顿回应说：“尊敬的殿下，那是我自己的事情。”^[3]

那么，挨饿的艺术家这种老观念呢？普遍的繁荣使得这点越来越不真

[1] Cowen, *In Praise of Commercial Culture*, pp. 166~168.

[2] 同上, pp. 62~64。

[3] 同上, pp. 137~138。

实。250 年以前，巴赫的年收入相当于今天的 7 万美元。^[1]即使在最初的情况下，莫扎特的收入也 3 倍于维也纳医院的主任医生，他的财政危机实际上主要源于自己的肆意挥霍而非收入过低。^[2]很多艺术家并不羞于挣钱。莫扎特写道：“相信我，我的惟一目标是尽可能地挣钱；除了健康以外，金钱是人们拥有的最好的东西。”^[3]

当然，即使在今天，也有艺术家从事其他工作来贴补自己的艺术创作。美国诗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在出版诗作的同时，还在保险业从事全职工作。一位他以前的保险业同事说，“他（史蒂文斯）是一个非常具有想像力的人。”^[4]有趣的是，史蒂文斯却拒绝了在哈佛大学教书和写诗的教职。实际上，即使是很多不那么成功的画家、音乐家和作家，也能靠他们的艺术作品为生。

许多文化悲观主义者认为文化正在走下坡路，那是因为他们犯了简单的统计错误。如果最近 40 年每年有 10 首好歌，而今年也有 10 首好歌，那么今年就和以往一样好，但人们总是错误地把今年的歌和过去 40 年所有最好的歌进行比较。这样一来，今年看起来当然不怎么理想，但是如果这么进行比较的话，任何一年都是如此。所以，下次你拒绝新出现的歌曲、书本或绘画作品的话，请记住：今天每个人都同意莎士比亚的作品是高雅文化，但那个时代的批评者一样认为他的“教养很浅薄”。而且，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莎士比亚的剧本，是因为它们满足了 16 世纪通俗文化的

[1] Cowen, *In Praise of Commercial Culture*, pp. 166~168.

[2] 同上, p. 139。

[3] 同上, p. 18。

[4] 同上, p. 17。

需求。莎士比亚和许多著名艺术家之所以能够佳作迭出，就是由于他们的作品在当时的自由市场中非常受欢迎。

数十年以前，人们的确可以说电视是一片巨大的文化废墟，但这种说法在今天就不够确当了。多数电视节目仍然是垃圾，至少根据我的标准是这样；但是有线和卫星电视使得频道和节目的数量倍增，可以说，不管你是什么口味，总能找到令自己满意的节目。有意思的是，有线电视的发展之所以花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联邦通讯委员会和当地的管制者拖了后腿。要是早一点开放电视频道的自由竞争，我们在很多年以前就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了。

我如何接触到文化

知识分子往往陈腐地认为电视和电台是文化的敌人。但是，正是流行的电视和电台节目给了我关于古典音乐的最早体验。就像多数 45 岁以上的美国人一样，我是通过电台节目的主题曲和稍后的电视剧《独行侠》（*The Lone Ranger*）才第一次听到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每次我的兄弟保罗和我听到电台放这段音乐的时候，我们就绕着屋子瞎跑，用手抽打着那匹我们想像中的马，让它飞奔起来，这是为什么我忘不了“威廉·退尔序曲”的一个原因。当然，直到在大学时买到唱片之后，我才听到了完整的序曲，但要是没有电台和电视节目的熏陶，我可不会对它感兴趣。

同样，是动画片兔宝宝邦尼（*Bugs Bunny*）引发了我对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的兴趣，邦尼兔曾经唱过一首歌，用的就是罗西尼这部歌剧中的曲调。

第九章

谁的收入？谁在分配？

在第五章已经提到过，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年都会去加拿大安大略省米纳基的小别墅度暑假。在那儿，不管用收入还是财富来衡量，几乎所有拥有小别墅的人都比我们家有钱。想要当地的湖里转转，你需要独木舟或摩托艇。其他家庭都有摩托艇，而我们只有一条父亲在1931年买的独木舟。而且除了我们，至少看上去，所有人都是游艇俱乐部的会员，那个俱乐部拥有一些小帆船和一个鸡尾酒廊。我的父亲总是抱怨周遭“富人”们的“炫耀性消费”。他对“富人”的定义就是任何收入比他高30%以上的人，这差不多囊括了所有在米纳基拥有小别墅的人。我的父亲讲起这些“富人”来总是愤愤不平，就好像他们拥有的都是不义之财，或者至少道德上有亏。看到一些朋友有自己的摩托艇，或至少偶尔也能借用他们父母的船，我也觉得很不好受。最难受的是看到同伴们在湖上滑水，却没有邀请我们。

是的，我也曾和父亲一样深深地怨恨那些比我们更富裕的人。考虑到加拿大大约有一半家庭的收入比我们家高，我的怨恨可以说已经堆积如山。至少在潜意识里，我采纳了父亲的观点，认为那些比我们有钱得多的人都不老实。当然，我没有任何证据。我的确听说过一些有钱人利用他人发财的故事，但我并没有可以怨恨数百万人的坚实基础。我的怨恨只是因为我没有其他孩子拥有的一些东西，我感到自己被忽视了，如此而已。

快20岁的时候，我开始学习经济学。我慢慢认识到，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中，大多数收入都是人们辛苦挣来的。当然，的确有小部分富人是通过欺诈赚到钱的，尤其在那些存在大量政府管制的社会里，人们可以通过政治特权来获得财富。但我开始明白，在相对自由的社会里，多数高收入者获得财富的办法还是很老套——努力打拼。

这种对有钱人的怨恨并非只有我才有。当某人告诉另一个人自己赢得了一个奖项或准备去好好度个假时，那个人经常会说，“我恨你。”通常来说这只是个玩笑，但这个玩笑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怨恨之情并没有立即消失，我花了好多年才慢慢将它驱除。记得自己一次在洛杉矶的富人区布伦特伍德散步，我朝北穿过布伦特伍德，进入希利亚区，发现房子一幢比一幢好。尽管在4年前我已经认识到，多数“富人”的财富是取之有道的，但面对那些我无法想像自己能够消受的财产，旧时的怨恨又重新出现了。我低下头，发现自己把拳头攥得紧紧的，满是愤怒。

但就算在我最为怨恨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任何理由可以让我放弃对人类自由的信仰，我相信自由包括人们有权拥有任何自己挣来或被赠予的东西。在布伦特伍德散完步之后，我仍然很沮丧，我没办法安慰自己说，

“我会打败你的”，或“征税征死你，被没收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对自由的信仰不是那么坚定，对富人的怨恨很容易就会使你得出结论说，应当让政府夺走他们的财产。1969年，我听了赫伯格（Will Herberg）在一个会议上的发言。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转向了。我的朋友克兰西和我问他是如何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突然，他的眼睛放光了。他动情地讲起自己从小贫穷，因为很聪明，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受雇教有钱人家的哑巴孩子。他告诉我们他感到愤怒，因为自己聪明却一无所有，而这些哑巴反而拥有一切。他说：“我就是这样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讨厌有钱人。”我们感到很震惊。我们原来以为所有知识分子的观点都是通过抽象思考得来的，而不是仅仅建立在怨恨之上。赫伯格一定从我们的脸上看出来了我们的想法，因为他马上说明他这种走向马克思主义之路很常见。我还记得他是这么说的：“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

多年以后，我对“富人”的怨恨已经消散了。这是件好事，因为忌妒会害了自己。有三件事情使我变得不那么怨恨，如果什么时候你忌妒别人拥有得比你更多，或许也可以试试。

当我忌妒某个人比我更有钱的时候，首先我提醒自己：深呼吸，看看周围，好好想想。我通过思考意识到自己原来拥有不可思议的财富，并且在这个工业化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拥有那么多的财富。就像我在前一章所详细说明的，比起200年前，甚至30年前的世界来，现代世界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然后，我提醒自己：从长期来看，我必须为自己的所得负责任。如果我真的希望得到某样东西，那我就得承担相应的职责。几年以前，我对我

的朋友汤姆·内格尔抱怨说，虽然我和哈佛大学教员一样聪明，却没有机会在那样的学校里任教。

“是你自己选择不去哈佛教书的，”汤姆回击道。

“这是什么意思？”我感到眩晕、受伤，开始自卫。

汤姆说：“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决定要去哈佛当老师，那你就应该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星期工作6天半，在顶级学刊上发表3篇论文，然后就可以去哈佛试试手脚了。要是想拿到终身教职，你还得再这么干上5到10年。你自己已经选择了不这么做。”

现在，每当我为自己没能在哈佛任教而难过的时候，我就会记起这场讨论，然后马上感觉好多了。是的，我已经做了选择。我喜欢每天“只”工作9小时，一星期工作5到6天，并和我的妻子、女儿及自己的社区生活在一起。

回过头看，即使在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也在为自己负责任。当我看到在那个避暑胜地，除了我们人人都有一艘船，我决定去赚足够的钱买一艘二手摩托艇。13岁的时候，我把大半个暑假以及那个学年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在各种各样的零工和小生意上。第二年夏天，我几乎已经攒够了钱，但后来我选择了不买，自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在为了赚钱买船而工作的时候，我对其他人的怨恨自然而然消失了。我喜欢为了一个目标而工作。

有人跟我说，我这么说是很容易的，因为我有许多获得高收入的技能，比如写作和演讲。但在工业化社会里，一个相当普通的人也能聚集净价值50万美元以上的财富。李（Dwight Lee）和麦肯齐（Richard McKenzie）是佐治亚大学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他们最近写了一本非常精彩的书：《在美国致富》（*Getting Rich in America*）。他们在书

中列出了致富的 8 条简单规则。

在美国致富的 8 条简单规则

下面就是李和麦肯齐在《在美国致富：建构财富与美好人生的八条简单规则》一书中所总结出的规则。我已经在每条后面加了简单的解释、例子或引证，其中一些取自于李和麦肯齐的这本书。

- 1. 把美国当作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
- 2. 认真看待复利（compound interest）的力量，并努力积蓄；

据说，当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有一次被问到自然界最有力量的东西是什么时，他回答说，“复利”。如果你一年投资 2000 美元，并且每年获得 8% 的真实收益率（也就是说，已经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30 年后，你就会获得 20.7932 万美元，40 年后，你会得到 47.7882 万美元。

- 3. 抵制诱惑；

如果每周三次，你用 1 美元的纸袋午餐代替 6 美元的餐馆午餐，并把省下来的钱投资在一年 8% 收益率的事件上，30 年后，你就能得到 2.8 万美元。

- 4. 接受教育；

接受教育，而不仅仅是上学。（两者之间的差异请见第十六章。）

- 5. 结婚并维持这段婚姻。已婚的人寿命较长；
- 6. 照顾好你自己。适度的锻炼和饮食；
- 7. 谨慎地冒险；

如果你打算至少 15 年不动用自己的投资，那就投资指数基金，即跟随

整个股市走势的基金。投资像 Vanguard 这样的基金，因为管理费用比较低。

8. 寻求平衡。

不要只是创造财富，还要建立你的声誉，偶尔为他人服务。

当我在《华尔街日报》上评论这本书时^[1]，我发现自己就是根据这些规则来生活的。它们相当有效。31 岁时，我的净资产还不足 1000 美元（我所有的财产，包括我的车）。得益于繁荣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到了接近知天命之年的时候，我的净资产已经很顺利地超过 50 万美元了。我的计划是我的这本书以及下一本书能帮助我达成净资产 100 万美元的目标。如果你不是英年早夭或者得了疑难病症的话，李和麦肯齐的这八条规则确实可以使你致富，甚至可以帮你延年益寿，免得绝症。但我发现，这些规则可以被浓缩为两条，我把它们送给了一个担心信息革命会毁了记者职业的朋友：量入而出；投资股票指数基金。

第三件帮我消除忌妒的事是经济学的语言。拿起任何一本初级经济学的教科书，你都会找到一章是讲收入分配的。收入分配就是对各种收入水平的人口数量的统计测度。但是，包括很多经济学家的人们在谈到它的时候都有些曲解，就好像是社会在“分配”收入，而人们只是被动地接受。一想到某个人在分配收入，我就想像有一辆装了一群人的卡车，后挡板被拉了下来，车上的人正在把成卷成卷的美元扔出去。如果你认为是某个人在发钱，那么你能想到的最自然的事就是每个人都应得到同样数量的钱，否则便是不公平。

[1] David R. Henderson, "The Wonders of a Penny Saved,"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0, p. A21.

我有个新鲜想法要告诉那些认为是社会在分配收入的人：没有人在分配。在自由社会里，我们的钱都是自己挣来的。社会不会在某天早上醒过来，突然决定迈克尔·乔丹打篮球一年应该得到1000万美元，为消费品做广告再得3000万美元。事实上，15年来，乔丹每个早上醒来都告诫自己要保持非常好的身体素质，他每天花几个小时进行锻炼，特别是手臂和腿，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优秀运动员。而且，数百万的篮球迷和消费品购买者也并不是被“分配”给乔丹先生的，他们不断地花更多时间在电视上看乔丹，或者花更多的钱在他所代言的产品上。这决定了乔丹的收入：不是社会分配，而是他挣来的。

所以，每当你听说最富有的20%的人的收入占了总收入的45%，或者前5%的人拥有总收入的20%的时候，请想一下它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前20%的人创造了45%的总产出，而前5%的人创造了总产出的20%。另一方面，家庭成员的数量和他们的收入之间的联系也是家庭总收入悬殊的一个重要因素。平均来说，收入前五分之一的家庭的人口是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的2.5倍。^[1]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包括许多单身母亲，其中很多人接受社会福利。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则包括大量的已婚双职工家庭，而且往往还有在工作的成年子女。

你也许会认为，我说是“分配”一词在误导人们以为是某个人在进行分配，这有点夸张了。但如果人们并没有被误导，那为什么当我们谈到政府将某些人的钱转移给另一些人时，我们会用“再分配”一词呢？如果没有人进行过第一次分配，那么政府的这种行为就应该被称为分配，再分配

[1] Cait Murphy, "Are the Rich Cleaning Up?" *Fortune*, September 4, 2000, p. 258.

里的那个“再”是从哪来的？那一定是已经错误地假设有人已经分配过财富了。当然，以为有人在进行分配是很可笑的。但是我们的语言让我们这样思考，并得出具有高度危害性的推论来。

幸运的是，对这个问题许多人有清醒的认识，尤其是那些没有受过太多正式教育也因此没有被所有美国大学教育所毒害的人。我要特别讲一件事情，这件事也是促使我搬到美国来的原因之一。1972年，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提出了一个对所有超过50万美元（用2001年美元衡量大概是250万美元）的遗产100%征税的计划，这实际上等同于完全没收。麦戈文的顾问魏尔（Gordon L. Weil）支持这个计划，他后来写道：

麦戈文对这个激进的计划感到非常满意，因为我们相信多数人都强烈反对巨额的财富继承。这个提议直接影响的只是一小部分人。^[1]

但新罕布什尔州的优秀民主党公民们，也就是麦戈文希望获得支持的那些人，却对这个提议一点也不满意。魏尔写道：

记得有一天，我在纳舒厄的拉斐特俱乐部和一群反对没收性遗产税的工人坐在一起。尽管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受到该法的影响，但他们还是认为把一个人挣来的所有钱都拿走是不公平的。麦戈文走访

[1] Gordon L. Weil, *The Long Shot: George McGovern Runs for President*, New York: W. W. Norton, 1973, p. 75.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黄金法则）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善恶有报。

不偷窃。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与人分享。

其他规则都是上述几条的变体而已。哲学家主要有两种方法来判断某件事是否公平。一种是结果公平论：不管是如何得到的，只要结果公平，那就是公平的。另一种是过程公平论：不能单独用结果的公平作判断，公平不能没有过程的公平。我把学生们给我的规则列到黑板上，根据是 E（结果公平）还是 P（过程公平）进行分类。一般来说，大概有 80% 到 90% 的规则是基于过程公平的，比如“不偷窃”。根据这条规则，不管你从别人身上偷多少钱，也不管自己是多么的缺钱，偷窃都是错的。换言之，你不必看结果如何，这正是一个严格的过程公平。为了对这两种规则进行比较，请考虑一下，有两个人，每个人都有 100 万美元。一个是通过努力工作，把产品卖给顾客赚来的。另一个则设计了一种电脑软件，从 100 万个人的银行账户里分别偷得 1 美元。这两个人中哪一个挣钱的方法是正当的？我们所有人都会说是那个诚实挣钱的人。也就是说，人们如何挣到钱，这一点非常重要。这证明了我们所有人都持有过程正义论。顺便说一句，据我所知所有的主要宗教都是如此，其中我最熟悉的是伴我成长的基督教。看看同样用于犹太教的十诫。从“不可偷盗”到“不可杀人”，都是纯过程角度的。伊斯兰教和其他所有的世界性宗教也都有类似的对偷窃和杀人的谴

责。十诫里还说，“不可贪恋他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及其他一切物品。”就像作家奥罗克（P. J. O'Rourke）所指出的，上帝把忌妒这件事看得这么重要，要放到仅有的十诫之中，这不是很有趣吗？

当大多数经济学家谈论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时，他们所持的是哪种观点呢，过程论还是结果论？他们往往是根据平等程度来判断收入分配有多么合理或“公平”的，而不是问这些人是如何获得这些收入的。简单地说，多数经济学家所持的都是纯粹的结果正义论。比如，前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公共部门经济学》一书中这么写道：

再想一想一个只有鲁宾逊和星期五两人的简单经济体系。假定一开始鲁宾逊有 10 个桔子，而星期五只有 2 个。这看上去是不公平的。因此，假设我们扮演政府的角色，把鲁宾逊的 4 个桔子转给星期五，但在这过程中会损失一个桔子。因此，最终鲁宾逊有 6 个桔子，而星期五有 5 个。这样我们就已经消除了大部分的不公平，但在这个过程中，可用的桔子数量减少了。这就是效率（可用的桔子总量）和公平之间的权衡。^[1]

请注意，斯蒂格利茨甚至不屑于告诉读者鲁宾逊和星期五是如何得到这些桔子的。他之所以不说，是因为过程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

[1] Joseph E. Stiglitz, *Economics of the Public Sector*, 3r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p. 94.

是结果。他通过说这“看上去”是不公平的而非“这是不公平的”来保护自己。但到了这一段的结尾，这层保护都没了，斯蒂格利茨直接跳出来说，不平等就是不公平。

尽管许多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完全基于平等程度来评论收入分配的合理性，但我敢打赌他们并不是这样教孩子的。他们不会对孩子的东西是挣来或是偷到的漠不关心；如何达到结果对他们来说同样非常重要，因为结果本身并不能使手段正当化。如果他们的孩子对另一个人使坏，我不相信这个孩子只要说“我这么做是因为他有钱”就能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所以，对比他们培养孩子的方法和他们发在经济学和哲学学刊上的文章，我敢打赌说，他们真正相信的是过程论。问题是这些人并不会去实践他们所鼓吹的东西，他们所鼓吹的结果正义论是非常可怕的。我希望这些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能够鼓吹他们真正在实践的东西。

在结束这个主题之前，我还得对斯蒂格利茨的书中关于收入分配的看法加以着重讨论，这看法也代表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斯蒂格利茨写道：

所以，如果我们不喜欢竞争性市场所产生的收入分配结果，我们并不需要抛弃竞争性市场机制。我们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对初始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剩下的就留给竞争性市场去做吧。

哦，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吗？斯蒂格利茨说得很轻松，就好像在黑板上画一个图表那么容易。但事实上，任何真正“重新分配初始财产”的办法都会带来一场血腥的内战。比如，许多人的主要财产就是他们的房子，他们肯定会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战。斯蒂格利茨这个身家

百万的富翁可能会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此外，只要人们发现每次“我们”（斯蒂格利茨对政府的委婉语）不喜欢收入分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干预来改变它，那人们挣钱的意愿就会小很多。而且政府一定会经常进行干预，因为就算我们实现了全面平等，市场也会打乱这种模式。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母亲生了个大胖小子，长大后他比所有的同学都要高大，他对篮球还很有天赋，在高中和大学训练自己的技术。当奥兰多魔术队雇用了他以后，即便是没钱的穷人也愿意花钱看他的比赛。这就是奥尼尔的致富之道。那些在做生意方面很有天赋的人就是这么致富的，拥有社会亟需的罕见技能的人也是一样。

自由市场会打乱既定模式。一个致力于推行平等的政府必然会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干预来阻止不平等，它的方法要么是阻止有钱人随心所欲地花钱，要么就是对超过某一水平线的收入予以没收。一个真正平等导向的政府甚至可能会尝试冯内果（Kurt Vonnegut）的一则幽默但读后难忘的小故事“哈里森·伯杰”中管制者所做的事。在那个故事里，政府用抵消人们的天赋的办法使得没有人拥有优势。身体强壮的男人不得不穿上很重的东西，这样他们就不能比别人更有力量；美丽的女人得戴上面具来隐藏她们的美貌；聪明的人得戴上电子头盔，每当他们要想问题的时候，电子头盔就会放电干扰。如果“我们”真的不喜欢自由市场带来的财富或收入分配结果，如果“我们”坚持要用政府来“纠正”市场，那最终就会出现邪恶的极权主义政府。

然而，如果是你而不是“我们”，不喜欢你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中的位置，那么就请付诸努力吧，用前面所列出的八条规则来改变你的收入和财富。

眼睛只盯着收入不平等是一个错误。如果一个国家中的收入分配或财富分配平等或接近平等，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要么没有高生产力的人，要么高生产力的人被管制和税收限制住了。不管是哪种情况，经济都会变得萎靡不振。多数美国人都在尽力地工作，因为有几百万人正在努力赚钱，创造新的产品，增加我们的生产力。给我一个收入平等的经济体，我就会让你看到它是如何地泥潭深陷。

批评家和分析家们总是在抓住数据寻找收入不平等，这并不难办到。然后，他们就想找到削弱这种不平等的办法。这个过程如果被推向逻辑上的极端，就会毁掉人类的自由和繁荣。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世界各地的政府在如何地压制人们，并找到终结这类压制的办法。请看我的朋友梅力斯 (Melese, François) 的故事。

第十章

梅力斯的故事

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用。

——老话

授人以鱼，可供三餐之需；允许他去捕鱼，拥有自己的网和船，保留捕捞的成果，不去监管他的要价，他可以终生自食其力。

——戴维·亨德森

梅力斯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与我谈论经济学最多的一个人。梅力斯成长于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的一个中上收入家庭，父亲是一个工程师，他们家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很近。1972年，在他17岁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对他后来所从事的职业和世界观影响至深。“我觉得自己需要做一些建设性的事，积极的事，”他解释道。“我看到了很多负面的事情：人们吸毒；人们有太多的钱，却不解生活的意义。拉霍亚这个地方太远离真实世界，我努力想作些贡献，但是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那一年，梅力斯和两个朋友了解到有一个叫美国人之友（Amigos de las Americas）的组织。一群医生建立了这个组织，想为拉美国家缺少基本医疗保健的人们提供服务。Amigos 计划召集优秀的美国高中学生，提供医疗和语言方面的训练，并把他们送到拉美去为当地孩子进行免疫接种，对抗那里的三大杀手——白喉，百日咳和破伤风。梅力斯和他的朋友花了整年的时间学习西班牙语，并彼此练习吊盐水。“我们彼此在身上的任何部位练习打针——手臂、肩膀、屁股，任何地方。”他大笑着回忆道。

第二个夏天，梅力斯高中毕业，他已经准备好了。在6月和7月的大部分时间，他被送到了尼加拉瓜。梅力斯来到了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当时那个地方已经在著名的独裁者苏慕萨的控制之下。数周之前刚刚发生了一场几乎把整个马那瓜毁于一旦的大地震，所以他的第一批病人是安置营里的那些在地震中失去了家园的灾民。他和其他志愿者的典型工作模式是走到一个小村庄里，花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给孩子打DPT（白喉、百日咳、破伤风混合疫苗），给十几岁的青年打DT（白喉、破伤风混合疫苗），给成年人打破伤风疫苗。然后，他们就转到另一个村庄，做同样的事情。

梅力斯在那里看到的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的世界观：“在去尼加拉瓜之前，我想成为一个医生。当我到那里之后，我发现医生不是我想从事的职

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梅力斯解释道：

我认识到问题另有原因，而医学对此无能为力。问题在于政治和经济。那儿有巨大的财富、收入和机会的不平等，我注意到还存在激励问题。丛林中的农民告诉我，他们对在苏慕萨的土地上偷偷耕种感到非常得意。我当时想，苏慕萨一个人拥有所有的土地，而这些有企业家素质的农民不得不冒着巨大的风险在他的土地上秘密耕种，这真的很古怪。在我们国家，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你有企业家才能，那你就能拥有这块土地。

我想如果人们不拥有土地，那他们就没有激励去投资。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被赶走，所以他们就满足于温饱水平而不去进行更多的生产，也不会去推销他们的玉米和大蕉（一种像香蕉一样的植物）。农民们都是偷偷摸摸地照料农地，因为士兵们会不断地进行巡逻。他们一直处在士兵的威胁之下，还不得不贿赂他们。

但至少他做得不错是吗？梅力斯说：

我曾经认为有一个救星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我发现只有我是受益者，因为那些被帮助的人都要死了。我给那些孩子们打针，但他们一年内就会死去。打针并不能使他们活得太长。那让我想哭，甚至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这件事还是难受。我们所做的是不必要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结局必然如此。我们所处理的只是症状而非病因。那儿有很多很多症状，背后一定有原因。我想了解这个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

非常高兴找到了经济学。因为我发现结局不是必然如此的。

第二年，梅力斯去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读书。“我选了生物学专业，并考虑读医学院的预科。但我并不兴奋。后来，我偶然找到了对我在尼加拉瓜所看到的现象的解答。那是我在三年级的时候上的一堂微观经济学课，也是我的第一堂经济学课程。”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学教师。我身边的每个人都在说：“救救鲸鱼。”但只有在他的课上，我第一次听到为什么鲸鱼会被滥捕的解释：因为没有人对它们有产权。那位教授非常聪明地将经济学原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我认识到产权和激励都非常重要；我认识到在尼加拉瓜，做任何生产性工作的成本都很高，因为你得送钱给别人——士兵、政府、官员等。这使得许多可以使人们超越温饱水平的生产力化为乌有。我开始找到对我在尼加拉瓜所见现象的解释。

这门课每周一次，这个500人的班级会分成许多小群体，每个群体都有一个研究生助教。我的助教非常优秀，他是个伊朗学生，为我思考问题的方法而兴奋。我不断测试我的理解力，尝试把所学的经济理论和我的个人体验联系起来。这些体验是指我的所有体验，不止在尼加拉瓜的那些。

梅力斯学过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吗？

我上了巴德汉（Prenab Bardhan）的发展经济学课程。那时，在发

展经济学家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早期，占主流的观点认为有必要在穷国建立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较新的那种观点与之针锋相对，它现在已经成为主流观点。根据这种观点，穷国所需要的是财产权、契约自由、低税收、低的政府支出和自由贸易。巴德汉就持后种观点。

1977年夏天从柏克利毕业以后，梅力斯获得了这方面的真实体验：他加入了一个公社。

我那时的女朋友叫普里西拉，她整个三年级是在西班牙度过的。她被安排去巴塞罗纳的一个农场待一个月的时间，那个农场属于一个有钱的企业家。一群人，10个左右，都是大学生或已经从大学毕业，提出了一个计划来振兴他的农场，他们打算以公社的形式运营。企业家购买家畜，提供种子，而这群人则提供劳动。普里西拉邀请我和她一起去。我答应了。

美国西北部的哈特兄弟会公社的建立原则是“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它来源于马克思的学说以及圣经中的相关段落。哈丁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人类生态学教授，他套用术语“公地的悲剧”来形容运用这类原则所产生的后果。哈丁指出，每个人都会产生卸责的倾向，因为人们得到的并非是自己所生产的全部，而只是产出的 $1/n$ ，而且这个 n 的量可能非常大。哈丁又写道，如果哈特兄弟会聚居区的人口数量有150人，“那么其成员就会倾向于贡献不足，索取过多。”少于150人的

话，兄弟会可以通过人们的羞愧之心来迫使人们努力生产。但如果超过150人，羞愧之心也无济于事。梅力斯发现羞愧可以发挥作用的数量上限很低：

那儿有一打人，可没有人肯承担责任。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而且你的工作效率如何根本无关紧要。没有人愿意做脏活。马厩已经被弃用20年，普里西拉和我把它打扫干净了。我们花了两到三天的时间来做这件苦差使。

没有人会去把鸡舍的门关上，狐狸可以任意进入，到最后我们只剩下一只鸡了。守护绵羊的是一个哲学系的学生，他最后把羊弄丢了。有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当时在吹长笛，同时脑子里产生了一些非常深奥的思想，他可不希望被打断。灾难接着灾难，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不过虽然我们在那只待了一个月，其他人还计划待得更久一点。他们并没有我们的那种紧迫感。

那个公社里没有责任两字，没有对生产的奖励，每个人的待遇都是一样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不管你是有效率还是无效率，得到的回报都一样——吃饭的时候分到一片蒜味面包。真正做了贡献的人没有得到很多回报，这也是前苏联的问题所在。^[1]

梅力斯现在在国防资源管理学院（DRMI）任教，那是美国国防部建

[1] François Melese, "A Quiet Revolu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Defense Analysis*, Vol. 4, No. 4, pp. 395~398, 1988.

立的一个组织。除了发表经济研究论文以外，他的工作就是不时在蒙特里向世界上各个穷国的中高层政府官员讲授基础的经济学理论。课堂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自由市场和产权制度能够帮助人们摆脱贫困。

他并非形单影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和其他国家大学的经济系，以及世界上的各类智囊机构都已经认识到，第三世界所最急需的是经济自由。事实上，关于政府管制如何使多数非洲国家、亚洲国家及拉美国家的人们陷入无望的贫穷之中，以及许多国家又是如何从极端的政府管制中抽身而出，走向更有希望的未来，这些故事都值得细细讲述。但与其在这儿长篇大论，我倒不如推荐大家去我的网站 [www. davidrhenderson. com](http://www.davidrhenderson.com) 浏览相关资料。

梅力斯在西班牙的公社所学到的教训同时适用于穷国和富国。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几年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开始融为一体的原因。最近40年，人们所学到的基本教训就是，增长的最大敌人就是大量的政府干预，不管是关税、价格管制、高额税收、政府的浪费性支出，还是琐碎的监管。幸运的是，在最近20年人们已经吸取了教训，并推动政府进行相应调整。它非常有效：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东亚和东南亚的贫困人口从7.17亿降到了1995年的3.46亿，在20年间下降了一半还多。就像引用这份统计数据的经济学家柯德雷（charles kadlec）所指出的：“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新加坡，从整个地区的角度来看，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1]

[1] Charles W. Kadlec, *Dow 100,000: Fact or Fiction*, New York: New York Institute of Finance, 1999, p. 162.

下一个大挑战在非洲，一个真正的恐怖故事发生地。但是，大规模地解除管制、减税、削减政府开支、解除价格管制、削减关税，这些措施一旦跟确立财产权结合起来，可以使非洲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转变成为一个相对富裕的大陆。

第十一章

市场德行与社区

差不多所有的知识分子，甚至很多商人在谈到自由市场的时候，都认为尽管它在“交货”方面非常优秀，却不能培育德行。这一点充分解释了为什么鼓吹政府管制生活的论调总是坦露其高尚的道德基准，虽然它的反面可能更接近真相。事实上，市场至少教育和鼓励了三种德行：宽容、诚实和同情。

市场教导人们宽容

“辛德勒是以错误的理由去做（拯救犹太人）的。”1994年，时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蒙代尔（Mondale）在东京犹太人联合会中心演讲时说了这番话。^[1]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的蒙代尔认为，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

[1] Paul Blustein, "Sugihara's List,"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3, 1994, p. B1.

的英雄辛德勒不如其他的犹太人拯救者那么值得赞美。他的理由是：辛德勒的最初动机是通过雇用犹太人来赚钱。但是，蒙代尔误解了自由市场。

雇用那些不被雇用就会死去的人来赚钱有什么不对？让自己生活得更好是最自然的人类动机之一。每次我问人们为什么他们觉得利益驱动是错的，他们的回答都是，这会导致不好的结果。但在辛德勒的例子中，利益驱动产生了好的结果，而且对此没有人会有异议。所以，如果你用结果来判断利益驱动究竟是对是错，那么利润在这里不就是一个非常对的动机吗？

电影的转折点出现在一个叫帕尔曼的妇女去见辛德勒的时候。她说，“他们说你是个好人，”并乞求他雇用她的父母，从纳粹手中救下他们。他拒绝了。在结束和帕尔曼的谈话以后，辛德勒愤怒地对他的会计斯特恩说：

人会死的。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他（阿曼·歌德，纳粹官员的头头）想把所有人都杀掉，那很好！我应当做什么呢？把所有人都带过来？你是这么想的吗？把他们送到辛德勒那儿来，全送过来。你不知道他的地方是个避难所吗？这不是工厂，这不是企业，这是为拉比*、孤儿和任何缺乏技能的人办的避难所。

辛德勒的愤怒来自于电影的前半部分中他所没有的挫折感。他记住了那些为他工作的犹太人的名字和容貌，他们不再只是他的收入来源而已。在这次感情大爆发以后，他吩咐别人把帕尔曼的父母从劳改营接到了自己

* 犹太传教士的称呼。——译者注

的工厂里。

之后的一幕更证实了辛德勒的转变。他在办公室里踱步，斯特恩充当打字员，输入数百位辛德勒希望从纳粹手中赎回来的人的名字。

辛德勒：有多少人？

斯特恩：850，大约。

辛德勒（心烦意乱）：什么大约，斯特恩？什么大约？数啊！到底有多少人？

换言之，对辛德勒而言，每个人都值得数——每个人都有价值；850个人和851个人是不一样的，人的生命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大转变。在电影的前半部分，辛德勒从刽子手的刀下救了斯特恩之后，恼怒地说：“如果我晚到5分钟呢？那我该怎么办呢？”他为可能失去一个会计而难过。而现在，他关心所有的工人。

一些电影批评家称辛德勒的这个转变是“难以理解的”（旧金山纪事）、“莫名其妙的”和“矛盾的”（亚特兰大宪政报）。但是，除非你把所有人都硬分成“工人”和“资本家”，否则辛德勒的人性复苏都是很容易理解的。辛德勒开始喜欢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是商业促成了这一点。差不多所有人都会关心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人，不管是雇员、雇主还是同事。事实上，我们会把从不关心任何人的同事看成是怪异、麻烦和罕见的。任何了解雇主的人都会懂得，他们最讨厌做的事就是解雇员工。

辛德勒是个英雄，他的行动非常英勇，因为他冒了巨大的风险。但他之所以会做出这种英雄行为，是因为他关心自己的雇员，这相当正常。我

们所有人都愿意冒险帮助身边的人，他们所受的威胁越大（死亡显然是最大的威胁），我们愿意承担的风险也越大。所以，尽管辛德勒的转变是英雄式的，其内在原因却很平常。自由市场创造了机会让辛德勒学着去重视别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教会辛德勒什么是道德。

如果蒙代尔和其他辛德勒的批评者真的关心德行，那他们也应当关心培育德行的社会制度。《辛德勒的名单》以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展示了这一点：雇主可能通过对抗种族主义来赚钱，并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辛德勒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消解种族歧视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自由市场。正如加里·贝克尔所揭示的，^[1]当个人享有贸易自由时，基于个人特征的歧视是有成本的，要么无助于生产力的提高，要么会损害被交易的产品的品质。人们的反应一定是减少歧视，花更少的注意力在令他们不满的种族特征上。而且，当他们意识到那些被歧视的人也是人的时候，其中一些人最终会变得根本不在乎这些差别。蒙代尔所说的“正确”理由可能做到这一点吗？

这些例子中所隐含的结论需要被强调：市场在培植宽容，政府干预却在用特定的管制形式培植偏执。你们可以在第七章中找到相关的例子。然而，宽容并不是市场能够产生而政府加以阻碍的惟一德行。

市场教导人们责任感

当我在梅西百货公司（Macy's）买了不称心的东西之后，我可以去退

[1] Gary S. Becker,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ed., 1971.

货。我这么做的时候总是很犹豫，因为我想他们可能会问我退货的理由。但有一次，一位素来注意观察企业及商业实践的聪明朋友比尔·海加建议我，下次我退东西的时候，就说，“我喜欢退货。”他说，然后你就不说话，等着，看他们是否会要求更多的细节。我试了他的建议，尽管对我来说约束自己不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是相当困难的。从那时起，我每次都使用同样的策略。偶尔，售货员也会要求我作出解释，但通常商店都会去监督自己商品的质量，而不是再三揣测我的判断力。有很少的几次，售货员质疑了我的理由，但那样的零售店往往规模相对比较小，或者售货员是新手，还没有接受雇主的训练。

商家的做法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责任感的要求。在市场的教育下，企业不仅对他们的产品负责任，同时还要满足顾客的需要。他们已经学会，如果不这样做，企业就无法维持长久。

要知道市场使私人的营利性企业负责任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可以把它们和国营企业进行比较。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比较产品类似的私人营利性企业和国营企业：美国邮政管理局和联邦快递（Federal Express）。美国邮政管理局的产品被称为邮政快递的隔夜邮递服务，它保证第二天能送到，但不能确定时间；联邦快递的产品也是隔夜邮递服务，保证可以在第二天早上9点半或下午送到，时间根据所付的服务费而定。

我从不使用邮政快递，因为别人用这种服务寄东西给我时，邮件几乎从没有在保证日到过。我使用联邦快递超过100次，从联邦快递那儿收到东西也已经几百次了。他们的晚点时间从没超过10分钟，而且也只发生过几次而已。

几年以前，在他们的广告中，美国邮政管理局吹牛说他们的准时记录超过了90%。想一想吧，联邦快递顶多迟到10分钟，而美国邮政管理局所说的不到10%有可能是晚一天或更多；而且，如果邮政快递晚了，你不妨试试走走政府迷宫去要求退款。

为什么在责任度上会有这样大的差异呢？这正是因为私营企业有很强的营利动机，而国营企业这方面的动机却很少。为邮政快递工作的人做得好并不能赚到更多的钱，但联邦快递可以。因此，联邦快递会通过奖优惩劣的方式让工人有兴趣把工作做好；可如果邮政总局局长着手改善邮政服务的效率，相关利益既不会给他，也不会送到所谓的股东们手上。

此外，如果我和一个私人企业发生冲突，我可以向企业的所有者投诉。如果我和一个国营组织发生冲突，我能找谁呢？

我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时候，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Douglass North）是我的同事。诺斯写过很多文章，指出当多数参与人都是陌生人，且他们之间的交易为一次性的时候，市场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诺斯写道：

在一个由非人格交易刻画的有着巨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高科技世界里，从交易中获利的经济潜力是非常少的。因为一个人既没有重复交易的必要，也不认识其他人，而且也不是跟一小部分人做生意。^[1]

[1]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2. Reprin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但根据我自己以及所认识的人的经验，一般来说市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利用声誉机制。

就在从圣·路易斯搬回加州蒙特里之前，我告诉诺斯，我开着汽车周游全国时，每一次买汽油、吃饭、住旅馆都会是陌生人和我之间的一次性交易。而且，因为我在路上，所以不会有时间在当地逗留，把那个欺骗我的人告上法庭。所以，根据他的理论，应当会出现一些相当棘手的问题，我应当担心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但是，我告诉他，我从不担心汽油中混进了水，食物已经变质，或者住进了一间很脏的房子。事实证明我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即使是面对最严格的考试——旅行中的陌生人之间的一次性交易，市场也能顺利过关。

市场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呢？品牌以及不能撤销的对声誉的相关投资是核心，因为如果生产者不顾质量，投资和声誉都有毁于一旦的危险。我只买大厂家出产的汽油，去 Taco Bell 和 Denny's 那样的全国连锁快餐店吃饭，住经过美国汽车协会认证的汽车旅馆。事实上，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开车开到太晚，没能住进 3A 级的旅馆，所以我住进了一家没有评级的汽车旅馆。那儿有很大的差别：家具很破旧，电话没有使用说明，而且之前住进来的大学生已经把房子折腾了一遍。尽管如此，情况还不算太糟。加热器、沐浴器和电视都能用，床还是很舒服的。这是一个没有品牌也没经认证的企业，主要顾客是陌生人，即使如此，它们也存在一些激励去提供某种最低水平的服务。

市场培育责任，政府不会。

市场：产生财富，培育同情和慈善

就像弗里德曼夫妇所指出的，^[1]美国慈善行为最大幅度的增长出现在19世纪，这一阶段同时也是实际收入稳定递增的时期。许多美国最著名的慈善机构，比如美国禁止虐待动物协会、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青年妇女协会、印第安人权利协会、救世军，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由卡内基捐助的遍及美国城乡的公立图书馆也出现在那个时候。这种慈善行为的增长不能用慈善行为可以减免税来解释，因为那时并没有这样的税收制度。美国的固定所得税是直到1913年第16条宪法修正案通过以后才实施的。事实是，人们的收入越高，捐赠也就越多，这是很简单的常识。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的，帮助他人的冲动非常普遍，尤其是在人们亲身体会的情况下。

人们通常会说，如果政府制定政策将资源从高收入人群转移给低收入人群，那这个社会是较有道德的。再想一想这种观念吧。要断言一个社会的道德程度，你必须对社会成员的一般道德水平有个判断。是什么让每个人有道德呢？那只能是每个人出于自愿的道德行动。我不会因为我所处社会的其他成员有道德而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也不会因为我的政府强制性地把我的东西给了别人而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我的道德是我自己的而非其他人行动的函数，与我受强迫所做的事更是无关。就像弥尔顿（John

[1]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0, pp. 36~37.

Milton) 所写的,^[1]“如果一个成年人的行动,不论其善恶,乃出于命令的怂恿及强制的压力,那么所谓美德难道不只是一空名吗?而所谓严肃认真、公正和节制,难道还具有丝毫意义吗?”

此外,政府转移财富的一个明显后果是使我们大多数人都变得更没同情心。政府的转移系统强迫雇主代扣所得税,这给了“办公室捐赠”^[2]一个全新的含义。不仅在办公室里,因为有销售税、公司税和关税,我们在所有购物的地方都要被迫捐赠。

在圣诞节的时候,许多人都喜欢看改编自狄更斯小说的电影《小气财神》。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是西姆(Alastair Sim)演的。圣诞鬼魂告知斯克鲁齐,他的狭隘自私是怎样使他丧失了爱和朋友。圣诞鬼魂还跟他说,除非作出改变,否则他死的时候将无人哀悼。斯克鲁齐醒来之后,意识到自己能够作出改变。我最喜欢的一幕是斯克鲁齐穿着他的睡衣像孩子一样在糖果店里跳舞。这改变是什么?难道他会说:“哦,孩子,现在我会支持那个向我和比我还穷的人课税来帮助穷人的政治家。”当然不是。这样做的电影制片人不可能让电影这么成功。斯克鲁齐兴奋是因为他现在就能改变, he 可以从帮助境况不好的人中获得快乐。

经济学家总是说,人们施舍得太少是因为他们总是指望别人去施

[1] John Milton, *Aeropagitica*, (“Everyman” ed. [London, 1927]), p. 18, 引自 F.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p. 79。(中译引自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94页。)

[2] Donald McCloskey, “Bourgeois Virtue,” *The American Scholar*, 63: 2 (Spring 1994), p. 187.

舍。^[1]思路是这样的：你帮助了某个人，所以我不用去帮了。也就是说，尽管我认为这个人值得帮助，但我没有足够的激励亲自去帮助这个人，因为你已经为我做了。换言之，我对你的努力“搭便车”。如果有很多人沿着这个思路走，那么就算他们认为有些人值得帮助，也不会去帮助他们。最后的结果是：慈善行为太少了。

这个看法或许是正确的，但它遗漏了赠予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动机。如果你帮助了某个我没有帮助的人，我当然可以因此不必再去帮助。但是如果我不帮助他们，那我的所得不会和你一样多，因为我没有把困难解决掉的感觉，我没有那种改变别人生活的快乐和深度满足感。简单地说，我因此错过了人之为人的一种重要体验。

我这么说不是出于假设，而是基于真实而痛苦的经历。由于各种原因，我的家庭并不怎么教育我要帮助他人，所以在借钱方面我并不是一个大方的人。结婚生子之后，看到妻子和年轻的女儿在这方面和我完全不一样，我也渐渐懂得了什么是慷慨。我在前面选《小气财神》作为例子并不是随意的，几年前，当我第10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终于理解了，我理解了这并不只是一部让你在圣诞节热泪盈眶的电影：《小气财神》道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和斯克鲁齐一样从吝啬中走了出来，而且我发现当我说反正别人（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会照顾穷人的时候，自己的错失有多么大。事实上，现代的小气鬼已经不再问，“不是有监狱吗？不是有救济院吗？”而是改问：“不是有公共医疗补助吗？不是有社会保障

[1] Larry L. Orr, "Income Transfers as a Public Good: An Application to AFDC,"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6 (June 1976), pp. 359~371; and Mark V. Pauly, "Income Redistribution as a Local Public Good,"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2 (February 1973), pp. 35~38.

制度吗？”

在教科书中，经济学家通常会这么写：政府是用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外部性的意思是，当人们以某种方式行事的时候，其效应可能影响到那些他们认为无关的人。但事实是，人们会通过教导和实践德行的方式将可能会出现的外部性内部化。我的经济学家朋友沃森（Harry Watson）就曾说过，“为了使社会交往能够进行下去，人们需要将外部性进行自动内部化（self-internalize）。”

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可以说明经济学家所宣称的理性行为和我们内心所真正相信的东西之间存在多么大的鸿沟。在去 UCLA 读研究生之前，我已经读了塔洛克、布坎南和唐斯的论文与著作。他们证明了单个人的投票行为影响选举结果的概率接近于零，因此它的预期价值小于成本。所以，他们总结道，就算是在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中，你个人的任何投票行为都是无意义的。那时正在进行的 1972 年总统选举对这个观点作了清楚的说明，因为尼克松总统痛击了另一个候选人麦戈文（George McGovern）。

在 UCLA 的那个秋天，我和另一个刚入学的研究生进行了一场长而热烈的辩论。我用塔洛克的例子向他说明为什么投票是无意义的。他理解我的观点，但没有被说服。他说：“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这么做，整个制度就会崩溃。”“错，”我说。“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都不去投票，恰恰就是你应当投票的时候啊。”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辩论，谁都没有说服谁。现在我会承认自己当时绝不会承认的事情：我想说服他的部分原因是那时我刚从加拿大过来，没有合法投票权，我忌妒他。三年以后，我听说他自称现在已经领悟了 UCLA 的思考方式，他意识到我是对的而他

是错的。我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想的，但我现在却认为他是对的而我是错的。

他清楚地说出了他惯用的那种思维方式，其实也是我们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不会仅仅计算自己的福利。我们也不会估计行为对其他人福利的影响，因为这样做太难了，而且经常是不可能估计的。但我们的确会这样问自己：“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呢？”

如果你有孩子，你会教导他们偷东西是错的，或者在没有征得他人同意的情况不应当使用别人的东西。我打赌你会这么说：“如果尊尼偷了你的自行车你会怎么想？”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因为我们想让自己的孩子合群，要让他们意识到其他人的价值。用我的良师益友克兰西·斯密非常喜欢征引的一个康德的陈述：其他人也是“自为目的”（ends in themselves）的。用这样的策略，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以身作则，我们就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好人。

但是请想一想，为什么我们想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好人？如果我们完全接受经济学家关于搭便车问题的模型，那么我们就应该教育自己的孩子，只要利用别人的成本低于收益（我是在非常狭隘的意义上使用“成本”这个词），就可以去做。^[1]但我碰到过无数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个是这么教育孩子的。或者说的确遇到过一个，但是为了他和他的孩子，我希望他只是在开玩笑。我知道有一个经济学家，当他发现服务员算错账的时候，他告诉儿子不要指出来，这样就能少付点钱。人总是难免有例外，但

[1] Jennifer Roback, *Love & Economics: Why the Laissez-Faire Family Doesn't Work*, Dallas: Spence Publishing, 2001, 该书对这些思想作了广泛和深刻的描绘。

是总体上看，经济学家培养孩子的方式和非经济学家们一模一样：我们传授德行，并以身作则。

我为什么要看10遍《小气财神》才能纠正我的行为？我相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父亲的影响。尽管他在很多方面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但在帮助别人方面，他并非榜样。（幸运的是，通过他的财务记录我发现，在生命的最后20年他变成了一个慷慨的人。祝福他。）我清楚地记得一次和他离开餐馆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小箱子，可以把零钱放进去帮助一个叫“紫心”的组织。我拿出一个两角五分的硬币，准备把它投进去。父亲看见了，用紧张的声音告诉我不一定要这么做。我知道我不一定要这么做，但他让我觉得这么做是不正确的，所以我把硬币又放回了口袋。从那时起，每当我准备捐钱给慈善组织时，我就会为自己放弃了某些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感到羞愧。那并不是说我不捐了，但是我确实捐赠得不多。

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非常希望自己成为社区的真正成员。1966年春天，某天早上，我的几个高中同学非常疲惫地来到学校。他们在前一天晚上骑车到一个叫莫里斯的隔壁小镇，整个晚上都在那里堆沙包，保护村庄不受里德河洪水泛滥之害。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但没有人来问我要不要去。回想起来，人们之所以没有问我，是因为我的父亲不像其他人的父亲一样与社区经常联系。我觉得很受伤。

这种因为没有机会去帮助别人而带来的挫败感本应当使我更早看穿经济学家们的花言巧语，但实际上，我到了后半生才识破这些伎俩。多数经济学家的观念是，当你去帮助某人的时候，那个被帮助的人是惟一的受益者。他们完全忽视了帮助者自身的收益：那种做善事的美好感觉。人类互相帮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非常想这样做。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公共品

概念远远比不上人们的信念那么有力。如果看到一个人得到帮助，就算你没有从中出力，也会感到欣慰，但你所错失的是帮助他人并感到自己真正投入的那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社区总是可以如此有效地处理问题，不论是组织大家清理海滩和公园，还是为一个需要做昂贵手术的邻居小孩筹集数万美元。

有句非洲谚语很好地表达了社区的重要性，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养一个孩子需要集全村之力。”我自己长大的两个小镇都给我类似的印象。孩子不（经常）毁坏或偷其他人的东西，是因为如果我们这么做了，闲话很快就会传到父母耳中。我不会忘记自己8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接到一个本地店主的电话。店主让父亲到店里去，因为他逮住了我11岁的哥哥在店里行窃。说实话我也这么干过。父亲当时的惩罚方式是叫我哥哥去每个他偷过的小店，当着店主的面承认错误，并赔偿相应的损失（用我父亲的钱）。看到这些，我下定决心不再偷东西了。我的哥哥当然也是如此。

现在有许多人嘲笑“集全村之力”这句话，因为希拉里·克林顿用它做了她最近写的一本书的书名。但她的书扭曲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她不是提倡通过社区和村庄生活来培养孩子，而是主张让更多的政府官员来干涉人们的家庭生活。希拉里这本书更准确的题目应该是“集整个政府之力”。但那样的话，谁愿意去买她的书呢？所以一定要澄清我们的语言，不要因为她的扭曲让我们拒绝这样一个完美的观念：社区居民强烈的自愿服务意识能够对其他人产生巨大的积极效应，包括对孩子。

自由培育社区

我在里根政府工作的两年半时间里，对生活在华盛顿特区感到最痛恨的一件事，就是那里几乎所有人“呼吸、住和吃”的都是政府的。在所有的美国人中，华盛顿人是最难理解社区重要性的，因为有那么多人在为这个国家最严厉的反社区组织而工作。这个组织就是联邦政府。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少觉得和我的邻居们有什么瓜葛可言，他们中很多人的冷漠态度是我在其他住过的社区里从未见过的。有一句流行语不是没有道理：“如果你想在华盛顿有一个朋友，弄条狗吧。”

尽管如此，我还是记得我曾经和一些华盛顿人一起度过一个非常棒的晚上。那是在一场暴风雪中，就在交通高峰时刻，大雪在路上结成冰，通往波托马克的道路出现了巨大的交通阻塞。在桥上，我看见一辆车陷到了冰里，轮子在空转。我走出自己的车，跑过去推那辆车，让它能重新开动。司机从窗户中探出头来感谢我，就在那一刻，我觉得在彼此之间发生了我在这个城市从未有过的联系感。

相对别人而言，我很晚才明白社区及彼此帮助的重要性，但在经济学上，我已经不是新手了。经济学对于什么使社区繁荣，又是什么会破坏社区的问题已经有过很多分析。美国在福利制度的实施范围上不如欧洲，但人们却比欧洲人更为慷慨，这不是很有趣吗？尽管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经常看不起美国人的粗鲁和天真，但它对美国人的慷慨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国人平均每年捐赠超过一星期的薪水给慈善机构，是世界上比

例最高的。此外，这个国家有一半的人从事义工，平均每星期超过四个小时。^[1]

这篇文章同时指出，与通常认为美国人把他们年迈的父母送到疗养院的陈词滥调相反，“只有 5.4% 年过 65 岁的人住在疗养院里，比 10 年前要少。”《经济学家》指出，这个比例要比多数富裕国家低。此外，10 个无行为能力的老人中有 8 个并不待在疗养院系统里，95% 有精神障碍的人仍然和亲戚们住在一起。

为什么美国比其他富裕国家展现出更多的社区感和更大的慷慨程度？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不像多数其他国家的政府那样需要对人们生活各方面负责，这给社区的发展和社区为成员提供支持留下了空间。人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希望感到自己的重要性，而当政府接管了这项工作以后，愿意施加援手的人经常会发现他们的帮助是多余和无用的。1989 年加利福尼亚大地震之后，我筹集了钱去为沃森维尔的孩子买尿布，但很快我就发现联邦政府已经发放了政府基金。我马上有一种被欺骗和自己很多余的感觉。我在想，他妈的全能的混蛋，用武力抢走我们的钱，不让我们选择如何帮助那些地震的牺牲者，也不让我们选择帮助多少。

经济学家已经发现政府援助“排挤”了私人的慈善行为。拉塞尔·罗伯茨（Russell Roberts）是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魏登堡中心的经济学家，他指出，当联邦政府在 1930 年代早期进行福利分配的时候，私人慈善的数量就减少了。在 1929 年到 1932 年之间，随着大萧条的日益恶

[1] “Holding together, better than most,” *The Economist*, February 22, 1997, pp. 28~29.

化，私人慈善的数量从1929年的1030万美元上升到了1930年的1090万美元，再到1931年的5570万美元，1932年的7160万美元。但是当政府救济的增长超过一定程度时，私人支出又下降了。到1935年，政府救济的支出超过了1932年的三倍，而私人支出则只是过去的五分之一。人们并没有停止捐赠，但开始转向那些政府没有插手的地方。比如，纽约提高穷人地位协会（AICP）始建于1843年，该组织致力于捐赠资源给“穷人、失业者、病人、老人和没有丈夫的母亲”。^[1]在1932年，AICP 54%的支出捐给穷人，46%投放在其他事务上；而到了1938年，在联邦政府确立了自己作为首席“捐赠者”的地位之后，AICP的支出中就只有29%是面向穷人的了。

社区的出现

社区的出现对我们来说绝对是福音。托克维尔在1830年就指出，美国人的一个主要美德就是，他们非常倾向于构建自发的组织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不需要任何政府政策来构建社区，它们就这么出现了。政府所需要做的事情只是走到一边去，让我们能够建设和培养自己的社区。

[1] Russell D. Roberts, "A Positive Model of Private Charity and Public Transfer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2, No. 1, February 1984, p. 143.

第十二章

华盛顿之旅

社会是因需要而产生，依邪恶而治理。

——托马斯·潘恩，《常识》

在1981年12月到1982年8月之间，我曾担任美国助理劳工部长高根（John Cogan）的特别助手，他对美国劳工部政策立场的影响力极大。之后，从1982年8月到1984年7月，我担任了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事实上，我在与白宫隔一个车道的老行政大楼里工作。当人们说他们在白宫工作时，他们一般都是指那个老行政大楼：那是伊朗门（Iran-Contra）丑闻的始作俑者奥立弗·诺斯（Oliver North）*的工作

* 发生在美国80年代中期的政治丑闻，指里根政府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一事被揭露后造成的严重政治危机。奥立弗·诺斯是当时国家安全顾问的助手，实际安排处理军售案的人。——译者注

场所，也是著名的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温斯基工作的地方。

一天，我和一些同事谈天，其中有一位是白宫学者（White House fellow；每年担任白宫学者的名额有10人左右。在华盛顿，这被看作是一份好工作）。他已经受邀给一个高中生团体讲解华盛顿的运作方式。他狡黠地笑着对我们说，“但愿我能告诉他们这里的真正运作情况，这肯定跟他们在公民课上所听到的不一样。”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我疑惑地问自己。这样做的话，不仅对高中生，而且对那些没有在华盛顿的高层工作或者以为肥皂剧如《白宫风云》就是现实的人而言，也一定是相当有启发意义的。所以，下面我将根据在华盛顿那几年的经历，加上与许多政府官员的交谈，在阅读了大量关于华盛顿政府是如何运作的著作之后，给你们一些新的介绍。

令人震惊！

1973年夏天，我在经济顾问委员会做实习生，那时的总统是尼克松。我提前了几个月做申请，虽然我的教授们写了推荐信支持我，其中两位却对我要在水门丑闻的高峰时期跑去白宫大加讽刺。有一个教授说，多数老鼠的做法是离开沉船，但我却是一只跑进沉船的老鼠。他们的态度让我觉得很孤独。后来，我明白他们的态度不是针对我的，而是要表达对尼克松的蔑视。

但那时我感到很脆弱，教授们不支持我，银行里也没多少钱。我用最后几百美元买了去华盛顿特区的机票，启程了。在一次漫长的午夜飞行之后，我终于到了华盛顿市区。我刚下出租车，扭头看见了老行政大楼（OEOP），我震惊地看到 OEOP 前有一面巨大的画着镰刀和锤子的红旗。

也许是时差反应，也许是因为我在飞机上只睡了不到一个小时，在一瞬间我感到了一种绝对恐怖，以为苏联在午夜接管了华盛顿。但我看到周围的人都表现得很正常，驱散了以为电影《天外魔花》真实上演的妄想，意识到这件事其实并未发生。当我坐在 OEOB 的休息室前排等候通过特工情报人员的审查时，我问一个工作人员为什么那儿有苏联的旗帜。他用我后来在华盛顿每天都能在任何地方听到的那种专横自负的腔调说道，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要访问白宫，这是为了欢迎他。我想，原来这是某种欢迎，不知道其他类似的人会不会受到同等的欢迎。在那个夏天的早些时候，我找到了答案。伊朗国王访美期间，一面巨大的绿色伊朗旗帜飘扬在老行政大楼的前方。我和许多部长和经济学家谈论这件事情时，他们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也许只是我脑中的天外魔花而已。但总之，我在华盛顿第一天所得到的印象是，这是个奇怪的地方。

1973 年夏天另一件让我震惊的事情是：用经济学理性来指导经济政策的情况是如此之少。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价格管制。在 1971 年 8 月，尼克松对自己以前所陈述的观点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宣布对美国的全部工资和价格实施 90 天的冻结。他在后面又追加了各种“程度”的价格管制，所以在我 1973 年 6 月到达华盛顿的时候，美国经济的许多部门仍处于价格管制之下。你不用上很多经济学课程就可以了解到，多数经济学家是反对价格管制的，包括对房租的管制在内。价格管制用所谓的最高限价方法使价格无法升到一定水平之上，这样就会使供给者调低商品的质量和其他方面的服务，以便在暗中提高商品的实际价格。另外，如果供给者不调低商品的质量，那他就会减少商品的供给；当买主发现价格较低，就会产生更多的需求，受管制的商品就会出现短缺。二战期间实行了价格管制

的商品都出现过这种现象，比如尼龙、轮胎、汽油、糖和肉等。在尼克松推行价格管制的几个月之后，整个经济都出现了短缺。那年的早些时候，汽油开始供应不足。当时 OPEC 几乎把原油价格提到原来的四倍，但尼克松的价格管制却不允许汽油价格跟着涨。结果到处都是排得长长的队和愤怒的开车人。

我的顾问生涯

我很想知道，在享有盛誉的经济顾问委员会里任职的经济学家们对他们的大老板要实施的价格管制到底有什么看法。这可不是无聊的好奇心。因为虽然这份工作让我领略了政府的经济政策，但我可不想成为支持价格管制的一个小卒子。所以就在上班第一天，我在 OEOP 的三楼到处乱逛，看门上写着的经济学家们的名字。我不断搜索记忆中与这些名字相关的各种信息。一个名字跳了出来：罗伯特·托利森（Robert Tollison），我在很多关于“公共选择”的论文上看到过这个名字。“公共选择”是布坎南和塔洛克创立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它假定政府官员就像其他人一样，是以自利为基础采取行动的。我敲开了门，看到一个 29 岁、样子很友善的人。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在经过半个小时的交谈之后，我想我至少可以对他讲些实话了。所以我告诉他，我认为政府的价格管制是场滑稽戏。我发现他的观点和我一样，担心要实施的粮食价格管制反而会让一些人得不到食物；然后我又告诉他，政府的价格管制政策非常不道德，我可不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告诉我他也有同感，而且在顾问委员会也可以做些好事，没必要卷入到价格管制中去。当我问到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时，他说出了一些有意思的和另一些不那么有意思的事情，没有一件跟价格管制

有关。我问他是否可以和他一起工作，他说他会看看能为此做些什么。

第二天早上，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帕珀金（Joel Popkin）给了我一张填有数字的表格，这些数字表明了形成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所有项目中各种食物的权重。他想让我把这些权重加起来，看看 CPI 中食物所占的比例。不是一项很难的任务，是吗？一个只有小学 5 年级数学水平的人就能做出来，而我已经拿到学士学位了。你会认为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易如反掌，那你想错了。

我在心底知道帕珀金要用这些数字来干什么：尼克松政府准备开展下一阶段的价格管制，其中有一些人想推动对食物价格的严厉管制。我走到一边去算那些数字，几分钟后把结果给了帕珀金。他说我的数字不可能是对的，并给了清楚的理由。所以我又算了一遍，得出了一个不同的数字。帕珀金恼怒地否决了我的第二次计算，指出这个数字也不可能是正确的。他又对了。我还从没做过这么差的计算呢，我想是因为我实在太讨厌价格管制了，这让我连简单的算术也做不出来。从某些人的眼光看，这意味着作为分析员我是失败的。也许这是对的，但我也认为自己因此成了一个更成功的人。

那天晚些时候，我有些羞愧地告诉托利森，我连个加法也没做对。他轻声地笑起来，并预言帕珀金在整个夏天都不会来找我了。托利森是对的。

后来我发现，我对帕珀金的感觉是正确的。作为一个强调集结市场（aggregates）而非个体市场的宏观经济学家，他支持对食物进行价格管制。他希望控制通货膨胀，而且认为如果获得了控制通货膨胀的方法，就是好事一件。通过控制构成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各项要素的价格，你就可以使通货膨胀看上去下降。我记得经济学家德姆塞茨在三年前就曾说过，这就好

像你觉得外面太冷了，然后用打碎温度计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区别在于，打碎温度计并不会改变温度，但实施价格管制却会引起食物短缺。

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价格管制是个会引起食物短缺的坏政策，但令我非常失望的是，其中一些人最后还是为价格管制而辩护。委员会主席赫伯·斯坦（Herb Stein）是个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老板。但他推动实施严厉的价格管制，并公开为此辩护。作为回报，他以总统待遇去戴维营度了一次周末。后来托利森跟我听说了一个好的笑话：斯坦从白宫回来之后，粗鲁地抱怨那天他们没有牛排可吃，因为供给者不肯接受管制价格。但这些并没有让他拒绝和尼克松政府在价格管制方面进行合作。

斯坦的儿子本·斯坦是喜剧频道的名角，第一流的喜剧演员，这看来是有遗传的。那个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委员成员玛丽娜·冯·诺伊曼·惠特曼（著名的数学家冯·诺伊曼的女儿）要离开了，在新行政大楼会有一个为她准备的盛大晚会。各色名流都参加了这个晚会，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恩斯（Arthur Burns）和财政部长舒尔茨（George Shultz），作为经济学家他们都心知肚明价格管制会伤害经济，但却依然为它辩护。那个夏天，水门听证会已经全力展开，几周以前人们就知道：首先，白宫的许多谈话都被录音了；然后，水门委员会要的几盘录音带已经失踪了。在庆祝会上，斯坦宣布“失踪的白宫录音带”已经找到，而且他准备播放其中的选段。他打开录音机，播放的是一个滑稽短剧，由斯坦编剧。斯坦扮演他自己，一个叫施奈德（Margaret Snyder）的人扮演玛丽娜，另一个委员会成员西维尔（Gary Seaver）扮演尼克松。其中一段到现在我都没忘掉：

尼克松：斯坦，通货膨胀又上升了。我们应当怎么办？

斯坦：让我问一问我们的新成员玛丽娜。玛丽娜，我们应当怎么办？

玛丽娜：实施价格管制。

尼克松：但是我们已经实施了价格管制。

玛丽娜：那么就废除价格管制。

包括伯恩斯和舒尔茨在内，大家都哄然大笑。我也大笑。单独来看这很有趣，但同时我也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不舒服。斯坦取笑了尼克松、价格管制、玛丽娜和他自己，而且他明知价格管制会带来很大的损失。事实上，它引起了能源危机，让人们排几个小时的长队买汽油，和平的市场竞争没有了，在取而代之的暴力竞争中，某些不满的人甚至可能去杀人。现在，大约30年以后，我们仍然生活在某些相同的管制之下，比如汽车的燃料经济标准，它从一开始就是政府为应付自己造成的能源短缺而提出来的。我至今仍然对那次晚会上的事感到厌恶：一个成年人，不去与自己明知会造成巨大危险的事物进行抗争，却只采用取笑的方法。

那个夏天的早些时候，我做了身为一个22岁的实习生所能做的事，来反对价格管制。哈佛教授、制定价格管制政策的生活成本委员会主管邓洛普（John Dunlop）邀请了在华盛顿的哈佛学生参加一个圆桌讨论。一个哈佛的朋友把我带上了，我问了邓洛普一些苛刻的问题，态度温和但是异常坚持，最后他恼羞成怒，开始敲桌子。我只能做到这些了。

在那个夏天之初，我就有了一种想法，我曾希望那不是真的；到了那个夏末，我已经很确定了。而现在，我已经贴身观察了政府整整20年，我绝对肯定这是真的：政府官员根本不关心我们。他们有巨大的权力，能

用这种权力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不可思议的破坏，但只要这些破坏不会让他们失去工作或进监狱，他们就不会放在心上。那个夏天让我看得很清楚，造成巨大损失的政策制定者不会失去工作或进监狱，他们甚至不会被罚款。要是尼克松不在1972年试图掩盖一项入室行窃，或者他虽然试图进行掩盖但没有对自己的谈话录音并保存下来，那他仍然可以继续待在他的位子上。即使尼克松能顺利结束自己的任期，他的价格管制政策对美国经济所造成的数十亿美元损失也根本不会对他追究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当托利森和我听说斯坦那天吃不到牛排的时候，我们会为此欢呼：没吃到牛排只是斯坦因为支持价格管制所承受的很小成本。而斯坦还算是政府官员中一个比较有勇气的人。

这并不是说政府中就没有好人了，政府里同时有好人和坏人。我在那个夏天收获的为数不多的惊喜之一，后来在政府的经历也证明了的一点是，两个政府工作人员里大概会有一个工作很努力。要知道，以前我认为四个人里面才有一个。但这并不总是好事，因为政府里的某些人在努力地管制人们的生活，并努力地花他们的钱。当然许多政府工作人员的确相信他们正在做的和要努力去做的事真的是好事。

那个夏天的另一个惊喜是，在整个政府部门里，我有许多自由主义的盟友。当托利森在7月初离开的时候，他说服斯坦让我暂代他的高级经济学家的位置（当然没有头衔），直到8月末他的继任者到来。所以后来我参加了解除货车运输管制的会议，并因此找到了很多在财政部、运输部、司法部跟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任职的盟友。顺便说一句，赫伯·斯坦本不希望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他认为解除管制这件事是不可能成功的。我觉得他可能错了，所以努力说服他让委员会保留这个议题。当然，5年以后，在

卡特总统的任期内，解除汽车运输的管制成为了现实。没有委员会的参与它可能也会发生，但我们永远也无法证实这样的假设了。

某些白宫人员一贯主张回缩（scale back）政府，其中之一就是弗拉纳根（Peter Flanagan），他后来去了纽约，成为了一名成功的投资商。之所以提到他的名字，是因为在1970年代末参加某个会议时，我听到某人引用拉尔夫·内德的话，说弗拉纳根是政府里最危险的人之一。我在白宫做实习生的时候看过一份备忘录，里面记录着弗拉纳根曾主张解除许多行业的管制，并详细解释了理由。1990年代初，我在胡佛研究院的会议上碰到了弗拉纳根，他在会上讲述了他用自己和其他捐助者的钱为穷孩子提供私立学校奖学金的事。当我转述内德的话给他听时，他笑得非常开心。

联邦官僚制中的无名英雄

在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的那个夏天，我在委员会里遇到了一位叫朗·霍夫曼（Ron Hoffman）的高级经济学家。他短矮身材，看上去很像是达斯汀·霍夫曼的兄弟；事实上，他就是达斯汀的兄弟。那个夏天，当移民归化局（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找我麻烦的时候，霍夫曼帮我找到了一个好律师。后来，在他转到财政部以后，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时候拜访过他几次。霍夫曼给我讲了1970年代末卡特政府中发生的一场内部争斗。那时，卫生、教育、福利部的部长卡利法诺（Joseph Califano）计划对医疗保健支出进行严格管制，这是希拉里·克林顿1993年所提出的方案的早期版本。霍夫曼的工作级别要比财政部长布鲁门索尔（Michael Blumenthal）低好几级，他分析了卡利法诺的提

案，发现这是一个坏方案，于是强烈要求布鲁门索尔应当对提案表示反对。布鲁门索尔被说服了，他让霍夫曼以他的名义负责这个议题的各种备忘录。霍夫曼告诉我，他和舒尔茨经济顾问委员会中的一位经济学家及林恩（James Lynn）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另一位经济学家组成了三驾马车。他们的备忘录总是署着布鲁门索尔、舒尔茨、林恩的名字，后来以迈克、吉姆和查理备忘录闻名于世。他们成功了。卡利法诺的管制没有付诸实施，这个国家至少有好几年不用担心医疗保健部门被扼杀了。

我在华盛顿的时候，碰到了许多像他这样的人。他们从没有被公众注意过，但他们为纳税者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金钱，并致力于拖延或阻止那些束缚人们自由的新措施。

头号公众敌人

1980年代早期我窝在劳工部的时候，发现了华盛顿另一桩奇怪的事情——“公众”的概念。当我想到公众的时候，脑子里浮现出的是这个国家里占人口多数的纳税劳动者，从最低收入的工人到最高收入的企业CEO，但那些在政府工作的人而言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很奇怪的，比如在劳工部，公众就是那些代表工会化企业的各种贸易协会，以及坐在离劳工部主建筑只有几百英尺之遥的办公室里的工会代表们。这种视角非常狭隘。例如，当政府官员讨论公众对某些会提高生产成本的法律会有什么反应的时候，他们所谈论的是那些已经接触过他们或者有可能接触他们的那些“公众的成员”，这些“公众的成员”几乎总是代表着受影响行业的所有雇主或雇员。公众从来不是那些不得不付更高的价格购买产品的消费

者，除非产品的主要买主是一家大型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也许会听到企业的抱怨，因为它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公众”的一部分。

公众就是企图对政府政策进行游说的各色玩家，这个事实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我曾经疑惑为什么越南战争结束后税收并未下调。现在我明白了，因为在华盛顿，任何人都看不到纳税者的需要。除了“全国纳税人联盟”要求更宽松的经济之外，几乎没有人为纳税者说话。对华盛顿的各色利益团体而言，结束越南战争所省下的钱是一笔“额外收入”，他们能够实际上也的确轻松地把这些钱花掉了。同样的，即使不减税或只是轻微地减税，那我们当前的财政盈余也不会存在太久：它总会被花掉的。*

前些年，鉴于美国国税局（IRS）过去对纳税者态度的不良记录，我很惊讶地发现国会议员和国税局官员开始谈论如何使国税局更好地对待“顾客”。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我在想“国税局的顾客”是什么意思。UPS的顾客是指想付钱寄包裹的人，通用的顾客是指想买一辆汽车或卡车的人。换言之，通常的顾客概念是指那些自愿掏出钱来换取商品或服务的人。但我可不是自愿付钱给美国国税局的。我付钱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失去自己的资产，还可能被关进监狱。所以我怎么会是国税局的顾客呢？如果我真的是顾客，那谢谢了，我宁愿跟别人做生意。把纳税者叫做国税局的顾客，这就像把小鸡叫做鸡蛋商的顾客一样。

根据我在华盛顿的亲身体验以及30年来对政府政策的跟踪研究，我还有其他发现。当你听到“政府低效”一词的时候，通常所想到的是政府做某件事所花的成本与私人部门（企业、个人、非营利组织）做同样的事

* “当前”指的是20世纪末克林顿执政的后几年，那时美国出现了较大的财政盈余。——译者注

所花的成本之间的比较。政府的成本的确要比私人部门高，对此经济学家在 30 年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证据。蓝十字（Blue Cross）和政府保险索赔过程的对比^[1]、私人和政府在垃圾处理的成本上的对比^[2]、私人和政府在消防上的对比^[3]，这是经济学家所作的三个最有名的比较研究。尽管这些比较是真实和重要的，可还是遗漏了政府所创造的一种主要的无效率。

是什么呢？让我用山姆·佩金法（Sam Peckinpah）的电影《赌命鸳鸯》（*Getaway*）来作类比。史蒂夫和阿里带着从银行偷来的钱开始逃亡，他们同时要躲开警察和想要黑吃黑的坏家伙。在逃跑的过程中，麦奎因和麦格劳至少毁坏了三辆汽车和一部旅馆电梯，在旅馆的墙上射出好多洞，还搞了许多大型破坏。用今天的美元计算，这些损失的总价值要超过 50000 美元。但他们什么损失也没承担，事实上他们所损坏的财富跟他们毫不相关，因为他们的行动没有破坏“他们自己的”财富；他们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破坏了别人的财产。

政府的行为跟电影中的角色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罪犯所做的事往往高度相似：他们破坏财富，只为了达到自己的狭隘目标。拿美国政府来说，政府不时地买下农作物然后将它们毁掉，只是为了达到提高农民收入的狭隘目标，农业经济学家已经证明这样的行动会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你只要认识到政府所毁坏的农作物对那些愿意买它们的人来说是有价值的，那

[1]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0, 1975, p. A1.

[2] E. S. Savas, "Public vs. Private Refuse Collec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Evidence," *Urban Analysis* 6, 1979, pp. 1~13.

[3] Roger S. Ahlbrandt, Jr., "Efficiency in the Provision of Fire Services," *Public Choice* 18, Fall 1973, pp. 1~15.

么不需要做复杂的经济分析就能得出相同的结论。那些被毁坏了的价值没有流向农场主、纳税者和任何人。它就是消失了。同样的，当警察破门而入把房子搜个底朝天来找非法毒品的时候，他们制造了很多无需负责的赌命鸳鸯式破坏。

通常，经济学家给经济概念取的名称都很糟糕。但针对这种破坏，他们想出了一个好名字——“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这就像史蒂夫和阿里在逃跑的时候弄坏别人的汽车一样。同时，就好像罪犯在逃命的时候不会去关心是否破坏了别人的财产一样，那些游说政府要求管制的农场主和把管制变成法律的政客都不会为这些管制给消费者和纳税者带来的损失负责。

我们可以找到数千例政府所引起的“无谓损失”。举两个例子。在1970年代，为了保住美国钢铁工人的工作，美国政府决定对钢铁进口实施限制。不管是推动实施这项计划的政府官员，还是对此进行游说的钢铁企业经理和工人，他们都没有想过这个计划对钢铁购买者的可能伤害。他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一点？毕竟，被毁掉的财富又不是他们的。在这个计划被执行以后，经济学家估计，通过限制钢铁进口保留一个工作岗位，消费者要为此承担75万美元的成本，^[1]而且并不是一次性75万美元，是每年75万美元。那时候，一个普通的钢铁工人的工资加福利大概是4万美元一年，所以政府实际上在破坏75万美元的财富去创造4万美元的价值。就连这都夸大了钢铁工人的收益。保住一个钢铁工人的工作所获得的真实

[1] Gary C. Hufbauer, Diane T. Berliner, and Kimberly A. Elliott, *Trade Prot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31 Case Studies*, 1986.

收益应该是他作为钢铁工人所赚的钱和他的第二选择所能赚的钱之间的差异。如果一个钢铁工人去做其他工作每年能挣 2.5 万美元，那些从限制进口中所能得到的收益就不是 4 万美元，而只是 1.5 万美元。所以，保留一个工作所造成的财富净损失是每年 73.5 万美元。

还有一个例子。政府常常阻止人们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财产，比如，尽管你已经付了邮箱的钱，但却不能合法地让 UPS、联邦快递或当地的报社塞任何东西到你的邮箱里。政府这样做只是为了达到一个狭隘的目标，即维护自己在邮政行业的垄断权。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律，这个邮箱的价值本来要更高一些。当政府卷入的时候，这种破坏会出现得非常普遍，因为根据法律，政府对它所造成的破坏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在私人部门里，在处理私人财产的时候，这种破坏要少得多。因为除了罪犯，没有人有激励去制造破坏，而所有其他人都要为他们自己所作的破坏负责任。比如，在私人部门里，人们不会去干预你所创造的机会，你当然也不会。为了钱想这么做的人（除了政府的代表以外）会被称为罪犯。政府和罪犯之间有一个主要的区别，这个区别可能跟你以前想的不一样：因为政府能够合法地破坏财富，所以他们破坏财富的数量级要高于罪犯。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政府：政府是那种很差的父母，一意孤行，而且从来没注意到我们已经长成大人。我们在一生中有许多想做的事做不了，因为政府说我们不能这么做，比如开车不系安全带，偶尔抽支大麻烟，或者买不包括怀孕事项的低费用保险（联邦法律要求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必须包括怀孕福利）。政府说我们不能做这些决定，因为我们无法做出好的决定。它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我们，而且是非常小的孩子。政府嘲笑我们，在我们整个生活历程里干涉和威胁我们。对多数人而言，这种

生活从我们踏入幼儿园的时候开始，在我们高中毕业后有一点放松，然后在剩下的日子里政府就一天一天地侵蚀我们。后来我们也变得习以为常了，好像生活就是如此。最近《焦点暗访》（Candid Camera）的一个故事提醒了我政府到底有多么无耻。在那个故事里，一名服务员对点了鱼的顾客说不能把鱼提供给他们，因为这对他们身体不好。然后，她把她们认为对他们有益的东西送了上来。人们被激怒了。许多人捍卫自己点菜的权利，并愤怒地走掉。这是我所见过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捍卫自己权利的最生动的例子。事实上，这个故事里的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感觉：“这名服务员凭什么对我说我能点些什么，我能吃些什么，以及我应该怎么花钱吃饭。”

政府一贯的行为就像那名服务员。政府经常以非常令人讨厌的方式干涉跟它无关的事情：它阻止我们买可能看上去有一点瑕疵但绝对安全的便宜桔子；它现在还试图操纵规则，让我们只能吃到加工过的美国乳酪。就像我已故的朋友蔡尔思（Roy Childs）所指出的，政府不可思议的卑劣，只要我们做的事和某些政府官员所想的有一点不一样，它就会以罚款甚至监禁相威胁。政府甚至例行公事地为我们决定人生大事，从我们如何为退休储蓄到我们能为自己的房子做哪些改动，再到我们可以服用哪种处方药。大体上，政府是个对它所管制的领域一窍不通的门外汉，而且对你自己的目标、利益、能力或意图一无所知，多数政府官员甚至根本不关心这些事。政府就像那位服务员，根本的区别只在于：这位服务员是个演员，她的“受害者”能够轻易地离开餐馆；而政府则是无处不在的，只要我们在国家里，它就会不断管制我们。

孟德斯鸠在一本美国宪法的草创者们曾详加阅读的书中写道：“那些

精神恍惚，为国王掌管国家大事的人（minister），常常把自己渺小灵魂的需要当作国家的需要。”^[1]在这句引文中所指的“人”^{*}可不是牧师，而是那些政府高官。事实上，孟德斯鸠还是说得太宽容了。国会把向我们强制征收可怕的“退休金”的计划称作社会保障，但这些国会议员可从没骗自己说他们也需要这个。他们给了自己一个更甜美的特别退休计划，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每年超过10万美元的养老金。猜一猜是谁付了这些钱？

肯尼迪总统从没试过要停止美国政府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但这不妨碍他做许多美国人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抽非法的古巴雪茄。阿拉巴马的参议员谢尔比（Richard Shelby）说他支持打一场毒品战，即使非暴力的毒品罪犯也要被判终生监禁，但这并不妨碍他帮助自己走私毒品的儿子逃脱监狱之灾，仅仅只是付了500美元的罚款。例子可以一直这样举下去。国会和政府官员的很多需要和我们一样，他们只是不希望我们也拥有这些；如果我们想要拥有这些东西的话，他们就要把我们关进监狱。

第一次华盛顿之旅给我的一个小小惊讶是，作为消费者，政府工作人员的需要和其他人一样。我本不应当惊讶的。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政府官员想要的东西和我们是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的私人部门也运作得很好，而且比起其他任何政府部门来，效率都更高。我所找到的最好的华盛顿博物馆游览指南不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制作的昂贵小册子，而是印在一张比萨店广告的背面。相对来说，华盛顿的出租车受管制不大，并没

[1]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 Vol. 1, Bk. 13, ch. 1, p. 255, 1751.（中译文来自《论法的精神》，2001，陕西人民出版社，孙立坚、孙丕强、樊瑞庆译。）

* Minister 有牧师的意思，所以作者才讲了这句话。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中译本译为“人”，未作改动。——译者注

有那种使纽约的出租车费用变得很高的出租车运营屏障。这是因为：管制者（国会）也是消费者，当他们用管制可以帮助消费者这种鬼话来欺骗别人的时候，他们可不会欺骗自己。

去过华盛顿的人经常会说，那里的老建筑和雕塑是多么美丽，我同意这一点。但是老联邦贸易委员会建筑前面的一尊美丽雕塑透露了另一些信息。这尊雕塑是一个男人在约束一匹可能就要失控的马。这个男人代表着政府，这匹马代表着事务。这尊雕塑概括了政府官员是如何思考的，他们思考的不仅是关于他们与事务的关系，同时也是他们与我们的关系。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如果不约束我们，我们就会不受控制。从字面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对的：我们确实将不受他们的控制，但现在已经真正不受控制的却是政府官员。

在华盛顿的亲身体验以及 30 年来对政府政策的研究，还让我了解到其他三件事情。首先，用来解释为什么政府工作如此之差的“公共地悲剧”的概念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今天的普遍观念是，如果有一个许多人都关心的问题，那么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让政府来作决定，花纳税人的钱来执行这个决定。许多人反对这种“一刀切”的方法，这当然也对，但它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大的问题是政府从我们手中拿走的钱现在成了公共的，而我们则必须借助我们的民意代表以彼此竞争的办法来获得“我们的份额”。毫不奇怪，公共的东西因此会被过度使用和滥用。考虑一下这个场景：假定有 100 万人都拥有花园，我们现在不能用自己的钱来维护花园，而是被迫将钱交给政府，由它来决定应当如何把钱花在我们的花园上。很荒谬吧！我们都知道多数花园不会被养护得像以前那么好，而且我们许多人所承担的税收要比自己养护花园的成本来得更高。但是不知道为

什么，当人们在考虑医疗保健、教育或其他政府事务的时候，想法却变得不一样了。

我所了解到的第二件事是政府的规模已经有多么庞大。我第一次在老行政大楼工作的时候，看到了这方面的一手资料。因为好奇，我作了些调查，结果发现在20世纪初的时候，不但是邮政局，几乎整个联邦政府的人都住在老行政大楼里。事实上，我那有着美丽门把手的办公室在60年前是一些高级海军官员的工作场所，甚至罗斯福在任海军助理部长的时候用的可能也是这个办公室。在整个20世纪，联邦政府所占的GDP比重从3%上升到了20%，由于同时期GDP增长了大概20倍，这就是说联邦政府大概扩张了120倍的样子。你也许会想政府在某些时候扩张，而在另一些时候是缩小的。但事实上，扩大的速度可能有时快有时慢，但从没缩小过。惟一的一个例外是在二战结束之后，但也没回复到战前的水平。

在华盛顿，我开始慢慢理解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一言以概之：缺少激励。假定你是一个政治家或官僚，力图取消各种支出项目或管制。或者，你的目标并非如此，但是看到身边有许多破坏性的项目，所以想终结或削减这些项目和管制。马上，你就会碰到许多从这些项目中受益的反对者。就算坏项目也有受益者，比如那些领取补助金的人，在管制下减少竞争的企业，或者管理补助金、强制执行管制的官僚机构。里根在1982年提出要减少州就业服务部门的补助金之后，整个政府所收到的信全都是这些机构寄来的反对削减的投诉。不幸的是，那些受益者，如纳税人或消费者，却没有提出多少支持，因为平均起来每个人所得到的收益太少了。在上面提到的这个例子中，里根政府没有收到一封纳税者寄来的支持信，说：“大胆地干吧，削减就业服务补助金。”如果没有支持你的声音，听到

的都是反对声，那你往往会失败。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规模不会缩减只会扩大的原因。总是在找事情做的政客和官僚是受欢迎的；利益集团努力争取他们的小特权，支持他们的政客和官僚也可以受到他们的支持。而且，管理补助金或强制执行管制的官僚机构一般就是利益集团。除非政府非常坚定地决心要削减政府项目，不然就往往会中途放弃。“顽固”的人，像我，往往会在几年后离开；不顽固的人留了下来。你要想理解政府“做些事情”的激励有多强，仔细看看下面这个故事。

大概在1986年，我在华盛顿见到了一些原来在里根政府时就认识的经济学家。其中一位在所有问题上的看法有90%我都是赞同的。几个月前，大学篮球明星林白诗刚和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签约，就因过量服用可卡因而死。里根总统对此感到很难过，然后他宣布要更严厉地推行毒品战。经济学家一般都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这种方法往往使问题变得更难以收拾，迫使毒品进入地下流通市场，推高毒品的价格，导致更多犯罪。基于这位经济学家以前对我所表达的观点，我以为她会反对这场毒品战，但是她强烈地支持毒品战和里根的行动。她给我看了她所写的备忘录，在那里她用经济学家所称的“市场失灵”来支持毒品战。她在备忘录中所说的失灵主要是指滥用毒品的人会丧失生产力，但包括她在内的经济学家通常都认为人们所得到的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会大致相应。所以，因毒品而丧失生产力的人所获得的支付也少了，因此他们自身就承担了生产力丧失所带来的成本；这里并没有什么市场失灵。我用这个论点和她讨论，因为她是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她对支持这个论点的数据了若指掌。但她并没有用数据做答。她的回答与其说是一名经济学家的回答，不如说是她帮助老

板里根辩护的一种方法。她的语调有点绝望，好像她已经厌倦了对自己本想说“是”的那些增加政府管制的提议说“不”。所以，就算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对政府计划持合理怀疑主义态度的人也会有强烈的激励，不惜对抗自己的知识也要支持已经破产的政府计划。

我所了解到的第三点是，自由与安全之间的所谓权衡通常是不存在的。我经常听到许多人，甚至包括那些政治立场和我相同的人都会说，如果你愿意承担风险，那一般就更倾向于自由市场和经济自由；但如果你喜欢安全，就更可能以经济自由为代价来支持政府计划。潜台词是政府减少了风险，增加了安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的做法实际上是用高风险来取代低风险。

以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为例。FDA 的管制让我们不能自由选择使用哪种药品，制造商也不能自由选择发展和生产哪种药品。作为回报，我们本应该拥有更安全和有效的药品。显然这才是自由与安全之间的权衡。但事实上，FDA 的管制阻碍了许多潜在药物的发展，反而使风险变得更大了。怎么解释？FDA 的管制延长了药品开发过程的测试时间，所以今天发现的药物可能在 1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都无法上市。近来发现的一种药物可能会逆转老年痴呆症的症状发展，想想看这对里根夫妇来说是多好的消息啊！但里根永远都无法获得这种药物。多么好心的 FDA！高额的测试费用推高了整个药物开发的成本，据估计，现在开发一种新药的平均成本大概是 5 亿美元。了解这一点的药物企业管理层们会倾向于把力量集中在可能有巨大市场的药物上，这样才能补偿他们的前期成本。这就使得治疗罕见疾病的新药变得很少，因为研制这种药收益太少。一位研究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估计，通过将人们本来能够使用的新有效药

排除出市场，FDA 的管制每年至少造成 5 万未成年人的死亡。^[1]

你也许会想，我们至少从 FDA 的管制中获得了某种安全，因为通过严格测试的药物会比较可靠。但这点福利就算在 FDA 不剥夺我们任何自由的情况下，我们也能通过市场得到。想像一下，如果我们消灭 FDA 对新药物的垄断权力，将管制机构转变成认证机构（certification agency）。FDA 甚至可以继续坚持下面的措施：如果一种药品还没有被鉴定，药瓶上必须用大号字体标注警告：“FDA 还没有核准该药品可供人类使用。”如果我们都相信 FDA 是非常好的认证者，而且没有经过他们验证的任何药品都是不安全的，我们就会拒绝服用任何不经 FDA 认证的药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既获得了自由，也没有丧失任何安全。

不过这种情况现在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买车之前我们都会阅读杂志并咨询朋友，为什么在购买药品之前我们就不会这么做呢？事实上，我们多数人现在就在服用 FDA 还没有核准的药品，医生以“药品标签外”使用的方式开那些药给我们。医生、各种期刊以及其他认证机构，这些都是我们的认证者。而且，取消 FDA 对新药物的垄断权力，我们中的许多人以及许多我们的医生，就会去相信其他认证机构，包括欧洲药物评审局（EMA）和其他私人认证机构，诸如美国药典（USP），美国医院药典服务（AHFS）药物信息，或者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只要我们被允许忽视 FDA 的观点，能够被允许信任其他认证机构，那就是用自己的行动在说话：我们认为在多元化的信息来源下，大家会生活得更好。

[1] Daniel B. Klein, “Economist Against the FDA,” *Ideas on Liberty*, September 2000, pp. 18~21.

大彩票

事实上大政府就是大彩票。你在所有的彩票中都会吃亏，所有的奖金加起来肯定少于参加者所付的金额总和。非常讽刺的是，很多希望政府禁止或者限制彩票生意的人却在鼓吹大政府，不知道后者正是彩票之王。在“大政府彩票”和典型的机会游戏（game of chance）之间存在一个基本的区别：在机会游戏中，玩家们自己选择去玩；而在大政府彩票中，每个人是不得不去玩。本杰明·福兰克林曾经说：“不惜牺牲自由以图苟安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配获得安全。”是的，他们什么也得不到。

第十三章

终结课税

在这个国家，为自由而展开的伟大斗争最初主要来自对课税的质疑。

——爱德蒙·柏克^[1]

克林顿总统说卡尔维里是他们当中惟一赚钱赚到最高税级的人，所以他也是惟一要缴增加的那部分税的人……克林顿把卡尔维里弄到自己的大总统办公室，掏他的口袋……当时大概有 20 个人围在桌子旁边，看着克林顿把手放进卡尔维里的后袋里，看这位极受欢迎的总统敲诈有钱人……

克林顿最终从卡尔维里的裤子后袋里拿出了钱包。里面有 80 美元现金。总统抽出一张 20 美元的钞票在大总统办公室里扔来扔去，这象征着对财富重新分配的方案。

——鲍伯·伍德沃德

《议程：克林顿白宫内幕》，1994^{*}

[1] Edmund Burke, "speech to the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 March 22, 1775, *Burke Selected Works*, vol. 1, *Thoughts on the Present Discontents, Two Speeches on America*, ed., E. J. Payne (Oxford, 1881), pp. 178~189.

* Bob Woodward, *The Agenda: Inside the Clinton White House*, 1994. ——译者注

我从16岁开始就在经济上独立了，这个独立并不是成了“富人”的委婉语，就是指字面意义上的自力更生。当我开始读大学的时候，父亲把他为我上大学存的所有钱都给了我，这些钱大概可以支撑我在温尼伯大学一年多一点的生活，再加上奖学金、我的储蓄以及我在两年的暑期工作中所挣的钱，我大概就能自立了。到第二学年末的时候，大概还剩下50元钱的样子，所以我沿路搭车去加拿大的一个北部城市汤普森，那里是马尼托巴的镍矿开发中心。我的计划是在矿里或就在矿的周围找一份有合适工资的工作，拼命地加班，然后带着足够我最后一年大学开销的钱回家。我很快找到了一份工作，是金刚石钻探工的“助手”，每小时工资3元（超过以2001年货币计算的15元每小时），然后拼命超时工作。但是，我所挣的钱却被政府拿走了很大一笔。

接下来的冬天，我第一次填报所得税表，事实上这是个很简单的表格。我开始填表格，但越填越生气，最后不得不停下来。在填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在求政府把从我身上拿走的钱还给我。是我挣了这些钱，不是他们！我只好让哥哥帮我把表格填完了，然后签上名。我想要回这些钱，但我不喜欢以政府所规定的游戏方式要回这些钱。

2000年9月当我读到一则关于维纳斯·威廉姆斯的新闻的时候，又想起了这件事。威廉姆斯小姐以19岁的年纪赢得了美国公开赛冠军，拿到了一张80万美元的支票。克林顿总统打电话向她表示祝贺，威廉姆斯小姐向《洛杉矶时报》的记者重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

他说，“你真的非常努力。”我说，“是的，我工作很努力，而且我

希望能一直保持下去。我是个好公民。但你能让我少缴些税吗？”^[1]

当时克林顿厚着脸皮说他对此无能为力。他真的是无能为力吗？在1993年他可不是这么想的，那时就是他提出并签署了增税法案，并在它开始执行后大吹大擂，也正是这次增税让威廉姆斯小姐不得不从80万美元中拿出超过8万美元来交税。总统在税收方面向来有很大的权力。如果他决定撤销自己1993年的增税法案，肯定会得到足够多的共和党人投票赞成，于是他又能够像自己以前决定征税一样再把它们削减掉。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哗众取宠，但克林顿的确在撒谎。也许威廉姆斯小姐对这段历史有点了解，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她接着又问克林顿，她是否可以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当你还年轻的时候挣到些钱，一个庞大的匿名组织就会跑过来，没有征得你的同意便把钱拿走，这让人非常吃惊。我相信这就是威廉姆斯小姐的感受，也许在她16岁刚开始正式挣钱的时候，这种感受曾经更强烈。

我向周遭的成年人抱怨课税问题的时候，多数人会回答说我不应该抱怨，因为这些税收是要花到我们的大学教育上的。我立即承认这一点，然后指出我会很高兴放弃政府对我的教育补助以及其他任何东西，只要让我别缴税。但是没有人会给我这个机会。

当某个委员会在温尼伯大学开会决定是否要增加对大学教育的补助的时候，18岁的我正准备去汤普森工作，临行前我向委员会递交了一份书

[1] J. A. Adande, "Venus' Open Title a Hand-Me-Down,"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10, 2000, p. D1.

面声明。声明主要参考了 UCLA 的经济学家阿尔奇安的一篇论文，至今仍认为这篇论文可以列入我所读过的经济学论文中最具洞识的十篇之一。^[1]在文章中阿尔奇安指出，对高等教育的补助是穷人对富人的补助，因为几乎所有受益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富人，因为他们的未来收入都比不读大学的人更高。所以，我要告诉政府不要补助我。

后来，我发现所得税是惟一一种各国政府都征收的税。部分出于个人观察，部分出于我对公共财政的研究——这是经济学的一门学科，可以细致地分析税收政策，我还发现我们的行为或多或少受到了避税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我们总是倾向于贷款买更大的房子，因为这样可以扣除抵押利息。大多数美国人都由雇主来支付健康保险，因为这样雇主就可以支付给雇员免税收入。英国曾经对窗户课税。政府注意到有大窗户的人一般都更富裕，因此决定对窗户课税。结果，许多人把他们的窗户封上，而且人们在建造新房的时候会尽量少建些窗户。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学生听，那些学生多数是军官，游历甚广，他们记起欧洲一些国家的房子里没有储藏室，人们用便携式橱柜取而代之。这是因为那些国家的政府根据房子的房间数来课税，而储藏室算作一个单独的房间。一个学生说，在有些欧洲国家，房子就像保龄球道，又长又窄。他询问后发现，这是因为当地政府会根据房子临街正面的面积来课税。另一个学生说在亚洲的某个国家，很少有人拥有已完工的房子，人们住的房子似乎永远在建造之中，因为政府向已完工的房子所征的税远高于未

[1] Armen Alchia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of Free Tuition," *New Individualist Review*, 1968, Vol. 5, No. 1, pp. 42~52, reprinted in Armen Alchian, *Economic Forces at Work*,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77.

完工的房子。

所得税还会给刚进入婚姻状态的美国夫妇一个非常恐怖的惊吓。为什么？因为在美国，已婚夫妇是根据两人合并的收入而非按单独的个人收入课税的。由于税率是分等级的，也就是说收入越高，你就进入了更高税收等级，这样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称此为“婚姻罚款”了吧。就算你是在该年最后一天结的婚，也得像已经结婚一年那样缴所得税。结果，那些了解这种税收制度的人为了回避“惩罚”，通常会等到新年才结婚。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经济学家斯特鲁普（Richard Stroup）讲述了“婚姻罚款”是如何使他和他的未来妻子简熬到新年才共结连理。这是比较有趣的情形，不那么有趣的情形是，一些人为了避免这种婚姻带来的惩罚，选择了同居而不是结婚。

所得税制度也让我们有激励将收入从一个税收年度转移到另一个税收年度。许多自由工作者常用的办法是说服他们的客户，在一月初才把上年最后几个星期的薪水付给他们。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推迟到第二年才缴税。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经常把它发挥到极致，将整年的收入都放到第二年的1月1日。有趣的是，希拉里·克林顿在阿肯色州罗斯律师事务所的时候一直使用这种标准办法，但在1992年12月，也就是她丈夫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她改变了这个传统。那一年，她不再等到第二年1月1日，而是在12月就拿走当月薪水，提前1年缴税。^[1]为什么她会这么做？有两个非常充分的理由。首先，她的丈夫在担任州长时的收入很低，这就可以保

[1] Charles R. Babcock, " Clintons Pay \$70, 228 in Tax on Income of \$290, 697 Last Year," *Washington Post*, April 16, 1993, p. A13.

证她在 1992 年的高收入会被征以低税率。但她知道总统的收入是 20 万美元，也就是说如果等到 1993 年 1 月 1 日，她的收入将会被征以高税率。这个理由已经足以让她这么做了，但可能还有第二个理由：她也许已经有了内部信息，知道她的丈夫计划大幅度提高对高收入人群的税率，她也明白增税会追溯到 1993 年 1 月 1 日。所以，如果在 1992 年缴税，希拉里·克林顿需要以 31% 的税率缴税；如果她把收入留到 1993 年，税率就会从 31% 大幅度提高到 39.6%。

每种税都会迫使我们寻找减少税收负担的方式，因此扭曲我们的行为。欧洲的高汽油税让人们选择较小的因此也就较不安全的汽车。当英国对投资收入征收最高税率为 98% 的所得税时，除了利润极高的行业，人们很少会进行投资。比如，某人投资 10 万美元在一个回报率为 20% 的项目，他的计划是挣 2 万美元一年，但却只能保留微不足道的 400 美元。如果他拿那 10 万美元去买一辆劳斯莱斯，不包括车的折旧的话，他的每年资本成本只有 400 美元。怪不得英国有那么多人在开劳斯莱斯。顺便提一下，当披头士乐队在 1960 年代中期开始挣大钱的时候，他们被迫要和高税率打交道。毫无疑问，他们同时要缴最高等级的收入所得税（税率“只”有 83%）和投资所得税。并不奇怪，披头士把他们的失望写进了“收税员”（*Taxman*）一歌中，对税率作了还算精准的描述。在歌词里，收税员是这么说的：

让我告诉你结果会如何，

1 份留给你，19 份归我。

当时，高税率使他们写下这首歌；后来，则迫使他们离开了英国。

本章开头所引柏克的话更具一般意义：与自由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是抵制课税。这就是戈黛登夫人（Lady Godiva）裸骑在马背上、英国大宪章、威廉·退尔向他儿子头上的苹果开枪、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以及梭罗的“论公民不服从”等事迹的共同之处。

戈黛登夫人。在13世纪的英国，戈黛登伯爵夫人想劝说她的丈夫退回他向考文垂所征收的重税。为了把她吓倒，伯爵答应如果她赤裸着骑马走遍整个市镇，他就答应退税。猜猜如何？税收被豁免了，而直到现在，考文垂的庆典游行仍会重演戈黛登夫人当年的勇敢举动。^[1]

大宪章。约翰王的兄弟狮心王理查被绑架，为了凑出赎金，约翰王提高了现有的税率，并打算征收新税。英国的男爵们不喜欢他这样做，于伦米尼德平原大战一场，强迫他签署了大宪章。其中的关键一条是“设无全国公意许可，将不征收任何免役税与贡金”。换言之，没有人民的公意许可，约翰就不能征收新税或提高税收。^[2]要是美国政府也遵循大宪章的规定，肯定会是件好事。

威廉·退尔。在13世纪对抗奥地利政府课税的斗争中，威廉·退尔是瑞士抗税者的领袖。他拒绝承认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收税的权力，作为惩罚，他被迫向他儿子头上的苹果射箭。这件事成功点燃了税收革命，持续了几十年并最终取得胜利。瑞士步兵联盟虽然在数量上差不多只是对手

[1] Charles Adams, *For Good and Evil: the Impact of Taxes on the Course of Civilization*, London: Madison Books, 1993, p. 153.

[2] Adams, *For Good and Evil*, pp. 156~158.

的十分之一，却成功击败了奥地利军队。在今天的瑞士，没有全体公民投票表示允许，政府仍然不能增税。^[1]

第四修正案。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写道：“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与剥夺之权利不得侵犯。且除非依据宣誓或代誓宣告证明之一定理由，并开列所须搜查地点与所须扣押之个人与物品者外，不得颁发拘捕扣押状。”*

如果你研究了高等法院最近 40 年的判例，你也许会想制定第四条修正案的惟一目的恐怕只是使警察更难抓住谋杀犯、强奸犯和窃贼。那你就错了。建国之父们将第四条修正案放到《权利法案》里，是因为他们对“协助令”深恶痛绝。英国的海关官员使用协助会在 13 个殖民地搜查走私物品。只要有这个令状，不需要法院命令就能进行搜索。建国之父们希望限制联邦政府在没有出示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搜查被怀疑逃税人的房屋和档案的权力。当然，建国之父们失败了。今天，美国国税局的员工可以很方便地要求银行提供人们的银行记录，甚至在没有提出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查封人们的银行账户。^[2]

梭罗。梭罗写过一篇著名的评论文章：“论公民不服从”。这篇文章是梭罗入狱之后写的，他在文中争辩道，在某些确定的情况下，违反压迫性的法律是正当的。但他所指的是什么法律？他是因什么而入狱的？通常的回答是他入狱是为了抵制课税，因为税收会花在墨西哥与美国的战争上。对我来说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了，虽然它并不是梭罗的理由。梭罗拒绝缴的

[1] Adams, *For Good and Evil*, p. 179.

* 中译引自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第 466 页。——译者注

[2] Adams, *For Good and Evil*, p. 296.

是人头税，而且他并不是因为税收的用途而拒绝缴纳。他拒绝缴纳是因为该税背后的原则，梭罗写道：

我并非由于税单上的某个特别项目而拒绝缴纳。我只是希望拒绝向州政府效忠，隐遁起来并离它远远的。^[1]

课税的本质

为什么戈黛登夫人、英国的男爵、威廉·退尔、建国之父们，以及亨利·梭罗，所有这些人都反对课税呢？因为他们明白，课税的本质就是合法的偷窃。当政府向你课税的时候，它等于不经同意就拿走了你所拥有的东西。这不就是小偷的行径吗？区别只在于，小偷违反了法律，而政府取走你的钱（通常）是合法的。有趣的是，就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担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也曾将课税与偷窃做类比。他写道：

强迫的转移（课税）跟偷窃相比，一个主要的区别是：尽管两者都是非自愿的转移，但通过政府进行转移在行政过程中获得了授权，披着合法与值得尊敬的外衣。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时候，这个区别最多

[1] From Henry D. Thoreau, *Walden and 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 ed. William Rossi,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p. 241. (该文中译本可参见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16～38页。)

只能说是模糊的。^[1]

不是说还有另一个主要区别吗？据说小偷取走钱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政府取走钱是用于对你有利的事。但我必须指出，并非总是如此。政府经常把大量的钱花在对纳税人无益的事情上。比如，我付了加州的物业税、销售税以及所得税，这些税收有许多流向了加利福尼亚的公立学校，但我已经把女儿送到了私立学校，我没有从这些税收中获得任何好处。其次，关键还不是政府是否把这些钱花到你身上。想像一下，有个人拿枪抢走了你的钱，用你的钱买了块牛排，然后把牛排送到你家。你会说他没有偷你的东西吗？我不这么认为。他取走了你的钱并为你决定什么对你是最好的，而不是让你选择怎么花自己的钱，这同样是偷窃。

很多人知道课税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他们总是使用别的更委婉的词来称呼“课税”这回事。当罗斯福引入薪资税来建立社会保障的时候，他从不称此为薪资税，他称之为“捐税”，甚至还把它写入了法律。这就是为什么看薪资明细表的时候，你会发现联邦政府向你征的巨额税收名称简写为 FICA，FICA 的意思是《联邦保险捐税法》（Feder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Act）。当政客们主张提高征税时，他们从不说他们想强迫你拿出更多；他们说他们在“请求”你拿出更多。如果这还是“请求”的话，那“要求”会恐怖成什么样子？在 1999 年末，我住的镇上通过了一个提高物业税来建立学校债券的方案。一个支持者想要解释为什么人们投票支持发

[1] Joseph E. Stiglitz, *Economics of the Public Sector*,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1988, p. 385.

行债券，说道，“人们更愿意打开他们的钱包了。”^[1]但这种语言是严重的误导。当人们打开钱包的时候，他们是要自愿地买或捐赠一些东西。课税的本质则是一些人投票来强制性地打开另一些人（通常包括他们自己）的钱包。所以，一个关于人们为什么投票支持增税的更准确描述是：人们更愿意打开（挑选？）其他人的口袋了。请注意语言上的差异：使用误导性语言，税收这回事听起来就像是一种慷慨的给予；但当使用精确的描述语言时，我们就会发现，这就好像一些人用强烈的武力在对付另一些人。

我们应当有税吗？

课税就像偷窃。这一概念看上去已经足够支持我们终结课税的要求了。如果这样的话，那本章就可以到此结束。但我发现自己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课税就是偷窃；另一方面，政府如果不向我们征税以维持收支，我感到另一个政府就会进行接管，它会比现在的政府更差地对待我们。在冷战期间，经济学家戴维·弗里德曼写道，他宁愿缴税给华盛顿而不是莫斯科，因为税率更低。^[2]一些自由至上主义者争辩道，和政府相比，我们人民可以用更好和花费更少的方式保护国家。我并不认为他们一定是错的，但我也不敢确定他们是对的。比较清楚的是联邦政府可以用低于2000亿美元的钱，或者说不到GDP的2%来保卫美国。那样的话，如果所有收入都依赖征税的话，税率也就不过是3%左右（为什么是3%而不是2%？因为课税的依据是国民收入而非GDP，而国民收入一般是GDP

[1] Alex Friedrich, "Why Bonds Passed," *Monterey Herald*, November 4, 1999, p. A1.

[2] David Friedman, *The Machinery of Freedo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p. 197.

的 75%。因此，GDP 的 2% 大致相当于国民收入的 3%）。我不想冒险为了逃避 3% 的税收而毁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当然，美国现在已经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受到威胁了。但是，征收国民收入的 3%^{*} 作为税收来避免出现概率不高但悲剧性的危险并不算多。

所以，这一章的剩余部分就建立在以下假设之上，即联邦政府需要相当于 GDP 的 2% 的收入。顺利指出，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联邦政府的花费就一直成功地维持在 2.5%~3% 以下。

如何杀死一只青蛙

人们说如果你将一只青蛙扔到一罐沸水中，那青蛙就会跳出来，但如果你将青蛙扔到冷水中慢慢加热，青蛙就会一直待在水中直到被烫死。我们纳税者就像那只青蛙。想像一下，如果我们今天的情形就像 1913 年以前一样：没有个人所得税，没有社会保障税，没有公司所得税，没有遗产税，再假设前 40 年也一直是如此。忽然，政府决定以今天的税率征税，所得税率从 15% 到 39.6%，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税率大约是你收入中“首个”8 万美元的 15.3%，公司税是 34%，如果你的房子价值超过 70 万美元，遗产税率在 35% 到 55% 之间。于是，你突然就要面对政府要拿走你的收入的三分之一这个事实。你认为你和你的同胞们会坐在那里忍气吞声吗？可能不会。我们之所以现在能够忍受同样的状况，就是因为它是在超过 80 年的时间里被渐渐推行的。

煮沸一只青蛙和提高纳税人的税率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差别：煮青蛙的

* 原文为“GDP 的 3%”，疑有误，改为“国民收入的 3%”。——译者注

时候，你不太可能向那只青蛙保证和其他青蛙的煮法不一样；但当政府提高税收的时候，一般会说目标只是针对小团体，同时政府会保证，其他人不会受到影响，当然接下来会慢慢提高对他们的征税。国会首次对所得税进行辩论的时候，支持者声称（或许他们也这样相信），它只会应用到收入非常高的那部分美国人身上。事实上，税收制度一开始的确是这样的。此外，那些支持宪法第 16 条修正案的国会议员，也就是使所得税合法化的那些人，曾经允诺过最高税率绝不会超过 10%。^[1]我能够想像当时的某些国会议员是这样说的：“请相信我，税率不会高于 10%。”当时，最低税率为 1%，向收入达到 2 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 30 万美元）的人征收。^[2]最高税率为 7%，收入达到 50 万美元（比今天的 600 万美元还要多）才需缴纳。换言之，多数人并不需要缴所得税，而且就算对最高收入等级的人而言，它也是相当低的。

但仅仅三年以后，也就是美国参战之前，最高税率已经到了 15%。第二年即 1917 年，最高税率已经到了 67%，1918 年则升到了惊人的 77%。保证最高税率低于 10% 的承诺就这样完蛋了。同时，最低税率也从 1% 升到了 1918 年的 6%。

财政部长梅隆（Andrew Mellon）在 1920 年代大幅降低税率，这直接造就了 1920 年代的经济繁荣。到了 1920 年代末，最高税率是所得超过 10 万美元缴纳 24%，最低税率不到 1%，适用于收入达到 4000 美元的

[1] Robert E. Hall and Alvin Rabushka, *The Flat Tax*,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Press, 1985, p. 20.

[2] 税率和可征税收入引自 Joseph A. Pechman, *Federal tax Policy*, 5th ed.,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 p. 313。

人群。

但是在萧条期间，胡佛总统把最高税率升了一倍还不止，达到了63%，最低税率也升了9倍，高达4%。尽管在萧条期间提高税率肯定会延长萧条期，但他还是这么做了。罗斯福在整个1930年代延续了胡佛的政策，他把税率提得更高。在1940年，他已经把最高税率提到了81.1%，向所得收入高于500万美元的人征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提高了所有收入水平的所得税率。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最低税率已经达到了23%，向应纳税收入中的前2000美元征收；应纳税收入超过20万美元部分需缴的最高税率则达到了吓人的94%。联邦政府还在战争期间引入了代扣所得税的制度。为什么？因为那样的话数百万新加入纳税队伍的人就可以分期给付，也就不怎么能意识到政府从他们身上到底拿走了多少钱。（记住那只青蛙。）所谓的“阶级税”已经变成了“大众税”。战争的结束只带来了非常小的减税政策，而且在朝鲜战争期间又重新恢复。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对收入达到4000美元的人所征的最低税率是20%，对收入高于40万美元部分所征的最高税率是91%。

在1960年代早期，肯尼迪总统提出了一个全面减税的方案，这个方案在他被暗杀后不久，也就是1964年被通过。他把最高税率从91%减到了70%，向收入超过20万美元以上的部分征收；最低税率减到了14%，从1000美元的收入开始征收。不过他减少了每个层级的税率，最高税率的门槛降到了20万美元，而最低税率的征收起点变成了1000美元——按照过去的法律，是4000美元。但不管怎样，这是一次实质性的减税。

然后难以预料的事发生了：高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在前15年平均通货膨胀率只有1.8%，然后就愈演愈烈，在整个

1970 年代则一发不可收拾。1965 年~1980 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是 6.6%，3 倍于以前的水平，这导致了所谓的税级攀爬（bracket creep）现象。就算你的收入跟上了生活成本的提高，税后收入还是会下降，因为通货膨胀使你进入了更高的征税等级。1970 年代的小规模减税对逆转这个现象并没有多少帮助，联邦所得税和高通货膨胀结合起来，提高了所有收入水平的人税比例，税收成了联邦政府效率惊人的赚钱机器。从 1965 年到 1980 年，收入相当于中等收入一半的家庭，其税级从 14% 升到了 18%；中等收入家庭的税级从 17% 升到了 24%；收入相当于中等收入两倍的家庭面对的税率则从 22% 升到了 43%。^[1]于是，在 1960 年代早期适用于最高收入人群的税率实际上应用到了中等收入人群身上，而原来为中等收入人群设计的税率最后则转到低收入人群中。从联邦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一变化的优美之处在于，政府没有要求国会通过任何一条法律就获得了这些收入。

普林斯顿大学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伦德（Alan Blinder）是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在回到普林斯顿之前他还担任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副主席。布伦德在 1988 年的书中居然说，除非你是经济学家或会计师，否则通货膨胀对税收的效应“会让你打哈欠”。^[2]在他的书所写的评论中，^[3]我讲了我的秘书克瑞茜的故事，那是在 1970 年代末的罗彻斯特大学，通货膨胀率很高。她发现尽管自己获得了很高的加薪，她的购买力仍然要比前一年低。这根本不是“让她打哈欠”的事，而是让她愤怒

[1]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February 1982, p. 120.

[2] Alan S. Blinder, *Hard Heads, Soft Heart*,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1987, p. 47.

[3] David R. Henderson, "A Liberal Economist's Case," *Fortune*, November 9, 1987, p. 188.

的事。

许多美国人也愤怒了。里根在 1981 年就任总统的时候，体会了这种愤怒，并采用两种措施进行处理。这两种办法都体现在 1981 年颁布的税法中：一是逐步调低所有收入水平的税率，最低税率在 1984 年从 14% 降到了 11%，最高税率则在 1982 年降到了 50%；同时他将税级和消费者价格指数联系起来，这样单是通货膨胀就不能再把人们推到更高的纳税等级中去了。在这一时期，政府的财税收入提高了，从 1981 年的 5993 亿美元上升到 1986 年的 7692 亿美元，提高了 28.3%。调整通货膨胀以后，收入增加了 6.4%。但因为里根和国会的支出也增加了 48.4%（经通货膨胀调整后，是 23%），我们的预算赤字仍然很高。

在 1986 年，里根政府和国会再一次调低个人所得税并消除了一些扣减额，把最高税率减到了 28%，最低税率则调到了 15%。老布什总统在 1990 年开了倒车，把最高税率变成了 31%，违背了他在 1988 年所作出的承诺：“请相信我，不会有新税。”这可能就是他 1992 年竞选总统失败的一个原因。继任者是当时少为人知的比尔·克林顿，他承诺为中产阶级减税。但克林顿也违背了他的承诺，增加了两个新的税级——36% 和 39.6%。青蛙被煮熟了。

征税的伤害

对美国人而言，只要有工作，税率都是相当高的。多数美国人处在 15% 这一级，也就是说，他们收入中超过起征点的每一块钱都要缴 15% 的联邦所得税，而且除非他们生活在没有州所得税的 7 个州里（阿拉斯加，佛罗里达，内华达，南达科他，得克萨斯，华盛顿和怀俄明），否则

他们还要向州政府上缴 3%~4% 的税。^[1]在此基础上，美国人还要缴 7.65% 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税，这 7.65% 是雇主代付的，因此人们实际上是以降低工资的形式缴了隐性税。这样，就算是收入相当低的人，总的边际税率也在 26%~33% 之间；中等收入者要缴的税率是 28%，再加上 4%~6% 的州税以及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税，总的边际税率大概是 40%~50%；高收入者的总税率大概是 50%（39.6% 的联邦所得税，没有社会保障税——见第十四章——加上 2.9% 的医疗保障税，再加上 6%~8% 的州所得税）。

高税率导致了两种大量的无谓损失。第一种是浪费性的税收支出，这一点经济学家们不怎么强调，但实际上应该加以重视。政府获得收入以后，花掉它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1999 到 2000 年的这届国会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花掉税款方面都相当“慷慨”（如果这个词可以用来描述人们怎么把别人的钱花掉的话），因为他们 30 年来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盈余。显然有理由相信，政府花钱的效率不如我们自己。就算是买辆卡车，政府对卡车价值的评估也不会跟我们一样精细；车还会被闲置一旁，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或者被用来做一些价值不大的事等等。政府没有激励去小心地花钱，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钱，任何为政府机构工作或者对政府支出非常熟悉的人都可以提出无数的例子来佐证这一点。事实上，如果你想知道政府的运作有多么好或多么坏，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问一个政府雇员，只要你能得到这个人的信任或者他（她）知道你不会引用他（她）所讲的话就行了。金钱对纳税者的价值和政府对福利收受者的价值之间的差

[1] 相关数据请查阅 <http://www.taxfoundation.org/individualincometaxrates.html>。

异（假定前者要超过后者）就是一种无谓损失。

经济学家比较重视的是第二种无谓损失，也就是每一税种都会使得人们以某种方式改变自己的行为。税制“扭曲”了行为，让人们做可以减少税负的事；这种扭曲的行为导致了无谓损失，而且没有人从这种损失中受益。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一种税所引起的无谓损失与税率的平方成正比。也就是说，将汽油税从 10% 翻倍升到 20%，所引起的无谓损失并不是翻倍，而是翻四倍。同样，将某人的边际税提高一倍，比如从 15% 升到 30%，所引起的无谓损失要乘以 4。根据哈佛经济学家、位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和 NBER 雇员芬伯格（Daniel Feenberg）所做的一项研究，他们估计克林顿总统对高收入人群提高边际税之后，联邦政府每得到 1 美元就会引起 2 美元的无谓损失。^[1]

怎么做，怎么做

我们要做的主要就是大规模减税，尤其是在联邦这一级。许多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已经讨论了我們是否应当建立统一比例税，也就是说，对高于一定水平的所有收入采取同样的税率，或者是否应当废除所得税，改成销售税。我自己的看法是直接废除，不要再增加另一个税种了，理由是：一个替换旧税的新税会变成旧税的简化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最后就不得不同步同时交纳所得税和销售税。2000 年，澳大利亚政府削减了

[1] Martin Feldstein and Daniel Feenberg, "The Effect of Increased Tax Rates on Taxable Income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1993 Tax Rate Increas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370, November 1995, p. 21.

所得税，削减的部分用销售税取而代之。我预测在几年以内，两种税的总税金加起来就会比老的单一所得税收高，幅度大约是 GDP 的 1%。

如果不增加销售税，那可行的方法就是减少当前的所得税，削减每个收入水平的边际税率。大政府的支持者通常会反对这样的减税措施，他们认为这种减税对高收入群体的好处大大超过对低收入群体的好处。这没错，因为高收入群体是绝大部分税金的来源。比如，前副总统戈尔在 2000 年大选中攻击收入最高的 1% 群体挣了 1998 年调整后总毛收入的 18.5%（收入在 269496 美元或以上），交的税却占了联邦个人所得税收总和的 34.8%。同一年，收入最高的 5% 群体挣了调整后总毛收入的 32.9%（收入在 114729 美元或以上），支付了联邦个人所得税收总和的 53.8%。^[1]很明显，税率的整体降低肯定会极度有利于高收入者，因为他们所缴的税额本来就极度的高。

你也许会认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很难同意全面减税，但你可能错了。问题在于，希望全面降税的人很少清楚地说明，从降税中得益最多的人同时也是目前承担税收最多的人。多数美国人如果了解情况的话，或许会认为全面减税是公平的。我这样说是基于民意测验专家赖德（Everett Ladd）在 1995 年所作的一项令人吃惊的民意调查。^[2]这项民意调查问一个每年赚 20 万美元的四口之家总共应该交多少的税，包括收得税、社会保

[1] 这些数据取自 IRS's Statistics of Income, 报告自 Patrick Fleenor, "Distribution of the Federal Individual Income Tax," Special Report No. 101, November 2000, Tax Foundation, Washington, D. C. (www.taxfoundation.org)。

[2] 调查结果来自 Rachel Wildavsky, "How Fair Are Our Taxes?," *Reader's Digest*, February 1996, pp. 57~61。

障税、销售税、物业税等等。所有人口统计群体回答的中间值是最多不应该超过 25%，但这些受访家庭现在实际所缴的税收总和在 39% 左右。联邦所得税只是一个年收入 20 万美元的家庭需缴税金的一部分，如果总的平均税率要降到 25%，那么个人的平均所得税率就得削减一半以上。

此外，高收入者能够从所得税削减中获得很多好处，这并不意味着低收入群体因此蒙受了损失。由于更低的税收负担，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也会从中受益。另外还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这些群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会得到好处。首先，由于高收入群体可以保留更多的所得，为了早日进入这一群体，人们的工作会更努力；其次，低的边际税率会给每个人更多的激励去增加储蓄，这样就增加了资本存量。资本和高技术工人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低技术工人的“互补”，那就是说，低技术工人身边有更多的资本和高技术工人的话，低技术工人也就有了更多的生产力，并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克林顿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简要地总结了所得税对低技术工人的负面影响：“所得税的结果是，熟练工人消极怠工，减少投资，这样的话，缺乏技能的劳动者的生产力以及工资都会下降。”^[1]当然，如果减税的话，就会有相反的结果：对高收入人群的减税会提高低工资工人的工资。

所得税扣税额（EITC）也应当调整。所得税扣税额是福特总统在 1975 年开始实施的，里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对此作了些许扩展，克林顿总统在 1993 年到 1996 年间则对它进行了实质性的扩张。它是减税和补助的一种结合，针对的是有孩子的低收入人群。对年

[1] Joseph E. Stiglitz, *Economics of the Public Sector*,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88, p. 493.

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数百万人口来说，所得税扣税额抵消了许多人的全部所得税，并向其他人提供补助。在1997年，这个项目覆盖了1800万的纳税人，花费了大约250亿美元，这是因为克林顿总统在1997年将最大扣除额从1511美元升到了3556美元。^[1]实际上这250亿美元比联邦政府花在福利上的所有钱都多。

所得税扣除额引起了两个激励问题。首先，那些不纳税的人也许也会倾向于并实际投票支持大政府，因为他们自己不需为此出钱。就像在20世纪早期许多不富裕的人支持向“富人”征收所得税一样，现在许多不缴所得税的低收入人群也不那么抵制政府支出的增加。其次，低收入者所赚的钱一旦跨过很低的收入门槛，就会失去扣税额，这样他们的隐含边际税率就非常高。举个例子，在1997年一个有一对子女的低收入家庭，父亲工作，收入为1.165万美元。如果妻子获得了一份工作，她每多挣1美元，扣税率就下降21%，加上联邦和州的所得税以及社会保障和医疗税，这个低收入家庭的边际税率达到了50%。因此，就算她的子女已经在上学了，妻子也没什么积极性去获得一份工作。处于这种情形中，人们因为不愿意有额外的收入，更难进行储蓄，也因此更依赖于政府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

相比起全面减税来，所得税扣税额是一项坏政策，因为它以损害其他群体为代价来特别关照某个群体。如果我们从以前的税收制度出发，那我不希望实施所得税扣税额，最好的办法是代之以全面减税。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所得税扣税额，作为自由的信奉者，我不认为应当剥夺那些有孩子

[1] 这些事实与许多其他关于EITC的事实均来自 Nada Eissa and Hilary Williamson Hoynes, "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and the Labor Supply of Married Coupl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856, December 1998。

的低收入家庭现在所拥有的不缴联邦所得税的自由，但是我们应当限制所得税扣税额：所得税扣税额最多只能把某个人所承担的所得税减为零，但不应当给任何人补助。

在假定了低税率的情况下，政府现在所征收的所有税种都应该大幅度降低，不管是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还是销售税。如果我们希望减小政府的规模和干扰程度，最好的策略就是不断地要求对各种各样的税进行削减。如果减少所得税很难，因为人们会说这有利于有钱人，那就减少销售税、物业税或汽油税。

但是，有些税收相对而言更加的不公平，应当首先被废除掉。其中一项就是遗产税。你死了以后，联邦政府对你的遗产中超过 67.5 万美元的部分征收 37%~55% 的税。因为它是死后才支付的，所以许多反对者形象地把它叫做死亡税。为什么说死亡税不公平？因为它是向人们生前已经缴过税的那部分积蓄进行再度征税。他们的遗产至少已经付过一次税了；如果遗产包括储蓄所得，那它至少已经缴过两次税了：一次是作为收入，一次是作为利息或分红；如果这储蓄收入是通过公司投资取得的，那这笔遗产至少已经缴过三次税了：第一次是工资所有税，第二次是他所投资的公司要缴公司所得税，第三次是他因为从公司获得的分红缴的税。向人们征第四次税是可笑的。

资本利得税是另一种非常不公平的税种，因为它没有考虑资产因通货膨胀而导致的虚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不用取消资本利得税，那就是允许人们将资产价格指数化，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真正的而非虚假的资本利得来缴税。指数化的反对者声称指数化“太复杂”了，我不同意这一说法。但如果人们真的发现指数化太复杂了，那还有简单的修正办法：允许

但不要求人们进行指数化。让那些觉得太复杂的人继续付极高的资本利得税好了，而另外99%的人则可以拿出计算器，忍受一点点的复杂度，把自己的钱从政府手中拿回来。

我们从漫长的历史中可以总结出一点：如果政府把钱收上来，它一定会把钱再花掉。吉姆·布莱克是我以前的学生，现在是旧金山一名成功的律师，他有一次指出，对政府征税的巨大争议在于它是如何把钱花掉的。他解释道，如果政府花掉税金的方式和你自己花钱的方式完全一样，而且如果我们假设征税成本为零，那么政府向我们收多少税都没有关系。但现在的问题是让别人来选择怎么花你的钱，因此，除了国防和其他一些非常重要、如果政府不提供就没有人提供的项目以外，税收并没有什么存在的理由。

我还没有对我们所缴的最大宗税收进行讨论。除了那些收入极高的人以外，多数人所负担的最大一笔税不是所得税，而是社会保障税。下一章我们会对此进行分析。

第十四章

社会保障危机：原因及解决之道

让我们抛弃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用一种新体系来替代它。在新的体系里面，你的名字在最底端，然后你把钱给那些在体系最上面的人，然后你就可以……等一等，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体系。

——戴夫·巴里^[1]

1991年，我的一个学生斯蒂芬·巴努斯写信给社会保障总署，要求了解有关他所缴的社会保障税以及他所能够获得的福利的信息。在回复他的格式信函中，社会保障总署署长格温多林·金（Gwendolyn King）写道：

[1] Dave Barry, "Election could come down to who kisses most orifice," *Miami Herald*, September 24, 2000.

我想向您保证社会保障是建立在合理的财政基础之上的。在您需要的时候，社会保障福利就会提供应有的帮助。

巴努斯是个细心有打算的人，他在1995年又发了一封类似的请求信。这一次，格式信函中所写的内容有所不同。社会保障总署署长恰特（Shirley Chater）写道：

社会保障信托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指出，社会保障体系还可以再支付35年的福利费用。这意味着国会还有时间制定出改革计划来保障项目未来的财务状况。

仅仅四年之后，署长的措辞就从担保“在你需要的时候”会随时提供变成了还能“再支付35年”。1991年和1995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除了1995年的社会保障总署署长可能比他1991年的前任少了一点不诚实以外，这4年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社会保障从来没有建立在一个“合理的财政基础”上，与社会保障部的官方宣传相反，那里没有真正的信托基金。现在所征收的薪资税在华盛顿稍作停留后，差不多有80%就转到了现在的退休人员手中，政府则把剩下的钱用到了其他项目上。所谓的信托基金包括政府自己发行的债券，而这些债券不过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另一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借据而已。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副主任杰恩（Chris Jehn）打了个比方，说发行这些债券就好像你每年写张借据放到一个为你孩子的大学教育而准备的盒子里。这些借据里写着：“我欠我女儿的大学基金5000美元。”这样存了18年以后，你打开盒子，里面出现的

不是9万美元，只是18张废纸。

那些在1940年代早期退休的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为他们只交了几年的薪资税。但是整个制度现在已经“成熟”了，现在的退休者在整个工作生命里都要缴社会保障税，但他们的回报率却要低很多。

如果你或我玩这样一种金融连环信（chain letter）的话，显然，会被关进监狱。事实上，的确有人为此被关进过监狱。他叫查尔斯·庞齐（Charles Ponzi），在1920年被逮捕。他承诺投资者在90天里可以获得双倍的钱，然后把后加入者的钱交给先加入者，以此维持他的承诺。这就是术语“庞齐骗局”的来源。

在庞齐骗局和社会保障制度之间有两个主要的区别。第一个区别是，社会保障是政府经营的，无论是在合宪性还是在道德规范上，它都是合法的。第二个区别紧跟着第一个：庞齐必须依赖于那些会上当的傻子，而政府却可以运用武力。政府把社会保障薪资税称之为“贡献”，对2001年收入在8.04万美元之内的人，征收额达到10.6%之多（额外的1.8%是残障保险，另外还有向所有工作收入征收的2.9%医疗税）。但是如果你想试试不作这种贡献会怎样呢？拜勒（Valentine Byler）先生就这么试过，他所信奉的宗教说成员们应该彼此帮助，他就通过不缴社会保障税来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结果国税局扣了他的三匹马然后卖掉，得到的308.96美元用来弥补他的未缴税款。^[1]

因此，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时候政府的福利支出会超过所征收

[1] 这个故事是 Martha Derthick 讲的，见 *Policymaking for Soci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9, p. 5, 资料来自 *Congressional Record*, June 26, 1961, pp. 11307~11308。

的薪资税及那些债券利息的总和，因为那就是这些债券被卖掉以及政府不得不提现的时候。根据社会保障部现在的方案，这个日子是2024年，那个时候差不多有三分之二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正处于退休状态。

在1990年代晚期，据政府自己的统计师估计，要维持政府所承诺的福利，那么下一个10年的税率就要从现在的12.4%升到超过18%。^[1]如果比例达到18%，那社会保障税收就将占整个GDP的7.5%。但所有的联邦税金收入从1950年代以来就一直停留在GDP的18%~20%之内。如果这样的历史状况不变的话，那么社会保障项目就将占到联邦政府总税收的40%左右，留下剩余的60%支付医疗、债务利息、国防支出以及其他联邦政府要做的事。这看上去不太可能。也就是说，实质性提高社会保障税率的可能性比较小，而这就意味着未来的福利肯定要比政府承诺的少。

先天不足

我们怎么会陷入这样的乱局之中？那要追溯到1935年，当时罗斯福总统和国会一起把社会保障设计成一种跨代“连环信”，就是它造成了未来几代人的巨大混乱。有趣的是，当年人们就这个提案进行辩论的时候，却没怎么讨论“连环信”这个问题。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政客们都没有因这一点而感到不安。那时候，该方案的某些提议者认为社会保障税是向低收入人群征收的所得税的扩展。第一届社会保障理事会的精算顾问威廉姆森（W. R. Williamson）说，社会保障以“民主党式的风格”将联

[1] Martin Feldstein and Andrew Samwick, "Two Percent Personal Retirement Accounts: Their Potential Effects on Social Security Tax Rates and National Saving,"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540, April 1998, p. 1.

邦所得税扩展到了低收入群体中。^[1]

罗斯福和国会还拒绝了克拉克修正案。这是密苏里州参议员克拉克 (Bennett Champ Clark) 所提出来的方案，主张拥有政府所承认的养老金方案的雇主和雇员可以免缴社会保障税。尽管国会以 51 票对 35 票的表决支持这个修正案，但它后来还是没有被通过。如果法律中可以加入这个修正案的话，加入社会保障项目的人会少得多，而且随着私人养老金的增长，社会保障中的劳动力数量可能会逐年递减。

罗斯福坚信薪资税是给这个项目提供财务支持的办法。联邦政府从一开始就称这项税为“贡献”，迫使人们相信社会保障是自己支付的且将来有权享受的年金。这也是为什么罗斯福希望设立一个特别的薪资税而不是一般税收的原因。罗斯福认为，如果人们所缴的是专用于社会保障的薪资税，那么他们会认为自己肯定能从这个项目中获益。罗斯福说：

这些税收在经济上根本不是问题。这完全是政治问题。我们把这些薪资捐助放在一起，并赋予捐助者以法律、道德和政治的权利来要求他们的养老金……税收就在这儿，没有任何一个政客能够拆毁我的社会保障项目。^[2]

罗斯福说，只要这种应得权利心态 (entitlement mentality) 存在，社

[1] "26,000 in Brooklyn Defy Security Law,"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9, 1936, p. 37.

[2]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Age of Roosevelt*, vol. 2, *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 (Houghton Mifflin, 1959), pp. 309~310, referenced in Martha Derthick, *Policymaking for Social Securit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9, p. 230.

会保障就很难削减或消除。他是对的。但还有一个他没有提到但金融连环信形式中已经包括的原因：年纪大的人会向政客们施压，要求维持福利，这就必然要继续向工作人群征税；当工作的人退休了以后，他们会要求对下一代征更多的税，如此代代相传。简而言之，罗斯福实施了一个滥用跨代转移的制度，并一直延用到今天。

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使这个问题变得更糟。1967~1972 年之间，国会和总统将社会保障福利提高了 72%（调整通货膨胀后是 37%）。当约翰逊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威尔伯·科恩（Wilbur Cohen）提议增加 10% 的社会保障福利时，约翰逊回应道：“得了，威尔伯，你能做得更好。”^[1]尼克松总统为此和米尔斯（Wilbur Mills）展开了一场攀比。米尔斯是一位很有权势的国会议员，为了获得 1972 年民主党总统提名而乱开空头支票，最后的结果是福利增加了 20%。

MIT 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为这些政策提供了知识支撑。“社会保障的好处在于它在**精算**上（黑体为萨缪尔森所加）是不合理的。”萨缪尔森的意思是，如果真实收入增长得很快，那每一代都可以从社会保障中获得比他们缴纳的更多的收益。当批评者攻击社会保障是一场庞齐式骗局时，萨缪尔森则在 1967 年把它赞美为庞齐式骗局，反而将了别人一军。“一个增长的国家，”萨缪尔森写道，“是精心设计的最伟大的庞齐游戏。”^[2]

现在我们正被这个“美丽的”庞齐游戏勒索。如果包括雇主所付的那一部分，超过 62% 的家庭现在付的薪资税（多数是为社会保障而付的）

[1] 故事来自 Peter G. Peterson, *Will America Grow Up Before It Grows O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pp. 93~99。

[2] 萨缪尔森的观点引自 *Newsweek*, February 13, 1967。

要超过他们所缴的联邦所得税。^[1]

这个项目刚开始时，薪资税是收入前 3000 美元中的 2%，由雇主和雇员平摊。到 2001 年，社会保障的税率在 80400 美元之下是 10.6%，之后则为零。征税所涉及的收入增加并不仅仅是因为通货膨胀。1938 年的 3000 美元，调整了通货膨胀以后，不到今天的 38000 美元，仅仅是今天的起征点，基本收入的一半。今天，雇主和雇员联合所交的税收上限是 8077 美元，而在这个项目刚开始时是 60 美元。如果税收的增加仅仅是因为通货膨胀，那么今天的上限就应该是 735 美元。见表 14.1：

表 14.1 社会保障的缴税上限（不包括残障保险）

计算年份	最高征税额（美元）	以 2000 年美元计算的最高征税额
1939	60	735
1950	90	636
1955	168	1066
1960	264	1518
1965	324	1750
1970	569	2496
1975	1234	3902
1980	2341	4835
1985	4118	6512
1990	5746	7483
1995	6438	7187
1997	6932	7348
2001	8522	8274（估计）

来源：税率和税基来自各期社会保障理事会信托报告；通货膨胀调整来自各期总统经济报告。

[1] Andrew Mitrusi and James Poterba, "The Distribution of Payroll and Income Tax Burdens, 1979~199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707, May 2000, p. 24.

庞齐 VS. 股市

许多社会保障的批评者认为当前的老年人发了笔横财，而年轻人则做了笔蚀本生意。他们只说对了一半。年轻人的确是做了笔蚀本生意，但当年的老年人也没有从中得利。因为社会保障的回报比起股市投资回报来说是非常低的。

在1987年发表于《全国税务杂志》(*National Tax Journal*)的一篇论文中，斯坦福经济学家波斯金(Michael Boskin，他后来成了老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帕弗(Douglas Puffert)和绍文(John Shoven)以及波士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克里寇夫(Laurence Kotlikoff)提供了社会保障税的收益率数据。^[1]真实收益率在-0.79%到6.34%之间，随年龄(年纪大的人收益率较高)、收入水平(低收入家庭的收益率比高收入家庭高)、婚姻状况(家庭中有一个不工作的，其收益率要比单身的或一家两口都在工作的为高)不同发生变动。有趣的是，就算是收益率最高的一类人，即生于1915年，家庭中只有一个人在工作，所挣的钱用1985年美元衡量是1万美元一年，他们的收益率也不过是6.34%。其他类型的人，包括年轻一点的或者收入高一点的人，社会保障税的收益率会更低一些。

在最近的一份研究中，^[2]哈佛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

[1] Boskin, Michael, Laurence Kotlikoff, Douglas Puffert, and John Shoven, "Social Security: A Financial Appraisal Across and Within Generations," *National Tax Journal* 40, 1987, pp. 19~34.

[2] Martin Feldstein and Andrew Samwick, "The Transition Path in Privatizing Social Securit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 5761, September 1996, p. 20.

和达特茅斯大学的经济学家塞姆维克（Andrew Samwick）研究了缴税的平均收益率，见表 14.2：

表 14.2 社会保障税的平均收益率^[1]

出生年份	1915 年以前	1915	1930	1945	1960	1975	1990
真实收益率	7.0%	4.21%	2.52%	1.67%	1.39%	1.39%	1.43%

请比较以上回报数据和你投资股票市场上的指数型投资组合的回报。根据计算股票市场回报的伊博森公司的研究，在 1926 年（1929 年股市暴跌之前）到 1997 年之间，股票的平均收益率为 11.0%，调整了通货膨胀之后则是 7.7%。

当然从短期来看，收益率会有高有低，但是 30 年期的真实收益率从没有低于 4%。所以收益率比较显示，对 30 年或以上的长期投资，私人的股票投资要优于政府为人们做的 30 年长期投资。当然，如果做 5 年期或 10 年期的投资，可能股市会表现很差。根据伊博森公司的数据，最差的 10 年期是 1964 年 10 月 1 月到 1974 年 9 月 30 日之间，调整了通货膨胀率之后，那段时间的年投资回报率是 -4.3%。^[2]但这个故事只是告诉我们，如果你想在大约 10 年后使用资金，就不应该把所有的钱都放在股票上。

另一个同样有效的比较方法会让对照结果更加明显：看一看社会保障税产生的效应以及你的财富本可以产生的利益。经济学家们分三步进行了计算。首先，他们计算了你和你的雇主所缴的社会保障税的当前价值，也

[1] Martin Feldstein and Andrew Samwick, "The Transition Path in Privatizing Social Securit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 5761, September 1996, p. 20.

[2] 感谢伊博森公司的公共事务经理 Heather Fabian 提供计算结果。

就是按照复利计算，到退休年龄时所缴的所有税金的总价值。第二步，他们对社会保障福利的当前价值进行估计，也就是到退休年龄时所得到的未来收入的总价值，所使用的收益率和他们计算社会保障税时的收益率保持一致。最后，他们用福利的当前价值减去税收的当前价值。

这种计算中最关键的变量是利率。一个悲观的实际利率是4%。为什么？因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投资30年期股票投资组合上的最低收益率要超过4%。海军研究生院的学生杜菲使用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4%收益率进行计算，发现一个1929年出生的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缴最高限额的社会保障税，然后在1994年退休，社会保障收益要比私人储蓄计划的收益少12万美元。如果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是中等收入，那他能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多得5.4万美元。就算一个一直拿最低工资并在1994年退休的工人，私人储蓄计划下也能多得9000美元。^[1]如果以更现实的6%收益率进行计算，那么收入处于最高等级的1994年退休者，其社会保障所得实际上是损失了26.2万美元；平均收入者要损失16万美元；最低工资者也要损失6.6万美元。

最早的那一批社会保障受益者的确发了一笔横财。因为他们只缴了几年的税，却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享受福利。比如，第一个接受社会保障的富勒小姐，到她100岁高龄逝世为止，总共获得了2万美元的福利，但一共只付了22美元的税。可是现在，所有未来和大多数当前的受惠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必须缴税（研究社会保障的经济学家称这个系统“成熟”了），

[1] Shawn P. Duffy, *Social Security: A Present Value Analysis of Old Age Survivors Insurance (OASDI) Taxes and Benefit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Masters Thesis, December 1995.

那么对在当前和未来退休的人员而言，就再也不会会有什么横财了。

不公正的社会保障

想像一下有个人每年拿走你收入的一部分，并许诺说当你活到 65 岁的时候，他会以某种累积利息把钱返还给你。但有一个问题：你不认为你能活到 65 岁，你现在 29 岁，而且患了艾滋病。你在绝望中需要这笔钱来支付医药费、租金和饭钱，但这个人却不让你这么做。

我刚刚所描绘的就是社会保障系统的运作方式。不管你现在有多么需要这笔钱，政府不会让你拥有它。如果你要求社会保障办公室给你一张申请免除该项义务的表格，那里的雇员会拒绝你，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表格。你被套牢了，而且只要联邦政府在操心这件事，你的欲望、需要和利益就都无足轻重。

艾滋病的例子是个极端，还有数百万不那么极端的例子。许多身体不好的人不太可能活到能领取福利的年纪。吸烟者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的预期寿命要比不吸烟的人低好几年。尽管比起不吸烟的人来，吸烟者预期可领到的社会保障福利要少好几年，但他们所付的税率并没有因此更低。另一大群实际寿命比较低的人是黑人。根据保险网站 www.insure.com 的资料，在 1996 年，一个 40 岁黑人的预期寿命是 71 岁，而一个 40 岁白人的预期寿命是 76 岁。换言之，黑人预期可领取社会福利的年数是 5 年（从 66 岁退休领取全额福利算起），而白人是 10 年。

另一种不公正来自于社会保障系统对待州和地方政府员工的方式，这些人是现在仅存的不在社会保障范围内的人。州或地方政府的退休员工如果有在社会保障的工作位置上待了 10 年或以上，就可以继续享受社会保

障福利。我并不是主张社会保障政策也要扩展到他们的职业生涯，就好像如果有一个大窟窿，解决的办法不是把人塞进去。我只是想指出州和地方政府的雇员相对于其他人，享有了多么不公平的特权。

不管你付了多少钱，社会保障都不能提供保障

1956年7月，从1913年起就生活在美国的保加利亚移民内斯特，因为在17年前成为共产党员而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在1936年到1955年之间，内斯特和他的雇主缴纳了社会保障税。1954年，国会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任何因为是共产党员而被驱逐出境的人都不得享受社会保障福利。内斯特向法院控诉他的权利被无理剥夺了。同样讽刺的是，高等法院在内斯特诉弗莱明案中宣称国会可以做它想做的事，如果这意味着在人们错误地把钱放到一个基金之后，他们享受养老金的权利因此被剥夺，那么这也只是“可惜”而已。当然高等法院用的语言要比我用的更为华丽，但语调是非常类似的。下面是法院的关键语句：

把社会保障系统理解为一种“应得的财产权”会剥夺在发生变动的条件下进行调协的可能性，国会应当清楚地谨记它保有在需要的时候变动、修正或废除任何法律条款的权利。

换言之，真可惜。

一步步废除社会保障

第一步是要有清楚的认识：我们以前被骗了。社会保障中没有信托基金，它只是个庞齐游戏罢了，而且对所有人来说，它都是一笔坏生意。因此，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废除社会保障制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自由地选择存多少钱，选择以什么形式储蓄。

那些希望把钱投资在标准普尔 500 指数或拉塞尔 2000 指数* 系列股票的人，经过长时间的投资，可能积累起比社会保障金多几倍的钱；那些因为害怕股票市场的起起落落而投资债券的人也能得到差不多的回报；那些购买出租房产的人也可以；那些不太愿意为退休储蓄而在六七十岁的时候继续工作的人也能如此。自由的伟大美德在于它允许每个人自己选择如何花自己的钱。

的确，我们多数人都不是投资方面的专家，但我们能雇用专家。此外，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其他人所不可能拥有的专家技术：我们都知道自己要什么。

没有了社会保障，人们会为自己的退休存钱吗？许多人表示怀疑，因为很多即将退休的人都只存了很少的钱：在 1991 年，主要成员年龄在 55 岁到 64 岁之间的家庭，金融资产中位数不过是 8300 美元；而其中一位成员的年龄低于 65 岁的家庭的净资产，包括房子的价值在内，中位数只有 2.8 万美元。^[1]但这些怀疑者没有认识到，社会保障就是为什么人们不进行储蓄的主要原因。正如马丁·费尔德斯坦所指出的，一个一直保持中等收

* 由 2000 家小市值股票组成的指数。——译者注

[1] Martin Feldstein, "The Missing Piece in Policy Analysis: Social Security Reform,"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 5413, January 1996, p. 13.

入的人在65岁退休，并且有一个“依赖”自己的配偶，他所得到的福利相当于退休前一年收入的63%。^[1]因为所得的社会保障福利是不需缴税的，所以其实相当于退休前税后收入的80%。如果你相信在退休后可以一直领取社会保障，那为什么还要去储蓄呢？

如果没有社会保障，今天的多数美国人都会生活得更好。但我们如何才能走到那一步呢？有许多可以使几乎所有人都受益的过渡办法。下面是其中一种。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目标是保留现有的社会保障，并避免大幅度地增加对年轻一代人的课税；第二部分则要逐渐地废除社会保障。

首先是在不增加课税的情况下保留社会保障系统。这要分三步走，（1）提高退休年龄；（2）改变福利规则；（3）改变福利指数。现在可以领取全额社会保障福利的退休年龄是65岁，但这个数字是在1930年代设定的，那个时候，65岁的男人预期还能多活12年，65岁的女人预期还能多活13年以上。今天这个数字则分别为15年和19年，而且工作所需的体力已经比那个时候大大减少了。领取全额社会保障福利的年龄据预期要在2009年上升到66岁，在2027年到67岁，但还可以进一步上升，比如到2017年就升为70岁，即使这样，依然能留给人们充足的时间来调整他们的计划。与此配套，享受部分福利的退休年龄也可以从现在的62岁有所提高，比如提到66岁。

当然，提高退休年龄会进一步损害吸烟者、黑人，及其他死亡年龄较早的人的利益。因此，一项相关的改革就是提供一种选择，让任何有需要

[1] Feldstein, "The Missing Piece in Policy Analysis: Social Security Reform", p. 13.

的人可以一次性拿到一笔收入，比如相当于6年社会福利的钱。通过这种方法，那些预期会较早死亡的人就不会像今天一样被政府抛弃。

福利规则也需要改变。过去的规则是真实福利随着真实工资的上升稳定地增加。比如，1995年的退休者平均年福利所得是7510美元。根据费尔德斯坦和塞姆维克的计算，如果整个制度不改变的话，2016年的平均年福利额就应当是8790元，2023年为9290元（均为1995年美元）。^[1]但如果我们把福利定在不变价格上，那2023年的平均福利支出就不会比今天更高。

最后，社会保障福利应该跟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挂起钩来。联邦政府指定研究CPI的波斯金委员会发现，CPI每年高估通货膨胀一个百分点。^[2]根据波斯金委员会报告而出台的改革措施是每年削减大约半个百分点。政府措施可以从现在开始跟这个减去半个百分点的CPI挂起钩来。如果这么做，这项改革再加上已经改革了的CPI计算方式，可以使福利支出增长得慢一些。把退休年龄提到70岁，将福利与真实的通货膨胀挂起钩来，冻结真实福利支出，这些改变加在一起可以消除财政危机，并可能适当地减少社会保障税率。然后，人们应当被允许，记住只是允许，而不是强迫将新老薪资税之间的差价存进个人退休账户中。

但就算有了上述全部改变，我们仍然还停留在一个政府经营的强制性

[1] Martin Feldstein and Andrew Samwick, "The Transition Path in Privatizing Social Security," p. 22, Table 2.

[2] "Toward a More Accurate Measure of the Cost of Living," Final Report to the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from the Advisory Commission To Study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December 4, 1996, p. ii.

庞齐骗局之中。但政府并不是我们的父母，没有一种简单的计算可以告诉我们为自己的老年存多少钱才叫够。至于把我们的“储蓄”（纳税）和别人的纳税额放在一起，然后粗略地根据我们所缴的钱（不要赚太多）、婚姻状况（娶一个不缴社会保障税的人）、年龄（活得长一些）来决定我们最后取回多少钱就更加不靠谱了。所以，我们应当逐步终结社会保障。

为什么是逐步终结而不是立即消灭？因为社会保障是一种连环信，许多当前和未来的退休人员要取回他们所缴的税收，就必须依赖于向后代人征税。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正确指出的，这一点使转型变得很困难。结束这个项目的惟一办法是从某一天开始，政府可以告诉所有年龄低于某个确定数字的人，比如说30岁，他将不用缴社会保障。然后把这些小于30岁的人的薪资税减到比如说5%（由雇主和雇员分摊），并允许这些年轻人将5.6%的差值（30岁以上的人要缴10.6%，年轻人是5%）存进个人储蓄账户里。

如果民意调查的数据是准确的，那有70%的X世代人认为在他们退休的时候，社会保障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就意味着70%的人已经相信他们所缴的税是没有回报的。坏消息是我的建议只是确证了他们的怀疑，好消息则是减去他们的税率因此可以被视为一种奖赏。有他们的支持，社会保障制度就可以在60年中被完全废除。

这样一种转型对年轻工人来说并不是最理想的，如果他们能把整个10.6%都撤出来进行投资的话，情况会更好。所以，如果我能够在1935年向罗斯福建言，我会说：“富兰克林，不要这么做。”不幸的是，在2001年，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马基雅维里式人物所造成的混乱。在这样的转型中，30岁以下的人还得向这个制度付钱，同时得不到任何

回报。这听起来对 30 岁以下一无所得的人不公平，这的确是不公平，但在理论上，比起让他们继续缴很高的薪资税，最后得到很低甚至可能是负的收益率来，这个结果并不算坏。此外，如果他们把少缴的薪资税投入股票指数基金的话，所得的最终回报会比在当前制度下好一些。

举个例子，一个工人在 20 岁的时候决定把他少缴的 5.6% 薪资税投入股票市场，这样一直投资到 67 岁，期间的分红也全部进行再投资。那么，如果股票基金的真实收益率为 7%，他在退休时的年收入相当于退休前收入的 122%，而当前法律所承诺的只是 42%，至于当前的社会保障税所能提供的则更少，只有 29%。^[1]如果这个工人是把钱以 50/50 的比例同时投到股票和债券中，收益率为 5%，那退休收入将等于退休前的 56%，仍然要比他从社会保障中得到的多。^[2]

我还想建议另一项改革。我希望能允许任何 45 岁以上或者缴了 10 年以上社会保障税的人立刻退出社会保障制度。退出的人不允许再回来，而且要放弃对过往所缴税收和未来福利的权利，但是他也不必再付社会保障税了。我并没有对这项提议作精确的计算，我甚至不知道它对我自己有多少影响。但我所知道的是：如果让我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它。我才不想去麻烦地计算不再拥有领取社会保障的资格会有多少损失，不必再付社会保障税又有多少收益。为什么，我这样一个理性、有计算能力、分析能力的经济学家会不做这些计算呢？因为我认为自由的价值更高，为了不

[1] Stephen J. Entin, "Private Saving vs. Social Security: Many Happier Returns," *IRET Congressional Advisory*, September 4, 1996, No. 56,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s of Taxation.

[2] Stephen J. Entin, p. 4.

让联邦政府把我看成无助的、不负责任的流浪者，我可以放弃很多东西。（但如果你让我在 55 岁或年龄更大的时候做这个选择，那我会做更仔细的计算。）在这方面也许我是个极端主义者，但我相信有数百万人跟我的想法一致。由于我们退出这个制度，联邦政府在未来的 20 年会失去我们上缴的税收，但在这段时间里问题不大，因为上缴的薪资税要超过福利支出。等到政府在 2020 年代和 2030 年代遇到财政困难的时候，它也不需要付福利给我们了。

糟糕的社会保障改革提议

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研究了社会保障在长期运作中的问题，提出了另外两个改变现有制度的办法。一个是私有化，也就是政府让人们少付一部分薪资税，并强迫他们把这部分钱存到私人储蓄账户里。私有化的方案和我的废除社会保障提议之间有两个差异。首先，在几乎所有的私有化提议中，人们都要被迫进行储蓄。所以，对那些希望在平时把钱花掉然后在正常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工作的人，或那些正在生病并希望把钱用在医疗保障上的人，这样的提议是没有意义的，政府仍然可以命令人们应当存多少钱以及什么时候存钱。比如，要是有个 40 岁的人希望把钱花在看加利福尼亚或欧洲的旅行上，他就无能为力了。政府说他必须存钱，并且用枪口指着他。第二个差异是，多数这类提议会比我的提议更大程度地削减薪资税，而且由于它们不改变退休年龄或调整福利规则，或对社会保障进行高度指数化（over-indexing），在所征收的薪资税和对当前领取者的福利支出之间会出现很大的空缺。

一些人建议联邦政府卖掉土地和其他资产来填补这个空缺。资产售出

是个很好的办法，但不应高估它的作用。私人投资银行“黑石集团”主席彼得森（Pete Peterson）估计，在1995年9月，联邦政府的资产大概是2.3万亿美元，但医疗和社会保障中没有预算支持的负债总值则有15.3万亿之多。^[1]

其他的私有化主张者，尤其是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了未来会产生巨大短缺，并且构思了如何转型的细节。下面我要解释为什么私有化是错误的，因为在所有这些建议中，征税都要在短期内大幅增长。

比如，克里寇夫提议建立个人保障系统。他要终结当前用来支付老年人福利金的薪资税。^[2]这个主意并不坏，但是为了支付转型期所需的费用，他又提出要征收一种接近10%的国家销售税。据克里寇夫和哈佛经济学家萨克斯（Jeffrey Sachs）所说，在40年中，税率可以降到2%左右。^[3]但你最后一次听说销售税降到这么低是什么时候？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销售税率几乎总是在一个地方降下来，同时在另一个地方又长上去了。

克林顿总统的五名社会保障顾问支持私有化，他们投票赞成美国企业协会的韦弗（Carolyn Weaver）和华信惠悦公司的修柏（Sylvester Schieber）所提出的提高征税计划。该计划要转移10%的薪资税，其中一半按均等给付制（flat benefit）付给退休工人，还有一半则转到个人保障户头。为了填补短缺，韦弗和修伯主张征收一项为期70年、税率为1.5%的额外薪资

[1] Peter G. Peterson, *Will America Grow Up Before It Grows Old?*, p. 18.

[2] Laurence J. Kotlikoff, "Privatizing Social Security at Home and Abroa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96, Vol. 86, No. 2, p. 368.

[3] Kotlikoff and Sachs, "It's High Time to Privatize," *Brookings Review*, Summer 1997, p. 22.

税，联邦还要额外负债 1.2 万亿美元。^[1]

私有化的主张者担心的是如果什么都不做，那未来的税率会提得更高。但如果现在什么都不做，那么以后的福利金就会削减，因为美国政府不可能将薪资税提高到 18% 的水平上。事实上，当前制度的一位主要支持者，社会保障总署前署长鲍尔（Robert Ball）曾经说过，他担心纳税人会起来反抗当前的薪资税率。^[2]

讽刺的是，许多可能领导这场革命的自由信奉者反而主张提高税收，他们用今天的确定增税来取代明天可能出现的大规模提税。社会保障制度是一团乱麻，但正如费尔德斯坦所说的，如果你陷在洞里，至少别再挖了。

近来许多人所鼓吹的第二个坏建议是让政府投资股市。问题是，10 年的政府社会保障税收金额巨大，联邦政府甚至可以因此拥有美国股市的很大一部分。当政府拥有某样权力之后，想让它袖手旁观是非常困难的。联邦政府几乎肯定会运用权力为它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那些企业制定商业政策。同样，政府也会运用它的资金进行很差的投资。在 1970 年代，宾夕法尼亚政府使用雇员养老金计划为大众汽车工厂筹资时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这家工厂在 10 年前倒闭了。

第三个坏提议是彼德森和其他人提出来的，那就是向社会保障、医疗和其他福利的领取者进行“富裕测试”。根据彼德森的提议，如果你的收入在 4 万美元以上，那每超过 1 万美元的收入就要相应少得 10% 的联邦福

[1] Bob Davis, "Senior Project,"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9, 1996, p. A14.

[2] Bob Davis, "Senior Project,"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9, 1996, p. A1.

利。^[1]所以，如果一个家庭年收入是 5 万美元并接受 1.2 万美元的联邦福利，那联邦福利中就要扣除 1200 美元。如果一个年收入 10 万美元的家庭也领取 1.2 万美元福利的话，那就要减少 1.2 万美元中的 60%，也就是 7200 美元。

这样一个计划除了执行困难以外（史密斯先生，我们刚刚发现你去年的收入比前年高 1 万美元。请寄给我们一张 1500 美元的支票，正好是你髌关节手术费用的十分之一），还有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富裕测试惩罚了那些收入和别人一样只是通过储蓄和储蓄利息变得比较富裕的人。那些从不储蓄，把钱都花在美食、名车或去欧洲旅游上的人却可以比勤俭节约为自己养老的人得到更多的福利金。对分红、利息和资本所得进行征税的税收制度已经是对储蓄者的歧视，这项“富裕”测试将进一步增加这种歧视。

你也许会说，那些超出人们控制的事情，比如高额医疗账单或大额遗产继承，是快到退休年龄的人财富不一致的重要原因。但根据经济学家凡蒂（Steven Venti）和怀斯（David Wise）的研究，这种生命中不可控的因素对退休者的财富影响是非常小的。事实上，人们在晚年财富不均等的最重要原因很简单：人们选择把多大比例的钱存起来。^[2]富裕测试在经济分析层面上也有问题：它会阻止退休金储蓄，毕竟，这是人们储蓄的主要形式。

[1] Peter G. Peterson, *Will America Grow Up Before It Grows Old?*, p. 167.

[2] Steven Venti and David Wise, "Choice, Chance, and Wealth Dispersion at Retiremen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521, February 2000.

结论

政府不能保障我们的养老。政府官员没有激励像我们关心自己一样来关心我们。在长期计划中，他们会变得更坏，因为他们的目光很少会越过下一轮任期。但当他们像罗斯福一样高瞻远瞩的时候，造成的危害又要远胜过好处。约翰逊和尼克松大幅度地提高了社会保障福利，尽管这意味着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需要大幅度地提高税收，但他们似乎对此毫不关心。社会保障制度无法以当前的形式持续下去，如果要在不增加税收的情况下维持这个制度，那就要求政府把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把福利金更精确地和通货膨胀挂起钩来，或者减少福利的真实增长速度。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面对一个代价巨大的庞齐骗局，而且每况愈下。它还留给我们一个武断和不公正的制度：从黑人、吸烟者、高收入人群、艾滋病患者以及单身者那里抢钱，再把它转给白人、非吸烟者、低收入人群以及配偶不工作的已婚家庭。它还让政府拥有为我们选择养老计划的权力。

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应当被废除。我们可以允许退休者和30年内要退休的人仍然拥有福利金，同时让年轻人自由地选择他们的退休储蓄方案。他们的境遇一定会比在当前的制度下要更好一些。我们的养老制度不应该建立在这样一种安排之上：当个人自行制定自己的养老计划时，他们居然要被关进监狱。

第十五章

以半价获得自由和健康

一个 70 岁的老头因腹主动脉瘤破裂而进了医院，他拥有医疗保障 (Medicare) ——政府适用于 65 岁以上老年人的健康保险项目。他在医院里待了三个半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在重病特别护理单元里住了两个月，还有 9 名顾问医生负责诊断他的病情。他活了下来。在冗长的恢复阶段，包括患者及其朋友、家人在内，没有人谈论过费用问题。所有医疗费用都由医疗保障来承担，一共是 27.5 万美元。病人的医生希望他戴上假牙吃东西，但这个人瘦了很多，原先的假牙已经不合适了，于是医生找来了一个牙医。牙医来过以后，那天晚上医生询问病人是否有帮助。那个人回答说：“哦，牙医当然能帮我，但那要花掉我 75 美元！对我来说这可是一大笔钱。我不准备这么做！”^[1]

上面这个故事颇具戏剧性地总结了我在 1982 年到 1984 年担任里根总

[1] James P. Weaver, "Pricing Health Care: The Best Care Other People's Money Can Buy,"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9, 1992, p. A14.

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卫生经济学家期间所学到的东西，当时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是马丁·费尔德斯坦。我学到的重要一点是：医疗保健的费用如此之高，正是因为我们自己支付的如此之少。如果我们的医疗费用从医疗保障和公共医疗补助（Medicaid，这是政府为穷人以及数量不断增长的收入超过穷困线的人而建的健康保险制度）中支出，那我们的医疗费用就是由纳税人支付的，所以我们没有激励去关心它要花多少钱。如果我们像多数美国人那样，用雇主提供的保险来支付医疗保健费用，那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其他人，比如保险公司要为我们买单一样，我们还是没有什么激励去关心费用问题。我们多数人花在医疗保健上的钱都是别人的钱，我们花别人的钱永远都不会像花自己的钱那样小心谨慎。

我们挥霍无度的一个表现是没必要的检查。医生经常为我们做一些非常昂贵的检查，涉及的都是些不太可能患上的疾病，因为病人自己不需要为测试付多少钱。比如，在一次关于医疗保健的白宫听证会上，副总统戈尔讲了一个故事，一次他的女儿吞了一根羽毛，急救室的医生希望给喉咙拍一张X光。戈尔正确地总结道，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要采用昂贵的检查来检验只是可能存在的病情，这样的制度一定出了问题。但他错误地认为问题在于医生。毕竟，是戈尔而不是医生把女儿送到了医院，同时他自己也清楚地知道吞下一根羽毛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戈尔的行为像我们许多人一样：在不需要自己花什么钱的情况下，尽管就诊没有多大价值，但他还是选择去看了，^[1]就像那位有医疗保障的70岁老头一样，医疗

[1] Christopher Byron, "Another Con Job: Clinton's Hustle on Health Care," *New York*, April 12, 1993, p. 14.

保障使他在作决定时不会考虑费用问题。就像我们多数人一样，戈尔花的是别人的钱。

在197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耗资8000万美元请兰德公司作了一次为期5年的健康保险实验，这肯定是历史上最昂贵的社会科学实验之一。几年内，接受实验的数千个家庭采用了四种保险计划。所有的计划都没有原初扣除额。换句话说，病人不用交任何最初支付（initial amount paid）。计划的主要区别在于自付率，也就是家庭所要负担的医疗费用的比例。自付比例分别是0、25%、50%和95%。如果一个家庭是零自付率，那保险方就会承担所有费用；如果家庭自付率为95%，保险方就只付账单中的5%。在所有计划中，如果家庭的现金支付超过了承保人称之为止亏点的1000美元，那保险方就会支付所有额外的费用。如果是95%的自付率再加上1000美元的止亏点，这就变成了一个可减免1000美元的大病保险方案。兰德公司实验的主要结果有：自付率高的家庭，其成员较少去看医生，支出医疗费用的次数也较少。那些零自付率的家庭在医疗保健上所花的钱要比有95%自付率的人高出46%。因此关键在于：花别人钱的时候，人们会在医疗保健上花更多的钱。有趣的是，兰德实验发现，低自付率家庭在医疗保健上花了更多钱，但并没有获得任何健康上的实质性好处。^[1]

正如参加该实验的经济学家纽豪斯（Joseph Newhouse）在1992年所指出的，兰德实验的一个重要推断就是，如果美国的所有人都采纳有家庭

[1] Willard G. Manning, Joseph P. Newhouse, Naihua Duan, Emmett B. Keeler, Arleen Leibowitz, and M. Susan Marquis, "Health Insurance and the Demand for Medical Care: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7, No. 3, June 1987, pp. 252~277.

高自付额的大病健康保险政策，我们的健康保险支出可以下降 30% 左右，^[1]那就可以多出 4% 的 GDP，我们能把这笔钱用到更有价值的地方去。这样的自付额应当有多高？1970 年代的 1000 美元相当于我们今天的 3000 美元。在这样的自付额下，我们不必再像今天那样把 GDP 的 14% 花在医疗保健上，只要花 10% 就够了。这是一个惊人的推断，它意味着只要实施有高自付额的医疗保险，我们就可以摆脱那些最没有价值的健康保险支出，该项支出所占 GDP 的比例和现在加拿大的情况相当，但美国人不需要像现在的加拿大人一样，必须承担价格管制和总是处于等候状态的代价。

避税 101

为什么我们的自付额会这么低呢？这主要是因为政府给了我们相应的税项减免。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系统是政府管制和征税制度无意中导致的结果。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实施整体的强制工资管制。这样，如果雇主想付给雇员的工资比管制允许的工资高的话，就要获得政府的许可。在一个动态的经济中，尤其是在政府用印刷钞票的办法应付战时支出的情况下，雇主往往需要提高工资来留住有高生产率的工人。这样，雇主就得找到一条可以合法地付给雇员更多钱的办法。工资管制阻止人们提高工资，但并没有在福利方面进行限制。许多雇主因此有动力提高健康保险。

给雇员健康保险的另一个好处是：这个支出可以作为费用从雇主的应纳

[1] Joseph P. Newhouse, "Medical Care Costs: How Much Welfare Los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6, No. 3, Summer 1992, pp. 3~21.

税所得额中扣除，雇主无须为此纳税，同时这项支出也不计入雇员的应纳税收入。所以，虽然二战以后工资管制结束了，但雇主和雇员觉得把健康保险作为工资补偿对双方都有利。美国国税局曾想把福利纳入应纳税收入，但是在雇主和雇员的抗议下，国会通过法律把健康保险立为免税项目。^[1]

当边际税率变高的时候，健康保险的避税收益也相应变高了。如果边际税率仅为 20%，那你每额外赚一美元就要付 20 美分的税，要是雇主少付一美元薪水或工资、多付一美元在免税的健康保险上，雇员就可以免去这 20 美分的税负。但如果边际税率是 40%，同样的转移就会免去 40 美分的税负。从 1950 年代一直到 1970 年代，除了 1964 年约翰逊—肯尼迪政府有一次大的减税动作以外，边际税率一直是上升的。所以，对雇主来说，把应纳税的货币收入转移到不需纳税的健康保险就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税率的提高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由于税级并不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因此通货膨胀会使人们进入更高的税率等级。第二，朝鲜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州政府引入了州所得税，而且多数州政府不断提高给定收入水平的所得税率。例如，在 1954 年，31 个州加上哥伦比亚特区向薪水和工资征收所得税，中等收入家庭所承担的一般税率是 2% 左右。^[2]到了 1981 年，41 个州外加哥伦比亚特区向薪水和工资征收所得税，中等收入家庭所承担的一般税率就变成了 4% 左右。^[3]边际税率提高

[1] Milton Friedman, "The Folly of Buying Health Care at the Company Stor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3, 1993.

[2]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for 1955*, ed. Harry Hansen, New York: New York World-Telegram and The Sun, 1955, pp. 636~637.

[3]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for 1955*, ed. Harry Hansen, New York: New York World-Telegram and The Sun, 1955, pp. 47~52.

的第三个原因是联邦政府提高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税率。在 1954 年，社会保障税率只有 4%；^[1]到了 1981 年，薪资税率提高到了 13.3%，现在已经是 15.3%。

考虑一下，雇主和雇员愿意把额外的美元放到应纳税的工资里还是放在健康保险里呢？比如说，雇员挣了 4 万美元，如果这个雇员的配偶能挣 25000 美元，那么这个家庭就处在 28% 的联邦税级上，社会保障税率雇主和雇员加起来是 12.4%；医疗保障税率雇主加雇员是 2.9%；这个家庭同时正处在 5% 的州边际所得税级上。因此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这个雇员的边际税率就应该是 $28\% + 12.4\% + 2.9\% + 3.6\%$ ，^[2]也就是惊人的 46.9%。差不多有一半的钱流到了各级政府手上，而雇员如果是以健康保险而不是现金的形式拿到这些钱，那他就可以免去这些损失。所以，只要雇员认为花在健康保险上的一美元的价值有 53.1 美分的增值^[3]，他肯定会倾向于健康保险。卫生经济学家们指出，这就是雇主采用自付额很低的健康保险的主要原因，雇员宁愿得到一张交给保险公司的 50 美元医生账单，尽管保险公司的处理费要 20 美元，雇主还是付 70 美元保险金用于最低赔付和处理费用。如果雇主支付的 70 美元是现金形式的话，雇员拿到手的只是 42 美元左右，而雇主实际上要花去 75.36 美元：70 美元加上雇主需要为此缴纳的 5.36 美元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税。

[1] 雇主通常会付一半的税，但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使雇主和雇员都可以逃税。

[2] 如果这家人在联邦税表上非常详细地登记扣除情况，那它能减少一些州所得税。5% 的州所得税进行扣除以后，就变成了 $3.6\% : (1 - 0.28) \times 5\%$ 。

[3] 100 减去 46.9。

这就是税法如何逼迫雇主提供给雇员低自付额的健康保险的过程。结果导致，雇员花在医疗保健上的钱都是别人的钱。这不是说他们在搭便车，很多他们花在健康保险上的钱本来就应该是他们自己的工资和薪水。但是，只要它花在保险上，就会变成好像是其他人的钱，可以随便花。

高自付额

在 1990 年代中期，我就医疗保健作过很多次演讲。我指出高自付额可以促使人们花他们自己的钱，于是人们就会更仔细地考虑他们所付的医疗保健费用，甚至会开始关心医生的收费到底是多少。

在一次演讲中，某位观众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因为他是自由职业者，所以他在健康保险上的扣税额很低。因此，他买了一个年自付额为 1 万美元的保险。后来他因为折断了胳膊去医院治疗，费用低于 1 万美元。当他手术后第一次去见医生时，他的医生告诉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要做大约 30 次物理治疗。他问医生每次要花多少钱，医生回答说，“80 美元。”这个人说：“我没有保险。能不能价格低一些，或者有其他更便宜的办法吗？”“你没有保险？”医生回答道。“好吧，让我告诉你治疗专家是怎么做的，你可以自己在家做。”

政府花费 VS. 私人花费

我们经常听人说，你所考虑的医疗保健是政府花费还是私人花费并不重要，因为两者在最近几十年中都有迅速增长。但事实上，它很重要。从

1970 年到 1999 年，政府在医疗保障和公共医疗补助上所花的钱从 123 亿美元提高到了 4030 亿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大概上涨了 663%。而在同一时段里，私人支出从 467 亿美元提高到了 6621 亿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增长了大概 230%，只是政府花费增长速度的三分之一。^[1]在 1965 年通过医疗保障法之后，国会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预测，到 1990 年，医疗保障下的医院医疗年支出是 96 亿美元。^[2]但事实上，到 1990 年它高达 670 亿美元。^[3]

这些数字说明，医疗保健上的支出膨胀主要是政府支出的膨胀。因此我对那种认为要控制医疗保健费用就要给政府更大权力的观点总是不以为然。而且，由于政府花费递增造成的对医疗保健需求的递增也会抬高医疗保健的价格。因此，私人部分费用的提高也要部分归因于政府在医疗保健花费上的递增。

双层系统

作为顾问委员会的卫生经济学家，我在华盛顿参加了许多关于健康保

[1] 支出增长率的数据来自 Suzanne W. Letch, Helen C. Lazenby, Katharine R. Levit, and Cathy A. Cowan, "National Health Expenditures, 1991," in *Health Care Financing Review*, Winter 1992, Volume 14, No. 2, p. 18. Updated data are taken from www.hcfa.gov/stats. Adjustments for inflation are made using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2] House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 98th Congress, 1st Session, July 30, 1965, Public Law 89-97, p. 33, cited in Peter J. Ferrara, "The Clinton/Gephardt Bill," Policy Backgrounder No. 133, Dallas: 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 p. 14.

[3] 1994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Federal Hospital Insurance Trust Funds, Washington, D. C., April 11, 1994, cited in Peter J. Ferrara, "The Clinton/Gephardt Bill," Policy Backgrounder No. 133, Dallas: 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 p. 14.

险的政策论坛。一次又一次，我总是碰到相同的一群由 30 到 40 人组成的健康政策分析家，他们分别在智囊机构、国会办公室，或者游说团体工作。演说分为两类：绝望型和幻想型。绝望型摆出关于各类政府医疗保健项目支出不断增长的消极数据，并哀叹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幻想型”的演讲者则列出医疗保健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非常严厉的解决办法。一种比较受欢迎的解决办法是“全球医疗保健预算”，要求各个地区的医疗保健支出都要受法律限制，如果你达到了预算限制，那政府就一分钱都不再多花了。有时是演讲者指出，用完预算的危险会使得预算制定者实行医疗保健配给制；有时则是听众中的某个人这么指出，然后演讲者表示赞同。有时候，其他医疗保健分析家的评论让我觉得他们喜欢政府配给这个主意。

我希望我能够指出第三条道路来勇敢地挑战绝望者和幻想者，那就是取消医疗保障和公共医疗补助。这个项目还只有 17 年的历史，在医疗保障和公共医疗补助出现以前，老年人和穷人都能够设法获得医疗保健。但事实上，我只是偶尔提出这个建议，通常，我只是建议采取适当的费用分摊机制，比如要求有公共医疗补助机制的人付 3 美元挂号费，或者一天付 50 美元住院费。我并不是想让政府从这种成本分摊机制中获得巨大的收入，而是希望省下巨大的费用，希望人们除了认为看病会损失时间以外，还应该知道存在其他成本，因此会进一步考虑医疗保健的费用问题。无论如何，对诸如医疗保健之类非常昂贵的事实行零定价是说不过去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建议废除医疗保障和公共医疗补助，建议实施费用分摊机制，我总是获得一种永恒不变的回应：“但那样会产生双层的医疗保健系统。”也就是说，一种系统是为富人的，一种系统是为穷人的。也许我

应该就此争辩几句，但我没有；我发现华盛顿的医疗保健政策是与政府必须在医疗保健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很难撼动。偶尔，当某个人提出了所谓双层机制的观点，但看上去愿意接受讨论的时候，我会这么说：

它并没有创造双层医疗保健制度；它创造了一个千层制度，就好像我们有千层的汽车制度、食物制度、住房制度一样。就算人们有相同的收入和财富，在汽车和食物上的支出也会相当不同，对医疗保健来说也是如此。而且，就像低收入的人有时会买昂贵的汽车，高收入的人有时会买便宜车一样，在医疗保健问题上人们也会如此。

人们通常的回击是医疗保健不像其他任何商品，因为它攸关生死，但汽车不过是普通消费品。我会指出多数医疗保健并非攸关生死，没有好好护理你的痤疮、你的背痛或你的眼睛并不会致你于死地。我还会指出，由于更大的车会更安全，价钱也更贵，因此购车跟生死问题也有点关系，但我们并没有让政府来帮我们买车。最后，我还要指出我们之所以需要那么多医疗保健，一个原因是价格被人为压低了；如果要我们承担全部的医疗保健费用，那我们就会在诸如锻炼、吸烟和饮食等生活习惯问题上作出更好的选择，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就会相应减少。

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跟我争论的人会同意我的所有观点，但他们还是希望政府对那些的确无法负担救命手术费用的人实施补助。我的回答是，对那些无法负担手术费用的人，即使在没有政府强制的情况，我们的社会也有办法把他们照料好。这包括医生和医院的慈善关怀（charity

care)，这是美国的光荣传统，以及来自朋友、家庭和邻居的互相帮助。（参与此类讨论以来，我已经成了两个社区基金的筹集者，为缺少健康保险及需要紧急的昂贵医疗保健措施的人提供服务。）当我这样说以后，人们通常会提出下面的异议：我们不能依赖于人们的慈善感情，因为这是不够的（请见第十一章我对此的回答）：让穷人向别人请求帮助会有辱他们的尊严。我一贯的回答是，向人们请求帮助并不可耻。当然有些人在请求帮助的时候会感到有失尊严，但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是政府补助，这是政府通过强迫人们纳税而获得的钱。对无辜的人施以强制，以此来减轻另一些人“不舒服”的感觉，这有什么正当性可言？！

科技进步的利弊

在193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杰出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问一位医学院同僚，他是否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医生治愈的人开始多过他们杀的人。那位博士考虑了一分钟，然后回答道：“从现在起的任何一天都有可能。”自奈特时代以来，我们已经有了很多进步，科技已经让这一天到来。正如西北大学的卫生经济学家韦斯伯德（Burton A. Weisbrod）在1990年代早期所写的：“50年前，内科医生和诊断医生之间没有什么区别。”^[1]他们那时候所能做的只是辨识病症并预测结果。但现在我们的确可以做一些事情了，因为有了很多有效的医学程序：肾脏透析，化学疗法，骨髓移植，器官移植，小儿麻痹疫苗，关节镜手术，CT检查，以及核磁共振。

[1] Burton A. Weisbrod, "The Health Care Quadrilemma: An Essay o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surance, Quality of Care, and Cost Contain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IX, pp. 523~552.

这些科技变革看上去很好，不是吗？它能挽救并延长生命。这是很好，但问题是：科技进步是医疗保障支出大幅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科技进步通常会降低费用，对医学来说也是如此。但科技进步也会使以前想不到的治疗程序成为可能，这些新的可能导致了支出的增长。在本质上，费用增长并不是坏事。放松管制所导致的机票下降引起了旅行的大量增加，因此也导致了总的飞机旅行费用的大幅提高。可是，人们花在机票上的都是他们自己的钱或是雇主及其他人自愿付的。但医疗保健的技术进步以后，多数花在老年人身上的钱都是纳税者的钱，他们对怎么花钱并没有发言权。想到里根政府在削减医疗保健保障支出上收效甚微，更谈不上废除，我发现自己私下里反倒希望医疗保健方面的科技进步速度慢一点。我还发现，其他卫生政策分析家们承认他们也有相同的想法。这是个很可怕的想法，因为科技进步速度放慢意味着那些本来不必那么早死的人现在就会死去。

卫生政策分析家仍然在担心科技进步，1990年《新闻周刊》中的一段话就是证据：

（人造心脏）的第一例样本在未来10到20年中还不太可能出现，但是一些批评者已经开始为此而担心——这个国家已经过分扩张的医疗保健项目每年要花上珍贵的25亿至50亿美元在那些数量很少的垂死病人身上。^[1]

[1] "Demises of a Miracle Heart," *Newsweek*, January 22, 1990, p. 53.

为此而担心？换言之，批评者所担心的是科技进步所延长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生命。大概，他们的担心和我一样：这种进步所需的费用多数是由纳税人而不是获益者承担的。

医疗保健是一种权利吗？

我们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很多人相信医疗保健是一种权利，而我们的许多法律也都建立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在我 1980 年代早期参与的各种讨论中，健康保险分析家们往往自以为是地宣称医疗保健是一种权利，很少有人对此进行挑战。只要我们假定医疗保健是一种权利，那么就会有人，一般来说是政府，来推行这项权利。他们向某些人征税，以此支出另一些人的保健费用。如果我们所有的医疗保健费用都由其他人支付，那除了时间成本，我们就没有激励去控制这笔费用，费用也就会没有上限。沿着权利假定进行逻辑推理，健康保健支出所占 GDP 的比例可能比我们现在的状况还要高，甚至可能是整个 GDP。然后我们就会彼此敌视，为别人也享有健康保险感到不满。所以，健康保险是一种权利这种假定最终会导致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在战争爆发以前，我们可能会要求政府插手对保健实行配给制。简而言之，这就是那些医疗社会化的国家中已经发生的事情。

但是医疗保健并不是一种权利。就像我的朋友查尔斯·胡伯（Charles Hooper）所说的，“医疗保健是一种交易。”你怎么可能对一项交易享有权利呢？医疗保健并不是像空气一样天然就免费的，而是必须由像你和我一样的人辛勤工作生产出来的。权利是对某人的要求，那谁是个站在交易另一方的不幸人呢，为什么仅仅因为我存在，他就不得不给我一些东西？

真正的权利是保护你免于伤害。你有生命权，这的确对我提出一个要求，但不是要求我负责你活着，而只是要求我不能杀你。你对某项交易拥有权利，这仅仅意味着交易的另一方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者有人要为你的交易买单。比如，如果你生病了，你有权进医院，那么医院有义务照顾你，要么就是其他人有义务为你付住院费。这种义务从哪里来的？就因为医院属于这个行业，所以就承担了这项义务？其他人仅仅因为赚了某个人认为应当纳税的钱，所以就承担了这项义务？

主张医疗保健是美国人的一项权利，认为医疗保健应当由美国政府来推行，这样想的人很少会同时主张这是世界上所有人的权利。比如，他们并不希望美国政府向人们课税，来为 10 亿印度人提供高品质的医疗保健，这样做马上就会使美国破产。所以，所谓的医疗保健权根本就不是一项权利，而是美国人或至少生活在美国的那些人的特权。此外，当各级美国法院判决以合法或非法形式移民到这个国家的人有权享受纳税人所建立的医疗保健和教育之后，许多本地纳税者（resident taxpayer）就有了很强的激励去反对各种形式的移民。边境巡逻队力量大增，制定非常粗暴的美国公民/居民报税表，以此类措施来确保工作的人都是合法居民，还在边境筑起铁丝围墙。这很大一部分要归因于将医疗保健的虚假权利合法化的尝试。

幸运的是，如果我们抛弃基于医疗保健是权利的观念而建立起来的管制和政府项目，并进一步抛弃掉那些认为供给医疗保健是一项特权的其他管制，那我们只要用一半的费用就能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顺便说一句，我所知道的卫生经济学家都认为当前的制度人为地提高了医疗保健的支出，通过控制供给的方式推高了价格。而且，就算是对大幅度解除管制并

解放医疗保健的提议有异议的卫生经济学家，据我所知，也都认为我的改革能够减低费用和价格，并且提高医疗保健的效率。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医疗保健经济学家们提出这样的改革呢？事实上，他们的确已经这么做了。我所提议的所有健康政策都是从其他卫生经济学家那里学来的。但在华盛顿担任卫生经济学家的几个月内，我学到的另一件事是，多数华盛顿的卫生经济学家已经完全放弃推行他们认为合理的改革的想法。我并没有放弃。

你的支出权

还有一个需要打破的观念，那就是政府应当有能力阻止人们购买自己想要的医疗保健。老年人往往愿意多付钱在医生服务上，即使超过医疗保障允许的范围，因为他们知道这么做会让医生把他们当病人来好好看待，而不是置之不理。但那些超过医疗保障设定的限度多收钱的医生会被判以重罪，并被处以一大笔罚款。讽刺的是，那些最热烈地鼓吹“医疗保健权”的人中，有许多也强烈地相信政府应当阻止医生和病人以协定一致的方式进行医疗保健交易。你会以为医疗保健权至少意味着政府不应当阻止你花自己的钱在医疗保健上。然而，这两个立场背后有一个根本的逻辑，那就是许多主张医疗保健权的人并不是真的在主张医疗保健权，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让政府经营医疗保健制度，替人们作出选择，阻止人们离开这个制度。换句话说，它所关乎的根本不是权利，而是权力。这些虚假权利的鼓吹者其实是希望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

我离开加拿大几年后，对许多人真正想要的是政府权力这一点才开始有模糊的认识。在加拿大，政府已经将健康保险国有化了，禁止医生和医

院向愿意自己付钱的人提供医疗保健。当我听到有人鼓吹说加拿大的制度使“每一个人都可以依法获得医疗保健”时，我就会指出，他们并非一定能获得真正的医疗保健。的确，根据法律，他们应当可以获得医疗保健，但同样真实的是，政府的制度创造了医疗保健持续的短缺。我的父亲在1990年代住院10天，只花了20元钱：每天2元钱的租电视机费，包括医生和医院服务在内的所有住院费用都是零。这种定价安排会造成短缺，这就是加拿大制度的问题所在。在经济学上，短缺的意思是：人们所需要的比能提供的更多，因此，政府就只能强迫人们等候治疗，对医疗保健实施配给制。

我在几年前飞到加拿大看望父亲，一位同行的旅客告诉我他这次是出来休假，回加拿大马上要做一次肺癌手术。他解释道，手术要等待数周之久，他总得在等候期间做点事情吧。温哥华政府的智囊团弗雷泽协会每年发布报告，估计在加拿大病人做心脏病手术、乳房切除术和各种其他治疗程序所需的等待时间。在1999年，从到公共医疗诊所（general practitioner）就诊到去看专科医生，一般的等待时间是3.7周，而从看专科医生到治疗，一般需要8.4周。^[1]因为医生不能向病人收取“医疗必需”的费用，所以他们常常不管病人的需要，也不提供服务。据一家加拿大媒体^[2]报道，1991年在多伦多，狗可以以300元的价格在24小时内进行CT检查，而人却要等3个月才能做相同的检查。为什么人不能够像狗那么方便地获得服务？这则新闻故事解释说，那是因为只有省健康服务部门才有权

[1] Martin Zelder, *Waiting Your Turn: Hospital Waiting Lists in Canada*, 10th ed., Vancouver: Fraser Institute, 2000, pp. 28~29.

[2] "Humans Wait in Pain, Dogs Don't," *The Daily Mercury*, Guelph, Ontario, June 14, 1991.

为人的 CT 检查付费。明白了吗？狗可以在 24 小时内进行 CT 检查，因为政府不关心狗；人不能付钱，要等待好几个月，那是因为政府“关心”人。在电影《铁窗喋血》中，虐待狂监狱长向路克解释说惩罚是为了他好，路克回答说，真希望不要对他那么好。许多加拿大人可能也希望政府不要对他们那么“好”。

同样的，由于医疗的社会化，许多加拿大年轻女性现在尝试自然分娩。一位安大略医生进行硬膜外麻醉只收费 100 元，而在美国则需要 1000 元。以这种价格，当一位要分娩的母亲希望麻醉专家在凌晨三点等候时，他们一般不会这么做。^[1]而不管一位妇女有多么需要硬膜外麻醉，她也无法为此而付钱。

你也许会想到，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一些加拿大人可能会因为缺乏及时的治疗而死去。事实的确如此。例如乔尔·邦迪，他是加拿大一个两岁的小男孩，他需要的心脏手术一再延期。他的父母联系了“心跳温莎”项目（Heartbeat Windsor），他们为乔尔在底特律安排了手术。媒体曝光了这件事以后，加拿大官员因为担心这会对他们的社会医疗制度造成负面宣传影响，就许诺把乔尔放到等候名单的最前列，只要他放弃去美国的治疗。他的父母同意了。在乘坐了 4 个小时的救护车之后，他来到了多伦多的医院，但那里没有空床位。一家人只好在旅馆过夜，第二天，乔尔死了。^[2]

有趣的是，掌权者对社会化会限制医疗服务的数量并降低品质认识颇深。当已故的魁北克省长伯拉撒（Robert Bourassa）要治疗他的皮肤癌

[1] Danielle Crittenden, "Don't Give Birth Up Her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31, 1994.

[2] John A. Barnes, "Canadians Cross Border to Save Their Lives,"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2, 1990.

时，他也不认为加拿大的社会医疗制度已经足够好了。反之，他直接去了华盛顿的国家癌症协会。^[1]

很难说加拿大政府为医疗保健提供了担保，如果说有，那也和“担保”一词一般的意义不同。事实上，政府真正担保的是，如果你获得了医疗保健，那就不能再为此付钱，而且这个担保使你不得不等待以获得医疗保健。政府还作出了其他的担保：如果医疗保健的提供者想开自己的诊所，并向愿意就诊的人收费，政府就会关闭它们。即便我把这些告诉主张加拿大式医疗保健系统的人，他们通常也不愿意放弃对社会医疗制度的信仰。我觉得这很奇怪，因为他们说自己支持社会医疗制是想让每个人都得到医疗，我也相信他们所说的。但是，许多社会医疗制的提倡者看来更愿意让每个人被迫进入一种配给制度，而不是由政府提供基本保障，同时允许那些不愿意接触这个制度的病人和医疗提供者自行其是。所以，错误地相信医疗保健是一种权利，到头来就变成了要阻止人们获得合适的医疗保健。因此，我的结论就是它所关乎的根本不是权利，而是权力。

在克林顿 1993 年的提案中，我们看到关于医疗保健的讨论也有同样的逻辑。看上去克林顿强烈地相信医疗保健是一种权利，但他们禁止人们购买医疗保健。他们计划的核心是政府垄断、价格管制和医疗保健支出的政府强行限制。在那个时候，《理性》杂志（*Reason*）的编辑帕斯楚对此作了最好的总结：

[1] Stuart M. Butler, "A Policy Maker's Guide to the Health Care Crisis, Part 1: The Debate Over Reform," *Heritage Foundation*, February 12, 1992.

这个计划的核心还不是过于昂贵，它是对机会和竞争的攻击。在令人头皮发麻的厚厚一叠官僚文章的背后，这个计划取消了所有可接受的规避办法，堵住了多元化的任何可能来源，消除了对创新的激励。它对新药进行价格管制，禁止医院和大学培训超过限定数量的专业人员，要求城市健康计划也服务于农村地区，并把自费医疗定义为犯罪。^[1]

好消息是国会和多数美国人都拒绝了克林顿的方案，坏消息是克林顿仍然取得了一些进展。正如经济学家特怀特（Charlotte Twight）在一篇非常深刻的文章^[2]中指出的，1996年通过的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将某些类型的医疗执业视为非法，并通过强制性的全国电子数据库侵犯医生—病人关系的隐私。内科医生并非出于个人利益地要求在一个实验室进行检查，最高罚款可达1万美元。如果医生在医疗保障的账单中写入没有被医疗保障认可的预防性服务，这会被看作是犯罪行为，还会被打上骗子的烙印。有没有欺骗医疗保障的动机并不重要。根据阿尔帕医生所说，监控医疗保障的医疗保健财务管理（HCFA）被控干涉医疗实验室，设立项目监视内科医生并报告“可疑的”分类测试模式。合作实验室被告知，如果他们乖乖地接受审计的话，HCFA就会对他们好一些。^[3]

[1] 重印经允许，December 1983 issue of REASON Magazine © 2001 by the Reason Foundation, 3415 S. Sepulveda Blvd, Suite 400, Los Angeles, CA 90034. www.reason.com。

[2] Charlotte Twight, "Medicare's Origin: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Dependency," *Cato Journal*, Vol. 16, No. 3, Winter 1997.

[3] Dr. Philip R. Alper, "Free Doctors from Medicare's Shackles,"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5, 1997.

让我花钱治我自己的病……求求你了

在2000年5月，威尔斯通参议员这么说制药企业：“我们有一个产业，它利用人们的不适、痛苦和疾病来获得不正当的利润。这是下流的。”前半部分是对的：医疗保健的提供者通过人们的疾病来赚钱，就像食品行业通过我们的饥饿来赚钱一样；但食品行业并没有靠让我们继续饥饿的方式来赚钱，它赚钱的办法是喂饱我们。同样，医疗保健企业应当以让我们健康的方式来赚钱，而不是让我们继续难受。

1995年秋的一天，我突然觉得很难受。我的体液不断流失，不到24个小时就轻了10磅。妻子把我带到蒙特里半岛的社区医院。在那里，我躺在一个安静的单间里，一张干净、舒适的床上，静脉注射设备将8磅的液体注入我的身体。之后的24小时我睡了22个小时。一天的账单是2000美元多一些，多数都由我的健康保险来支付，当然我也会很愿意由自己全额支付这些钱。医生后来告诉我，我身体中的每个细胞都损坏了，如果那个晚上我没有去医院的话，可能我就会死去。接下来的几个月，每当我经过那家医院，我都会兴高采烈。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有时也会给医院一个默默的吻。在那里工作的男男女女并不认识我，甚至也不关心我，但却尽力来治疗我，可能还救了我的命。虽然他们很乐意治愈病人，但如果没有人付钱的话，他们是不会留下的。他们通过我的疾病赚钱。保佑他们。

感谢世界上数不清的陌生人在实验室整夜工作，努力发明新药来治疗我和我关心的人可能患上的疾病。除了他们对自己工作的信念以外，许多人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药物企业会付钱给他们；药物企业的动机则是通过开发可以治愈疾病挽救生命的新药来赚上一大笔。想一想你的家庭。

我打赌你一定能想到几个得了重病的家庭成员，要是这些新药早点出现，他们也许就可以避免这些病了。我家就是这样：我的父亲和我的姐姐在1952年前都得过小儿麻痹症。不幸的是，制药公司要到1954年2月才生产出高质量的小儿麻痹症疫苗。^[1]现在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不会得小儿麻痹症，但这要感谢一个想为股东挣钱的制药公司和那些想要为自己及家人挣钱的科学家们。我绝对愿意让人们通过发现治愈我的疾病的办法来赚钱。

用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你真的想得到某样东西，那你自然就愿意多付钱。反之，如果你嘴上说非常想要，却不准备为此付出很多，这就让我想起一个过去的笑话：一个要做手术的人想找这方面最好的外科医生。当然，有很多人也想得到这位医生的服务。当这个人出现在外科医生的办公室时，医生说可以为他做这个手术。

“要花多少钱？”那个人问。

“2.5 万美元。”医生说。

“我无法负担 2.5 万美元。”那个人回答道。

“我理解，”外科医生回应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可以收费 1.5 万美元。”

“我无法负担 1.5 万美元。”那个人回答道。

“好吧，”医生说，“我可以给你优惠，我偶尔可以打折。5000 美元怎么样？”

[1] Richard Carter, *Breakthrough: The Saga of Jonas Salk*, New York: Trident Press, 1966, pp. 216~217.

“我无法负担 5000 美元。” 那个人回答道。

“我不明白了，” 医生说，“你知道我是这行里最好的医生，那你肯定已经知道我的价格了。为什么你不去找另一个医生呢？”

“那很简单，” 那个人说，“当关系到我的健康时，我就不考虑钱了。”

认为通过治愈我们的疾病来赚钱的方式是错的，这种观点不仅是头脑发昏，而且如果持续下去的话，会为害甚烈；同时它也非常不道德。怎么可能挽救你的生命是好事，而人们因此赚钱却是错的呢？怎么可能酒商和冰淇淋商赚钱是对的，而治病的人赚钱就是错的呢？一瓶好酒比治疗艾滋病或癌症还要重要吗？那种认为医疗保健不应当有赢利动机的观点要么没有好好思考它所可能带来的结果，要么就深刻地反映了病态的价值观。

让我补充一点，如果人们操纵制度阻止竞争，以此从你的疾病中赚钱，那的确是不应该的。医生们之所以赚这么多钱，主要是因为州政府引入了执照要求，阻止有能力没资格的人成为医生。在我教书的海军研究生院，许多医疗服务队的军官都是想要成为医生却没办法获得执照的人。当然，你也许会说他们不会成为好医生。但按我的看法，其中多数人其实都能成为非常好的医生。有一个经济学家提出了适用于多种职业的市场解决方案：让消费者来作出他们自己的选择。没有政府机构说你必须得一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才能成为经济学家。要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博士学位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我所认识的一些最差的经济学家，他们对市场如何运作没有任何基本理解，但他们都有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其中有不少还毕业于一流大学。相反，三个我认为可以列入前 500 名（美国一共有超过 5 万名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从没有得到硕士学位，更不要说

博士。^[1]要是政府要求他们必须获得成为经济学家的执照，那我们很可能就看不到他们的贡献了。

同样，执照让许多有能力有创造性的人不能从事医疗职业，减慢了创新的速度，抬高了医生所收的费用。我们应当结束执照制度，代之以认证制度。想一想，许多电器设备上都有两个字母，有了它我就相当放心，肯定不会在使用中被电死，这两个字母是什么？答案揭晓：UL，保险商实验室（Underwriters' Laboratory）的缩写。保险商实验室是一个纯粹的私人组织，收费检验和确认各种物品的安全性。事实上，他们就所认证的产品向制造商收费，这创造了内在的利益冲突。但是 UL 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抵消这个激励，他们的董事会中加入了保险公司的代表。保险公司有很强的激励来确保 UL 认证的准确性，因为不安全的产品会让保险公司赔大钱。同样，不管有没有政府的认证，如果消除了医疗职业的执照障碍，马上就会有私人认证机构来检验医疗专业人员的质量。

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组织准备好成为此类认证机构了：它们被称作医疗管理组织（MCOs）。多数医疗管理组织目前并不对医生的水平进行判断，那只是因为州政府机构已经把这件事给做了。当政府离开这个行业以后，医疗管理组织就有激励取而代之了。其实，最早也是最知名的医疗管

[1] 他们是 Gordon Tullock, Alan Reynolds 和 David Friedman。Tullock 拿了一个法学学位，一生中只上过一门经济学课程，写了数十本经济学专著和数百篇经济学学术论文，差一点与他的长期合作者布坎南在 1986 年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Reynolds 完成了经济学的硕士课程，但没有写毕业论文，后来他成了位于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智囊机构哈得逊研究院的首席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儿子 David Friedman 拿的是物理学博士学位，从没有上过一门经济学的课程，但是他接受过这个国家最好的经济学教育，那就是他父亲的教育。David 现在是圣塔克拉拉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法与经济学方面写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著作。

理组织“凯萨医疗网”（Kaiser Permanente）多年来已经在对医生进行认证了。凯萨网雇用医生并付给他们薪水，这已经蕴含了对医生的认证。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62年的经典之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中预测道，有了私人认证之后，医疗集体就会形成“医疗百货公司”。^[1]就像百货公司通常会明示或者默认地对他们所卖的商品的质量进行担保，“医疗百货公司”也会这么做。即使在政府执照制度存在的情况下，这种演化也会发生，逐渐让政府认证失去意义。但问题是政府执照会限制人们的这种实践，而且，这么做所回应的并不是市场，而是医生所拥有的政治权力。

在接下来的几年，政府执照带来的问题会更为明显，因为该限制会减慢甚至阻止互联网所创造的医学进步。现在，一个艾奥瓦州达文波特的病人可以让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医生来看病。但是，州管理机构在中间挡着，坚持说在网上看病的医生已经虚拟地在病人所住的州正式行医，因此也必须符合行医州的执照标准。^[2]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私人认证机构都不会妨碍这种进步。

FDA 如何用救命的药“拯救”我们

政府在医疗保健方面阻止竞争的另一种方式是处方药。政府以两种方式阻止竞争，第一种是我所赞同的，第二种不是。第一种，政府授予药物开发者专利，并给以17年的合法垄断权。没有专利作为奖励的话，企业就没有足够的激励去开发我们需要的好药。然而，另一种方式是不公正的，它导致成千上万人不必要地提前死去。我指的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管制。

[1]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 159.

[2] Bill Richards, "Hold the Phone: Doctors Can Diagnose Illnesses Long Distance, to the Dismay of Som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17, 1996, p. A1.

几乎所有在 20 世纪中叶前出生的人都记得沙利度胺 (thalidomide) 的故事，这是一种在 1950 年代晚期上市的药，帮助怀孕妇女减轻晨吐症状。这种药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副作用：它会让某些婴儿四肢畸形。由于沙利度胺造成的悲剧，FDA 通过 1962 年的修正案获得了新的权力：在 1938 年以来就对新药的安全性进行管制之外，还增加了对药效的管制。请注意一件有趣的事：沙利度胺事件被用来作为建立药效标准的理由，可是沙利度胺的问题其实是关于安全性的，而不是药效。没有人说沙利度胺在帮助减轻晨吐症状上是无效的，而是它对婴儿造成了可怕的后果。

这不过用一个悲剧作为借口展开与阻止类似悲剧无关的管制，是个先例而已。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联邦政府对地下煤矿的安全性管制，我发现这当中也出现了相同的事。在 1968 年，西弗吉尼亚州的法明顿发生了一场大爆炸，死了 78 个人，如果遵循现有的联邦安全标准的话，这场爆炸是不会发生的。结果，美国国会在 1969 年通过了一条法律，增加了并不会有助于防止爆炸的新管制条例。国会只不过用这场爆炸作为增加新法的正当理由而已，这只是因为各种利益团体，包括联邦官僚机构本身，需要新的管制，而且愿意利用任何借口来获得它。

经济学家们已经对药物的效力管制作了数不清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这些管制会拖延新药的上市时间达数年之久，往往还要给这种新药增加数亿美元的开发成本。圣塔克拉拉大学的经济学家丹尼尔·克莱因 (Daniel Klein) 调查了所有经济学家关于 FDA 管制效果的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全部在批评 FDA 对新药的垄断权力。^[1]比如，塔夫斯大学药物开发

[1] Daniel Klein, "Economicists Against the FDA," *Ideas on Liberty*, September 2000.

中心的研究员发现，FDA 在 1985 年到 1986 年所核准的 46 种新药中，有 33 种平均 5.5 年前已经在外国市场上市了。^[1]这种拖延完全是由于 FDA 的“好心”。

这种拖延在杀人。在 1988 年 12 月，FDA 核准了一种新药米索前列醇 (Misoprostol)，用来预防由阿司匹林和其他不含类固醇的消炎药所引起的胃溃疡。在其他国家，米索前列醇 1985 年就已经上市。竞争企业协会 (华盛顿的一个公众利益游说团体) 的 FDA 专家卡兹曼 (Sam Kazman) 使用 FDA 自己的数据，发现米索前列醇每年可以挽救 8000~15000 人的健康。^[2]也就是说，FDA 的延迟造成了超过 2 万，最多甚至可能达到 5 万无辜生命的死亡。要知道，这只是被拖延的数百种新药中的一种。

真正的悲剧是，这些管制其实并非必需。FDA 在药品安全和效力方面也许是有些专业知识，但是在个人对各种风险的内心权衡方面，只有自己才是专家，FDA 的科学家们则是十足的外行。在这章的前半部分，我提到了我的朋友查尔斯·胡伯，他也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现在是一家生物科技咨询企业的合伙人。查尔斯写道：

一个病人选择何种治疗方式（在医生的帮助下）基于许多变量：效力，忍受度，副作用，风险，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比如，麻烦），治疗速度。这些药物的成本和收益必须在私人价值观和利弊权

[1] K. I. Kaitin, B. W. Richard, and Louis Lasagna, "Trends in Drug Development: The 1985~86 New Drug Approvals,"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27 (August 1987): 542~548.

[2] Sam Kazman, "Deadly Overcaution: FDA's Drug Approval Process," *Journal of Regulation and Social Costs*, Vol. 1, No. 1, August 1990, pp. 42~43.

衡的背景下才能进行判断：对死亡的恐惧，对手术的恐惧，对医院的恐惧，潜在的疼痛，以及个人的健康态度，财务状况，时间的价值，健康的价值和风险容忍度。FDA 不能从单个病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因此由 FDA 来做这种复杂的权衡并得出个什么结论是荒谬的。A 的最佳选择也许是 B 的最差选择。我们已经看到艾滋病人说：“如果我得了癌症，一年花 2 万美元来治疗，我才不会去治呢，因为没有癌症我也会在 6 个月中死去。”他们不会去进行医学治疗，而是去买洗衣机或者干脆度假，虽然我们会觉得这很可笑。这就是冯·米塞斯所说的：中央官僚缺乏必需的信息，因此不能作出合适的选择。^[1]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 FDA 在 2000 年 7 月封杀了一种胃痛药西沙必利 (Propulsid)，因为 FDA 认为它与 340 例危险的不规则心跳有关，其中有 80 个人死亡。听上去很合理，对不对？但是，对某些患大脑性麻痹的人而言，西沙必利仍然是一件天赐之物。22 岁的病人奥尼尔只要消化食物就会疼痛，然而政府禁止他使用惟一能帮助消化的药，西沙必利。^[2] FDA 制订了严格的标准，要求制药企业必须进行特别的科学研究。这当然提高了病人和制药企业的成本，降低了该药的价值，也让发掘该药新用途的做法变得不划算。花生过敏会杀人，人们知道自己对此过敏，当然就会避免吃花生，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花生可能致死就把它给禁了。如果花生是药，FDA 可能真会禁了它。

[1] Charles Hooper, Letter to David Henderson, September 18, 1995.

[2] "Drug ban brings misery to patient," Associated Press, November 11, 2000.

不管是从安全性还是低成本方面考虑，要拥有更多有用的药，解决方案就是取消 FDA 在药物方面的垄断权，并让病人自由使用医生所开的任何药。FDA 要变成一个药物的认证机构而不是管制者。未经 FDA 认证的药将会带上警告的标签，和香烟盒上的有点类似，上面说：“警告：该药未经 FDA 认证。”

购药者可以分成两种人：喜欢选择 FDA 禁药的人，以及只买 FDA 认证药物的人。对前者而言，他们有了新的选择，而且相信自己的处境会变得更好。后者会拒绝这些新选择，但这对他们并没什么影响。

此外，如我在第十二章已经指出的，如果 FDA 是一个认证机构而非管制机构，那么病人和医生就会开始信任其他的信息来源。什么来源？很多很多。在欧洲，欧洲药物评审局（EMA）与许多国家机构进行竞争，因此一个国家中的药物企业可以选择接受国家机构还是 EMA 的检查。在美国，医生也经常依靠美国医院药典服务这样的私人认证机构。

不幸的是，FDA 不满足于对新药制造的垄断权力，它还寻找限制医生不按核准标示使用合法药物的办法。根据医学博士（M.D.）、博士（Ph.D.）、现为美国医学协会药物及毒物部主任班尼特（Donald R. Bennett）的说法，所有药物中有 40%~50% 的用途是在核准标示以外，60%~70% 用来治疗癌症的药以及 90% 用在儿科上的药用法也都在核准标示以外。^[1] FDA 的分支药剂销售、广告和沟通部门（DDMAC），会寄例行警告信给宣传药物核准标示以外用途的药物公司，尽管这广告其实只是重

[1] Andrew A. Skolnick, "Pro-Free Enterprise Group Challenges FDA's Authority to Regulate Drug Companies's Speec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February 2, 1994.

印由同行评审 (peer-reviewed) 的医学期刊论文寄给医生。虽然 FDA 并没有法律权力提出这样的要求, 药物企业一般还是会服从它的警告, 因为它们害怕 FDA 会减慢核准新药的速度, 这对药物企业和病患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事情。^[1]有趣的是, FDA 很少宣称药物是无效的, 它们只是说 FDA 不确保这些药品具有所宣传的用途。当我 1995 年在 FDA 关于市场限制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 我的证词^[2]中引用了 FDA 警告信的内容。可以想像, 我关于 FDA 的证词要比各种制药公司强硬得多, 因为我没什么好怕的。

我作完证以后, 许多制药公司的雇员过来感谢我说了他们不敢说的话。一些人告诉我说, 他们想拍手喝彩, 但是不敢。不过, 一位制药行业的员工走过来, 看上去苍白和憔悴, 他公司的首席律师陪在旁边。他批评了我, 因为我在证词中引用了他对 FDA 的批评。(我是在访问了他并获得允许之后引用了他以前所发表的文章。) 他解释说他们企业有一种很重要的新药在等待 FDA 的审批, FDA 有可能因此延迟核准, 这会让公司损失重大。我向他道歉。一家与药物行业没有关系的公益律师事务所就此进行起诉, 并获得了限制 FDA 权力的法院判决。不幸的是, 这种限制没什么用, 因为 FDA 在上诉书中说, 他们从没有要求过管制权。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 因为就如前面所提到的, 不遂他们心意的企业总会在其他方面受到惩罚。我们经常听人说, 在美国人们一直享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意

[1] John Calfee, "The Leverage Principle in the FDA's Regulation of Information," in *Competitive Strategies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ed. R. B. Helms,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96, pp. 306~321.

[2] 我的证词以及之前的政策分析, 请见 www.davidrhenderson.com。

味着不会被人监、罚款，或者被政府以其他形式惩罚，可以自由地言说。但在今天的美国，联邦政府已经限制了制药企业员工的言论自由，牺牲品则是那些得不到有效药物的病人。

对未来的展望

我们太习惯于医疗保健部门的高价格和无效率了，多数人很难想像还有另一种处理事情的方式。我怀疑我们对医疗保健的惰性比任何其他部门都要严重，这许多人举起手来说：“让我们摆脱所有原来的制度，实施加拿大式的国营体制吧。”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进行医疗保健体制改革，只要几年时间就能逆转政府累积了几十年的问题。

适度的改革：市场如何处理成本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已经厌倦了极其昂贵的医疗保健体制，某些人打算为此做些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没有任何政府激励的情况下，1980年代会出现像凯萨医疗网这类健康维护组织（HMOs）。在健康维护组织中，投保人付固定的年费给护理的提供者，同时也是承保人，护理提供者会选择是否将病人送到专家那里去。其他保险公司也已经采用了所谓“有管理的保健”（managed care），在这种制度下，病人要去某家医院或进行某种检查之前都要获得保险公司的允许。以前，没有人对过多的医疗保健费用说“不”，医生和其他护理者从病人的费用中获益，保险公司则被动地买单。但现在，健康维护组织和“有管理的保健”制度开始产生激励去说“不”。卫生经济学家德雷诺夫（David Dranove）指出，在1990年代早期，多数明眼的观察家都预期美国医疗保健体制的支出要从GDP的

14% 上升到 2000 年的超过 18%。事实上，它停留在 14% 这个份额，德雷诺夫认为这主要应该归功于有管理的保健。他指出有管理的保健可以为有私人健康保险的人一年节省 2000 美元。^[1]

医生们经常抱怨不得不打电话给一个年轻、匿名、没有见识的人，经过他的许可才能进行某些治疗和检查。但在电话那端的人可不仅仅是在编造一个答案：他是在一个专家所创造的系统中寻找答案。当然，有管理的保健组织会犯错误，但是医生也会犯错，而且有管理的保健组织的优势在于它们能从上万个案例中归纳出答案，而最有经验的医生也不过能有几百例的经验。

激进改革：除掉那些大麻烦

政客们在考虑医疗保健的时候，往往会在不理解根本问题的情况下处理表面症状。今天被抱怨最多的症状就是医疗保健的高成本，以及人们没有保险。我已经说明了医疗保障、公共医疗补助和免税代码（tax code）是如何导致了高昂的医疗保健费用和保险费用：医疗保健的花费这么巨大是因为他们个人只需要付一点点钱。

人们在医疗保健上花其他人的钱，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废除导致他们这么做的法律，先从雇主提供健康保险开始。

政府并不需要强迫雇主为雇员购买有高自付率的健康保险，只要政府结束对健康保险的优惠纳税条件就可以了。有两种办法，一是由国会宣布

[1] David Dranove, *The Economic Evolution of American Health Car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62.

雇主为雇员所买的健康保险属于应纳税收入。这在政治上可能不受欢迎，因为这意味着雇主和雇员都要纳很高的税，而且让患上权力饥渴症的联邦政府拥有这种权力也是相当危险的；另一种办法就是每年给员工一定数量的补偿，比如 4000 美元。这是免税收入，雇员可以用它来买健康保险或放到类似个人退休账户的医疗储蓄账户里。^[1]如果雇员想在每年有额外补贴（比如说 2000 美元）的大病保险政策和有 4000 美元补贴的低自付率政策之间进行选择，他可以自己决定选哪一个。但是他要花自己的钱，而且他知道如果现在不花这笔钱，他也能够把它积蓄起来支付未来的医疗账单，或者就一直积蓄到退休为止。

考虑一下这个税制改革会如何变革和“激励”医疗保健市场。假设一个有 2000 美元自付额的人在考虑是否要去看医生，这个人知道所有的钱都要他自己出。我们首先假定他准备去。那么，他会事先了解他要付什么钱，会价比三家。就算他没有事先去了解，事后也会知道费用，并把它列入以后是否去看、看哪个医生的考虑范围之内。假定医生给他开了一种药，突然之间，他就有了很强的积极性去找出是否存在同样药效的无品牌低价药。在这之前，他不会这么做，因为节约下来的钱只有 15% 是他自己的，而现在则保留了 100% 的价格差。而且，如果能够等的话，他也许会从打折的邮购供应商那里买药，而不会选择当地的药店。

多数人可以想像医生有报价，而且很多医生已经这么做了，但是人们很难想像由医院来报价。可如果人们花的是自己的钱，医院就会告知他们一个约定价格。正如卫生经济学家古德曼（John Goodman）指出的，医

[1] Goodman and Musgrave, *Patient Power*.

院和医生在整容手术上会报价，因为这些病人花的是自己的钱。尽管有包括医生、护士、麻醉师和医院在内的多方参与，但病人通常可以事先得到一个一揽子的价格（package price）。古德曼总结道：“花自己钱的普通人可以得到大雇主、大保险公司，甚至联邦和州政府都无法得到的价格信息。”^[1]

就像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一样，医疗保障和公共医疗补助使人们倾向于购买昂贵的医疗保健，这就使得医院方面推高了费用。而且，医疗保障给了联邦政府借口来管制医生的费用，这就让许多医疗保障下的病人更难获得医疗。到了最后，如果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医疗保障会吃光联邦预算的增长部分，还会要求在10到20年之内大幅提升薪资税。最好的改革方法就是同时取消这两者。对今天的多数人而言，取消医疗保障和公共医疗补助是不可想像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习惯于有这两项东西，但对1965年医疗保障和公共医疗补助开始以前的老年人和穷人来说并非如此。那时的医疗保健是很便宜的，部分是因为医疗保障和公共医疗补助还不存在，没有推高医疗成本。而且，这个国家一直存在着慈善医疗的强大传统：医生和医院愿意减少费用，经常为需要的人提供免费医疗，捐钱给医院的现象也很普遍。当“我把钱给了政府”这种想法不再有意义时，这个传统就会再度复兴。很难相信那么多人表达出的对老年人和穷人的关心是假的，如果你认为没有政府项目，老人和穷人就会没有医疗保健的话，那其实你就在怀疑这种善心。

[1] John G. Goodman, "Health Insurance," in David R. Henderson, ed., *The Fortun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p. 685.

基于简单的正义原则，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要求更快地终结公共医疗补助。公共医疗补助在本质上是一个福利项目，它的领取者只缴了很少的税；而虽然医疗保障也是一个福利项目，但多数领取者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还是付了钱的。医疗保障的过渡办法是将之现金化，具体做法是：将前一年的公共医疗保障预算的数目除以适合条件的人的数量，然后给他们每个人一张写有这笔钱的支票。他们可以用这张大概是一年 5000 美元^[1]的支票去买健康保险、医疗保障或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这张支票的数额大概每年减少 2%，所以这个项目将在 50 年内结束。目前还在这个项目中的人以及还有几年就要退休的人因此会有一个很轻松的过渡期，剩下的人则有足够的时间来为自己的老年医疗费用存钱。

前总统克林顿也提出了废除公共医疗补助的理由，尽管他的说法不一样。在讨论他的医疗保健计划时，克林顿指出那些通过公共医疗补助获得免费健康保险的人缺少激励去获得一份没有健康保险的低工资工作。他的“解决方案”是要求工作必须有健康保险，这实际上会进一步降低工资，而且并不必然会使得工作比福利救济和公共医疗补助更具吸引力。真正的解决方案是结束公共医疗补助！

另一项政府干预也会使健康保险变得很昂贵，而且会让许多人失去健康保险。这项干预就是政府对健康保险的管制。

[1] 2000 年联邦政府在 3980 万受益者身上大概花了 1970 亿美元的医疗保障（来自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01*, p. 370）。（来自 Marilyn Moon, *Growth in Medicare Spending: What Will Beneficiaries Pay?* Urban Institute, January 1999。）

没有保险通常都是暂时情况

许多人相信年复一年，美国 4300 万没有保险的人都是同样的人。想像一下你给这 4300 万人拍张集体照，5 个月后再给当时的 4300 万没有保险的人拍张照。两张照片中同时出现的人的比例是多少？大概是 50%。换句话说，有一半没有健康保险的人在 5 个月后能够拥有健康保险。为什么他们会在短时间里失去健康保险？因为美国的多数工作都会给有需要的雇员提供健康保险，而没有健康保险的人很多都是失业人员。对在某一年份中失业的多数人而言，这是个短期现象（今天，失业的中位持续时间是 7 周^[1]），因此没有健康保险也是短期的。在某段时间没有健康保险的人只有 15% 在两年后还没有健康保险。^[2]也就是说，在美国 2 亿 8 千万人当中，只有 650 万人，或者说不到 2.5% 的总人口，没有健康保险的状态持续超过两年以上。但是，没有健康保险并不等同于没有医疗保健。事实上，除了自愿放弃治疗的人以外，美国任何一个需要医疗保健的人都能得到治疗。

有两种管制特别有害。第一种，联邦政府和许多州政府禁止雇主向员工提供单纯的高自付额大病保险。它们怎么做到这一点？通过控制保险的范围。许多州政府要求雇主的医疗计划必须包括艾滋病、酒精中毒、滥用

[1] Hoyt Bleakley, Ann Ferris, and Jeffrey Fuhrer, "In a Booming Economy, Unemployment Has Remained Surprisingly High," *Regional Review*,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Boston, 1999.

[2] Katherine Swartz and Timothy D. McBride, "Spells Without Health Insurance: Distribution and Their Link to Point-in-Time Estimates of the Uninsured," *Inquiry*, Vol. 27, Fall 1990, pp. 281~288.

药物、针灸以及人工授精。在佐治亚州包括心脏移植，在明尼苏达州包括植假发，在马萨诸塞州甚至包括精子库内的精子存放。^[1]

联邦政府对雇主提供的保险有三种主要的控制办法。1978年通过的联邦怀孕法要求雇主所提供的保险必须包括怀孕。MIT 经济学家格鲁勃 (Jonathan Gruber) 发现1978年的法律主要为了让处于怀孕期的女雇员得到工资，这意味着没有孩子的妇女要补助那些有孩子的。^[2]格鲁勃还指出在1975年到1981年之间，每千人剖腹产率翻了一倍。^[3]剖腹产比顺产的费用高，但是按照联邦的要求，病人无需直接承担这笔费用。在1990年代，联邦政府开始规定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要覆盖顺产妇女至少48小时的医院看护费用。同时政府还开始要求将更多昂贵的精神健康项目纳入保险。结果，不想要这些项目的雇员和不想提供这些项目的雇主就倒了霉。雇主不能给出一个收费较低同时工资扣减也较低的单纯健康保险政策，而必须提供昂贵的项目，这也就意味着数量较大的工资会被扣减。解决的办法就是根本不提供健康保险，而且由于许多低工资雇员的工资会被昂贵的健康保险政策扣去很大一块，许多雇主就选择不向雇员提供保险。有趣的是，游说政府进行管制的人并不是希望保险覆盖更多范围的雇员团体，而是各种各样的医疗保健供应协会，它们包括按摩疗法医生、精神卫生行业人员，它们更愿意说服政府官员而不是病人去相信这些服务是必需的。

[1] Goodman and Musgrave, *Patient Power*, pp. 324~325.

[2] Jonathan Gruber, "The Efficiency of a Group-Specific Mandated Benefit: Evidence from Health Insurance Benefits for Maternit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1157, September 1992.

[3] Jonathan Gruber, "The Efficiency of a Group-Specific Mandated Benefit: Evidence from Health Insurance Benefits for Maternity," p. 39.

第二种阻止低成本费用保险的机制是州政府对保险定价的管制。有两种管制问题最为严重，它们加在一起，经常使得一个家庭的保险费用超过每年1万美元，这就是社区分级（community rating）和保证批核（guaranteed issue）。在社区分级制度下，保险公司不允许根据性别、年龄、职业或任何其他影响顾客使用医疗保健概率的特征来变动他们的保险费，这就好比要求汽车保险公司向21岁的男性和40岁的男性收取同样的保险费。因为费用必须能覆盖保险公司的全部费用，包括预期支出，所以对健康的人来说这是笔坏买卖，而对身体较差的人来说则是个大便宜。结果，健康的人不太愿意买保险，而健康水平概率较差的人更愿意买。这样，保险人的健康水平概率朝着不健康的方向转移，这又进一步推高了保险费的价格，同时使得健康的人更不愿意购买保险。这种效应在经济学上叫做“逆向选择”，这么说是因为保险人群的构成与保险公司的利益是相反的。有趣的是，经济学家已经很好地分析出信息不对称如何造成逆向选择，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潜在的购买者比保险公司更好地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但现在信息不对称是由政府政策造成的。这些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逆向选择是坏的，这意味着他们赞同保险公司根据风险进行定价，但他们却没有在对社区分级的批评中据理直言。

另一种管制，即保证批核，要求保险公司必须受理所有新投保者。只要保险公司可以根据风险对保险自由定价，那么这项管制本身并没有什么危险。比如，一个艾滋病患者想要保险的话也没问题，但必须付特别高的保险费才行。保险购买者应该有基本的道德自律，不应当仗着有保证批核，就一直拖延，直到得了病才去买保险。

但是保证批核加上社区分级就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如果保险公司必

须向所有人提供保险，而且不能进行相应定价，那么人们就会一直等待，直至得了病才去买保险。了解这点的保险公司就提高费用，让身体较好的人更没有兴趣购买保险，纷纷退出，这又进一步提高了费用。同时实施这两项管制的有7个州，包括新泽西、纽约、华盛顿、肯塔基、佛蒙特、缅因和新罕布什尔，结果这几个州的保险费巨增，数十万人退出了保险，个人保险市场枯竭。比如在纽约州，保险费提高了50%以上。^[1]许多企业因此离开了纽约的保险市场。其他所有州的“改革”情况都说明保险费的提高对保险公司并不是一件好事，反而造成潜在病人（patient pool）风险的提高。一个保险代理人跟我聊天的时候，推测说支持这些管制的政客和其他政府官员不仅清楚这些效应，而且是刻意追求它们。为什么？因为他们让更多的人没有保险，也就创造了对政府保险的需求。他的推测是有道理的。

如果我们把所有事情都做了：改变免税代码，取消公共医疗补助，逐渐停止医疗保障，取消FDA对药物的垄断权以及医生对行药的垄断权，并放松对保险的管制，我预测在几年之内，医疗保健就会更有效、质量更高、更便宜。一点点自由就能走很长一段路，许多自由的话当然可以走得更远。

这些很难想像吗？也许是，但谁能在20年前想像柏林墙的倒塌？谁能想像人们能制造出比1955年整个世界的计算能力还要强大的手提电脑？妨碍医疗保健进步的主要障碍是我们以为这样的进步不可能发生，并按着旧的想法行事。

[1]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New York State to Use Insurance Pool Funds to Avert Major Health Premium Increases," *Health Care Policy*, vol. 6, No. 17, April 27, 1998.

第十六章

“公立”教育之忧

就在不久以前，教育机构还向我们承诺只要在国家教育上进行更多的投资，他们就能制造出一个国家的爱因斯坦和爱迪生。今天，如果我们的孩子听说过爱因斯坦和爱迪生，大家就已经很满足了。

——乔治·威尔

我小时候就下定决心，不让学校妨碍我去学习。

——马克·吐温

下一页有 10 行空白。如果你能花上几分钟时间填写，我保证你肯定能从中获益良多。写下你在生活中所学到的 10 件最重要的事：它们可以是特殊的技能，重要的思想和观念，专业领域（比如数学），或其他任何重要的事实。你也许会说你要花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来思考答案，如果你

要这样，当然没问题，但如果你只花 10 分钟，效果可能会更好。试试把首先进入你大脑的事情写下来，准备好了吗？开始。

我在生活中学到的 10 件最重要的事

(1)

(2)

(3)

(4)

(5)

(6)

(7)

(8)

(9)

(10)

我自己的答案是：

1. 如何行走。
2. 如何讲话。
3. 如何阅读。
4. 数学。
5. 如何进行有逻辑的思考。
6. 宽恕。
7. 键盘输入。
8. 如何安排预算和为未来投资。
9. 如何开车。
10. 为什么自由市场运作得如此之好。

现在该你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再写下你是如何或从谁那里学到这些的。

在上学之前我已经会走路和讲话了，而且虽然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我想自己那时已经学会阅读了。中学的最后一年，先后有四位数学老师给我们上课。我的父亲是一位公立学校的老师，在家里也教我数学。他躺在床上抽着雪茄，而我则忍受着烟味，掌握他所教的概念。上过的课程对我进行有逻辑的思考很有帮助，但更重要的是我有希望理解事情的强烈欲望，它总是让我在学校麻烦不断。我仍然在学习宽恕，我记得最好的教育来自父亲、母亲以及多年来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我的朋友比尔·海加。我在学校学到了键盘输入，虽然我的母亲已经在家中教会了我

基本的原理。我自己学会了安排预算，考虑到父母收入不是很高，我不得不自己进行储蓄。这提醒了我，我遗漏了一件我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事——如何赚钱。我是不得不学会的：小时候每周的零用钱是 25 分，十几岁的时候涨到了 1 元钱，如果我想要买价钱超过这个数字的东西，就得自己去赚钱。这样，我学到如何克服应征一份工作的恐惧，学到把高尔夫球卖给打高尔夫的人。父亲教我开车，我的朋友布莱克·麦卡勤教我驾驶他的标准变速本田 65，提高了我的技术。我通过自己的课外阅读学习自由市场理论，与学校没有什么关系。

简言之，在我学到的 10 件最重要的事中，只有数学和打字两件事是通过学校学到的，可即使是这两件，我同样也在家里接受了良好的指导。

鼓吹公立学校的人搞出的最大的欺骗是让公众将“学校”和“学习”（learning）、“学校”和“教育”（education）混同起来。它们是不一样的。学校并没有垄断学习，它们甚至不是学习的主要场所。想一想什么是学校教育，其中很大一部分无非就是读、写和算术。现在是谁教会学生这些？经常是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以及在市场上销售的“学习点点通”^{*}。当然，好的教育应该带来学习的兴奋和满足一个人好奇心的可能。可如果你上的是公立学校，或者你的孩子上公立学校，你会用“兴奋”来形容对学校教育的感受吗？

我的女儿凯伦比我更懂得使用计算机，可没有一点是她从学校学到的，她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学习的，而让她这么做的动力是想要在网上与朋友交流、购物、听音乐，以及设计一个她所喜欢的屏幕。她并没有什

* hooked-on-phonics，一种可以帮助记字和学习的商业产品。——译者注

么与众不同之处，数百万的孩子有着相同的经历。凯伦以自学的方式学会使用计算机，她这么做是因为有东西在刺激她。感谢上帝，学校在以很慢的速度拥抱计算机革命，否则它们可能已经把它搞得一团糟了。

举个我女儿很小的时候读公共学校的例子。上一年级以后的几个星期，凯伦回家想玩一种叫“中国跳绳”的游戏，她要我们帮忙把住绳子，于是我们就把绳的一端围在椅子的腿上，另一端则围在我的腿上。她以严格的顺序进行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步伐变换，而且在进入下一阶段之前，她必须完成前面一部分的动作。如果她犯了一个错误，她必须从犯错的地方后退一定数量的步伐。规则非常复杂，在帮了她10次以后，我还是不太懂，但她对顺序了若指掌。作为一个自豪的父亲，我想我的聪明女儿可能是极少数能在6岁的时候掌握所有这些步伐的人。我问她还有多少一年级女生和她做得一样好，她淡淡地说：“所有人。”所有女生都掌握了这种复杂的游戏，这是因为她们喜欢这件事。如果她们被学校要求学习中国跳绳，那我想她们不会学得像现在这么好。

人们在课堂以外学了这么多东西，这解释了一个悖论。观察家们惊奇地发现我们的经济搞得这么好，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在经济体系中做得非常出色，虽然我们的教育制度一塌糊涂。很多人猜想，如果美国的教育制度不是现在这么糟的话，天知道会出现多少奇妙的事。不过这其实说明了，美国的教育制度不过是人们学习的许多途径中的一条而已。无论退学还是成功毕业，许多人在公立学校中并没有学到基本的阅读、写作和算术技能，但当生活中需要这些技能的时候却可以学得很快。这暗示了学校的工作事实上做得非常不好，这同样也暗示了公立教育制度所浪费的最大资源其实是孩子的时间，只是人们很少提及这一点。

学校并没有垄断学习，但是公立学校的确垄断了孩子的时间和纳税人的金钱，这是法律所赋予的垄断权。它以两种方式进行垄断。首先，政府要求我们纳税，并用武力强制建立了公立学校。在美国，公立学校超过 90% 的资金来自当地政府、州和联邦的税收。如果你怀疑我所说的政府用武力建立公立学校，那不妨试一试不纳税，看看会发生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公立学校”（public school）中的公立两个字其实是用词不当的原因。麦当劳也向公众开放，但它并不是通过税收建立的。一个更准确的用词是“政府学校”^{*}（government school）或“税立学校”（tax-funded school）。

这样的税收资助给了公立学校在竞争学生方面非常不公平的价格优势，公立学校不需要做得和依靠自愿同意及有学费的私立学校一样好。假设你现在把你的孩子送到一个有税收资助的学校去，你对此并不是很满意，所以你四处寻找，并发现了一所收费 3000 美元的天主教学校。所以你就认为只有在这所天主教学校的教育价值至少比有税收资助的学校多 3000 美元的情况下，才会让孩子转学到那儿去。3000 美元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笔大数目，因此，即使多数父母认为公立学校很差，它还是能招到学生。而且如果你送自己的孩子去私立学校，就要付两次钱：你没有使用公立学校，但仍然得付财产税、州所得税和销售税，然后去私立学校你又得付学费。这给多数父母设下了一个严酷的悖论，也是为什么公立学校相当于一把关闭教育市场的大锁。

* 在本书的其他部分，government school 依然译为公立学校。——译者注

恐怖的故事

我们在这么长的时间中忍受了如此之差的教育质量，政府垄断是重要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恐怖的故事。斯蒂芬·杰克逊是一位努力的学生，从不缺课，每天晚上学习两个半小时。他所读的西部高中位于华盛顿特区，是一所公立学校，作为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词的学生代表，他申请就读乔治·华盛顿大学，但是被拒绝了。他的学术能力倾向测验（SAT）成绩是600分，语言部分得了320分，属于最差的13%，他的数学是280分，是最差的2%。（满分是1600分，最低分是400分，他的分数，根据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的发言人所说，那就是你“签上自己的名字、出生日期和社会保险证号码，然后在考场上睡大觉”得到的成绩。）^[1]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招生办公室主任约瑟夫·鲁思评论道：“我的感觉是他被骗了。他误以为已经接受了教育。”^[2]

再看看《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布罗特花了很长时间调查高迪小学后所写的报道。据布罗特所讲，这个学校不是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中最好的，但“绝不是最差的”。

在高迪，有一种胡闹的气氛。喧闹声压过了有线广播。某个下午，校长打断正常教学，向整个学校发出警告，说二楼走廊上有一群孩子在撒野。当她想知道某些事情的时候，当她要继续和一个怒气冲

[1] Telephone interview on May 7, 1993.

[2] “The Valedictorian,” *Newsweek*, September 6, 1976, p. 52, and retold in Paul Copperman, *The Literacy Hoax*, New York: Morrow, 1978, p. 105.

冲地离开办公室的教师争吵的时候，或者在发薪日让一些老师在上课时间去领“兑现”（这是学校中对薪水的委婉用语）的时候，办事员会把她的声音直接传达到课堂上去。（一个老师抱怨说，在那些高迪学校的低收入学生面前说“薪水”两个字让她感到不安全，所以大家开始用“兑现”两个字。）^[1]

妻子和我送女儿去当地公立学校的时候，我们加入了家长教师会（PTA）。有一年我们对她的物理老师的行为提出了意见，我们和其他父母进行了讨论，有一些人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看校长。在校长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含糊的回答之后，我们决定一起参加 PTA 会议，陈述我们对这位教师的看法，寻求其他父母的支持。当我开始讲的时候，一位在场的教师说道：“这不是谈论教师行为的地方。这是 PTA。”这让我想起库布里克著名电影《奇爱博士》中的一幕：乔治·斯科特扮演的特格德森将军和俄国大使在战争室扭打起来，墨菲勒总统试图阻止争斗，说道，“先生们，这是战争室。”很显然，这位教师对 PTA 的看法也是所有老师和父母的看法：虽然我的会员卡上写着 PTA 的目标是加强孩子的教育，我也曾大声地读出这一点来回应这位教师的评论，但每个人都知道 PTA 的真实目的是筹钱。教师们很清楚，他们不需要对自己的教学的看法。我们是非自愿的观众，事实上，我们的孩子才是非自愿的观众，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另一个故事来自一位教育测试者，由于你马上就会知道的原因，现在

[1] Bonita Brodt, "Inside Chicago's Schools," as quoted in David Boaz, ed., *Liberating Schools: Education in the Inner City*, Washington, D. C.: Cato Institute, 1991.

他已经不再是这个身份了。他的名字是查尔斯·詹森 (Charles Johnsen)，当他在 1995 年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成了路德教会的传教士和科罗拉多州奥罗拉的计算机芯片设计员。20 年以前，詹森为芝加哥教育委员会委托的项目做目标测试 (proposed test)。一个测试问题是关于“el”的，el 是称呼芝加哥高架列车系统的当地用语。詹森在测试中放入了一张真正的 el 时间表，提了一个问题：“CJ 在早上 9 点钟有一次工作面试。这个公司距州街站有一条街路程。CJ 要准时参加面试，能乘的最后一班车是哪班。”然后他从时间表中列出了 5 个不同的列车时间，只有一个是正确答案。

结果让他很惊奇。郊区学校的学生在其他项目上都做得很好，但是，用他的话说，“在 el 上却搞不清楚。”城里学校的孩子普遍能答对 el 的问题，即使从其他的测试来看，他们的阅读能力很差。

这是第一个惊奇，然后是更大的。他的雇主通过软件生成了包括每个测试问题的统计表。问题“好”“不好”并不是因为区分了无知和有知，而是因为区分了“好”学生和“穷”学生。不管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如果很明显，郊区的好学生答错了，而市内的坏学生答对了，那这个问题就应该被扔掉。^[1]每当我听到别人说 SAT 并没有歧视黑人时，我就会想起这个故事。

还有两个故事，第一个令人心烦，第二个则纯然是让人惊恐。第一个故事使妻子和我决定花我们税后收入的 10% 到 20% 送女儿去私立学校。

[1] Charles Johnsen, "Small Reforms, Little Victories," Vol. 1, No. 1, September 1995, *The Education Liberator*, Published by Separation of School and State Alliance.

我们在一次期中父母教师会议上讨论凯伦的课程进度时，我们发现她在几乎所有科目上都得了 A，但我们不太清楚一个 A 意味着什么。她的老师回应道：“你们太担心凯伦了。她总是做得很好，我几乎从不管她。”

第二个故事来自 1994 年《圣路易邮报》的一篇美联社新闻报道，是“学校与州联盟分离组织”的负责人弗里茨发给我的：^[1]

芝加哥 (AP) ——一个持枪者闯入小学体育馆之后，诺特瑞几乎没有时间反应。子弹飞舞，这位体育老师张开手臂保护孩子，并把他们推到门外的安全地方。他的手腕被击中了。

他所在的学校和社区赞扬诺特瑞为英雄，但芝加哥教育委员会坚持他没有权利得到工作人员的补偿。他们说挽救孩子的生命不是他的工作。

下面是委员会的原文。

被未知攻击者射击的风险并非操场活动中应被合理预期的风险。

我不相信教育委员会中会有人建议诺特瑞在学生被射击的时候独自跑掉。但公立学校的大问题之一就是没有人负责。委员会成员分担责任，而被分担的责任通常意味着没有责任。这样，可能并不邪恶的人却导致了邪恶的结果。

[1] “Chicago Schools Rebuff Wounded Hero-Teacher,” *St. Louis Post-Dispatch*, October 1, 1994.

虽然多数人在学校的不快乐体验是发生在公立学校，但私立学校也并不是就没有这种情况。一个朋友有一次被他在天主教学校的“同事”塞进了垃圾桶，他到现在仍在驱除那个学校的修女强加给他的可耻的魔鬼概念。另一位朋友读的是上加拿大学院，那是加拿大英语区排名第一的男生预科学校（相当于美国的安杜佛学院）。他告诉我，一个大男孩剥了他的裤子，把他举到空中，并威胁要把他头朝水泥地丢下去。

的确，一群成年人控制的把一大群年轻人凑到一起的任何一种制度都有点像养殖场。但是，我仍然认为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有着系统性的差异。作为教育分析家和活动家，道格拉斯·杜威（Douglass Dewey）说，当人们谈论公立学校的时候，有一件事是你从来不会听别人提到的，那就是“一个有爱心的环境”。杜威是儿童奖学金的执行副主席，这是一个位于纽约的基金会，向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奖学金，送他们去私立学校。他说，许多奖学金的领取者都描述私立学校“像家一样”。毫无疑问，私立学校要强过公立学校。尽管多数私立学校都是非营利机构，但仍在售出服务，必须生产人们愿意付钱的产品。而公立学校并没有面对类似的市场考验。

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的另一个差异是人们付钱给老师的方式。在公立学校，薪水是基于资历和正式教育程度。比如，在1997年～1998年，公立学校老师在教书的9个月中所得的平均薪水是39385美元。^[1]调整了通货膨胀以后，相当于2001年的44000美元。在1993年到1994年，有20年

[1] 薪水和学费的数据来自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1999*,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以上教育经验的公立学校老师，平均所得是 43796 美元，相当于 2001 年的 54000 美元。相反，私立学校的老师，工资要少一些。另一个重要的差别是退休金。公立学校的老师一般有非常丰厚的退休金，在调整了通货膨胀之后，相当于他们收入最高的那几年总和的一个很高的比例，而私立学校的退休金就没有那么高了。想一想这样的薪水安排所创造的激励：一个公立学校的老师获得全部退休金的办法就是留在这个系统里超过 30 年或更长时间。我的女儿在公立学校所碰到的最差的老师在 5 年内就要退休了。他们很明显在几年前就失去了教书的兴趣，只是想挂在那里等待丰厚的退休金。如果我希望鼓励人们教书不要太认真，我就会差不多照搬公立学校现在的薪水结构。

当你认真思考以后，就会发现多数学校都是相当怪异的。孩子被和其他同龄人凑到一起，他们以及他们的父母对还有谁加入进来都没得选择。孩子们要在某个时间，比如 8 点半，学习数学（在离我所住的地方很近的帕西菲克·格罗夫中学，是 8 点 13 分）。他们差不多以同一个步伐进行学习，以前他们学习是有连续性的，这一年开始的地方就是上一年结束的地方，但现在这种连续性多数已不复存在。在幼儿园或一年级的時候，很多老师让孩子记忆词语像什么，这样来教阅读，但从不教他们以辅音和元音为基础来猜词。如果英语是像中文那样的一系列符号，这种教育方法还有点道理，但现在这样简直是不可理喻。现在的历史课本要满足这个或那个利益集团，所以你上完历史课后，对乔治·华盛顿是谁还没有多少认识，但已经知道了许多妇女在美国革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一段时间还要上所谓的毒品教育，也就是宣传毒品如何对你有害。上课的经常是警察，他们的专业技术一般是法律而不是毒品的药理效应。当孩子到了一

定年龄以后，许多学校就会教他们如何把避孕套戴到香蕉上。亚特兰大一个11岁女生最近因为带了翠鸟的钥匙链而被赶出学校两天，原来链条是“武器”。^[1]

有了这些以后，如果学校能够运作得符合个人的标准，那真是个惊喜了。

人们经常批评美国的公立学校教得太少，而且教育方式枯燥，但许多人仍鼓吹要增加孩子呆在学校的时间。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老笑话，两个人抱怨餐馆的食物。一个人说，“菜太难吃了。”另一个人说，“分量太少了。”考虑到今天公立学校的沉闷和无聊，感谢上苍它的分量这么少，这至少留出了时间让学生在校外进行真正的学习，或者开心地玩。

公立学校只有一点做得非常之好：校外运动。在这样的项目中，孩子学到了技能、坚持和团队合作，他们的积极性被高度地激发出来。为什么在校外运动和课堂的表现之间有这么大的差异呢？一言以蔽之：强制。每一个州政府都要求在一定年龄范围内的孩子得上公立学校或其他指定的学校，这个年龄段通常是从6岁起，到16或18岁为止。^[2]比如，在加利福尼亚，孩子直到18岁都是不自由的，除非他们16岁时通过了特别考试。但是没有一个是有一个州政府要求孩子参加校外运动，这差异就像白天与黑夜一样。每天上课的孩子中有许多人不想待在课堂里，而且他们让那些想待在课堂里的人也很难受。但是几乎所有进行校外运动的学生都是自愿参加的，多数教练如果觉得一个孩子不想待在那儿，就会把他赶出团队。结果，校外

[1] “Georgia girl’s Tweety Bird chain runs afoul of weapons policy,” *CNN.com*, September 28, 2000.

[2] 关于细节，参见 <http://www.nces.ed.gov/pubs/d96/D96T149.html>.

运动是公立学校少有的成功例子之一。他们的成功是根据成绩、学到的技能、自然欲望，或性格的培养来判定的。有趣的是，运动是学校中少数使用客观标准的活动。没有人会在学生没有投中篮的情况下假装他投中了，裁判员和记分员勾结起来在记分板上作假的话，就会被严厉斥责。

强制所产生的最大伤害是减少了动力。学习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我们从出生后几天就开始这么做了。我们学会，只要哭，父母就会过来换尿布、喂奶，或者抱抱我们。我们在几个月大的时候学到了如果把某样东西扔掉，有个人就会捡起来放到我们的高脚椅上。我们在一岁的时候会花几个月的时间学习走路。每当掌握了一个阶段的技能，我们都会非常高兴。

我的女儿在进入幼儿园之前就开始学习如何阅读，这不是因为我们要去教她。相反，我们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读她喜欢的书，过一会儿，她就能明白全书的内容，然后根据记忆几近完美地向我们“读”一遍。然后，在4岁的时候，她就想读她还不太熟悉的书。当她碰到一个生词，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会指着每个字母读出来，告诉她如何把读音聚在一起读出整个单词。我们从来不去纠正她的错误，除非这个错误重大到会影响她理解故事。我们第一次与她的公立幼儿园教师会面，大概是在她入学一个月左右。教师告诉我们她很惊讶凯伦的阅读能力，并问我们她是如何学习的。我们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告诉她。老师变得激动起来，“但如果你不纠正她，”她说，“她怎么能学到什么是正确的呢？”我回答说，我们每次纠正一个正在学习的人，都极有可能使他失去信心，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小心地避免那么做的原因。此外，我说，“看看她读得多好；很明显，我们的方法是有效的。”但很显然，这位教育专家没有看到纠正一个人的小错误所可能带来的潜在伤害。

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学习的时候那么痛苦，丧失生命中第一次学习时的那种快乐的原因。事实上，我认为将学生分为聪明和不聪明的做法，创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差别。我的二年级老师奥利斯夫人将所有学生分成勤奋的海狸和忙碌的蜜蜂。在知道每个团队中有谁的时候，大家都明白了忙碌的蜜蜂是学得“慢”的人和二等公民。作为勤奋的海狸中的一员，我被诱惑着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而且在以后的学校生活及大学的一段日子里，我一直是这么看自己的。我认为，那些在课堂上表现得好的，在智力上比那些表现不好的人要高一等。按着这个思路，我认为工人阶级不是知识分子，我自己才是。我本来可能一辈子都持这种看法，但是，感谢上帝，在我大学最后一年前的暑假里发生了一些事，它戏剧性地改变了我对此的看法。

那个暑假刚开始的时候，我搭车去北加拿大的采矿区，马尼托巴的汤普森，寻找一份高薪的蓝领工作，因为我想要挣到足够的钱来支付我最后一年大学的费用。最终，在离汤普森 40 英里的索伯湖，我在一个地下镍矿找到了一份金刚石钻探工“助手”的工作。大概有 300 个人在这个矿中工作，住在邻近的采矿营里。由于有两年的大学经历，我是整个团队中受过最好的正规教育的人。我非常爱社会交际，想跟所有人交往和交谈。所以没过几天，我就围着那群年龄从 18 岁到 45 岁不等的人，争论快要到来的省选举、社会党提议政府接管汽车保险产业的新闻，以及各种其他政治议题。我很快发现他们当中很多人有自己的观点，你可以跟他们争辩，他们并不比温尼伯大学的学生甚至许多教师逊色。主要的差别是他们非常坦率，装腔作势少一些，还有一些人想把嬉皮士们靠墙绑起来，然后枪毙掉。（温尼伯大学的一些学生也想成立行刑队，不过是向资本家而不是嬉

皮士开枪。)在那个暑期之后,我发现再也没有办法把人分成有知识的阶级和没有知识的阶级;相反,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希望把他的知识运用在教书和研究上;技术娴熟的汽车修理工是知识分子,运用逻辑来消除发动机的各种可能隐患,减少事实上的事故;每个人都是一个知识分子。强制性的教育剥夺了数百万人成为知识分子的权利。

回到强制问题上来。在1999年,我参加了由11名美国顶尖的教育改革家^[1]在胡佛研究所举办的讲座。他们同意更小的班级规模和更高的老师薪水并不是解决之道,他们中的一位,经济学家汉努舍克(Eric Hanushek)总结道,基于丰富的证据,他们认为这些事情与教育成就的标准量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更加强硬的管制,要求学校使用统一内容的课程表,让老师留更多的回家作业,实行州范围的测试,并施加其他能让学校和教师把工作做得更好的要求。在一次提问阶段,我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我十几岁的时候,心目中的英雄是小山姆·戴维斯(Sammy Davis, Jr.)。在他的自传《是的,我能行》里,他提到他在两岁半的时候就 and 父亲、叔叔一起巡回表演。小山姆·戴维斯从没有上过一天学,但是今天每个州政府都要求人人上学。他们威胁要把不服从的父母关进监狱,这样来推行他们的要求。我对你们每个人所提的

[1] 按字母顺序, John Chubb, Williamson Evers, Chester Finn, Jr., Eric Hanushek, E. D. Hirsch, Paul Hill, Caroline Hoxby, Terry Moe, Paul Peterson, Dianne Ravitch, and Herb Wahlberg.

问题是，如果你们在那个时候负责这件事，你们会把戴维斯夫妇送进监狱吗？

他们中的三个人，保罗·彼德森、沃尔伯格（Herb Wahlberg）和埃瓦茨（Williamson Evers）说，他们不会把小山姆·戴维斯的父母送进监狱。另外八个人说他们会送他的父母进监狱。八人中的一位，雷维奇（Dianne Ravitch）说，“有一个小山姆·戴维斯，就有一千个从不关心孩子的父母。”她的意思是，强制入学的目标是控制父母。

雷维奇表达了一个非常普遍的假设：没有强制的话，很多父母就不会送他们的孩子去学校。事实上，这种观点是支持强制入学法的主要支柱。但这是虚假的：不管是富还是穷，在政府要求孩子入学或为此买单之前，多数父母都会送他们的孩子去学校。

在政府插足教育之前受教育范围已经很普遍，这方面最全面的证据来自经济史学家威斯特（Edwin G. West）。在经典之作《教育和国家》当中，威斯特挖掘了19世纪早、中期的英国教育数据。那时人们的收入很低，政府也没有要求孩子上学或者为他们上学付钱。他所提供的事实是令人惊愕的。

威斯特指出，在19世纪早期，英国政府对阅读政治著作的工人数目感到不安，政府就采取“财政和法律行动来对付报纸的传播”。^[1]忧虑人口增长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也同样忧虑潘恩（Tom Paine）《人的权

[1] Edwin G. West,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2nd. ed.,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70, p. 127.

利》的广泛传播。威斯特写道，事实上，潘恩的书大概卖掉了150万本，考虑到那时的英格兰人口大约是1000万，这么广的销售范围说明了普遍的阅读能力。

但这只是威斯特的数据揭示的相当表面的一部分。下面是一些较为深入的地方：

- 在1837年到1839年期间被审判的人当中，有44.6%有阅读能力。^[1]这个数字很可能比那时候青少年的平均阅读能力要低。首先，被控以犯罪的人一般来说教育程度要低于正常水平；第二，因为犯罪数据将年纪大的人和年纪轻的人混同在一起。

- 在19世纪早期，穷人中的穷人经常住在救济院当中。关于1838年住在诺福克和萨福克救济院的孩子的数据表明，9~16岁孩子中有87%能够阅读，有53%能够写作。^[2]

- 在1840年的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和达累姆郡（Durham），843名煤矿工人中有445名（53%）能够阅读和写作，有665名（79%）能够阅读。^[3]在那个时候，教孩子阅读但不教写作的情况很普遍。

为什么人们普遍能够掌握读写能力？威斯特也在问这个问题。像机械协会（Mechanics Institute）、文学与哲学学会和星期日学校这样的私人组

[1] West,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p. 128.

[2] West,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p. 129.

[3] West,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p. 130.

织会教孩子们读书，而且有许多教育是在家里完成的。^[1]但同时，也许听来很奇怪，人们还是经常用学其他东西的老办法来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付钱。威斯特引用了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密尔在1813年时所说的话：

根据观察和细致的调查，我们可以说，在英格兰的下层社会里，对教育的热爱正在迅速发展。就算是在距伦敦50英里范围的环形区，尽管那里离这个国家最有教养和德行的地区相去甚远，也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学校的村庄；不论性别，很少有孩子没有被或多或少地教导阅读和写作。我们已经碰到一些家庭，整家人连续数周都吃马铃薯，但仍然用辛苦赚来的钱送每个孩子去学校。^[2]

当时的英格兰正在从与拿破仑作战的巨大耗损中慢慢恢复，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入学的孩子从1818年的67.5万人增加到了1833年的127.7万人。^[3]从1833年起，英国政府开始对教育进行补助，全国有总共2万英镑的小型补贴。^[4]这样，在几乎没有补助且收入微薄的情况下，1450万总人口（包括孩子和成人）中有130万孩子在校读书，这可以当作一个测量标准。

有点相似、但更为有趣的是来自美国的证据。在1818年，第一部强制入学法实施的34年前，诺·韦伯斯特（Noah Webster）估计他的单词

[1] West,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p. 136.

[2] 引自 Mill article in *Edinburgh Review*, October 1813 in West,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3] West,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p. 149.

[4] West,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p. 137.

拼写课本已经卖掉超过 500 万册，^[1]当时的全国人口还不足 2000 万。托克维尔在 1835 年《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称美国人是历史上受到最好教育的群体。今天，美国的平均收入在调整了通货膨胀以后，是 1833 年英国的 12 倍。^[2]因此，现在由家庭来为私立教育埋单要比过去容易得多。

而且，教育就像许多商品一样，随着收入的增加，我们会买到更多的东西。你也许会认为教育的高价会减少许多人的需求，但现在的教育这么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是由政府提供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儿子戴维·弗里德曼是自学成才的一流经济学家，他曾经提出过弗里德曼第一定律，即政府提供的东西要比由私人通过竞争提供的贵上一倍。经济学家通过比较政府与私人在提供垃圾收集、消防和保险索赔的成本，已经粗略地证明了这个定律。美国没有税收资助的学校在 1993~1994 学年的平均学费大约是 3116 美元，调整为 2001 年美元以后，大概是 3800 美元。在 1998~1999 年，公立学校每个学生的平均成本是 7896 美元，2001 年大概是 8700 美元。当然，私立学校的学费要略低于成本，因为部分成本被捐赠抵消了，但是你可以看到弗里德曼定律大致是成立的。而且，互联网和相关网站以低费用提供高质量的学习，降低了教育的成本。

[1] John Taylor Gatto, "Our Prussian School System," *Cato Policy Report*, March/April 1993, Volume XV, Number 3.

[2] 我怎么算的？根据经济史学家 Nicholas F. R. Crafts 的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在 1830 年，英国人均收入用 1970 年美元衡量，是 498 元。（引自 Clark Nardinelli,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David R. Henderson, ed., *The Fortun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3, p. 13.）在 1970 年，以 1984 年为基准，消费者价格指数为 38.8。在 2001 年，大概是 176。因此，1830 年英国人均收入，用 1999 年美元计算，是 $(176/38.8) \times 498 = 2259$ 。今天的美国的人均所得是 82000 亿美元除以 2 亿 8000 万人，等于 29286 美元。

1. 真菌原生质体融合的基本方法

原生质体融合要涉及亲株选择和标记,细胞壁酶解释放原生质体,渗透稳定的原生质体纯化和分离,标记互补的融合子

智能发育测试 (1 岁 10 个月)

分类	项目	测
----	----	---

地方学校就是我们孩子的父母。像父母一样不仅仅意味着要像那位不受赞赏的诺特瑞一样，从枪底下救出孩子，保护我们孩子的身体安全。它还意味着通过语言和行动教给孩子我们所认同的德行。

当我说“我们”所认同的德行时，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同的人会认同不同的德行，有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只是不一致，但没有冲突。我也许希望我的女儿多学点英语写作，你也许希望你的儿子多学点数学。教数学和教英语写作并不冲突，至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冲突”，但仍然需要严格的权衡。你和我的想法也许不能同时被满足，因为学校里总共就只有这么多时间。

有时候会发生冲突，真正的冲突。你也许希望你的8年级孩子学到安全的性行为，我也许不希望谈论14岁的孩子是否应该发生性行为的问题，这样的问题留在家里、教堂、犹太教会堂或清真寺也许更合适。这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冲突。或者我们都希望孩子学到偷东西是错的，但刨根问底的头脑想知道为什么。你可能认为这是错的，因为《圣经》就是这么说的，而我也许是基于某些功利主义的标准。这同样也是一个冲突。谁是对的？很明显，你认为你是对的，而我认为我是对的，这就是价值观的差异。我并不是鼓吹相对主义，如果我认同一种德行，我真的相信那种德行，那么我就会认为凡是与之矛盾的就是错的。

我们如何回避这种冲突？要么你纠集同意你的人，把你的价值观强加到我身上；要么就是我和我的盟友一起把我的价值观强加到你身上。

这就是美国的整个公立学校史。我不光是在谈最近的科学课上进化论与特创论的冲突，或者阅读中发音法与整字教学法之间的冲突。我是在说，美国的公立学校史就是一部冲突史。一开始，新教徒统治了公立学

校，使用他们的支配权阻止天主教的孩子信仰天主教的教义。事实上，一些教育学者已经证明，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公立学校的兴起就是新教徒统治天主教徒的一种尝试。

很明显，当前的税收资助学校的制度根本没有用。如果我们说，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税收不能用来支持宗教，那么在公立学校中就不能用偷窃违背“圣经教义”的说法来教育孩子偷窃是错的；但如果老师用功利主义的理由和完全脱离有神论的办法来传达偷窃是错的这种观念，那他们就在暗示圣经是无意义的。这就侵犯了有神论父母根据第一修正案享有的权利。

在这个社会中，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尊重父母将他们的价值观传导给孩子的权利。以宗教为例。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宗教间有许多暴力冲突，但尽管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有很大的差异性，这些冲突却很少上升为暴力。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权利选择将我们的孩子送去某个特定的教堂、清真寺，还是犹太教会堂。在美国，建国原则之一就是宗教自由，宗教冲突却很少；而在有些社会，法律强制推行特定的宗教，那儿的冲突反而要多得多，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嗯，也许同样的方法对学校也是适用的。我们只要让父母为他们的孩子选择学校，也许就能彻底消灭学校要教什么这个深沉、未解和不可解的难题。

有两种择校方式：自己付钱和税收资助。真正的选择应当像选一辆车或鞋子：你自己进行调查研究，用你自己的钱购买符合你的偏好与预算的东西。有税收补助的选择就像食物券：你往购物车里塞东西，把商品放到结账台，然后由不知名的纳税者来付钱。不幸的是，选择“税收资助”的

人和/或教育券的人一直占了上风。虽然我这么说，但我曾经也是“税收资助”方的正式成员。我写过三篇主张教育券的文章，一篇短文在1971年秋天发表在西安大略大学的学生报纸上，一篇较长的则是1993年为胡佛研究会而写的文章——“择校的例子”，另一篇短一些的则于1994年发在《洞察力》(Insight)杂志上。我在1968年读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关于教育券的文章后就支持这个观点，直到1995年，我碰到的所有反对教育券的人都把论点建立在对市场、竞争和父母的不信任基础上。因为我非常信任市场、竞争和父母，所以从没有被这些争论所说服。我听到的最好的反教育券论点是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教育券最终将肯定陪绑上高度的政府管制，这会极大地降低私立学校的独立性。你可能争辩说其他90%学生将会变得更好，因为学校要和其他学校进行竞争。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我只是不相信当政府付钱的时候，它会允许太多的竞争。经济学家埃斯特尔·詹姆斯(Estelle James)在为世界银行所做的一份研究中^[1]，分析了实施类似教育券制资助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当父母选择了一个私立学校，就会有一笔确定数量的政府基金拨入学校，这就是教育券制的本质。荷兰、比利时、法国、卢森堡、丹麦、挪威和新西兰政府负担了本国私立学校费用的75%。詹姆斯发现，对私立学校的高补助还附着着对教师执照、教学时间、雇用和解雇的高度管制，政府甚至经常限制学校挑选学生的方法。

[1] Estelle James, "Private School Finance and Public Policy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unpublished paper prepared for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onference on the Economics of Private Schools, May 1991.

虽然我现在反对教育券制，但我不敢确定自己是正确的。^[1]但是，如果教育券的支持者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把它放置一边不理的话，我会感到很欣慰。

出于类似的理由，我们应当像 19 世纪那些想要结束奴隶制的废奴主义者一样，变成现代的废奴主义者。取消政府在学校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意味着四件事情：结束强制性教育；结束政府对教学内容的控制；结束政府对老师资格的控制；结束政府向某些人征税来支付另外一些孩子的上学费用的做法。随着政府角色的消失，学习会变得兴高采烈。我不能告诉你是怎么变的，没有人能够。我能够告诉你的是我认为什么样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每天的课都在一个大建筑里上，从早上 8 点 30 分到下午 3 点，或者，像我们当地的政府中学一样，是早上 8 点 13 分到下午 2 点 40 分。自由的美和力量在于，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使用他们的自由，产生各种各样的结果，这些结果是他们自己以及其他人都无法预料的。当然我可以作一些有根据的预测。

如果自由得到恢复，我可以预期正规学校会更多地采取部分时间制，让父母或其他导师陪着孩子一起去探索他们周遭的世界，包括工作的世界。许多成功人士回忆过去，会指出对他们最有价值的学习体验就是十几岁时（个别情况是十岁不到）的兼职工作。比如，我最好的工作体验就是去当地的高尔夫授课处找高尔夫球，再把它们卖给打球的人。我学到了努力和回报之间的关系，而且通过试错，我学会了如何在一定的时间里找到最大数量的高尔夫球。我学到了一些最低层次的谈判技能。我还学到了汇

[1] 我关于远离教育券制的“对话”可参见 [Http: //www. sepschool. org/edlib/v2n6/squirm. html](http://www.sepschool.org/edlib/v2n6/squirm.html)。

率，因为高尔夫课是在加拿大开的，而打高尔夫的有很多是美国人。在那个时候，1 加拿大元比 1 美元略多值几美分，当他们付我美元的时候，我坚持要这多出的几分钱。（在美元比较值钱的时候，如果他们问我是否收美元，我就说，“当然了。”）我是在 8 到 13 岁的时候学到这一切的。我打赌许多父母会让他们的孩子用一些业余时间兼职打工，一些孩子甚至愿意当学徒。比如，如果你希望制作电影，想一想你 15 岁的时候在一个电影组中当勤杂工的话，能学到多少东西。

但是，要出现教育自由，政府就必须滚开或至少缩回去一些。下面是过渡性的政治目标：

1. 在任何时候，只要你可以投票反对教育税，就这么做。
2. 争取把政府强制入学的年龄范围缩小，比如把 6~18 岁改成 6~14 岁。
3. 分散税收资助。争取将州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赶出这一领域，这样的话，地区就有更多的自由来设置教育政策。
4. 就算你支持特许学校或政府教育券，也不要让它转移你的注意力。2000 年在提议于加利福尼亚实施教育券的过程中，那些多花了金钱和时间支持择校权利的人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没有花时间和金钱来反对把教育券的门槛从以前的 66.7% 降到 55% 的卑鄙提议。结果，这个卑鄙提议胜利了，加利福尼亚的教育税可能很快就会上升。
5. 争取你的州政府放松对家庭学校的限制。近年来，大学前教育方面的最大胜利是家庭学校，我们每年都看到大量在家学习的人出现在全国拼字比赛当中。

就像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人绝不会坐等政府插手，而是要先解放自己的奴隶，你也应该主动着手去解放那些孩子奴隶。

1. 把你的孩子带出政府的控制。把他送到私立学校去，可以是昂贵的那种，也可以是学费一般在 2000 到 4000 美元左右的宗教学校，或者考虑让你的孩子在家学习。

2. 如果你使用家庭学校的方式，可以和其他孩子在家上学的父母结合起来，进行劳动分工。你也许可以教 6 个孩子数学，而另一位家长则教他们英语。在某些州，教其他家长的孩子是非法的，这足以让你怀疑支持这项法律的公立学校的动机。如果在你的州这是非法的，那就挑战这条法律——见上面的第 5 条。当你要挑战这条法律的时候，漠视该法也许是个好办法。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给你的孩子上了一堂公民不服从的好课。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罗莎·帕克斯的事迹，她敢于违背要求种族隔离的当地法律。我们需要的是和她一样的胆色，至少偶尔如此。

3. 如果你没有孩子，但想要提供教育，那就挂出免费当家庭教师的招牌来。

4. 如果你不想花自己的时间，但希望孩子们能接受教育，那就捐钱给另一个家庭，让他们可以送孩子去私立学校。

5. 给你的孩子一台计算机和另一扇通往学习“万维网”的窗户——图书馆借书证。

最后，如果你有十几岁或不满十岁的孩子，或者你就是一个十几岁的

人，那么请释放你自己，通往一个新的可能。人们说十几岁的人之所以很难相处是因为那个阶段是“成长的一部分”，但是，为什么十几岁的人在暑期打工或上学期间做兼职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他们会碰到很多人，他们之间的年龄相差很大，但是他们没有被残忍地对待，也没有残忍地对待别人。他们的态度变好可能是由于以下三项事实的影响：他们可以自由地离开工作；其他干这份活的人通常希望能留下；工作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变得残忍。十几岁的人会残忍地对待他人，也可以说部分是由于成长，当强制入学成为成长的一部分的时候。

第十七章

环境：拥有它，拯救它

在 1940 年代早期，一家化学公司开始在纽约州某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倾倒有毒化学品。这家公司经过仔细的调查，证明这块地是由不透水的土壤构成的，因此化学品不会渗入地下水对人们构成伤害，所以才选择了这个地点。美国军队在二战期间和二战后也选择这个地方倾倒有害废料，当地的城市政府则在这里倾倒垃圾。

然后，在 1952 年，位于该城市的学校管理委员会威胁说要使用它的优先征用权，从公司手上取得这块地。学校管理委员会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在那里建造一所学校。公司没有反对，而是以 1 美元的价格将这块地卖给了学校管理委员会。学校管理委员会接受了这笔生意。公司在地契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递交这份财产转让文书之前，受让人已经得到了让予人的忠

告，让予人在纽约州××城所建的工厂已经将化学制品的生产废料全部或部分填充在前述土地中，受让人承担使用土地而带来的所有风险和责任。作为这份财产转让对价的一部分，也作为该财产转让成就条件之一，双方理解和同意，受让人、它的继承者或被转让者不会因为现在所指出的工业废料或它对个体或人群的伤害（包括由此导致的死亡），以及由此引起的财产损失，向让予人提出任何形式的赔偿要求、诉讼、传讯等。双方也同意，作为该财产转让成就的条件，上述土地以后的财产转让也应当满足前述的规定和条件。

在1952年，即使没有这个条款，责任法也可以让公司无所畏惧。新的土地所有者会自动成为那些废料所产生损害的责任者，所以公司并没有太多的动力去警告人们，这些化学品是危险的，而且不应当被挪动。不幸的是，没有人在听，也没有人会去看。1952年3月，一位公司官员陪同学校管理委员会官员到现场钻孔，直到保护性的泥土层，让学校管理委员会确信里面真的埋着化学品。但是在1953年8月，学校管理委员会一致投票决定将4000立方码*的填充物从放废料的地方转移到另一个校址，以填充那里的道路。学校管理委员会到底还是在那里建立了学校，并于1955年2月完工。

然后，在1957年，学校管理委员会准备将这块地卖给两个开发商，来交换另一块地和1.1万美元的现金。原来拥有那块地的化学公司知道后，派律师来参加讨论这个提议的委员会会议。律师提醒委员会化学品就

* 一码约等于0.9144米。——译者注

埋在土地表层之下，并提请他们不要在这块土地上盖房子。这次，委员会听进去了：投票结果 4 比 4，没通过。

不幸的是，市政府没有听进去。在打算把土地卖掉的那段时间里，工人正忙着造下水道，地表和泥土层。尽管当地报纸已经警告说建造是“危险”和“有害”的，他们还是那么做了。

到了 1978 年，一个叫迈克尔·布朗的记者开始报道该地区居民的健康问题，而且问题显然与有毒废料的释放有密切关系。这很快引起整个国家的注意，总统卡特接着宣布该地区为国家灾难区。

这个埋废料、警告政府的公司，如果你还没猜到的话，那我告诉你，它就是胡克化学厂（Hooker Chemical），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的子公司。而这个城市就是尼亚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这个有毒废料的堆放点则是腊夫运河（Love Canal）。^[1]

问 40 岁以上的美国人什么事件让他们感到了污染的恐怖，多数人可能提到的一个名字就是腊夫运河。他们可能告诉你，腊夫运河说明贪婪的营利性企业为利润会破坏环境，并在这个过程中伤害无辜的人。但这个例子根本不是这一观点的最好佐证，事实上胡克化学厂非常注意环境问题。腊夫运河事件实际上是政府机构为了追求狭隘目标而忽视环境的典型例子，腊夫运河事件是政府官员在侵犯产权的激励之下造成的环境问题。

[1] 对这个故事的完整而精彩的报道，请见“Love Canal: The Truth Seeps Out,” *Reason*, February 1981, by Eric Zuesse。

时间旅行

想像一下，你我一起乘时间机器回到了1990年，在全世界穿梭，观察各国的环境。在前苏联，我们看到的情景足以让人呕吐。前苏联海军常规性地将核废料倾倒入波罗的海，当盛有核废料的桶浮起来的时候，为了让桶沉下去，前苏联人就将它刺穿。^[1]我们看到工厂和纸浆厂向贝加尔湖倾倒污染物。贝加尔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淡水湖，体积是苏必利尔湖的两倍。^[2]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就被倒进了湖的主要支流。结果，岛状的碱性污水漂浮在贝加尔湖上，其中一段甚至有18英里长、3英里宽。^[3]贝加尔湖并不是前苏联惟一被毁掉的水体，由于前苏联将咸海的水用于灌溉，咸海已经下沉了大约一半。没有处理的污水自由流入，剩下的一半咸海咸化和污染程度也越来越严重，过去的海岸线现在已经成了干涸的沙漠，港口城市木伊拉克（Muynak）现在离水有44英里之远。^[4]那么多石油漂流在伏尔加河上，以致汽船禁止游客从船上扔下香烟，因为害怕会引起一场大火。^[5]

为什么如此残暴地对待环境呢？马歇尔·高曼（Marshall Goldman）说

-
- [1] Paul Hofheinz, "The New Soviet Threat: Pollution," *Fortune*, July 27, 1992, pp. 110~114.
 - [2] Marshall Goldman, *The Spoils of Progres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72, p. 179.
 - [3] Marshall Goldman, *The Spoils of Progres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72, pp. 200~201.
 - [4] Hofheinz, "New Soviet Threat," p. 112.
 - [5] Goldman, *Spoils of Progress*, p. 231.

得很坦率，“前苏联式生产伦理的本质就是：自然是用来被开发的。”^[1]

我们继续旅行，穿越时间和空间，来到其他国家。在克拉科，我们看到波兰最大的维斯瓦河。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那一年克拉科的市长称维斯瓦河“已经成了一条污水运河”。^[2]波兰一半的城市，包括华沙在内，从不处理垃圾，^[3]波兰人中有三分之一生活在波兰科学院称之为“生态灾难区”的地方。^[4]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氧化硫浓度是美国的8倍。在东德的莱比锡，空气污染程度非常严重，每年莱比锡的儿童发病有一半跟空气污染有关。《财富》杂志作家德马利（Allan T. Demaree）在1990年底去东德旅行后这样写道：

一路往南，从莱比锡到开姆尼斯，你逐渐发现自己在一片可怕的云层下面，它太高了，不可能是雾；太低了，不可能下雨。发电厂在燃烧从周围采剥来的含硫褐煤，从烟囱中散发出这种云朵。你的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都是怪异的开裂沟渠。在远方，是另一些工厂、另一些烟囱，和另一些浓烟。^[5]

[1] Goldman, *Spoils of Progress*, p. 66.

[2] Marlise Simons, "A Green Party Mayor Takes On Industrial Filth of Old Cracow," *New York Times*, March 25, 1990, p. 18.

[3] Thomas DiLorenzo, "Does Capitalism Cause Pollutio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Business,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Contemporary Issues Series 38, August, 1990.

[4] Marlise Simons, "Rising Iron Curtain Exposes Haunting Veil of Polluted Air," *New York Times*, April 8, 1990, p. 1.

[5] Allan T. Demaree, "The New Germany's Glowing Future," *Fortune*, December 3, 1990, p. 148.

现在，我们往南旅行，穿过中东，到达非洲大陆。我们来搜寻一下，不是要打猎，只是来数数。从1979年到1989年，中非的大象数量从49.74万头降到了27.48万头，东非则从54.665万头降到了15.472万头。在肯尼亚，我们只数到了1.6万头大象，而当肯尼亚政府宣布禁止猎象的时候，那儿还有14万头。在坦桑尼亚，只剩下6.1万头大象，而在1970年，那儿还有25万头。在乌干达，大象数量从1970年的2万头降到了1600头。可笑的是：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就像肯尼亚与中、东非的多数国家一样，已经禁止了捕猎。

都是坏消息。有任何让我们感到还有希望的事情吗？有！要看到好消息，我们必须旅行到南部非洲的5个国家：津巴布韦、马拉维、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和南非。津巴布韦的大象数量从1979年的3万头升到了今天的7万头。博茨瓦纳则增长了两倍还多，从2万头升到了今天的6.8万头。马拉维、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大象数量每年以5%的比例稳定增长。有趣的是，这5个国家的政府允许附近的村民从捕猎大象中赚钱，这给了村民激励以减少偷猎。^[1]

让我们回到中非，停留在萨赫勒荒漠。在荒漠中央，我们观察到沙海中有一块繁茂的绿色五边形地区，面积有390平方英里。这块五边形第一次被世界注意是在1974年，在当时所拍摄的卫星照片中，它看上去就像一片暗色的补丁。科学家们惊呆了，因为萨赫勒位于长期干旱地区。美国的农业学家麦克劳德（Norman MacLeod）对这件神秘事情进行了地面调

[1] 这一段的数据来自 Randy T. Simmons and Urs P. Kreuter, "Herd Mentality: Banning Ivory Sales is No Way to Save the Elephant," *Policy review*, Fall 1989, pp. 46~49, and from "Riding the 'Ban' Wagon: Unsafe for Any Species," *CEI Update*, June 1991, No. 6.

查，很快弄清事实。他发现，这个地区被有刺的栅栏围起来，这是私人财产。栅栏把那些会破坏放牧区的动物隔在外面。这个五边形地区被分成了五个部分，每年，业主就会把他的动物移到一个新地区，使每块土地都有4年时间从以前的放牧当中恢复过来。^[1]而另一方面，环绕着这块地区的沙漠，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公共品”。换言之，没有人对这块土地拥有产权，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使用它。它被过度使用，因为没有人有足够的积极性来照顾它。

现在让我们继续旅行，来到英格兰和苏格兰。在这些国家，我们注意到允许捕鱼的河流特别清澈。这肯定是严格管制的结果，是不是？错。苏格兰没有政府机构来保护水质。真正的原因是，作为休闲和商业的捕鱼权都是可以转让的，捕鱼权的所有者能够而且也获得了污染的赔偿金，并对污染河流的人施以禁令。他们很少需要去法庭，因为权利已经被维护得非常之好。^[2]

现在我们去美国。首先，我们来到东宾夕法尼亚的鹰山（Hawk Mountain）。我们毫不奇怪地注意到，那儿有很多鹰。在秋天，鹰和其他猛禽沿着山脊向南方迁徙，途经鹰山。由于这个原因，很多人等在这里射杀鹰和其他鸟类。在1934年，为这种屠杀担忧的一位女士做了一件事情。生于1877年的罗莎莉·埃吉（Rosalie Edge）是美国最早最知名的环保主义者之一。在劝说奥杜邦协会（Audubon Society）购买鹰山并停止这种屠杀未果之后，她决定自己把山买下来。她租了一年，第二年以3500美元

[1] Garrett Hardin, *Filters Against Folly*, New York: Viking Books, 1985, P. 89.

[2] Richard Stroup, "Environmentalism, Free Market," in David R. Henderson, ed., *The Fortun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3, p. 443.

买下了鹰山。从那时起，鹰山就成了人们来看鹰和其他鸟类的胜地。他们的人会费加上会员费，足够让鹰山保护区协会雇用一些全职员工。^[1]

让我们再往南，到路易斯安那的雨林野生动物保护区去看看。这块 2.6 万英亩的保护区是国家奥杜邦协会所有的私人财产。保护区不允许游客参观游玩，而由于有天然气，有三家石油公司在保护区开采天然气，并付给奥杜邦协会每年数十万美元的费用。奥杜邦协会向石油公司投降了吗？根本不是这样。协会要求石油公司的开采必须遵循严格的条件，以保护环境，而且协会可以用特许开采权所得到的钱维护更多的荒漠地区。^[2]

什么在起作用

现在让我们乘时间机器回到今天，想一想我们刚刚看到的一切。可以总结出一个模式：凡是政府负责的地方，环境就会被破坏。比如，在腊夫运河，政府机构为了建造学校，完全无视对环境的破坏。

另一方面，私人财产看起来可以很好地保护环境。当人们可以从捕猎大象中获利时，他们有很强的激励去增加大象数量而不是使之减少。就算是在荒漠当中，私人财产也给了所有者激励去照顾他们的土地。这让人忆起一句中国老话：“把沙漠租给一个人 100 年，他能够把它变成花园。”* 苏格兰的河很清，因为渔民有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可由法庭强制执行。鹰山

[1] 这些事实来自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Environmental Quality*, 15th Annual Report, 1984, Chapter 9, "Special report: The Public Benefits of Private Conservation".

[2] 这些事实来自 Robert J. Smith, "Conservation Capitalism," *Libertarian Review*, October 1979, p. 21, and from John Baden and Richard L. Stroup, "Saving the Wilderness," *Reason*, July 1981, p. 33.

* 未找到出处，但似乎不像是中国人的古话。——译者注

的鸟和雨林野生动物保护区的野生动物是安全的，因为人们拥有它们，可以保护它们不受猎人、游客和其他人的伤害。

环保主义者及蒙大拿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斯特鲁普（Richard L. Stroup）认为：

要让市场同样在环境领域发挥作用，对每项重要资源的权利就必须得到清楚的界定（clearly defined）、要能够轻松抵抗（defend）侵害，而且根据买卖双方的合意，所有者权利是可剥除（divestible）的（可转移的）。^[1]简言之，能够发挥作用的市場要求“3D”财产权。

如果人们拥有清晰的财产权利，而且可以很容易地保卫这些权利，就像鹰山保护区协会和苏格兰钓鱼者协会那样，那么就没有人会被强迫去接受任何不想要的污染。而且，当第三个D实现，也就是资源权能被卖掉的时候，比如苏格兰的捕鱼权，权利所有者就有激励去做好财务管理员：他们的财富直接依赖于他们对财产的照管程度。

定义财产权并不总是很容易的。我们都知道政府立法机构和法庭经常阻止普通法系统处理污染问题，即使在普通法能够很好地处理问题的时候也是如此。比如，臭名昭著的库雅荷加河，它流经克里夫兰城，最终进入伊利湖。这条河被伐木、残骸、家庭垃圾等严重污染，分别在1932年、1952年和1969年发生了原油燃烧事件。1999年，华盛顿参议院金融委员会

[1] Richard Stroup, "Environmentalism, Free Market," p. 442.

的经济学家托马斯 (Stacie Thomas) 挖掘了导致这些灾难的历史原因。^[1]

1936 年，库雅荷加河某支流的一家造纸厂控诉克利夫兰市政府，要求停止向这条支流倾倒未处理的污水。法院支持市政府有继续倾倒的权利，毕竟它已经这样干了 76 年。到了 1948 年，俄亥俄州法院确立了反对污染的财产权，宣布“在没有业主同意的情况下，一个人不可以通过命令或任何购买的形式获得将污水倾倒在另一个人土地上的权利”。^[2]这个决定和其他相似的决定一起促使市政府和企业沿着库雅荷加河建立污染控制技术。然而，在 1951 年，俄亥俄州政府建立了俄亥俄水污染控制委员会。法律宣布污染俄亥俄的水源都是不合法的行为，“除非水污染控制委员会给出了有效的未到期的许可，”^[3]这给污染者留下了很大的法律漏洞。如果申请人是在一条被分类为“休闲用途”的有鲑鱼的支流上，那么水污染控制委员会就会拒绝给予许可，但如果污染者打算污染的是一条已经被污染的“工业用途”支流，那么就会得到许可。换句话说，在政府的插手之下，阻止污染者污染一条已经被污染的河流就变得不可能。这样，作为一条“工业用途”的河流，库雅荷加河着火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如果包括空气和水在内的所有资源都能够被私人拥有，而且侦知伤害私人资产的来源和程度的成本很少，那么普通法系统就可以解决所有的污染问题。就像你对自家院子的所有权让你有权禁止我把垃圾倒在你的草坪上一样，你对空气的所有权让你可以禁止其他人将煤烟混进你的空气。这

[1] Stacie Thomas, "Cuyahoga Revisited," *PERC Reports*, June 1999.

[2] *Vian v. Sheffield* (June 14, 1948), 85 Ohio App. 191, 88 N. E. 2d 410, cited in Stacie Thomas, "Cuyahoga Revisited," *PERC Reports*, June 1999.

[3] The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 of Ohio, Sec. 1261-1e of the Act, Violations of Act Defined.

并不意味着就不会有污染，它意味着所有的污染都已得到同意。如果你付给我足够的钱，我就会让你在我的草坪上倾倒垃圾。（你也许不愿意付给我足够的钱。）如果你付给我足够的钱，我也许会让你把我的空气弄得稍微脏一点。

对我来说，发现其他人将垃圾倒在我的草坪上是很容易的，但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市的一位业主如何才能知道他周围空气中的烟尘是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的一家发电厂，而不是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另一家发电厂呢？他非得要知道去控告谁才行。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对空气和大规模水体的权利定义和实施是不可能的，可以先考虑一个直到 19 世纪晚期都还存在的类似问题：美国中、西部平原的财产权定义和实施问题。^[1]当时，制定一套有效的财产权制度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土地的面积太辽阔了。但是在 1870 年代，一项发明改变了一切：带刺的铁丝网。^[2]有了这项发明之后，定义土地财产权的成本直线下降。人们能够以很低的成本将入侵的动物隔在外面，因此，也就有了激励去改善他们自己的土地。

弗瑞德·斯密（Fred Smith）是持自由市场论的环保主义者，他是华盛顿公共利润游说机构“竞争企业协会”的负责人。他认为我们能够想像一个类似的技术突破，使得定义和实施空气与水的财产权变得比较容易。斯密写道：

[1] 我要感谢 Fred L. Smith, Jr. 的洞识，“Markets and the Environment: A Critical Reappraisal,”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Vol. XVIII, January 1995, pp. 62~73。

[2] Terry L. Anderson and P. J. Hill, “The Evolu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 Study of the American We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XVIII, No. 1, April 1975, p. 172.

已经有这样的技术，能够确定进入某个区域的污染的数量和类型。比如，Lasimetrics 技术可以绘制出大气的化学浓度。技术还可以提供一个追踪跨界污染流的复杂工具。同时，像发电厂这样的大型装置可以在排污时加上（或被要求加上）化学或同位素“标签”，使得追踪变得比较容易。这种“标签”在炸药的制作中已经是常规性要求，它可以用来追踪犯罪或恐怖主义袭击中所使用的炸药来自何方。^[1]

私人所有权也可以防止珍贵物种的消失，特别是那些可爱的物种。物种会灭绝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人拥有它们。我们从不担心奶牛会灭绝。为什么不？这问题看上去很可笑，但如果人们不能被允许拥有一头活的奶牛，那么拥有奶牛的惟一办法就是杀了它，这样的话我们可能真的会让奶牛灭绝。通过法律来禁止拥有所有权，这对任何一个物种来说，都是一场公共地悲剧。奶牛不会灭绝是人们可以拥有它们，所有者有激励去照顾奶牛，养更多的奶牛。同样，珍稀物种的私人所有权会给所有者前所未有的激励去打击偷猎者，并提高繁殖率。即使像鲸鱼这样的远洋物种，也可以由私人拥有。鲸鱼的旅行路线是相当固定的，私人组织可以在鲸鱼体内植入电子装置，定位该鲸鱼在任何时间所在的精确地点。这会加大偷猎鲸鱼的难度，所有者出售观看鲸鱼的权利也变得很容易，因为他知道鲸鱼的精确位置。绿色和平组织和其他团体仍然可以继续提供他们的服务，但它们的工作将不再是阻止法律所禁止的猎鲸活动，他们可以帮助所有权人执行财产权。

[1] Smith, p. 72.

许多环保主义者主张另一种保护珍稀物种的办法：让政府宣布它们为濒危物种，禁止私人进行开发，而且就算该物种是在私人土地上被发现的，也要照此办理。这是今日美国的标准做法，它会带来两个问题。首先，它在道德上是错的。为什么一个私人土地所有者在他的土地上恰好发现了某个珍稀物种，就应当失去开发自己土地的权利呢？如果政府重视这个物种，那就应该给予土地所有者足够的补偿，以说服他自愿地不去开发。其次，这样的一种策略不起作用，因为它创造了一种不正当的激励。如果我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现了一种可能相当珍稀的物种，我知道政府会非常有效地将我的土地价值减少为零。我该如何阻止？那就是在任何人发现之前将这个物种秘密地除掉。发现了这种极端情况的环保主义者开始谈论“3S”：射（shoot），铲（shovel）和闭嘴（shut up）。^[1]也就是说，杀掉它，埋起来，而且不告诉任何其他人。

使用私人产权来解决环境问题能走多远？我们可以完全不要任何政府管制机构，完全依赖于普通法来解决问题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两件事情：第一，正如库雅荷加河这个故事所展示的，普通法能够替代许多当前的管制。第二，如果我们承诺借助普通法解决问题，那么普通法的解决机制及相关技术的发展速度将会快得多。如果人们不被允许保护自己的产权，就不会那么早就发明出带刺的铁丝网来。利润和消费者的福利是发明之母。

此外，再来看看政府解决机制的效果有多差吧。环境保护机构（EPA）创立于1970年，主要处理跟空气和水有关的重大污染物质。它不

[1] Robert H. Nelson, "Shoot, shovel and shut up," *Forbes*, December 4, 1995, p. 82.

断地扩展范围，现在试图管制数百种污染物质，其中一些所造成的风险接近于零。许多由 EPA 发起和执行的管制每挽救生命一年（per year of life saved）就要花去数千万美元。然而，通过对工作风险选择的相关研究，经济学家们发现人们对自己剩余生命的估价也不过是 500 万美元。

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通常支持向污染征税或实施可交易的许可证（marketable permit），以此来解决污染问题。征税是给污染者激励以减少污染问题，只要减少污染的成本小于对每单位污染的征税，他们就会这么去做，而且消除成本最低的污染就会首先被消除掉。这样一来，清除污染的成本才是最低的。可交易的许可证设置允许污染的数量，把所允许的数量分配给各种各样的污染者，并允许他们进行买卖。比如，如果一个污染者想要污染的数量比所允许的多，它可以从其他企业那里购买许可证。这样的话，只要减少污染的成本小于许可价，污染者就有激励去减少污染。而且，能够以很低的成本减少污染的污染者就可以卖掉多余的许可证，以此盈利。如果减少污染的成本很高，污染者则可以购买许可证。这样，就像征税一样，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以最低的费用减少了污染。一个相当简单的数学实验表明，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产生的结果与课税制度是相同的：消除同样数量的污染，其许可证的价格等于每单位的征税额。区别是，用征税的办法，政府拿走了我们的钱；但是如果用许可证方法的话，就意味着钱还保留在我们手里。

改用这样一种制度能节约的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当前在减少污染上所花的钱大约是 GDP 的 3%，经济学家们已经估计出，如果完全转向许可证制度，要减少同样的污染只需花 GDP 的 2%，每年能节约 1000 亿美元。也就是说，每年能为每个美国人节约 400 美元左右。

然而，出于两个原因，我现在已经不再支持这样一种解决方案了，一个原因是实用主义的，另一个则更为根本。实用主义的问题由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克兰道提出。当经济学家们鼓吹可交易许可证的时候，政客们则通过将许可证列入法律的办法施以小恩小惠，诱使平时总是拒绝政府方案的经济学家们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成了法律的支持者，虽然这项法律还包括了旨在消除无害污染物质的极端不经济的管制。克兰道所指的就是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克兰道写道：

（发放许可证的）新程序在任何一方面都比前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可恶得多。不但所有的污染主要来源必须获得许可（这个“主要”的量其实根本不大），而且如果要对任何改变污染的性质和数量级的过程做出调整的话，都必须先得到改变环境运作的许可。对于必须快速回应市场条件变化的制药、化学和电子企业来说，这个要求给它们平添了一层障碍。^[1]

该法同样还要求每年减少1000万吨的二氧化硫排放以减少酸雨，尽管联邦政府自己作的价值5.7万美元的研究——国家酸沉降评估项目（NAPAP）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当前美国的酸雨程度导致了广泛的森林破坏”。国会、老布什总统和EPA无视于他们自己的研究，毕竟浪费在这项研究上的5亿美元是纳税人的钱，不是他们自己的。不过，尽管要求减

[1] Robert W. Crandall, "Is There Progress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Vol. XIII, January 1995, p. 82.

少二氧化硫的排放并没有什么根据，该法还是扔给了经济学家一根骨头：用可交易许可证的办法来减少排放量。所以，一个无效率的结果将以有效率的方式来实现。当然，经济学家们已经将这个没有太大价值的成就吹到了天上。

我反对征税或许可证的第二个也是更根本的理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要将税率设到多高，或者应该允许发放多少污染许可。要了解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知道人们对减少污染有多重视，但是在不允许通过自由市场作出决定，而是用政治的办法来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消灭了形成答案的可能性。正如自由市场环保主义者弗瑞德·斯密（Fred Smith）所指出的，给予市场许可并允许它们交易，这种办法无异于经济学家们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办法。在市场社会主义之下，政府设定价格，并让生产者和消费者调协他们的价格。市场社会主义从没有真正付诸实践，它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自由市场中，只有参与者才掌握有可以导出真实价格的信息，政府的计划者是不会知道的。类似的，只有造成污染的人和被污染伤害的人才会知道到底应当允许多少污染。是的，如果市场和普通法都无法解决污染问题，那许可证制度的确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佳办法。但如果我们拘泥于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那我们永远都无法发现普通法、自由市场和产权是否有效。

短期内容易做出的妥协是保留EPA和其他环境管制，让它们仅仅颁布对收益超过成本的污染的管制条例。我通常会怀疑这样的要求，因为我相信政府官僚很容易就能高估收益、低估成本，使得许多无谓的管制看上去相当有道理。不过有证据表明我的老观点可能是错的。首先，支持进行成本—收益测试的克兰道注意到，惟一要求这种测试的环境法是1976年

的《毒性物质管理法》(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 TSCA), 克兰道指出, 在 TSCA 之下没有发生任何因过度管制而造成的悲剧故事。EPA 想证明禁止石棉的所有其他用途是正当的, 但它自己的数据表明, 完全的禁止在 25 年到 40 年内只挽救了少于 200 名的癌症患者。另一方面, 成本则是巨大的: 禁止在汽车刹车上使用石棉, 每年将造成数百人死亡, 更不要说经济成本了。一家法院通过成本—收益测试, 否定了 EPA 的这项管制条例。所以, 成本—收益测试阻止了 EPA 对石棉进行超出政府管制范围的更严厉管制的企图。克兰道写道:

(法院决定的)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它 (EPA) 没有再提出新的提议。事实上, 就我所知, EPA 没能在 TSCA 之下找到任何一项可以通过成本—收益测试的管制。^[1]

全球变暖

近年来, 对全球变暖的恐惧正在促使人们要求更多的政府管制。人们担心的是, 我们燃烧含碳物质做能源, 创造更多的二氧化碳, 那么就会出现温室效应, 在大气中形成隔热层, 逐步使全球气温变暖。根据这个观点, 大气是一个巨大的全球公共品。如果我控制自己所消耗的含碳能源数量以减少或阻止全球变暖, 那我从中所得的收益大约只相当于我所创造的收益的 60 亿分之一。换句话说, 差不多所有的收益都到了世界上其他 60 亿人手, 这些人都是陌生人, 我对他们的关心远不如对自己的关心。所

[1] Crandall, p. 83.

有其他人的想法也都跟我一样，所以就算全球变暖对这个世界来说是件坏事，也没有人有足够的积极性来遏制这种趋势。因为你无法阻止不付钱的人从中获利，你就必然碰到搭便车者，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几乎所有人都主张用政府来解决问题。因为问题是全球性的，一个国家单方面进行限制，哪怕其消耗量像美国这样大，也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大家就呼吁签署一个国际条约来限制所有国家的含碳能源消耗。在日本东京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允许穷国继续不受限制地使用含碳能源。这是为什么美国参议院会以 95 比 0 的压倒性票数反对签署该条约的原因。从那些希望政府干涉的人的角度来看，理想的条约是能够不受政治影响的。经济学家已经参与了这场争论，他们指出，限制含碳能源使用的最有效办法是由政府发行可交易的许可证，或对能源使用征税。

如果温室气体肯定会导致全球变暖，再如果全球变暖一定对世界有害，那么通过国际条约来限制温室气体的使用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这里有两个很大的“如果”。关于温室气体是否使全球大幅度变暖，科学家还没有达成共识。在促使大家相信共识已经形成这方面，最知名的人物就是前副总统戈尔。在 1997 年，他宣称有 2500 名科学家支持他的看法，即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影响了地球的气候。事实上，这些科学家只是帮助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起草了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里，下面这句被戈尔用来支持他的观点：“证据表明，人类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清晰可辨。”请注意这句话多么的温和：它根本没有宣称全球变暖可能会成为一场大灾难。而且，这句话是在 IPCC 通过该报告之后，该章的编者在最后一分钟加上去的。这份报告出笼后一个星期，洛克菲

勒大学名誉校长及马歇尔研究会主席弗雷德里克·塞茨 (Frederick Seitz) 揭露了编辑的丑行，他指出，在撰写该章的科学家们“已经接受了最后文本”之后，该重要章节有 15 段被做了改动或删除。^[1]塞茨注意到这些改动根本不是中立的，而是要把对全球变暖的怀疑态度去除掉。他引用了下面这些经过科学家们认可但是被编辑删掉的句子：

上述研究中并没有显示出存在清楚的证据，使我们可以将观察到的（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的递增这一特殊原因联系起来。

迄今为止的研究并没有将全部或部分（迄今为止所观察到的气候变化）问题归咎于人为原因。

在气候系统全部自然变量的不确定性被消除之前，任何宣布探测到重大气候变化的研究很可能仍是有争议的。

塞茨愤怒了。他写道：

在我作为美国科学共同体的成员超过 60 年的时间里，我担任过国家科学院和美国物理学会的主席，还从没碰到过比这份 IPCC 报告的形成过程更为混乱不道德的事。

[1] Frederick Seitz, "A Major Deception on 'Global warming,'"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2, 1996.

考虑到这个议题面临的压力，科学家们的观点被如此扭曲并不令人意外。正如环境科学家帕特里克·迈克尔斯（Patrick Michaels）所指出的，联合国大会在此之前已经指示 IPCC 为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提供理论基础。^[1]许多人一旦被告知要为某件事找到一些基础时，就会真的这么去做。事实上，全球变暖方面的某些极端支持者已经坦承，在全球变暖方面误导公众并没有什么不对。在 1988 年，当时的参议员蒂姆·沃斯（Tim Wirth），也就是后来克林顿政府的全球事务助理国务卿，同时也是克林顿政府中支持京都议定书的主要人物，这样说道：

我们在能源会谈上要做的事就是驾驭全球变暖问题。就算全球变暖理论是错的，也要把它当成能量守恒一样的真理来处理，这样我们至少在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方面做了正确的事。^[2]

同样，戈尔在 1992 年《危急中的地球》一书中写道：

经过多年的辩论，我企图说服怀疑主义者相信时间已经不可再拖延了，但我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尽管我们有着非常充足的证据。对所有妨碍我们联合起来面对危机的科学上的重大不确定性，我

[1] Michaels 引自 Daniel Bodansky, "Prologue to the Climate Change Convention," in *Negotiating Climate Change: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Rio Convention*, ed. Irving Mintzer and J. A. Leon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3.

[2] Rochelle Stanfield, "Less Burning, No Tears," *National Journal*, August 13, 1988, pp. 2095~2096.

们必须进行彻底调查。调查的结果不仅可以反驳那些怀疑论者用以拖延的借口，也能帮助我们选择回应这个危机的策略，找到最有效和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并且促进公众支持必需的全面改变。^[1]

这让我想起了句老话，“让我们先给他公正的审判，再把他吊死。”戈尔打算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但只限于那些妨碍他的不确定因素。显然，在你进行一项科学研究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会发现什么，但是戈尔已经知道了。他非常确定结论会证明怀疑者是错的，而且能够推动公众对大规模政府干涉的支持。请注意戈尔的语言，他并不是真的相信可以用进一步的研究来求得真理；相反，他已经“放弃”了。由戈尔和沃斯这样的狂热之徒来充当领导，再加上他们在联合国的同道，无怪乎在这场辩论中真相只不过是次等因素了。

因为这场讨论的全部关键就在于政府是否应当行动起来减少或逆转全球变暖现象，所以研究执行京都议定书对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很有趣的。汤姆·威格利（Tom Wigley）是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的高级科学家，他计算出，如果每个国家都履行自己在京都议定书中的责任，到2050年，仅能使全球气温少上升0.07摄氏度。^[2]也就是说，削减巨资能源以达到京都议定书的目标，其实对阻止全球变暖作用甚微。

此外，适度的全球变暖也许是件好事。现在的证据表明，多数变暖现象发生在寒冷地区和夜里，这样就延长了生长季节。托马斯·摩尔（Thomas

[1] *Earth In The Balance* by Al Gore. Copyright © 1992 by Senator Al Gore.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2] Thomas Wigley, "The Kyoto Protocol: CO₂, CH₄, and Climate Implication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 25, 1998, pp. 2285~2288.

G. Moore) 是我在胡佛的同事，他已经发现全球变暖会为世界产生正的净收益。摩尔使用被普遍接受的人口模型来预测人口增长，他发现，在温暖时期，比如公元前 5000~前 1000 年，人口增长比预期的要高，而寒冷时期，如从公元 1300~1800 年的迷你冰河时期，人口增长要比预期的低。因此，基于大量的研究，他的结论是，变暖是一件好事。^[1]

根据这些事实，现在最应该做的不是去管制人们的活动以降低全球变暖的速度，而是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戈尔所说的相反，很有可能还有更多的惊奇在等着我们，这就是寻找真相的本质。而获得真相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管进行诚实研究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发现了什么，都不要去谴责和攻击他们。研究全球变暖问题的研究经费很多来自政府，研究和研究报告都会被政府努力侵蚀，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 IPCC 报告出炉过程中所发生的事，它也可能发生在这个国家由政府资助的各个研究协会中。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对这类协会的腐败问题掌握了具体材料，而是因为对政府和激励有着深刻的理解。

万一全球变暖真的会变成一场大灾难呢，难道我们就不应该限制含碳能源的使用吗？是有这个可能，但这个可能性很小。如果含碳能源的使用抵消了自然界中其他可能导致另一场冰河时期的因素呢？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认为我们应当限制含碳能源的使用以防万一，这种“预防”论点让我想起了帕斯卡的赌注。帕斯卡（Blaise Pascal）是法国著名的数学家，他认为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上帝存在，但选择信仰上帝是一个安全的赌注。因为如果他信仰上帝但事实上并不存在上帝，他并没有损失；

[1] Thomas Gale Morre, *Climate of Fear*, Washinton, D. C.: Cato Institute, 1998.

如果他信仰上帝而上帝真的存在，那么他就能够上天堂。帕斯卡的赌注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没有任何关于上帝的信息，他也没办法知道上帝是恶毒的还是仁慈的。如果上帝是恶毒的，会惩罚那些信仰他的人，那么信仰上帝就是有害的。同样，限制含碳能源的使用可能会让这个星球变得太冷。比帕斯卡的赌注更糟的是，限制含碳能源的使用成本很高，燃油价格也将比现在高得多。所以，这并不像帕斯卡的赌注一样，是一种“免费”的信仰。

两种环境保护主义

我女儿小时候在公立学校上学，整天被灌输说自然是多么的伟大。这个观点没有什么害处，但它遗漏了人这个主角。有一次我们开车去我们在加拿大的那幢小别墅，当她评论沿途所看到的自然景观时，我就指着一位正在爬竿子的安大略水电集团的雇员，对我6岁大的凯伦说，“他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我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自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想要一个清洁和干净的环境。我们想要那些毛茸茸的可爱动物能够茁壮成长。我们想要有着质朴山景的美丽公园。在所有这些句子中，关键词都是“我们”，是我们想为自己要这些东西。不幸的是，许多环保主义变异成了另一种形式：不管对人类的影响如何，都要保护环境，最终就变成了哪怕会害死人，也要保护环境。许多环保主义者所关注的只是自然本身，哪怕它会对人有害。这些环保主义者并不总是隔一阵就寄邮包炸弹的隐士，他们往往在政府里担负要职，合法地对人们施以伤害。比如，美国政府制定了一个官方政策，让狼居住在公用土地上，根本不管狼会攻击

其他自然生物，比如牛、羊和狗，甚至还会威胁牧场里的人。

所以，的确存在两种环境保护主义：关怀人类的环境保护主义和仅仅关怀环境的环境保护主义。第一种是支持人类的，而第二种在本质上是反人类的。并非巧合的是，神秘邮包炸弹手（Unabomber）* 也相信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杀死无辜的人是正义的。他付诸于行动的想法某些时候已经成了环保主义者的主流。比如，国家公园服务处的生物学家格拉伯（David M. Graber）在《洛杉矶时报》这样写道：

……我们并不关心一个特殊的物种或生态系统对人类而言有什么价值。它们有其本身的价值，对我来说，这个价值比一个人，或其他10亿人的价值还要大。

人类的幸福和人类的繁衍，它远不如一个原始和健康的星球重要。我知道社会科学家会提醒我，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但这是不对的。从某个时候起，大约10亿年前，也许是5亿年前，我们就退出了与自然的契约，成了一个毒瘤。我们已经变成了危害自己和地球的一场瘟疫。

发达国家不太可能停止它们对化石能源（fossil-energy）的浪费性消费，而第三世界则在自杀性地破坏环境。在智人（Homo Sapien）选择重新加入自然之前，我们只能期待出现正确的病毒了。^[1]

* 从1970年代起，美国出现了一位用邮包投递炸弹的连环杀手，他被称为“Unabomber”，于1996年被美国警方抓获。他的原名是Ted Kaczynski，毕业于哈佛与密歇根大学，曾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后辞职隐居在一个小木屋中。——译者注

[1] *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 Sunday, October 22, 1989, p. 9.

想一想吧。对我们多数人而言，呼吁环保是因为担心污染会让空气和水变得对人类不安全，但如果你像格拉伯一样希望所有人都去死，那为什么要关心会杀死人或危害健康的污染呢？或者考虑一下近来人们关于自然到底能提供多少资源的争论，但无论如何，资源都是我们人类需要的东西。如果格拉伯希望出现一种能杀死我们所有人的病毒，那他怎么会对自然生成的砷表示反对呢？

事实在于，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自然所赋予我们的一切。格拉伯能够写下他那些恶毒的思想，我们多数人能够活过 70 岁，就算住在 2000 英里之外我们也能够去游览黄石公园，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前人不满足于自然给予的吝啬恩惠，他们认为他们能做得更好。他们是对的。

第十八章

我们时代的自由

哲学不能帮你做什么，它能帮你不做什么。

——亚里士多德

在阅读这一章之前，我们假定你同意我迄今为止所提出的大部分观点，而且愿意为此做些什么。接下来我将讨论人们已经做了些什么，以及不管你愿意投入多少时间多少金钱，你可以做的又是什么。

哈耶克曾经写道，社会主义者不吝于走向乌托邦的勇气俘获了知识分子的想像力，于是他们将这些理念灌输进我们的文化，让欧洲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程度上弱一些）在 20 世纪头 70 年里实施了相关的政策。我在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几个月之后碰到了他，那是在一个为期一周的“亲自由与市场”青年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学生的讨论会上。哈耶克很高兴有这么

多人支持自由与市场，认为在接下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应该在学院里让数以千计的学生明白自由的益处有多么大。在各类校园里，年轻的自由信徒并不总是会获得道德和经济上的支持，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组织。依托于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乔治·梅森大学人文研究所 (Institute of Humane Studies)，成立的目标就是对那些想成为未来自由学者的人提供教育 and 经济支持，它同时也对想在新闻和电影领域有所建树的自由信徒提供帮助。

在学术界我们的声音比较响亮，但在实践上就差得多了。^[1]不过我们也已经有所改善。其中的一个亮点是正义协会 (www.ij.org)，一旦政府侵犯人民的财产权利或工作权利，它就会起诉政府。在最近几年，正义协会成功地保护了维拉·科钦的财产：她是亚特兰大城的一位年老寡妇，政府机构要夺走她的财产，交给唐纳德·强普，好让他建一个停车场。这个协会还同样成功地捍卫了乔安妮·康沃尔的权利，她是圣地亚哥一位专业的美容师 (locktician)，靠做非洲式辫发谋生。州政府要求非洲式发型设计师在从事这个行业之前，必须花9个月时间至少5000美元去州政府批准的美容学校上课，尽管没有一门课是教如何做辫发的。正义协会提起控诉并获得了胜利，现在在加利福尼亚，非洲式发型师已经可以自由执业了。

如果你想控告政府或者支持这样的诉讼，你有两种选择：一个是捐钱给正义协会和其他类似的自由团体；另一种办法是当政府侵犯你的权利时

[1] 关于我自己的第一次实践，请见 www.davidrhenderson.com 的“Fighting the draft”版块，它引发的效应非常强烈。

站起来，找到一个愿意帮助你提起诉讼的组织。21 岁的卓利·帕默最近正在这么做，他是印第安纳波利斯 Outback 牛排馆的服务生，也是自由至上党印第安纳州众议员的候选人。帕默在一个路障前被拦了下来，因为他那辆 1979 年的庞蒂亚克跑车“符合怀疑条件”，他拒绝警察检查他的车中是否有毒品，但他们还是进行了检查。他们没有找到毒品，但帕默也没有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他找到印第安纳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对印第安纳市政府提起诉讼。这场诉讼最后一直打到最高法院，他以 6:3 的票数获得了胜利，法院认为随机进行毒品方面的路障检查是违宪的。帕默的话可以鼓舞我们所有人：

我站起来抵抗我认为是错的事情。我在为每个人的权利而斗争——我要向大家证明，会有人挺身而出，不让大政府任意地欺凌我们。^[1]

或许，卷入诉讼对你来说太激进了。那么就选择你可以接受的方法。比如就相关问题进行示威，或者写信给当地报社的编辑。你不会缺乏材料的，美国各级政府正以种种形式侵犯我们的自由，在我们的一生中，甚至可以每天就一个新的问题提出抗议。课税在收入中的比例已经接近和平时期的顶点；最近，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地方政府将索伯恩关进了监狱，因为他拒绝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树；联邦政府禁止人们使用药用大麻，虽然美国宪法从没有给予联邦政府这样的权力，而且在许多州，都有大比

[1] “Indiana LP member gets Supreme Court Hearing,” *LP News Online*, September 2000, www.lp.org/lpnews/0009/palmer.html.

例的选民支持使用药用大麻。政府还是成功地起诉了彼得·迈克威廉姆斯，使他不能再服用大麻，尽管他只有用了大麻，才能在癌症治疗中不发生呕吐。结果，迈克威廉姆斯最近因呕吐过烈而死；各级政府，只要怀疑人们是毒品犯或犯了其他罪行，在证据不足或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可以抢夺人民的财产，包括钱、车和房子。而且，即使在拒绝登记立案的情况下，政府也经常拒绝归还这些财产。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呼吁将儿童医疗社会化，他们称这一计划为“健康儿童”，想以此让人们踏上终生依赖政府的第一步。我可以继续这么数下去，但如果你真的站起来反抗的话，效果就会更好了。

当然，一个几乎不花你自己的时间就能帮助自由事业的办法是向自由事业捐款。许多组织在传播亲自由言论方面非常得力，比如位于华盛顿的Cato研究所和竞争企业协会这类智囊机构都是积极的行动者，又比如同样位于华盛顿的罚款危害美国人权组织（FEAR），它一直致力于终结财产罚没行为：政府只要怀疑某个人违反了毒品法，就可以通过政策夺走人们的财产。这样的组织还有很多。你也许需要像我一样，重新思考如何向你愿意出力的慈善事业提供帮助。我的母亲死于癌症，我的妻子得了癌症。有助于帮助癌症病人的一个办法就是寄钱给美国癌症协会，我已经那么做了，而同样为了加快治愈癌症和其他疾病，一个不那么明显、但可能更有效的办法则是寄钱给那些努力制止FDA不准我们使用救命药的组织。多年以前，当父亲问我是否能以我和我已过世的母亲的名义寄300美元给一个护士时，我劝说他将支票转寄到一个正在与FDA作斗争的组织。我有时会寄钱到非洲，帮助那些饥饿的孩子。现在，在学到了第十一章中所讲到的教训之后，我想要将钱寄给非洲的自由市场智囊机构，他们

正努力终结对农业的价格管制，以生产更多的食物，并贯彻实施对产权的确认，使人们能够摆脱贫穷。

此外，我们这些自由的信徒要做的不仅是抗议，我们需要歌曲、海报、口号和诗。用“美丽的美利坚”^{*}和“在风中吹响”^{*}的曲调来一首冈萨雷斯（Elian Gonzalez）^{*}的民谣如何？美国公民自由协会为了抗议美国政府没收嫌疑毒品犯的财产，创作了一幅效果非常好的海报：让山姆大叔穿上红、白、蓝三色的衣服，用手指着你，说，“我要你的钱、珠宝、车、船和房子。”

还有，别忘了公民不服从。制止暴虐法律的一个办法就是违反这种法律，并支持同样这么做的其他人。最有效的亲自由行动是由那些受够了暴虐法律的人们发起的，从十三个殖民地居民对印花税的不满到罗莎·帕克斯恼怒于要求她为白人让出位置的法律，无不如此。当然，如果你违反了法律，请小心，因为后果可能很严重。因此，我不建议你违反任何特定的法律，我建议的是你要保留这个念头。

最后，有一件我们所有人都能做的事，它既不耗费你额外的时间，也不需要花任何钱，而且它还可能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有效的亲自由行动。让我们去跟朋友、家人、同事，以及所有和我们交谈的人大声地宣传我们的理念，就算这样做会让自己变得不受欢迎，也要这么做。米尔顿·弗里德曼回顾自己的一生，发现尽管许多人认为处在不受欢迎的位置需要很大

• 凯瑟琳·李·贝茨在19世纪末所写的诗歌，后被谱成歌曲，传唱至今。——译者注
 • 鲍勃·戴伦的名作，录于1963年，被称作是民权运动的圣歌。——译者注
 • Elian Gonzalez，曾偷渡到美国的古巴男孩。——译者注

的勇气，可这样做很少会带来不好的后果。^[1]当某个人说药物公司赚钱是混蛋的时候，不妨问问他是不是更希望药物公司不赚钱，同时他的孩子也无谓地死去。当某个人说高收入者钱更多，也应当缴更多税时，不妨问问他自己的收入又是如何。当一个异性恋说同性恋者不可结婚时，不妨问问如果同性恋反对异性恋的声音足够响的话，是否可以不允许他本人结婚。当然，挑战并不总是改变人们想法的最好办法。另一个办法是提问。弗兰克·巴列特（Frank Barrett）是我的朋友和同事，他发现在自己的课堂上，最能够改变别人想法的人并不是事事争辩的人，往往是沿着别人的观点进行提问的人。

限于篇幅，我无法列举所有的办法，教你如何能够回击拥有巨大的破坏性权力、可以干涉我们生活的政府。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所有的方法，没有人知道。因为每个人都有基于自己生活背景的特殊知识，这些知识都可以用来击退政府的魔掌，所以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可以增加自由的方法。我建议你使用与你的具体环境相衬的行事方式。虽然我并不知道你的特殊力量是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

不管我们选择用什么办法，我们这些自由的信徒需要相互支持，支持那些被政府欺压的牺牲者，支持每个人的亲自由行动，即便他们并不总是支持自由。如果你看到当地报纸上登的某封读者来信是亲自由的，你就可以联系那封信的作者，祝贺他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花费了时间和精力。你说不定还能交一个新朋友呢。如果联邦政府禁止你所在社区中的某个人服

[1] Milton and Rose 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 362.

食药用大麻来减少由于化疗而带来的恶心，请在道义上支持他与癌症及政府的战斗。如果你碰到一位在某个问题上支持亲自由政府的国会议员，去祝贺他。几年前，我在一个公众场合发表演说，发现还有一位演说者是斯坦霍尔姆（Charles Stenholm），他是德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我记得大概在20年前，他的跨党投票对里根总统削减预算和税收的一揽子计划得以在国会通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去向他道谢。他看上去很惊讶，可能是因为国会议员不习惯因为20年前的投票而被感谢，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没有习惯于被感谢。我在前面曾经提及，自由能引导人们建立社区。我在生活中还进一步学到，自由的行动主义建立了社区。你所接触的或接触你的为自由而战的人都会成为你终生的朋友。

但不要误解我的观点。有时候，自由会是一场战争。活动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19世纪中叶对美国最重要的自由至上事业——结束奴隶制的战斗——的看法仍旧适用于今天。他说：

没有奋斗就没有进步。那些表示支持自由但却不屑于行动的人，不过是些不耕田就要收获庄稼的人。他们想要没有打雷和闪电的雨，他们想要不会愤怒咆哮的大海。

奋斗可以是道德上的，可以是肉体上的，也可以既是道德上又是肉体上的，但必须是奋斗。没有需要，权力不会让步。它从不会让步，也永远不会让步。找到任何一个人们会平静忍耐的东西，你也就找到了强加于人们头上的不正义和错误的方式，这样的情况会继续下去，直到人们用语言、行动或同时使用两者进行抵抗。暴君的限制是

由受压迫者的忍耐力来规定的。^[1]

所以，别再耽搁了。当我们的自由被侵犯的时候，要大声地说出来，当别人的自由被侵犯的时候，也要这么做。追求一个更自由的世界，现在还不算太晚。

[1] Frederick Douglass, "The Significance of Emancipation in the West Indies," Speech, Canandaigua, New York, August 3, 1857, in *The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s*. Series One: Speeches, Debates, and Interviews. Volume 3: 1855 ~ 1863. Edited by John W. Blassingam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204.